

版權信息

《鄧小平時代》

傅高義 著

馮克利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譯校

英文版 © 2011 Ezra F. Vogel

中文版 © 2012 香港中文大學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本社已盡最大努力確認圖片之作者或版權持有人，並作出轉載申請。如發現遺漏，敬請與本社聯絡。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78-962-996-538-9 (平裝)

978-962-996-498-6 (精裝)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 cup@cuhk.edu.hk

網址: www.chineseupress.com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 Chinese)

By Ezra F. Vogel

Translated by Feng Keli

Edited by Editorial Divis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English edition © Ezra F. Vogel 2011

Chinese editio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38-9 (paperback)

978-962-996-498-6 (hardcover)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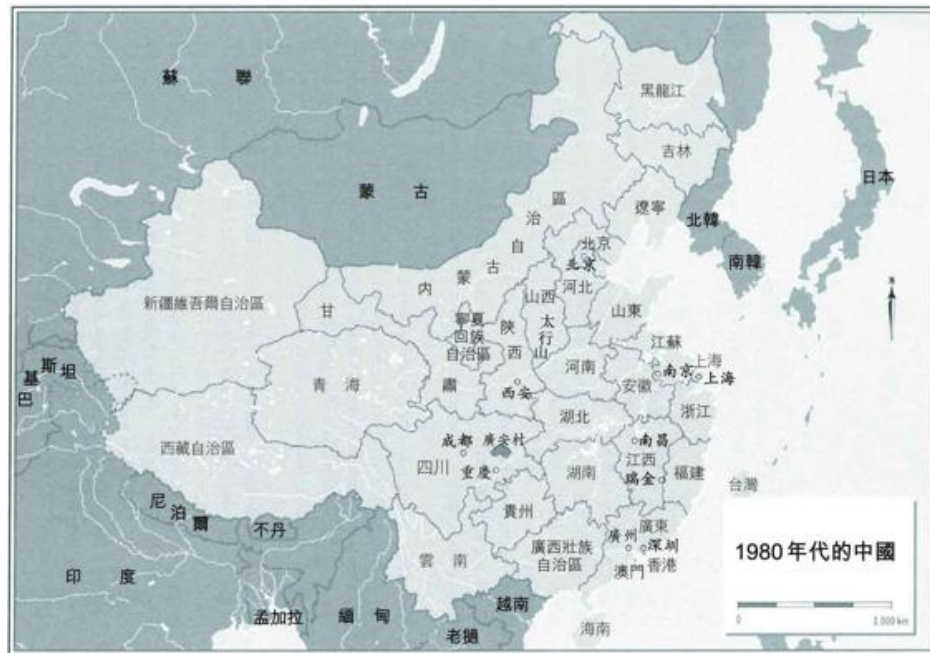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Pagebreak

獻給我的妻子艾秀慈
和那些決心幫助一個外國人理解中國的中國朋友們

地圖 1980 年代的中國



香港中文版序

傅高義

我寫這部關於鄧小平的書，心目中的讀者首先是西方讀者。作為一個研究中國事務長達半世紀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國人和西方人能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係，世界的未來會變得更好，而這又要求雙方達成更深的理解。在哈佛大學做了幾十年研究中國的教授，我也感到自己有一份特殊的責任，不僅是教育哈佛學生，也應當致力於教育普通的西方民眾，因為和美國其他大學一樣，我們所得到的支持也來自大學以外的廣大公眾。

2000 年我從哈佛退休時，決定專注於研究在我看來對理解今天的中國最為關鍵的問題：1978 年後中國轉型的性質；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動這場變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這場變革。成百上千萬的中國人在這場始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角色，但處在所有變化中心的人物是鄧小平。因此我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瞭解他所面對的問題的性質，以及他如何克服重重困難、協調各種不同的力量去達成那些不同尋常的變化。

鄧小平沒有留下可資史學家利用的私人檔案，很多重要決策也未公開。因此，研究鄧小平，研究他如何作出決策，以及他究竟做了些什麼，比起寫其他人的傳記要做更多的工作。我利用了能得到的一切文獻，包括已公開的資料如《鄧小平年譜》、《鄧小平文選》和各種官方出版物，並對高級幹部的子女和曾在鄧小平手下工作的年輕幹部進行了訪談。我也閱讀了與鄧小平共事的高層官員的紀念文字，使用了外國政府公佈的文件，以及會見過鄧小平的外國人的紀錄。我還感到有責任盡可能運用我在哈佛多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機會，去理解鄧小平及其時代。我也有機會訪問一些其他外國人不容易接觸到的西方官員。

幸運的是，我這本書得到不少好評，尤其是來自那些對鄧時代的中國有深入瞭解以及有幸見過並瞭解鄧小平的人。但是，也有一些外國評論家認為，我對鄧小平太客氣了，對他在毛澤東手下做過的一些事，對他在 1989 年 6 月對示威者的鎮壓，對他拒絕給民主化改革更多支持，我應當有更嚴厲的批評。然而我相信，細心的讀者應會看到我確實討論了所有這些問題，並且為許多對鄧持批評立場的人提供了有助於他們理解鄧小平言行的事實依據。我也確實講述了鄧小平批評者的意見和他們批評的理由。但是我相信，盡量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

在計劃出版這本書時，我並沒考慮出版時機，我打算寫完之後就出版。不過我認為它的出版時機還算幸運。假如在天安門事件後的最初幾年出版，很多西方人對鄧小平的敵意會使他們難以用超然的態度去看待鄧為已發生的變革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從 1989 年 6 月 4 日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我相信大多數西方人對天安門事件有了足夠客觀的態度，使他們願意思考鄧的歷史作用，就像我所做的嘗試一樣。

儘管這本書主要是為西方人而寫，我依然樂見中國和世界各地的華人讀者對它有興趣。我從 31 歲開始研究中國，許多有見識的中國人與我分享了他們的經歷與認識，使我受益匪淺；但我本人對書中所講述的事件，卻沒有他們作為過來人的那種親身體驗。中國有句俗語叫「旁觀者清」，意思是局外人有時可能比當事人更為客觀。很多有過痛苦經歷的中國友人向我坦承，作為事件的當事人，他們難以做到客觀，所以很想聽聽從事學術研究的局外人盡量以持平的立場提出的看法。很多喜歡網上閱讀的中國友人意識到，網絡上不斷重複的很多事情未必可靠。我希望我對 1978 至 1992 年發生的事情盡量做到客觀，盡可能排除各種謠傳，採用信實的材料，我希望我的這一努力將有助於海內外中國人盡量客觀地理解中國的發展。

中國國內的現狀尚不成熟，使中國學者還難以寫出一本客觀全面的研究鄧小平的著作。他們中有很多人比我更瞭解鄧小平生活與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希望在中國大陸的學者未來寫出這樣一本書之前，我的書能有助於中國讀者客觀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在書中記述了鄧小平的積極貢獻——他努力讓所有中國人過上富裕生活，維持與其他國家的良好關係，大力削減軍費，增強法律的作用，擴大普通民眾公開表達意見的機會等；我希望這對致力於改善中國人的生活、維持中國與外國良好關係的人們有所助益。

2012 年 3 月

香港中文版出版說明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傅高義 (Ezra F. Vogel) 教授的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是對鄧小平一生的完整回顧，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全景式描述。該書雖從鄧 1904 年出生寫起，但敘述重點為鄧 1977 年復出之後的政治生涯，縱貫鄧時代的起始、展開、挑戰和終曲，故香港中文版定名為《鄧小平時代》。

本書由馮克利先生翻譯，前後歷經兩稿。2010 年秋作者完成英文初稿後，譯者進行第一輪翻譯，作者據該譯本延請多位中國學者專家閱讀，繼而根據反饋意見對英文原稿進一步修改。及至 2011 年秋本書英文版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前，譯者再度根據英文編輯定稿進行第二輪翻譯。鑒於工程浩繁，蒙作者和譯者認可，本社編輯部承擔了本書譯校工作。譯校力求秉承作者嚴謹的學術作風，同時尊重譯者的翻譯風格。

本書的翻譯原則是在「中文化」和「陌生感」之間尋求有效平衡，即在符合中文讀者閱讀習慣的大前提下，適度保留直譯元素和翻譯色彩，以使中文讀者得以相對直接地分享作者特有的概念、分析思維和學術視野。例如：將「the radicals」直譯為「激進派」，而不採用中文特定語境中的「極左派」；將「the builders」、「the balancers」直譯為「建設派」、「平衡派」，而不譯為「改革派」、「穩健派」。

本書編輯過程中，對廣泛涉及各類中外文獻進行了嚴格查考。對直接或間接引自中文文獻的引文，力求恢復原始文獻中的記述；對引用的外文文獻，盡可能覆核出處。對部分有中文版的外文文獻，一併提供中文版出版信息。在註釋處理方面，所引用的中文文獻全部復原為中文，英文文獻則保持原狀，其中常用英文文獻的縮寫一併保留，例如 *SWDXP-2*，即《鄧小平文選（1975–1982）》英文版（詳見本書注釋部分的英文文獻縮寫對照表）。本書索引以邊碼方式從英文原著，以便有研究需要的讀者查閱。

本書在翻譯、校訂、編輯、出版過程中有幸得到熊景明、陳方正、肖夢、南希 (Nancy Hearst)、竇新元，以及北京三聯書店董秀玉、李昕、舒燁、葉彤等諸多人士的大力協助與支持，謹表謝忱。

本書編輯完成後，又榮幸地得到孫萬國先生的全面審讀和修訂。孫萬國先生在訂正錯訛、復原中文文獻、補充史料等方面貢獻甚巨，專此致謝。

本書在內容上完全忠實於英文原著，並經作者核實後對英文版疏漏之處有所訂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擁有本書中文翻譯版權，其他所有繁、簡體中文版均以此譯本為母本。

2012 年 4 月

前言

探尋鄧小平

2000 年夏我在南韓濟州島。一天，悠閒地用過戶外晚餐後，我心情放鬆地對我的友人、20 世紀美國最了不起的東亞事務記者之一唐·奧伯多弗（Don Oberdorfer）說，我就要退出教學工作，想寫一本書，幫助美國人瞭解亞洲的重要發展。很多人都說，我在 1979 年出版的 *Japan as Number One*（《日本第一》）有助於美國商界和政界的一些領袖對 1980 年代震撼不少西方人的日本崛起有所準備。那麼，站在 21 世紀的起點上，做點兒什麼最有益於幫助美國人理解亞洲未來的發展呢？唐在過去半個世紀裏一直進行亞洲事務的報道，他毫不遲疑地說：「你應該寫鄧小平。」思考了幾周後，我斷定他說得對。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而對中國的現代歷程造成最大影響的人是鄧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鄧小平的人生和事業，可以揭示近年來塑造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

寫鄧小平並非易事。1920 年代鄧小平在巴黎和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就學會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記憶力——他身後沒有留下任何筆記。文革期間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錯誤紀錄，但沒有找到任何書面證據。為正式會議準備的講話稿均由助手撰寫，有紀錄可查，但其餘大多數談話或會議發言都不需要講稿，因為鄧只靠記憶就能做一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條理分明的講話。此外，就像黨的其他高層領導人一樣，鄧小平嚴守黨紀。即使在文革期間和妻子兒女下放江西時，他也從來不跟他們談論黨內高層的事，儘管他們也是黨員。

鄧小平批評那些自吹自擂的自傳。他沒有寫自傳，並且堅持別人對他的任何評價都「不能誇大，不能太高」。^[10-11]事實上，鄧很少在公開場合回憶過去的經歷。人們都知道他「不愛說話」，出言謹慎。因此，相比於通常情況下研究某位國家領導人，寫鄧小平和他的時代，是一項更不尋常的挑戰。

遺憾的是，我從來無緣與鄧小平本人會面並交談。1973 年 5 月，我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贊助的代表團成員初次去北京訪問時，見過周恩來和其他一些高官，但沒有見到鄧小平。那次訪問給我留下的最強烈印象之一是，鄧小平剛剛結束了文革下放回到北京，高層內部正對此事議論紛紛，對於他將擔任某種重要角色並帶來重大變化抱有很高的預期。擔任什麼角色？帶來哪些變化？我們西方人都在猜測，但誰也沒有預料到後來 20 年中國行將發生的巨變，以及中國的未來會在多大程度上被這位非凡領導人的努力所推進。

我最接近鄧小平的一次，是 1979 年 1 月在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館的招待會上，當時我離他只有幾步之遙。這個招待會是一次盛大的集會，來自政界、媒體、學界和商界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齊聚一堂，慶賀美中兩國正式建交。我們參加招待會的很多人已相識多年，過去常在香港見面——當中國對大多數西方人緊閉大門時，香港是中國觀察家聚會的重要地點，在那裏我們分享最新消息或傳言，力圖穿透帷幕。而我們中一些人已久未謀面，於是熱切地攀談敘舊。此外，舉行招待會的國家美術館的音響效果十分糟糕，不是個適合演講的地方，從擴音器中完全聽不清鄧小平和譯員在說些什麼。於是我們這群聚在一起的中国觀察家同行朋友繼續著自己的交談。據接近鄧小平的人說，這群嘰嘰喳喳、心不在焉的人令他懊惱。然而他給我們大多數在場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對著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聽的中國聽眾一樣唸著講稿。

因此，我要瞭解鄧小平，就像一個歷史學家要去瞭解自己的研究主題一樣，只能通過研讀文字材料。而關於鄧小平一生的不同方面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紀事。儘管鄧小平告誡寫作者不要吹捧，但在官方或半官方歷史寫作中，褒揚英雄、貶抑他人的傳統在中國依然流行。由於另一些官員也會有秘書或家人寫一些溢美的文字，細心的讀者便可以對這些不同的紀錄進行比較。黨史專家中也有一些出於職業責任感而秉筆直書的人。

隨著更多黨內檔案的公開，未來將有更多寫鄧小平的書。但我相信，對研究鄧小平的學者而言，沒有比現在更好的寫作時間。很多基本的年譜資料已被整理和發表，大量回憶錄已出版，況且我還有一個以後的歷史學家無法再有的機會：我得以跟鄧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這些同事的家人會面交談，他們為我提供了一些未必能從文字材料中獲得的見解和細節。過去幾年中，我總共花了大約 12 個月的時間在中國、用中文採訪了那些瞭解鄧小平及其時代的人。

就研究鄧小平事蹟的客觀紀錄而言，最基本的一部文獻是《鄧小平年譜》：2004年先出版了兩卷，共計1,383頁，從官方角度記錄鄧小平從1975年直到1997年去世前幾乎每一天的活動；2009年又出版了三卷，共計2,079頁，記述1904年到1974年鄧小平的生平。由黨史學者組成的編寫這部年譜的班子可以接觸到大量黨內檔案，並力求做到記錄準確。年譜不提供解釋，不進行褒貶，不作揣測，沒有涉及一些最敏感的主題，也不提政治鬥爭。不過，它對於確定鄧小平曾在何時跟何人會談，以及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之間說了些什麼，都大有幫助。

鄧小平的很多重要講話經過編纂整理後，收入了官方的《鄧小平文選》。這部三卷本的著作提供了關於鄧的很多重大政策的有用紀錄，儘管，極為關鍵的是，仍需要參照當時國內和國際事件的大背景對之作出詮釋。有關陳雲、葉劍英和周恩來的重要講話和文章的編年資料同樣很有幫助。

最有助於深入理解鄧小平個人思想的著作，是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毛毛）所寫的有關復出之前的鄧小平的兩部書。它們是根據她的個人回憶，她對瞭解鄧小平的人的採訪，以及中共檔案寫成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鄧榕一般都會陪同父親外出。儘管鄧小平不跟家人談論高層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瞭解國家形勢，所以足以領會和理解他關切的問題和考慮問題的方法，其中有些東西也只有他們看得到。其中《我的父親鄧小平》講述了1949年以前鄧小平的經歷，另一部《鄧小平：文革歲月》記述的是1969年至1973年間她陪同父母從北京下放到江西省的歲月。她在書中明顯表露出對父親的感情和崇敬，描繪了一個十分正面的人物形象，但是她也講述了很多細節，揭示了不少鄧小平的品格和態度。事實上，考慮到黨的政策限制，以及她要描繪一個正面形象的努力，她已經是驚人地坦白、開放和具體了。她在寫這些書時得到了黨史學者的協助，由他們核對日期、人名和事件。她的寫作仍在繼續，正在寫建國初期鄧小平的活動，但還未寫到1973年之後仍很有爭議的時期。她慨然同意接受我的幾次長時間採訪，對她所寫的內容進行補充說明。

在我扎進大量中文文獻之前，有些英文著作為我研究鄧小平時代提供了很好的起點，但除了孫萬國和弗利德里克·泰偉斯（Frederick Teiwes）的著作外，它們大多撰寫於為紀念鄧小平百歲誕辰而出版的年譜和回憶文字面世之前。以下作者的著作令我格外受益：鮑瑞嘉（Richard Baum）、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梅勒·谷梅（Merle Goldman）、馬若德（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莫里斯·邁斯納（馬思樂）（Maurice Meisner）、錢其琛、陸伯彬（Robert Ross）、阮銘、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泰偉斯、孫萬國和于光遠。

理查德·伊文思大使是一位聰明幹練的英國外交官，1984年至1988年任英國駐華大使。他根據自己和鄧小平的會談以及英國政府文件，寫了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0-2]。此書主要涉及鄧小平在1973年以前的經歷，為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提供了一個文筆極佳的概述。在西方的政治學者中間，鮑瑞嘉對鄧小平時代的政治做了最為細緻的研究，寫成 *Burying Mao*（《埋葬毛澤東》）一書。他利用了1994年其著作出版之前可見的中國資料和香港分析家的著作。他慎重使用了香港的報道，我則極少使用，因為很難核實它們的信息來源，故而很難評價其可靠性。莫里斯·邁斯納（馬思樂）是一位很有思想、熟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他的 *The Deng Xiaoping Era*（《鄧小平時代》），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作為背景研究了鄧小平。我在費正清研究中心長期共事的同事梅勒·谷梅在她的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在中國播種民主：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改革》）一書中，回顧了鄧小平時代不斷變化的思想潮流。她利用的材料不僅有出版物，還有她跟書中所記的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交談。*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0-3]的作者阮銘在1983年被黨內保守派清除出黨之前是中央黨校的研究人員。他流亡美國後，激烈批評了那些拖改革後腿的保守派意識形態宣傳家。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0-4]的作者錢其琛，在鄧小平時代的大多數時間擔任外交部長和副總理，他的著作對這個時期的外交政策做了中肯的、信息豐富的紀錄。幫鄧小平起草過三中全會講話稿的于光遠，在 *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0-5]一書中講述了這個歷史轉折點。由於我參與過這兩本書的英譯本編輯工作，所以有機會同這兩位和鄧有密切工作關係的前官員進行補充性討論。

已故的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是一位記者，也是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新皇帝：毛鄧時代的中國》）的作者。毛澤東去世不久後他有機會見到中國的幾位主要領導人。雖然他的一些描述——例如鄧小平和三線工業的關係——顯示出嚴重誤解，但他較其他記者而言接觸到更多材料，並且講述了當時人所不知的新鮮觀點。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鄧小平上台時擔任 *The China Quarterly*（《中國季刊》）的主編，1992 年鄧小平退出權力舞台不久後，他召集一些學者對鄧小平及其時代進行評價，並把這些評價文章收入了他編的 *Deng Xiaoping*（《鄧小平》）一書。

泰偉斯和孫萬國為寫作他們的三卷本著作，較之所有西方學者掌握了更多 1974 年至 1982 年這個時期的中文文獻。他們出版的第一卷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毛時代的終結》）的時間跨度是 1974 年到 1976 年。他們仔細評估關於各種事件的不同解釋，旨在以極為細緻的方式釐清基本事實。孫萬國在過去 20 年裏致力於探究這個時期的每一個重要事實，其堅持不懈超過了我所認識的其他任何人。後來他還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核對我手稿的不同版本，修正錯誤、建議補充說明及推薦關鍵性著作。

博士卓所著 *The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中國改革的困境》）是有關這個時期經濟論戰的最好的英文著作。陸伯彬寫了幾本研究這個時期外交關係的傑作。窮數十年之力研究中國精英政治和文革的馬若德（麥克法夸爾），撰寫過三卷本的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6-6]，並與沈邁克合著講述文革史的 *Mao's Last Revolution*^[7-7]。我認識所有這些作者，並就鄧小平及其時代與他們進行過交談。他們總是慷慨地對我補充他們書中所述，使我對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已經面世的中文資料浩如煙海，即使最傑出的中國學者也無法全部閱讀。從 1990 年代開始，又可以從中文互聯網上獲得爆炸般增長的信息。我一直得到許多研究助理的協助，其中尤其應當提到任意和竇新元。任意的祖父是前廣東省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一位了不起的廣東改革派領導人。竇新元曾在廣東省經委工作多年，他既有個人經驗，又具備學者從歷史文獻中探知真相的毅力。任意和竇新元兩人都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幫我搜集大量材料，並力求深入理解不同立場的中國人的感受和行為。姚監復曾是趙紫陽領導下的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官員，也花了數周時間閱讀我手稿中有關經濟的章節。

中文互聯網是查詢人名和日期這類問題的難得的信息源，但除此之外，往往很難區分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臆想或趣聞。如果互聯網上的一些文章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沒有註明來源，我會盡量核查原始出處，或至少在採用前將之與另一些資料進行比較。這樣做時，我發現 *China Vitae* 是一個有關在世的中國官員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網站。

和鄧小平一起工作過的官員所寫的回憶文章可謂汗牛充棟。三卷本的《回憶鄧小平》是這類文獻中最好的文集之一，類似的文集還有三卷本的《鄧小平人生紀實》。《炎黃春秋》和《百年潮》這兩本出色的雜誌發表了很多與鄧小平一起工作過的人撰寫的文章。《炎黃春秋》是由既瞭解內情又有改革意識的前任高官主辦的刊物。從保守派官員鄧力群所寫、出版於香港的《十二個春秋（1975–1987）》，以及他在當代中國研究所——這個由他建立的研究所，為很多研究建國後重大事件的歷史著作提供了條件——的未發表的講話中，可以看到另一種觀點。

還有很多有關這個時期的所有關鍵人物——包括陳雲、谷牧、胡耀邦、萬里、葉劍英和趙紫陽——的文獻，往往是出自優秀的記者之手，他們提供了各不相同的視角。最出色的記者所寫的有關鄧小平的著作是楊繼繩的《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官方歷史如《陳雲傳》，雖經過精心編輯，仍是以文獻資料為基礎。朱佳木談陳雲的書（朱佳木、遲愛萍、趙士剛著：《陳雲》）雖然簡略，卻得益於他為陳雲當過五年助手的經歷和他本人的細心研究。除了《鄧小平年譜》外，還有一些官方為陳雲、周恩來、葉劍英以及其他一些與鄧小平有密切工作關係的高官編訂的年譜。

另一部極有價值的文獻，是有關 1949 年後中國歷史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簡稱《國史》）。該書已出版七卷，仍有三卷待刊，由中國大陸的學者撰寫，包括高華（已故）、陳東林、韓鋼、沈志華、蕭冬連等人。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由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為這個時期客觀全面的學術研究樹立了新的標準。

雖然中國政府已大大放寬了人們的寫作空間，但大陸一些知情的局內人所寫的東西仍被認為爭議太大，無法在大陸出版。香港的出版業則更加開放，因此很多這類著作在香港出版。其中信息最豐富的是鄧力群、胡績偉、楊繼繩、趙紫陽和宗鳳鳴的著作。在寫過回憶錄的改革派官員中，有《人民日報》前總編胡績偉，他寫了《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書。

中國大陸沒有出版胡耀邦的年譜，但他大陸的朋友在香港出版了兩部篇幅浩大的年譜，一部是盛平編的《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另一部是鄭仲兵編的《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還有張黎群等人所寫的三卷本《胡耀邦傳》，其中二、三卷迄今仍未出版。胡耀邦的朋友彙編了四卷本文集《懷念耀邦》，編者為張黎群等，在香港出版。在大陸方面，胡耀邦的女兒用「滿妹」的筆名發表了《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

趙紫陽 1989 年後被軟禁在家期間，設法記錄下他的個人經歷和觀點，並被譯成英文以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⁰⁻⁰¹ 為書名出版，編者是鮑樸、蔣悅磊（Renee Chiang）和殷阿笛（Adi Ignatius）。1989 年之後，趙紫陽與之交談時間最長的局外人是宗鳳鳴，他寫了《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趙紫陽並未授權宗鳳鳴寫下這些回憶，但他授權出版並親自審閱了與記者楊繼繩進行的三次主題集中的談話紀錄，該紀錄發表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這些著作包含對鄧小平一些做法的嚴厲批評，提供了有別於大陸出版文獻的富有價值的視角。

我還觀看過記錄鄧小平的講話、會見、出訪以及與家人休閒的紀錄片。我的研究助理還應我要求翻譯了一些俄文文獻。

除了上述有關鄧小平時代的一般性著作，我還使用了很多與本書某些特定問題相關的專業文獻（見註釋及英文、中文和日文文獻的線上目錄 <http://scholar.harvard.edu/ezravogel>）。

除了多次在中國的短期訪問外，我也有數次在北京較長時間居住的經歷：2006 年住了五個月，2007 年一個月，2008 年數周，2009 年一個月，2010 年數周。這使我有機會採訪到三類知情人士：黨史專家、高幹子女和在鄧小平手下工作過的幹部。除了幾位會講英語的中國人選擇用英語交談，其他訪談都是直接使用漢語，沒有翻譯在場。具體而言，我受益於同朱佳木、程中原、陳東林和韓鋼的深談，他們都是專治黨史的傑出歷史學家。我也採訪過鄧小平的兩個女兒（鄧榕和鄧林）、陳雲的兩個子女（陳元和陳偉力）、胡耀邦的兩個兒子（胡德平和胡德華）。此外我還採訪過陳毅、紀登奎、宋任窮、萬里、葉劍英、余秋里和趙紫陽等人的子女。他們都是聰明、有頭腦的人，出言謹慎且深懷孝心。他們的具體回憶令人感受到他們的父母及父母的同事的氣息。

我採訪過的前任官員中既有鄧小平的仰慕者，也有他的嚴厲批評者。後者認為鄧沒有充分支持胡耀邦和知識分子，悲劇性地喪失了推動政治改革的良機。有些人是曾與鄧小平共事或在鄧手下工作過的著名官員，包括前外交部長黃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前副總理錢其琛和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所有這些官員都已退休，這使我們之間的交談可以比他們在任時更為放鬆。

我還受益於對一些有才華的退休官員的採訪，他們曾為鄧小平工作過，其中有些人現在還在給《炎黃春秋》寫文章，如杜導正、馮蘭瑞、孫長江、吳明瑜、楊繼繩和已故的朱厚澤。有些人因政言而一時受到過批評或警告，但大體上他們享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此外，我也有機會採訪中國一些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學者。與那些曾在鄧小平手下工作過的黨政幹部相比，即使是身為黨員的學者一般也不太瞭解黨內的事情，但他們往往有機會認識一些要人，有些人閱讀廣泛並仔細研究過可以看到的文件。

雖然一些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都在研究黨史，如中央黨校、幾所大學和當代中國研究所，但是研究人員最多、文獻最豐富、接觸黨內資料最便利的部門，還是中共中央委員會轄下的中央文獻研究室。該機構的大約 15 名工作人員編寫了《鄧小平年譜》。此外，目前還有大約 15 人正在編寫官方的鄧小平傳，預計將在未來幾年內完成。

多年來，我在哈佛有機會與諸多來訪的中國官員和學者交談，他們中有些人十分熟悉北京的政局。其中有一批傑出的政治異見人士，他們極有才幹，富於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在 1980 年代與黨的正統發生衝突。我同陳一諮、戴晴、高文謙、已故的劉賓雁、阮銘和已故的王若水等人的交談均使我受益匪淺。我也跟天安門「六四」事件中的學生領袖王丹有過交談，還和曾因 1978 年在民主牆貼出著名的大字報〈論第五個現代化〉而被判刑 15 年的魏京生交談過。我也跟較年輕的前官員，如吳國光、吳稼祥（後來回到北京）和郁奇虹進行過交談，他們都曾在中央機關工作過。我也從在北京和哈佛結識的經濟學家尤其是樊綱、盧邁和錢穎一那裏深受教益。

除了以上提及的這些人外，我還採訪過鮑樸、儲百亮（Chris Buckley）、陳方安生、陳廣哲、陳昊蘇、陳開枝、陳偉力、陳先奎、陳小魯、陳元、陳知涯、鄭在浩、鄧英淘（已故）、杜芬（John Dolfin）、德賴斯代爾（Peter Drysdale）、杜蒲、杜瑞芝、杜潤生、高華（已故）、高尚全、高西慶、龔育之（已故）、顧汝德（Leo Goodstadt）、何方、何理良、胡曉江、黃平、黃仁偉、紀虎民、江綿恒、金沖及、劉遵義、冷溶、梁振英、李德全、李捷、李君如、李普、李盛平、李慎之（已故）、李向前、林京耀、柳述卿、劉亞偉、陸恭蕙、龍永圖、盧躍剛、羅援、馬立誠、馬沛文、馬誠禮（Charles Martin）、狄迪（Dede Nickerson）、彭定康（Chris Patten）、皮尼（Mario Pini）、沙祖康、單少傑、申再望、宋克荒、宋一平、孫剛、曾蔭權、萬叔鵬、王建、王軍濤、王雁南、王毅、吳敬璉、吳南生、蕭冬連、熊華源、嚴家其、楊成緒、楊啟先、楊天石、葉選基、葉選廉、葉劉淑儀、余曉霞、曾彥修、翟志海、章百家、張國新、張顯揚、張星星、張新生、張穎、張蘊嶺、趙樹凱、鄭必堅、鄭仲兵、周明偉、周牧之、周琪和朱啟禎。我感謝所有幫助過一個

外國人理解中國的中國朋友和熟人。不過他們對我的任何觀點都不負有責任。我的看法是我本人根據所接觸的各種資料而作出的最佳判斷的產物。

為了更好地感受鄧小平經歷過的環境，我去鄧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點分別小住過數日，包括他的出生地四川廣安縣，他打過八年遊擊戰的山西太行山，1949 年到 1952 年他擔任西南局負責人時的基地——重慶和成都，以及 1930 年代初他生活過幾年的江西瑞金。我還走訪過上海近郊陳雲的出生地青浦。每到這些地方，當地學者和幹部會向我深入講解博物館裏的資料和實物，有助我在當地環境中理解鄧小平的角色。

我曾前往新加坡與前總理李光耀交談，他對鄧小平的瞭解大概不亞於任何其他外國領導人；我也訪問了前總理吳作棟、前中國沿海經濟開發區顧問吳慶瑞和總統納丹（S. R. Nathan）等官員。我還與一些學者進行過長談，尤其是王廣武、黃朝翰和鄭永年。在香港，我會見過楊振寧和鄭維健，後者與其岳父包玉剛同往中國大陸時，曾多次見到鄧小平，而包玉剛這位香港船王跟鄧小平見面的次數多於中國大陸以外的任何人。

在澳洲，我有幸與前總理羅伯特·霍克（Robert Hawke）、前駐華大使羅斯·加諾特（Ross Garnaut）、前外交部官員理查德·賴格比（Richard Rigby）、羅傑·尤倫（Roger Uren）等人交談。此外，我去莫斯科時會見過列夫·德留辛（Lev Deliusin），他在中國住了多年，主持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寫過一本有關鄧小平的書。亞歷山大·潘索夫（Alexander Pantsov）——一位細心嚴謹的學者，目前在美國教書，熟諳有關毛澤東和鄧小平以及謝爾蓋·齊赫文斯基（Sergei Tikhvinsky）的俄語文獻——與他的討論使我尤其受益。

我還數度前往英國，尋訪對鄧小平有特別見識的人，故與前駐華大使阿蘭·唐納德爵士（Sir Alan Donald）和理查德·伊文思、前任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進行過交談。我還在北京會見過前駐華大使安東尼·格爾斯沃齊爵士（Sir Anthony Galsworthy），同香港前行政長官董建華也有過交談，並多次與香港和北京談判小組的成員之一邵善波座談。

我在日本與之進行過交談的有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駐華大使阿南惟茂、國廣道彥、谷野作太郎；還有日本外務省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如島中篤、加藤弘一和下荒地修二；以及十分瞭解日本外交政策的川島裕、東鄉克彥和渡邊宏二等博學之士。我還同日本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專家做過交談，特別是平野健一郎、川島真、國分良成、毛里和子、添谷芳秀、高木誠一郎、高原明生、田中明彥、辻康吾、矢吹晉和山田辰雄。益尾知佐子和杉本孝這兩位日本的中國問題學者使我受益尤多，他們也是本書日文版的翻譯。益尾知佐子寫過一本論述鄧小平外交政策的傑作，她協助我搜集日文文獻，其中包括日本政府的解密文件。

我有幸跟一些見過鄧小平的美國官員進行過交談，包括前總統占美·卡特（Jimmy Carter）和前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他們都是 1979 年與鄧小平有過關鍵性會面的人物；還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我也同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已故的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有過交談，他們曾是負責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白宮要員。尼克遜的女婿、曾跟岳父一起見過鄧小平的愛德華·考克斯（Edward Cox），和我分享了他的回憶。我還同一些前美國駐華大使交談，包括恒安石（Arthur Hummel，已故）、李潔明（Jim Lilley，已故）、洛德（Winston Lord）、喬·普理赫（Joe Prueher）、桑迪·雷德（Sandy Randt）、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尚慕傑（Jim Sasser）和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已故）。伍德科克大使的遺孀莎朗·伍德科克（Sharon Woodcock）友好地與我分享了她丈夫的文件。我也有幸同一些任職於白宮、國務院或美國政府其他部門的中國問題專家交談，他們是阿馬柯斯特（Mike Armacost）、克拉克（Chris Clark）、費舍爾（Richard Fisher）、傅立民（Chas Freeman）、格里斯（David Gries）、希爾（Charles Hill）、凱德磊（Don Keyser）、科雷斯伯格（Paul Kreisberg）、黎赫白（Herb Levin）、李侃如（Ken Lieberthal）、麥卡希爾（Bill McCahill）、包道格（Doug Paal）、卜勵德（Nick Platt）、容安瀾（Alan Romberg）、芮效儉、索樂文（Richard Solomon）、斯皮爾曼（Doug Spellman）、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沙利文（Roger Sullivan）、沙特（Robert Sutter）、宋賀德（Harry Thayer）和湯姆森（John Thomson）。我過去的兩名學生李淑珊（Susan Lawrence）和劉美遠（Melinda Liu）曾多年在北京從事報道，十分慷慨地同我分享了他們的時間和見解。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白麗娟（Jan Berris）一向是我獲得各種有關人與事的信息的一個絕佳來源。我還訪問過鄧小平的四位翻譯：冀朝鑄、施燕華、唐聞生與已故的章含之。

我還受益於仔細閱讀過本書全部手稿的柯文（Paul Cohen）、傅士卓、谷梅、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凱德磊、黎安友（Andrew Nathan）、賽奇（Tony Saich）和沈大偉。還有一些人細心閱讀過部分手稿，也令我感到榮

幸，他們是白志昂（John Berninghausen）、葉敘理（Ashley Esaray）、坦梅·戈爾斯坦（Mel Goldstein）、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藍普頓（Mike Lampton）、拉里（Diana Lary）、李淑珊、李成、林重庚、林至人（Edwin and Cyril Lim）、林培瑞（Perry Link）、麥卡希爾、芮爾登（Lawrence Reardon）、陸伯彬、芮效儉、撒母耳斯（Richard Samuels）、索樂文、宋怡明（Mike Szonyi）、懷默霆（Martin Whyte）和賴特（Dalena Wright）。（閱讀過第 18 章手稿的人見該章列表。）中國的一些黨史專家，如陳東林、程中原、韓鋼、齊衛平、沈志華、蕭延中、楊奎松和朱佳木，也閱讀過先前被譯成中文的手稿，幫助改正了一些錯訛之處。不過，只有我本人對尚未糾正或在他們閱讀後仍未發現的錯誤負責。

與哈佛大學同事的討論讓我獲益匪淺，他們是安守廉（William Alford）、包弼德（Peter Bol）、張伯廣（Julian Chang）、柯文（Paul Cohen）、科爾登（Tim Colton）、溫奈良（Nara Dillon）、歐立德（Mark Elliott）、傅士卓、谷梅、戈迪溫（Steve Goldstein）、何曉清（Rowena He）、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蕭慶倫（William Hsiao）、江憶恩（Iain Johnston）、柯偉林（Bill Kirby）、凱博文（Arthur Kleinman）、馬若德（麥克法夸爾）、奧格登（Suzanne Ogden）、歐偉倫（Bill Overholt）、德懷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Liz Perry）、陸伯彬、賽奇、宋怡明、戴胡慧心（Tam Tai）、杜維明、王甯、華琛/屈順天（James L. Watson）、瓦特夫婦（John and Anne Watt）、懷默霆、韋傑夫（Jeff Williams）、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沃爾夫（David Wolff）。我也同其他地方的學者討論過相關問題，他們包括白志昂、伯恩斯坦（Tom Bernstein）、陳廣哲、大衛斯（Deborah Davis）、杜芬、高爾德（Tom Gold）、坦梅·戈爾斯坦、桂本青、藍普頓、林培瑞、趙文詞（Richard Madsen）、戴慕珍（Jean Oi）、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白魯恂（Lucian Pye，已故）、賽繆爾斯（Dick Samuels）、沈大偉、謝淑麗（Susan Shirk）、索林格（Dorie Solinger）、謝德華（Ed Steinfeld）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

我還得到過以下人士的幫助：安和麗（Holly Angell）、夏滴翠（Deirdre Chetham）、埃斯帕達（Jorge Espada）、高申鵬、吉伯特（Elizabeth Gilbert）、羅索（Anna Laura Rosow）、索耶爾（Kate Sauer）、石文嬰和張煒。同在哈佛查閱 1949 年以後資料的所有學者一樣，我對費正清研究中心馮漢柱圖書館的館長南希（Nancy Hearst）深懷感激，她一向以對資料的驚人熟悉和似乎無限的熱誠，去幫助學者找到他們所需要的信息。她曾數次糾正我的筆記，核對我的手稿。隨著中國在 21 世紀變得日益重要，我們在哈佛享有的特殊優勢愈發凸顯出來——我們得以利用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Fairbank Center Collection of the Fung Library at Harvard）的特藏，它們對研究當代中國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其中很多文獻不但在西方的其他圖書館見不到，在中國也無法見到。

我還要感謝熊景明，她以同樣的幫助學者的熱誠，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搜集並創造性地整理了中國大陸以外這一時期最完整的文獻收藏。我也有幸得到亞特蘭大卡特圖書館館員的協助，他們幫我查找和使用了卡特政府的文件。我的編輯伊爾·哈伯特（Earl Harbert）認真細緻，逐行逐句地加工手稿，以便讓那些不是中國專家的人更易於理解。我的手稿編輯茱麗葉·卡爾松（Julie Carlson）既有創意又工作投入，不辭勞苦地幫我使手稿最後成型。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凱薩琳·麥克德默特（Kathleen McDermott）也發揮其創造精神，熱情勤奮地照料著與本書出版有關的方方面面。

我的妻子艾秀慈是中國人類學專家，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始終是我的思想伴侶。她以最大的耐心為一個身不由己的工作狂提供了平衡及精神支持。

雖然我在 1993 年到 1995 年擔任過與東亞事務有關的美國國家情報官員，但在本項研究過程中我沒有接觸過任何保密資料。所有關於事實的陳述、表達的意見或分析，均出自作者本人。書中提供的任何材料都不反映中央情報局或其他美國政府部門的官方立場或觀點。書中任何內容都不應被推測為表明或暗示美國政府對作者觀點進行過信息認證或認可。這份材料已經中央情報局審核，以防保密信息外洩。

[0-1]SWDXP-3, p. 307.

[0-2]中文版為理查德·伊文思著（武市紅等譯）：《鄧小平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中文版編者註

[0-3]中文版為阮銘著：《鄧小平帝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中文版編者註

[0-4]中文版為錢其琛著：《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中文版編者註

[0-5]中文版為于光遠著：《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中文版編者註

[O-6]中文版為馬若德（麥克法夸爾）著（魏海平、艾平等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兩卷本（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同書另有北京：求實出版社 1989—1990 年本。——中文版編者註

[O-7]中文版為馬若德（麥克法夸爾）、沈邁克著（關心譯，唐少杰校）：《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2009）。——中文版編者註

[O-8]香港版為《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台灣版為《國家的囚徒》（台北：時報出版，2009）。——中文版編者註

導 言

這個人和他的使命

1979 年 3 月，港英總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飛往北京，就香港問題作出說明。麥理浩通曉漢語，且廣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將與一位高級官員見面，抵京之後才高興地獲悉，即將與他會面的是剛被任命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9-9]這次不公開的會見在人民大會堂進行，麥理浩向鄧小平談到香港正面臨日益增多的困難。雙方都知道，自鴉片戰爭以來英國一直統治著香港這塊殖民地，但香港大部分土地的租約將於 1997 年到期。麥理浩總督採用外交辭令，字斟句酌地談到有必要讓港人放心，因為他們對 1997 年之後的前景深感憂慮。鄧小平仔細聽取了港督的關切。當會談結束後他們起身走向門口時，鄧小平向麥理浩做了個手勢，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聽到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幾的主人對他說：「你如果覺得統治香港不容易，那就來統治中國試試。」^[10-10]

鄧小平深知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爛攤子。在上一個十年開始的時候，大躍進已造成三千多萬人死亡；國家仍因文革的混亂而步履蹣跚——在文革中，年輕人被動員起來批判高級幹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們拉下馬，使這個接近十億人的國家陷入一片混亂。當時佔人口總數 80% 的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區區 40 美元，人均糧食產量還不及 1957 年的水平。

軍隊幹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趕下台的老幹部，但他們對自己佔據的職位既無準備又缺少素養。軍隊變得臃腫不堪，並疏於軍務，有些在地方任職的軍隊幹部享受著當官的特權，卻不務正業。交通與通信設施破敗不堪。大型工廠的生產仍在採用 1950 年代從蘇聯進口的技術，設備也處於失修狀態。

大學在過去十年裏基本上被關閉。知識青年被迫下放農村，但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裏變得越來越困難。城市又無法為他們提供就業，更不用說那些想進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萬農民。再者，城市居民擔心自己的飯碗，並不歡迎新來的人。

一些大膽的幹部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澤東本人，但是鄧小平認為，過去 20 年的失敗不能全歸罪於一人，用他的話說，「我們大家都有份」。毛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但在鄧小平看來，更大的問題是導致這些錯誤的制度缺陷。政治體系控制到每家每戶的做法搞過了頭，造成了恐懼和主動精神的喪失；對經濟體系的控制也搞過了頭，導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國的領導人究竟怎樣才能做到既維持國家穩定，又為社會鬆綁？

文革前的十多年裏，沒有誰比鄧小平在建設和管理這個舊體制上承擔過更多責任。1969 年至 1973 年鄧小平下放南昌的三年半裏，也沒有哪個中國高官比他更深入地思考過中國的舊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需要做些什麼。

1978 年時，鄧小平對於如何做到民富國強並無清晰的藍圖，他承認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並且一再重複這句如今已廣為人知的話。^[10-11]不過，他在思考如何開展工作時，確實有一個框架。

他要讓中國向世界各國的科學技術、管理體制和新思想敞開大門，無論那個國家屬於什麼政治制度。他很清楚，亞洲的新興經濟體——日本、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正以其他任何國家未曾有過的速度快速發展。然而鄧小平也明白，不能全盤照搬國外的整個制度，因為任何外來制度都不適合中國的特殊需要——中國有著豐富的文化傳統，它幅員遼闊，各地差異很大，而且十分貧窮。他認識到了一些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沒有認識到的事情：單靠開放市場並不能解決問題，必須逐步建立各種制度。他要鼓勵幹部開闊視野，到各國學習成功經驗，帶回有發展前景的技術和管理方式，通過試驗來確定能在國內行之有效的辦法。他要幫助鋪平中國與其他國家發展良好關係之路，使它們願意與中國合作。

為使這項重建工作有序進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唯一能夠掌控這個過程的組織。在 1978 年的中國，最有經驗的領導，是那些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就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需要讓他們重新回來工作。要派年輕人去海外學習，從世界各地帶回最好的觀念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採用這些新的做法將帶來巨大的破壞性。即使共產黨也要從根本上轉變它的目標和工作方式。

作為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並不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提出新思想，他認為自己要負責的是設計和建立新體制這一顛覆性的過程。他要承擔最後責任，作出正確判斷。他要挑選一個與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導這個體制的過程中能夠與他

分擔責任；他必須迅速建立起一套組織，使他們能夠一起有效地開展工作。他要得到有關國內真實情況和國際形勢的最佳信息。他要給人們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澤東在 1958 年那樣使人產生不切實際的預期。他要向幹部群眾說明國情，也要調整變革的步伐，使之能夠被人民接受，使國家不至於分裂。雖然他掌握著很大權力，但他知道必須敏於觀察他的同事間的政治氣氛，畢竟他要依靠這些人去貫徹他的指示。即使制度在發生著根本改變，他仍要在就業和日常生活方面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簡言之，鄧小平面對的是一項苛刻的、史無前例的任務：當時還沒有哪個共產黨國家成功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更不用說這個有著十億人口、處於混亂狀態的國家。

鄧小平這個人

雖然鄧小平身材矮小，但擔任最高領導人的他在房間一露面，就能展現出奪人的氣勢，自然而然地成為眾人矚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觀察家說過，他似乎能給房間帶來電流。他在解決重大問題時專注而果斷，既有戰時軍隊司令員那種天生的沉著，又有半個世紀裏接近權力中心處理重大問題養成的自信。他經歷過官場沉浮，在妻子兒女和親密同事的支持下又東山再起，所以對自己的處境已經泰然自若。如果他不瞭解某事，他隨時樂於承認。占美·卡特總統曾評論道，鄧小平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的自信，這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他從不糾纏於過去的錯誤或誰要對其負責。他經常打橋牌，就像他打牌時的表現一樣，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認識並接受權力現實，在可能的範圍內做事。一旦沒有毛澤東在背後盯著他，鄧小平對自己和自己的權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現得輕鬆自如，坦率而機智，並且直言不諱。在 1979 年 1 月的華盛頓國宴上，莎莉麥蓮（Shirley MacClaine）對他說，有個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的知識分子很感激自己從那段種番茄的生活中學到的東西，鄧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斷她說，「他在撒謊」，然後向她講述了文革是多麼可怕。

鄧小平在 1978 年時已 74 歲，但依然精力充沛，機警過人。早上起床後，他會在家裏的花園快步繞行半小時。他的辦公室就設在自己家裏。很多中國領導人同客人坐在並排的沙發上談話時都是目光直視前方，鄧小平卻喜歡轉過身來注視著與他交談的人。他勤思好問，善於傾聽。據外國官員的描述，如果他反對外國的政策，他會表現得易怒和「咄咄逼人」。鄧小平見識過那些利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海外武力謀求私利的國家，因此他對自稱友善的外國領導人從來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無論來自大國還是小國，那些有著不同社會地位、屬於不同政黨的外國客人，最後都會感到與他相處愉快，即使他們並不喜歡他說的話。他們覺得鄧是一個能夠打交道的人。

有些西方人對鄧小平的直率和務實留有深刻印象，這使他們誤以為他骨子裏是個資本主義分子，他會將中國引向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樂於學習，但他最終認為，自己要比他們更清楚什麼對中國有利，而那不應該是資本主義和西方式的民主。

到 1978 年時，鄧小平右耳聽力已經很差，這妨礙了他參加人們表達不同意見的會議。他更喜歡看報，每天上午都會一個人坐著讀各種報告；他的辦公室主任每天為他拿來十五份報紙和所有重要報告，鄧小平會從中選出那些值得花時間去閱讀的東西。會見外賓對他來說要更容易一些，因為譯員可以直接對著他的左耳說話，使他能夠與客人自如地交談。鄧小平講一口帶有濃重四川鄉音的普通話，不過會講普通話的人並不難聽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語速。鄧小平面對的任務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難想像還會有什麼人比他作了更充分的準備，或者是從性情和習慣上更能勝任。

鄧小平有著本能的愛國主義和為黨獻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這種精神的鼓舞。鄧小平的愛國思想形成於他 14 歲那年，當時他就讀於廣安縣中學，他走上街頭示威並感受到了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五年後他去了法國，分派給華人的苦力活和求學前景的落空讓他大失所望，於是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法國支部。此後，直到七十多年後去世，他一直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

在法國的五年和在蘇聯的一年，使鄧小平比毛澤東更瞭解世界發展的大勢，對中國更有洞察力。他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的工商業；在蘇聯的一年使他得以觀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如何應對現代化的。

在法國時，鄧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為共產主義青年運動思考整體戰略的知識分子中。從那時起，通過和這些中國革命的大戰略家交往，鄧小平培養起一種看問題的獨特眼光，能夠從一個「統領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將理論加以落實、如何用理論來影響社會。在法國期間，鄧小平放棄了工廠的工作，為周恩來——他比鄧小平大六歲——領導下的那個小小的中共黨支部幹些雜活。他當時的工作是印刷向留法中國學生傳播左派思想的宣傳冊，所以得了一個「油印博士」的綽號。但他實際上變成了周恩來的徒弟，能夠觀察這位去過日本和英國、已是圈中青年領袖的人如何建立組織。儘管鄧

小平是這個團體中年齡最小的之一，但他很快就進入了歐洲共產黨青年組織的執委會。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蘇聯剛剛開始在這裏培訓中國人參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鄧小平被編入第七組，這個組專為培養國際共運的中國最高層領導人而設。他在中山大學有機會理解蘇聯如何開創共產主義運動，並瞭解他們對於在中國如何開展運動的看法。

除了短暫的中斷，鄧小平終其一生都十分接近最高權力的位置，這使他得以從內部觀察最高領導人對形勢變化的反應。1927 年回國後不久，他又回到周恩來手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當時，他們過去的同事蔣介石正試圖將共產黨斬盡殺絕，因此他們要努力找到生存的戰略。鄧小平不但參與了籌劃城市暴動的工作，而且年僅 25 歲的他還被派往廣西領導城市暴動。當毛澤東開始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根據地時，鄧小平也去那裏擔任了瑞金縣委書記，並學習到毛澤東是如何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在長征期間，鄧小平參加了關鍵性的遵義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作為領導人脫穎而出。在長征結束前，鄧小平有幸成為毛澤東信任的人。毛在西北建立根據地後不久便對鄧小平委以重任，讓他擔任了領導部隊政治工作的政委。在後來的內戰中他又參與接管上海，領導向共產黨統治過渡的工作，之後又擔任了全國六個大區之一的西南區的領導人。

最重要的是，由於鄧小平從 1952 年到 1966 年一直置身於北京的權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澤東近距離共事，思考有關中國發展和外交問題的戰略。毛把鄧小平當作自己潛在的接班人之一，讓鄧小平參加政治局會議，並在 1956 年以後與其他五位國家最高官員一起參加政治局常委會。他是籌劃和建立以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為特點的社會主義體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區的土地改革中也發揮著核心作用。從 1959 年到 1961 年，在大躍進失敗後的社會主義結構調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總之，1978 年的鄧小平，在思考中國最高領導人領導國家的戰略方面已積累了 50 年的經驗。

鄧小平當了 12 年軍隊領導人，後來也時常自稱軍人。雖然他是政委而不是司令員，但他是黨的書記，負責批准軍事行動。他與司令員緊密合作，先是在小型游擊戰中作戰，後來又在內戰中打過大戰役。在 1948 年的淮海戰役中，他擔任總前委書記，負責指揮 50 萬大軍。這是軍事史上最大的戰役，也是內戰的關鍵轉折點之一。

鄧小平在其一生中主要負責落實，而不是理論。他的責任不斷加大，在抗戰期間先是領導江西蘇區一個小小的縣，後來領導太行山區的幾個縣，抗日戰爭勝利後則領導數省交界處的邊區，1949 年後領導整個西南大區，直到最後領導全國。

在 1950 年代，鄧小平負責指導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關係，當時中國與西方幾乎還沒有外交。文革期間允許他恢復工作後，他擔任了周恩來的助手，接手領導中國的外交工作。

有人說，鄧小平在經濟方面沒有多少經驗，但經濟活動一向就是黨內多面手的重要職責。此外，鄧小平在 1953 年到 1954 年擔任過財政部長，當時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一個關鍵階段。

宣傳向來是中共的一項重要工作。鄧小平在法國時就負責印發宣傳品。他在江西蘇區受到批評後，被分配管理整個蘇區的宣傳工作，在長征期間他再度分管宣傳領域。作為部隊的政委，他發現最具有說服力的辦法是直截了當，為部隊提供大局眼光，把部隊工作跟全局及其使命聯繫在一起。

總之，鄧小平有著在地方、大區和中央工作的豐富經驗可資利用。半個世紀以來，他一直是中共領導層構思宏觀戰略思想的參與者。他在黨政軍都曾身居高位。1950 年代他參與過從蘇聯引進新工業和新技術的工作，就像他將在 1980 年代主持引進西方新工業和新技術的工作一樣。

鄧小平十分聰明，在班級裏一向名列前茅，在 1920 年四川廣安縣赴法考試中，他是 84 名過關的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時就很優秀，學會了背誦大段的儒家經典。從事地下工作時他學會了不留下任何字跡，只把事情記在腦子裏。鄧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個小時條理分明的講話。毛澤東曾把他稱為會走路的百科全書。大事當前，鄧小平喜歡獨自一人靜靜思索，考慮他要說什麼，當時機一到，他便能作出清晰、明確的表述。

目睹過自己的同志死於戰爭和黨內清洗，鄧小平養成了一種強硬的性格。他見過許多朋友變成敵人、敵人成為朋友的事例。他曾三次受到整肅：先是在江西蘇區、然後在 1966 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 年又一次挨批。鄧小平養成了一種剛毅的品格，能夠做到不論憤怒還是受挫都不形於色，不讓情緒左右自己的決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對黨和國家需要的認真分析之上。毛澤東曾經說，鄧小平是綿裏藏針，外柔內剛。^[10-12]但鄧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綿」的存在。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不喜歡報復，但是只要他斷定符合黨的利益，即使是忠實於他和他的事業的人，他也會將其革職。

鄧小平之所以能挺過難關，固然是因為他和妻子兒女的親密關係，以及以往克服艱難險阻而形成的自信，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直到 1976 年都跟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有著特殊關係。毛毀了他的很多同志，但是自 1930 年代鄧

小平作為毛派第一次受到整肅時，他便跟鄧有了一種特殊的關係。毛澤東整過鄧小平兩次，但從沒有把他置於死地。他只是讓鄧小平靠邊站，以便今後可能時再啟用他。

鄧小平的同事們知道，他認為統治中國是一件嚴肅的大事，雖然他可以很風趣，但他在與同事交往時總是一本正經。他對他們的個人生活不感興趣，也不在乎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專注於提供大多數人認為中國最為需要的堅強領導，並使他們的共同事業有一種方向感。他頭腦清醒，做事有條理，不會反覆無常。眾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體工作留給別人去做。他不是那種事必躬親的人。

但是，對於普通百姓來說，鄧小平要比像神一般的毛澤東更易於接近；人們在談到毛時畢恭畢敬，對鄧卻可以直呼其名——「小平」。他對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對客人說自己有三個壞習慣——抽煙、喝酒、吐痰，而且從中自得其樂。

鄧小平堅定地為黨和國家謀利益，不為自己的朋友撈好處。自 16 歲離家之後，他再沒有回去看望過父母或回鄉探過親。他明確表示自己不代表某地、某派或某些朋友。他最親密的同事都是為共同事業一起工作的同志，而不是在組織的需要之外效忠於他的朋友。他和妻兒的關係特別親密，但他嚴守黨紀，從不向家人透露高層機密，儘管他的妻子和四個子女也都是黨員。作為嚴守軍紀的軍人，他接到命令就會勇往直前，即使他知道這會帶來嚴重傷亡。

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喜歡鄧小平。有人認為他獨斷專行，不尊重別人的意見。知識分子對他在 1957 年反右運動中壓制大膽敢言的人很反感。有人認為他過於急躁，太想衝在前面，太想強調紀律。就像任何出色的軍人一樣，他希望下屬有令必行。他歡迎別人提出能夠解決問題的建議性意見，但是外國人和政治異見人士對黨的批評則會讓他勃然大怒。他對內戰和文革的混亂記憶猶新，因此認為中國的社會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斷定它受到威脅，就會作出強硬的反應。作為最高領導人，他準備按自己的日程表大膽實行改革開放。簡言之，當他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時，他是個嚴守紀律、經驗豐富的幹部，決心為黨和國家的需要而服務。

這個人的使命：建設富強的中國

在 1978 年以前的將近二百年裏，中國的其他領袖人物和鄧小平一樣，一直試圖找到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0-13]這個與羅馬大約同時建立的帝國體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儘管經歷過一些中斷和調整，它不但在統治的人口之眾、延續時間之長上超過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文明。在這樣偌大的一個國度裏，從這頭到另一頭要花上一個月的時間，因而朝廷官員不可能嚴密監督每個城鎮和鄉村執行全國性法規的情況。朝廷發明了令人讚歎的科舉制度，擇優選出官員，培訓他們，並在予以監督的同時也賦予他們很大的地方自主權。

到 18 世紀末時，由於人口迅速增長和地區商業的發展，加之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到達中國沿海地區，帝國體制遭遇到危機。當時中國有大約 1,500 個縣，各縣平均人口約 20 萬，僅靠一個小小的縣衙治理。軍事、交通、製造業和運輸新技術——例如火藥和船舶——的進步，促進了經濟和新興社會勢力的發展，使有限的基層政府無力應對。在過去二三百年裏，朝廷一直限制地方經濟，盡量不使其越出帝國的控制範圍，而如今北京的統治者卻不得不盡力使帝國體制適應這些變化。

但是中國幅員之遼闊卻給他們帶來了麻煩。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在過去 200 年裏又翻了一番，而且仍在迅速增長。在這個時期，它的版圖也向著西部和東北方向擴張。在沿海一帶，甚至在內陸某些地區，中國軍隊擋不住外國人的入侵，各地官員也無法阻止商業活動的擴張。

帝國體制受到的挑戰日益嚴峻，但它仍難以讓朝廷相信這個幾乎延續了兩千年的體制正面臨著嚴重威脅。從 1861 到 1875 年，就在鄧小平的祖父節衣縮食擴大自己的田畝時，同治皇帝手下的一批官員則試圖平息有增無減的社會亂象。他們沒有認識到為了應付國內新興社會勢力和虎視於國門的外敵，需要進行何等深刻的變革，因此他們仍然竭力維護傳統的威嚴——派兵平息叛亂，整飭科舉，強化儒家教育，以及大舉重修宗廟。

同治皇帝的繼任者們相信傳統體制已然動搖，甲午海戰敗於蕞爾島國日本，尤其令他們感到震驚。1898 年，在 27 歲的光緒皇帝的支持下，有維新思想的官員急不可耐地在百日之內連下四十道變法詔書和諭旨，試圖建立新秩序。他們興辦新學，派員留洋研習西方的現代學問。但是，日本人學西洋、圖改制用了二三十年時間，戊戌維新派卻未能建立為變法提供支持的政治或制度基礎。被變法嚇壞了的慈禧太后將光緒帝囚禁於瀛台，終止了變法。雖然後來她也廢科

舉、練新軍、籌備立憲，但她同樣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本應用於擴建海軍的銀兩，竟被她挪去建造石舫和奢靡的頤和園。受制於既有的習慣和制度，錯綜複雜的帝國體制難以改變。

到鄧小平 1904 年出生時，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國已是積弱難返，面對內憂外患一籌莫展。1911 年，一小批反叛者在武昌佔領了湖廣總督和第八鎮統領的官署，由此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帝國體制隨之土崩瓦解。1911 年的事件被稱為「辛亥革命」，倒不如將它稱為「崩潰」更為恰當。它不是組織有序的革命力量帶來的結果，而是對帝國體制失效作出的反應。一些有才華的朝廷要員對中國面臨的問題作了很有洞見的分析，也提出了創新建議，但是從整體上說，統治者無力完成使帝國體制應對挑戰的使命。

與保留了天皇的日本和仍允許國王在位的英國不同，辛亥革命徹底廢除了帝制，建立了一個名義上的共和國，但中國實際上並不存在有效取代帝國統治的政府結構。辛亥革命之後，相繼登場的領袖——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都試圖建立一種能使中國變得富強的新體制。

袁世凱是辛亥革命時期最有威望的軍事領袖，他想以軍事手段統一中國。可是他無法贏得民間領袖的擁護，也無力克服各地那些在帝制衰敗之際為保一方平安而武裝起來的地方軍閥。

孫中山曾與兄長一起在檀香山讀書多年，他後來成了一名出色的宣傳家和籌款人。他先是鼓動革命，後又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政府。辛亥革命之後，他最初擔任的角色是與袁世凱合作組建政府——為此後來在 1940 年被尊為中華民國國父，但他很快就輸給了袁世凱。袁世凱倒台後，孫中山於 1923 年在廣州組建政府，希望使它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政府。他還組建了國民黨來為國家提供政治領導，在名義上建立了一個有民主框架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吸引了一批愛國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人物——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和林彪，這些人當時也是國民黨員。他強化了民族主義，鼓勵年輕人出洋留學，促進了大眾媒體的發展。但是，面對混亂的國情，他既缺乏組織能力，也缺少建立有效政治體制的必要支持。他於 1925 年懷著未竟的夢想去世。

蔣介石曾是一名在日本受過訓練的年輕軍官，孫中山將他帶到廣州，讓他擔任剛成立的黃埔軍校的校長。蔣在這裏培養了一批新式軍官，他們將領導軍隊統一全國。蔣介石在 1925 年接過孫中山的衣鉢，但他難以控制國民黨內部的共產主義者與右翼之間日趨激烈的鬥爭。這場黨爭後來發展成雙方反目。蔣介石在 1927 年 4 月斷然清黨，屠殺了那些拒絕放棄共產主義、拒絕宣誓效忠國民黨的人。蔣介石是個頗有才華的軍人，但是為了進行統治，他要和諸如大商人、地主和軍閥這樣的權勢集團合作，而那些已經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並不穩固的軍閥同盟的支持下，他成為了中國政府的首腦，可是他無力控制腐敗和通貨膨脹，從而失去民心，在後來的內戰中輸給了更加團結的共產黨；後者在抗戰期間建立了強大的黨和軍隊，並利用城市居民對於物價飛漲的恐懼和農民想通過重新分配地主財產獲得土地的願望，贏得了廣泛的支持。

毛澤東是個魅力十足、有遠見和智慧的傑出戰略家，也是一個精明狡猾的權謀家。他率領中共打贏了內戰，在 1949 年統一全國，收回了外國佔領的大部分領土。他在內戰期間積蓄的軍隊足夠強大，加上共產黨的組織紀律和宣傳，使他得以在 1950 年代初建立起一套政治結構，比帝制時代更深地滲入到鄉村和城市。他建立了由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政權，並在蘇聯幫助下著手建設現代工業。到 1956 年時，國家已穩定有序。毛澤東原本有機會給中國帶來富強，然而他卻把國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烏托邦，導致嚴重的食品短缺，致使數以百萬計的民眾非正常死亡。在他統治的 27 年間，毛澤東不但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也毀掉了很多知識分子和自己手下的老幹部。1976 年毛去世時，國家仍然處在混亂和貧窮之中。

鄧小平在 1978 年上台時，具備許多他的前輩所沒有的優勢。在 19 世紀中葉時，幾乎沒有人意識到新技術和沿海地區的發展給中國的體制帶來了多麼嚴峻的挑戰。清末的維新派對於落實新觀念需要怎樣的制度變革也沒有清楚的認識。在袁世凱和孫中山時代，既無統一的軍隊，也沒有能把角逐權力者團結在一起的政權結構。而毛澤東沒有出國的經歷，他在掌權後由於冷戰的原因也得不到西方的援助。

鄧小平上台時，毛澤東已經完成了國家統一，建立了強大的統治體系，引入了現代工業——這些都是鄧小平可以利用的優勢。很多高層領導人認識到毛的群眾動員體系已經失效，中國的科技已大大落後於外國，中國亟須向西方學習。整個體制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鄧小平能夠依靠那些受過迫害的老幹部——他們曾被打倒，但逃過了劫難。這些重返工作崗位的老革命，願意團結在鄧小平和黨的領導之下，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為受過現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過渡。

1978 年美國從越南撤軍後，蘇聯變得咄咄逼人，因此西方各國樂於幫助中國進一步疏遠蘇聯。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張，中國得以進入新市場——日本、臺灣、南韓、香港和新加坡——並獲得新技術，它們也為中國提供了欠發達國家迅速實現現代化的範例。與東歐各國不同，中國在 1960 年代就徹底擺脫了蘇聯，這意味著它的領導人在決策時可以只考慮什麼對中國最有利。

但是，如果缺少一個強而有力的、能夠將國家團結起來並為它提供戰略方向的領導人，中國在 1978 年具備的所有這些有利條件，仍不足以讓這個巨大而混亂的文明轉變為現代國家。與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或毛澤東相比，鄧小平作了更好的準備。他將完成近二百年來其他人試圖實現的使命，即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在完成這項使命的過程中，鄧小平在不同時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 年以前他是革命家，建國以後他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者。從 1967 年到 1973 年的文革期間，他利用下放農村的時間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 年和 1975 年時毛澤東仍然在世，鄧被委以整頓國家的職責，這為他後來的工作打下了基礎。他在 1977 年成為改革家，先是在華國鋒手下工作，然後在 1978 年成為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 1974 年會見一個美國的大學代表團時說：「我沒有上過大學，但我一向認為，從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著人生這所大學。它沒有畢業的一天，直到去見上帝。」^[0-14]鄧小平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學習和解決問題。他引導着中國的轉型——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使得這個國家和他 1978 年接手時相比，變得幾乎難以辨認。

[0-9]從 1931 年到 1997 年去世，鄧小平一直使用「鄧小平」這個名字。他父親為他起的名字是「鄧先聖」，他按私塾先生的建議改為「鄧希賢」，這也是他上學和在法國時使用的名字。他去蘇聯時的名字是「克列佐夫」（Krezov），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名字是「伊萬·謝爾蓋耶維奇·杜佐羅夫」（Ivan Sergeevich Dozorov）。1927 年回國後他使用了「鄧小平」這個姓名。有人認為這個名字很適合他，因為他身材矮小，梳著平頭。他在 1927 年至 1931 年從事地下工作時還使用過一些化名。

[0-10]2001 年 3 月作者對麥理浩手下外交官的採訪。

[0-11]就像很多與鄧小平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格言一樣，這個說法也不是由他首創。鄧小平使用這一說法的最早紀錄是 1966 年 3 月 22 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 1902。

[0-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 1674。

[0-13]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關於中國帝制時代的歷史及相關文獻可參見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2nd exp.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and Gungwu Wang, *To Act Is to Know: Chinese Dilemm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2). 近年來對清代的研究也可參見 Mark C. Elliott,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New York: Longman, 2009); R. Kent Guy,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關於孫中山見 Marie-Claire Bergère, *Sun Yat-s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關於蔣介石見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關於中國革命，參見 Lucia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毛澤東的傳記參見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99). 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見 Stuart R.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2005), 此書計劃出版 10 卷，已出的 7 卷包括 1912–1941 年這個時期的文獻。

[0-14]據代表團成員谷梅（Merle Goldman）提供給我的筆記。

第 1 章

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1904—1969

鄧小平 1904 年生於四川省廣安縣的牌坊村。他雖然出生於一個小地主之家，但鄧家的親戚中卻有一個讓整個村子都引以為豪的人物——鄧時敏。這個鄧氏族親鄧時敏曾擔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專為皇帝和朝廷大員寫摺子。^[1-1]1774 年鄧時敏告老還鄉，村裏為他立了一座牌坊，並就此更名牌坊村。鄧時敏及其兄弟確實成就不凡。當時這個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每年只有一兩千人能通過科考中舉，鄧時敏和他的兩個兄弟卻都通過了鄉試。事實上鄧時敏又連過兩關，通過了會試和殿試，當上了京城的大官。^[1-2]

1926 年至 1927 年鄧小平在莫斯科時，在自己的個人簡歷中說，他的父親望子成龍，盼著他同樣能當上大官。這種夢想大概又因他母親的因素而愈發強烈，因為她也有親戚考取功名當上縣令。在帝制中國，很多家庭，尤其是有親戚當過官的家庭，若是有個聰明伶俐的孩子，都願意含辛茹苦加以培養，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耀門楣。鄧小平便是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雖然他的父親鄧文明很少跟兒子相處，卻在他讀書求學上花了不少工夫。

鄧小平的父親忙於村子以外的活動，很少照料家事。他的原配妻子無後而死，16 歲那年他又娶了比他大兩歲的鄧小平的生母。鄧母頭胎生了個女兒，然後生下鄧小平，接著是鄧小平的兩個弟弟，最後生的女兒在十歲那年夭折了。鄧文明後來娶的第三個妻子，生下一子後不久就死了。他又娶了第四個妻子夏伯根，她生了三個女兒。鄧小平父親最富有時，擁有近四十畝地和幾個幫他幹農活及養蠶的長工。

鄧文明在世時家道日衰。他是村裏的秘密社團哥老會的首領，但大多數時間他都在離牌坊村三四里路以外的協興鎮和二十里路以外的縣城度過。他在 1914 年當上了縣警察局局長。他在協興鎮開過一家小飯館，與一些長輩一起贊助過一所學校，他的兒子鄧小平便是在這裏唸書。但是，由於賭博輸了錢，他不得不賣掉一些田地，幾陷破產，再加上跟一位上司關係不好，他逃到了外地。不過，他仍然資助鄧小平唸書。

據鄧榕說，鄧小平的母親十分疼愛這個兒子。鄧小平後來也回憶說，他非常敬重自己的母親，父親不在家時她總是悉心照料著家務；但是她在 1926 年便已去世，只活了 42 歲。毛澤東反抗自己的父親，鄧小平卻沒有，他只是疏遠父親而已。鄧榕回憶說，在後來的歲月裏，爸爸從來不提他自己的父親（他死於 1936 年）。

當鄧小平漸漸長大時，大人們並不清楚讓孩子接受哪種教育最有利於前程。科舉制在鄧小平出生第二年便被廢除，鄧小平六歲時發生的辛亥革命，又讓朝廷的官僚制度壽終正寢。但是取代舊學的新式教育才剛剛起步，於是就像當時中國農村很多有天資的孩子一樣，鄧小平五歲那年的開蒙教育，是在牌坊村一個有學問的親戚家中學習儒家經典。第二年他又轉入協興鎮一家較大的私塾，繼續學習那些經典，由此養成了背誦經書的能力。當時廣安縣有人口 20 萬，但只有一所公立小學為有天分的孩子教授現代科目。鄧小平想必在這裏學得不錯：他在 11 歲那年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進入了離牌坊村二十里以外的廣安縣高級小學，由父親出錢成了那裏的寄宿生。14 歲時他又考入廣安縣初級中學。當鄧小平 15 歲離開該校去重慶時，他在儒家經典以及數學、科學、歷史、地理這些現代科目和寫作方面，都已打下很好的基礎。^[1-3]

一些進步教師提高了鄧小平的愛國覺悟，1919 年他年僅 14 歲就參加了作為五四青年運動一部分的示威活動。這場運動的起因是西方各國領導人在凡爾賽聯手操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格局，要把德國過去在山東佔領的膠州半島轉交日本而不是歸還中國。這激怒了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學生，他們於 1919 年 5 月 4 日走上北平（1949 年成為首都後改名為北京）街頭，不但抗議西方列強不尊重中國，而且抗議中國政府顛覆無能，沒有維護中國的利益。

五四示威活動的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國內許多的大學和一些中學校園，在中國知識青年中掀起了瞭解世界大勢的熱情，點燃了民族主義的火焰。跟中國其他更為偏遠的內地相比，廣安與外界有著更多的接觸，流經廣安縣城的曲江水面寬一百多米，通過另外兩條河與 90 公里以外的重慶相連，從重慶乘汽船五日便可到達上海。早熟的鄧小平也加入了這場運動，跟同學們一起走上廣安街頭遊行示威。1919 年秋天，他還參加了重慶抵制日貨的運動。鄧小平對外部

世界的覺醒與中國知識青年民族意識的萌生完全同步。從這一刻起，鄧小平本人便與中國人努力擺脫洋人欺侮、恢復其偉大和強盛地位的事業分不開了。^[1-4]

鄧小平對外部世界的初步認識，又因鄧文明給兒子找到一個留學機會而得到了進一步擴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很多法國青年上了戰場，一時造成工廠勞力短缺，於是招募了 15 萬中國勞工赴法打工。當時西方各國幾乎沒有為中國優秀學生提供的獎學金，但也有例外：一些社會賢達在戰前就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組織，希望能幫助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他們可以一邊打零工謀生，一邊到大學學習現代科技。當時的中國人認為法國是一個文化水平很高的國家，法國便成了中國留洋學生所嚮往的目的地。一個曾經留學法國的四川富商成立了一個基金，提供補貼，使川籍學生能夠加入到赴法勤工儉學的計劃之中。重慶成立了為期一年的預備學校，鄧小平參加並通過入學考試，1919 至 1920 學年在那裏作留學準備。這一年年底，有為數不多的獎學金到位，使一些學生得以赴法。鄧小平從未接受過專門的外語訓練，未能通過法語考試。但他父親鄧文明花錢通融使他過了關。一個比鄧小平大三歲的堂叔是他的同學，與他一起動身，在法國的頭幾個月裏一直與他為伴。

革命家的誕生——法國和蘇聯：1920—1927

1920 年，當 16 歲的鄧小平登上一艘從重慶開往上海的汽船，開始他赴法之旅的第一段旅程時，他是 84 個勤工儉學的四川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旅途本身對他就有教育意義。在上海逗留的一周，鄧小平看到了洋人在他的國家如何像對待奴隸一樣對待中國人。當經過改裝的貨輪「葛特萊蓬」號駛往法國，途經香港、越南、新加坡和錫蘭（今斯里蘭卡）時，白人主子與當地勞工之間同樣不平等的關係，也給鄧小平和船上其他的年輕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國學生於 10 月 19 日抵達馬賽時，據當地報紙報道，這些學生身穿西裝，頭戴寬邊帽，腳登尖頭皮鞋；他們默默無語地呆在那裏，但看上去很聰明。^[1-5]他們先乘車去巴黎，次日便被分配到一些中學接受專門的法語和其他科目的培訓。鄧小平等 19 人被安排到諾曼第的巴耶中學。

從 1919 年到 1921 年，經中國主辦人及法國友人的共同安排，大約有 1,600 人赴法勤工儉學。然而他們來的不是時候。1919 年，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法國青年人重返工作，導致法國就業緊張，通貨膨脹嚴重。1921 年 1 月 12 日，即鄧小平和勤工儉學的同胞來到法國不足三個月時，由於為這項計劃籌措的錢很快就變得入不敷出，四川的基金會與勤工儉學計劃終止關係，3 月 15 日以後將不再為學生提供經費。^[1-6]法國政府建議巴耶中學想辦法讓計劃繼續進行，但校方說它也籌不到足夠的錢。鄧小平和 18 位勤工儉學的同胞於 3 月 13 日離開巴耶，三周後他在南部城市克魯梭的施奈德公司——法國最大的軍械廠——找到一份勉強糊口的工作。

此時，巴黎的中國學生也因無法繼續求學而深感失望，到中國政府駐巴黎使館前示威抗議，要求政府給他們想辦法，因為他們是在為中國的未來學習科技知識。中國政府派駐巴黎的人說這是不可能的，法國警員也逮捕了帶頭示威的人。法國各地的中國學生為失去學習機會而義憤填膺，他們加強聯繫，建立自己的組織，抗議法國和中國當局。中國學生示威的一些領頭人，如學生活動家蔡和森、後來擔任了上海市長和外交部長的陳毅，因參加抗議而在 1921 年夏天被驅逐出法國。

中國留法學生四處奔波，尋找辛苦低下的工作來維持溫飽。他們看到法國的富商家庭過著優裕的生活——這種生活是鄧小平在中國從未見過的，而工廠的工人則在惡劣的工作條件下從事著長時間的繁重勞動。^[1-7]中國學生大多來自殷實之家，因學業優異而獲選留學，都是些想學習現代科技以報效國家的英才。可在法國，他們只能找到連法國工人都不願幹的工作，在重工業、化學工業的工廠和礦山做沒有技術含量的苦力活。此外，中國工人最初多半只能當學徒，薪水甚至比普通工人還要低。

儘管備受屈辱，這些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人卻為中華文明而自豪，並將自己視為未來的領袖。他們成立了自己的社團，還分成小組，探討中國政府為何如此軟弱，世界為何變得如此不公平。這些小組的一些成員後來成了無政府主義者，但鄧小平等人則尋求發動一場運動，推翻軟弱無能的中國政府。

鄧小平來到法國時，十月革命已過去三年。在討論小組中，他從那些好學的工友那裏瞭解到更多有關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蘇聯的知識，這為他在法國生活時的見聞賦予了更深刻的含義。歐洲帝國主義欺侮中國，資產階級剝削工人，華工的待遇比當地工人還要差。需要一批精英組成先鋒隊，通過開展運動去改變這種狀況。1921 年底，就在這些留法中國青年開始在工廠打工時，傳來了中國共產黨在同年 7 月 1 日成立的消息。這個黨最初很小，1921 年它在國內只有

大約 50 名黨員，1922 年時也不超過 200 人。然而它的出現卻對在法勤工儉學的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22 年在法國成立了一個組織，其成員稱之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 年 11 月，學生領袖之一李維漢從法國火速回國，想讓這個青年共產主義組織歸屬於「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這一請求得到了許可。1923 年 2 月，鄧小平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大會正式宣佈自己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一部分；周恩來當選為總書記。^[1-8]

鄧小平在施奈德軍械廠時，被分派的工作是用大鐵鉗把燒紅的大鋼塊從噴著火焰的鼓風爐裏拖出來。鄧小平當時還不到 17 歲，只有一米五的個頭，他幹了三周便離職而去，回到巴黎另尋工作。（他的堂叔在施奈德又幹了一個多月。）幾周後，鄧小平在巴黎一家生產紙花的小工廠找到一份臨時工，後來又在小鎮夏萊特的哈金森橡膠廠（當時它僱用了大約 1,000 名工人，大多都是外國人）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從 1922 年 2 月 13 日到 1923 年 3 月 7 日，除了短暫的中斷外，他一直在這裏上班，工種是加工橡膠套鞋，一份不太費力的活。經過短暫的學徒期後，鄧小平像其他工人一樣成為計件工，於是他學會了抓緊幹活，並工作很長時間，一周長達 54 小時。他從工資中省出一些錢，又從父親那裏得到一點錢後，於 10 月 17 日辭去工廠的工作，想辦法進了附近的夏狄戎學院唸書。然而他的錢並不夠用，三個月後便又回到了哈金森橡膠廠。3 月份他第二次離開該廠後，工廠檔案的紀錄中說，他「拒絕工作」，「辭職不幹，不再僱用」。

[1-9]

鄧小平最後一次學習機會落空後，便投身到激進（radical）事業之中。在第二次回到哈金森工廠時，他就在附近的蒙塔日加入了由秘密的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基層組織成立的學習小組，其中有不少人是他曾在重慶預科學校的同學。有些學生甚至在中共建黨之前就已經很激進了。鄧小平尤其為號召中國學生投身激進事業的雜誌《新青年》所打動；該雜誌的主辦人是陳獨秀，當時他的兩個兒子也在法國學習。

鄧小平在夏萊特一直呆到 1923 年 6 月 11 日，然後去了巴黎，在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小辦公室裏工作。他在哈金森和蒙塔日的工友和激進派朋友大都是四川人，而在巴黎，他和來自其他各省的中國人一起參加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剛到巴黎時，鄧小平在周恩來領導下的支部幹一些雜活。他的主要工作是印刷該團體一份十頁紙的小報。鄧小平擅長寫字和刻版，因此得了一個「油印博士」的綽號。1924 年 2 月這份雜誌更名為《赤光》，^[1-10]雜誌宣稱要反對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它的讀者對象是留法中國學生，其中一些人一直信奉無政府主義或更加右翼的保守政策。鄧小平在比他大六歲的支部書記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周恩來曾在日本和英國與激進派有過交往，具有戰略意識和團結各種人一起工作的能力，因此成了中國青年的天然領袖。在周恩來的教導下，鄧小平對共產主義運動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刻版和印刷《赤光》的同時，也開始參與制訂運動戰略。^[1-11]

鄧小平在支部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因而進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在 1924 年 7 月的會議上，按照中共的決定，該執委會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全部成員，自動成為中共黨員；當時中共黨員的人數，把中國和法國的加在一起不足 1,000 人，而鄧小平那時還不到 20 歲。

旅法中國學生的政治鬥爭，與國內那些年輕政治領袖的行動保持同步。1923 年 6 月，中共宣佈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法國的中共黨員也立刻宣佈他們會加入旅法的國民黨。鄧小平本人也加入了國民黨，並在 1925 年成為國民黨歐洲支部的領導人之一。^[1-12]在為《赤光》撰寫的文章中，鄧小平反駁較為保守的國民黨支持者，主張更激進的革命性變革。

兩個法國學者曾仔細研究過鄧小平在法國五年期間的活動，他們說：「在法國，鄧小平發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勞工世界、黨的組織工作、中國的地位、社會和地區差別以及他的安身立命之本。」^[1-13]法國也影響了鄧小平的嗜好，他喜歡喝紅酒咖啡，吃乳酪麵包。更重要的是，當鄧小平在 21 歲那年離開法國時，他已經成了立場堅定、富有經驗的革命領導人，他的自我認同已經與對黨和黨內同志的認同密不可分。從那時起直到 70 年後去世，中國共產黨始終是鄧小平生活的中心。

1925 年春天，鄧小平因其能力和可靠的表現，被任命為里昂黨組織的領導人。1925 年 5 月 30 日，中國國內的示威者走上街頭，抗議上海的英國警員向中國學生的示威人群開槍，鄧小平也和旅法的中國學生一起，抗議法國政府與鎮壓學生的中國政府沆瀣一氣。^[1-14]1925 年 11 月，鄧小平被派到巴黎的雷諾汽車廠工作，在那裏從事組織工人的宣傳工作。1925 年底，參與示威的中國學生的上層領袖被驅逐出境，當時只有 21 歲的鄧小平在組織內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發表了主要演講並主持會議。1926 年 1 月 7 日，有人警告鄧小平說，他本人也成了逮捕目標，於是他乘火車經德國逃往蘇聯。

在中國以外，沒有哪個國家比法國的中共黨員發揮了更大作用。1949 年以後，從法國回來的人在建設國家上扮演著獨特的重要角色。與中共的絕大多數領導人——包括 1949 年以前從未邁出國門一步的毛澤東——相比，這些從法國回來的人有著更開闊的國際視野。在 1937 年到 1949 年的革命鬥爭中，他們不一定身居高位，但是從 1949 年到 1966 年的中共國家建設期間，不但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而且其他一些從法國回來的人，在經濟計劃（李富春）、外交（陳毅）、科技（聶榮臻）、統戰宣傳（李維漢）等各個領域都擔任了關鍵角色。中共嚴禁在黨內搞派系，這些從法國回來的人也處事謹慎，以免被人視為派系，但是他們對於中國需要做些什麼都有著特殊的理解。

逃離巴黎後，鄧小平於 1926 年 1 月 17 日抵達莫斯科，兩周後進入中山大學一班。孫中山於 1925 年 3 月去世，七個月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學，該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培訓國共兩黨的黨員。

到莫斯科第一周，鄧小平寫了一份自我批評。就像所有僑居在莫斯科的中國人一樣，他被視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在自我批評中發誓拋棄自己的階級出身，終生做一名嚴守紀律、服從上級的無產階級成員。他的能力很快就得到了大學幹部的承認。大約 300 名學生被分成 13 個小組，鄧小平被編入第 7 小組「理論組」，成員全是被認為將來大有希望成為政治領袖的學生。這個班裏還有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軍閥馮玉祥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馮玉祥是一個難得地具有進步思想的地區領袖，他當時與共產國際合作，也從共產國際獲得資金。鄧小平在班裏被同學推選為黨代表。^{[1]-[15]}

在中山大學，中國學生在任卓宣同學（他更為人知的名字是「葉青」）的領導下開展組織活動，鄧小平在法國時就認識此人。任卓宣要求嚴格的服從和軍隊式的紀律，這種做法引起了很多中國學生和學校領導的反彈。事實上，任卓宣在 1926 年夏天被調離莫斯科，未久共產國際又宣佈，在蘇聯的外國學生不得召開他們自己國家黨派的會議，但可以成為蘇共見習黨員，五年後有可能轉為正式黨員。

許多中國學生對不讓中共黨員開會有意見，但鄧小平不在此列。在蘇共保存的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報告中，鄧小平受到了表揚，說他有強烈的紀律觀念，很清楚必須服從領導。鄧小平最初接受任卓宣的領導，任離開後他便服從蘇共的領導。在蘇聯的日子臨近結束時，蘇共在 11 月 5 日對鄧小平的評價是：「他是個嚴守紀律、做事一貫的人，而且學習能力強。他通過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工作，積累了豐富經驗，變得十分成熟。他積極參加政治工作。在與他人的關係中他以同志之道行事。他屬於最優秀的學生。」^{[1]-[16]}

在莫斯科，鄧小平每天上課八小時，一周上六天課。他修完了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著作研究的全部課程，還有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地理、蘇共黨史和中國革命運動史。共產國際希望與潛在的中國領導人搞好關係，為中國學生提供了比一般俄國人更好的生活條件。

鄧小平在蘇聯學習時，蘇聯還沒有建成社會主義體制，仍在實行「新經濟政策」。這種政策鼓勵小農、小工商業、甚至較大企業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則致力於發展重工業。蘇聯也請外國人來投資。跟當時不少人一樣，鄧小平認為這種經濟體制——在共產黨的控制下允許私人企業和鼓勵外國投資——比資本主義制度更能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1]-[17]}「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即共產黨領導下的市場經濟，類似於鄧小平 1949 年至 1952 年在西南局當政時實行過、後來又在 1980 年代再次採用的政策。

還在莫斯科時，21 歲的鄧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對於一個年輕人而言非同尋常的想法，而且這些想法終生未曾改變。不妨舉個例子，他在 1926 年 8 月 12 日的課堂作業中寫道：「集中的權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從上級命令是絕對必要的。允許多少民主，要視周圍的環境變化而定。」^{[1]-[18]}

反抗國民黨：1927–1930

中山大學的正式學制為期兩年，但剛過一年，即 1927 年 1 月 12 日，鄧小平就和其他 20 名年輕的共產主義政治教導員一起，被共產國際派往當時駐紮在陝西黃河谷地的軍閥馮玉祥那裏，以便利用馮所提供的一個機會。在國民黨內部，共產黨和右翼之間的分裂日趨嚴重，共產黨的軍事實力大大弱於國民黨右翼，所以共產黨為了應付看來已經無可避免的分裂，試圖尋找軍事同盟。馮玉祥恰好提供了這樣一種關係，他在三個子女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曾訪問過那裏。馮玉祥認為共產黨的政治教導員可以為他的軍隊培養目標感，利用像鄧小平這樣有前途的領導人，能夠讓軍隊明白打仗是為了什麼。馮玉祥雖同鄧小平及鄧的共產黨同志關係融洽，但到 1927 年 4 月國共分裂時，他清楚國民黨的軍事力量要比一小撮共產黨強大得多，因此斷定自己別無選擇，只能與國民黨結盟。馮玉祥客氣地向鄧小平及鄧的同志道別，請他們另謀出路。

鄧小平在陝西按照黨的指示向上海黨的總部打報告，要求參加地下工作。蔣介石意識到與共產黨的裂痕正不斷擴大，擔心受到攻擊，於是在 1927 年 4 月率先下手剿共，大開殺戒，很多中共領導人遇害。上海的中共中央與過去的盟友反目成仇，隨時面臨被揭發的危險，於是轉入地下。為了避免暴露，鄧小平採用各種偽裝，練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領：從不把黨內活動記在紙上，從不丟棄可能給其他黨員帶來麻煩的紙屑。事實上，從此以後，他總是把重要人物的姓名和地址記在腦子裏，不留任何字跡。

鄧小平和新婚妻子張錫媛一起來上海。他們兩人是在蘇聯讀書時的同學。據蘇聯的上級說，鄧小平喜歡這個女孩子，但跟很多糾纏女同學的同學不同，鄧小平舉止適度，一直以學業和黨的工作為重。^[1-19]直到鄧回國後，兩人在武漢一次會議上再次相遇，才有了一段短暫的戀情並結了婚。鄧小平和張錫媛跟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成了鄰居，一起從事地下工作。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 21 名領導人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如何對付國民黨的剿共。22 歲的鄧小平並不是正式成員，他擔任書記員並負責處理會議文件（在後來的黨史中，他被賦予「黨的秘書長」這個響亮的頭銜，其實他當時只是個小角色，為這些共產黨人做做會議紀錄而已）。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第一次遇到了高大、自信而強而有力的毛澤東，不過當時毛還不是黨的最高領導。

1929 年，黨把鄧小平從上海派往廣西，這是廣東西面的一個貧窮省份。當時鄧小平只有 25 歲，他要聯合那裏的一些小軍閥建立中共的根據地。鄧小平被選派承擔這項任務，說明黨的領導人對他獻身革命的精神，他在迅速變化的政治環境中處理與軍閥、當地人以及和黨中央的複雜關係的能力，有很高的評價。國共分裂後，黨中央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命令各地黨員領導城市暴動。

一小批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以及在廣西和鄧小平一起工作的黨員，與當地一些已經跟蔣介石以及實力更強的廣西軍閥——他們曾參加蔣介石致力於統一全國的北伐——決裂的廣西小軍官（李明瑞和俞作豫）建立了合作的基礎。儘管身處幕後，鄧小平在廣西取得的短暫勝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鄧小平和他的盟友攻佔了廣西西部臨近雲南的百色和龍州兩地。

在中共黨史上，這些進展被當作共產黨的起義加以歌頌。但是當桂系軍閥李宗仁從北伐中返回後，他的大軍很快就消滅了鄧小平在百色和龍州的軍隊。鄧小平的很多盟友被殺，紅七軍剩餘的幾百人先是在壯族人的幫助下逃往北部，後又沿著粵桂北部的山區向東逃了數百公里。在撤退過程中，與當地軍隊的一系列戰鬥幾乎讓他們全軍覆沒。一場戰鬥使鄧小平與軍隊走散，他就此離開紅七軍回到了上海的黨中央。他一到上海，就被要求就廣西的失敗寫一份檢討。他在檢討中解釋了自己離開軍隊崗位的原因，說是紅七軍的領導同意他回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他這樣做是得到了正式批准的。他也承認，在危難之際離開部隊，說明自己的政治判斷力不夠。文革期間，他又因離開紅七軍返回上海一事受到批判。

與他那些僅從軍校裏獲得軍事訓練的同志不同，在廣西，25 歲左右的鄧小平是在與受過訓練並有實戰經驗的同志們並肩戰鬥的過程中獲得最初的軍事訓練的。在廣西的一年，鄧小平肩負著很多重要責任——建立軍事同盟、為軍隊籌措給養、躲開武裝精良的軍閥、與當地壯族首領合作。但是，就像當時共產黨領導的所有城市暴動、包括更著名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一樣，廣西的起義也以徹底失敗而告終。與鄧小平共事的大多數領導人都被殺害，不是死於戰鬥，就是因為被懷疑通敵而死於黨內清洗。

鄧小平在戰鬥期間離開廣西後，去上海一家醫院探望了臨產的妻子，這是他們最後的幾次相聚之一。醫院的條件很差，她在生產時染上產褥熱，幾天後便去世了，沒過多久新生兒也夭折了。據說妻兒的死亡讓鄧小平深感悲痛，但他立刻回到工作中。在這慘痛的一年間，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鄧小平，又與上海一個既聰明又有自由思想的女革命家阿金（金維映）結為伴侶。^[1-20]

江西、長征和西北根據地：1930–1937

上海的黨中央在為鄧小平安排工作上動作遲緩，但幾個月後同意了鄧小平去江西中央蘇區的請求。在那裏的崇山峻嶺之中，毛澤東率領的軍隊已經佔領了幾個縣，並且建立了一個有自己的地方政府的蘇區，正在開展土改運動。他們希望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等到足夠強大之後再向國民黨和軍閥發動進攻。中央蘇區方圓數百里，從贛西北風光秀麗但

條件艱苦的井岡山，綿延到東南部地勢平坦的農業區。鄧小平奉派前往東南部的瑞金報到，1931年8月他和第二個妻子阿金抵達目的地。

到瑞金幾周後，鄧小平在江西的頂頭上司便決定讓他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上任之初，國民黨正在剿共，雙方都想派奸細打入對方。1927年國共分裂後，共產黨的幹部害怕一些黨員暗中為敵人提供情報；鄧小平到達瑞金之前，已有數百名共產黨員被懷疑通敵，不是被投入監獄，就是遭到處決。鄧小平一上任就花了數周時間仔細瞭解情況，最終確信對疑犯的指控是錯誤的。關入獄中的人因此獲釋，殺害地方黨員的領導人也被處決。鄧小平的決定在當地黨員中深得人心，使他在瑞金的一年間得到了大力擁護。

在江西，鄧小平對毛澤東產生了極大的崇敬。毛是帶著一小批追隨者從老家湖南逃離軍閥、越過東部山區來到毗鄰的江西省的。鄧小平曾試圖在廣西建立和維持共產黨的根據地，但以失敗告終，所以他很理解毛澤東在建立根據地上取得的成就。毛澤東不但要為軍隊搞到足夠的給養，還要阻擋敵軍入侵，贏得當地居民的支持。

鄧小平擔任瑞金縣委書記時，中央領導決定在那裏建立全國性的首都。建都之前，在瑞金召開了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根據地的代表大會。鄧小平雖然不是與會的610名代表之一，但在籌備會議以及在瑞金一帶建立新首都的事情上，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在瑞金工作一年後，鄧小平又被調往瑞金以南的會昌縣擔任黨的實際負責人，同時兼管黨在尋烏和安遠兩縣的工作。

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認為共產黨必須建立農村根據地，等到有足夠的實力後再向對手發起挑戰。然而中央領導卻指責鄧小平追隨羅明（一名福建籍幹部）的失敗主義政策，在打擊敵軍上不夠積極主動。在後來所謂鄧小平「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中，他被撤銷了會昌縣委書記一職，並和三個同事（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謝唯俊和古柏）一起受到嚴厲批評，後被派往外地以示懲罰。鄧小平受到嚴厲指責，被稱為「毛派頭子」，甚至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金也加入了批判他的行列，和他離婚，嫁給了批他的人之一、在法國時就和鄧相識的李維漢。幸運的是，鄧小平的另一位在法國時的故交、時任江西省委書記的李富春，在他下放幾個月後把他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

據鄧榕說，在1930年至1931年的一系列沉重打擊——第一個妻子和孩子去世、自己在黨內受到嚴厲批評和責難、第二個妻子與他離婚——之前，鄧小平的朋友都認為他是個性格開朗、愛說愛笑的人。但是在經歷了這一連串的悲劇和挫折後，他變得更加內斂，少言寡語。當時他還無從知道，從長遠看，他因被指為「毛派頭子」而受到懲罰其實是他的運氣，因為這使毛澤東長期相信鄧小平是忠實於自己的。在後來的歲月裏，即便在毛澤東讓激進派批鄧時，也絕不同意把鄧小平開除出黨。

共產黨建立的蘇區根據地使蔣介石對中共的威脅深感憂慮，於是派兵圍剿江西蘇區。共產黨在四次反圍剿戰役中都擊退了國民黨，但在第五次圍剿中，強大的國民黨把共產黨趕出了根據地，共產黨從此踏上差不多長達一年的逃亡之路，這就是著名的「長征」。他們歷盡千辛萬苦才從江西到達陝西的新根據地。長征給中共造成重創，從江西出發時軍隊大約有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還有一些人開了小差，1935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區時只剩下不足10,000人，在那裏迎接他們的是當地一小股共產黨武裝。雖然缺少長征途中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交往紀錄，但據鄧小平的女兒說，隨著部隊日益減員，在長征途中負責宣傳以維持紀律的鄧小平，有不少機會與毛澤東交談。

長征開始幾周後的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授權毛澤東領導軍隊，也為他成為中共頭號領導人鋪平了道路。鄧小平不是遵義會議的正式成員，但他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會議紀錄沒有留存下來，但鄧小平後來被賦予了會議「秘書長」這個響亮的名頭。

在長征的最初幾周裏，鄧小平負責出版《紅星》報。沒過幾周，由於運輸中不堪重負，油印機被丟棄。但作為宣傳幹部，鄧小平繼續口頭鼓勵部隊堅持鬥爭。長征途中他得了傷寒，幾乎送命。他後來對客人說，自己是一半靠馬一半靠腳走完了長征。中共在西北建立根據地後，侵華日軍取代國民黨變成了中共的主要敵人，因此當時除了有反對專制軍閥的訴求之外，又加上了愛國主義的訴求。

1936年12月，軍閥張學良的軍隊發動「西安事變」囚禁了蔣介石總司令，給共產黨帶來良機。蔣介石為了使自己獲釋，被迫同意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這一事件消除了來自蔣介石軍隊的壓力，共產黨乘機於1937年1月轉移到陝北延安一塊更大的根據地。鄧小平在這裏作為紅一軍團宣傳部長領導著文工團，並通過演講教育軍政幹部。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宣傳方式：講話簡明扼要，把國際大勢與當前工作聯繫在一起。演講結束時，聽眾對自己該幹些什麼都有了清楚的認識。

這一年夏天，日本人從東北向全中國發動侵略，佔領了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線，只剩下農村地區和西南地區的城市仍在中國人控制之下。小規模軍事衝突仍在繼續，但日本人已經變成了佔領軍。

抗戰時期：1937–1945

中共同意與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後，其軍隊被改編為「第八路軍」，成為全中國軍隊的一部分，形式上接受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但事實上國共之間仍然猜疑甚深，彼此很少接觸。

共產黨的八路軍總部設在延安以東數百公里的山西，那裏土地肥沃，部隊可以得到充足的糧食補給，也更接近前線，能夠通過游擊戰騷擾日軍。

1937 年，毛澤東任命他最得力的將軍之一劉伯承為八路軍主力部隊第 129 師師長。不久之後，1938 年 1 月，就像其他單位一樣，毛澤東又給劉伯承選配了政委，就是鄧小平。不過和其他政委不同的是，鄧小平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這使鄧小平享有更大的權力，包括有權對部隊的戰前政治準備和周圍環境作出判斷。劉伯承比鄧小平高出一頭，年齡比他大十歲，一隻眼因作戰負傷而失明。他們兩人將在工作中密切配合。鄧小平到達 129 師在太行山區의 駐地後，立刻樹立了自己的權威：因為劉伯承恰好短暫外出，鄧小平代理了他的職權。

從 1937 年到 1949 年，鄧小平和劉伯承先是共同抗日，抗戰結束後又在內戰中一起打國民黨，他們配合緊密，使「劉鄧」成了一個固定的稱呼。劉伯承有善待部下的名聲，鄧小平則對部下要求甚嚴，打起仗來不顧一切。在處決那些被懷疑給國民黨做奸細的士兵時，劉伯承也要比鄧小平更加慎重。

在抗戰期間，129 師為了躲避日本人，不斷在太行山區變換駐地，但駐地總是設在一天之內可以騎馬趕到八路軍總部的地方，以方便領導人參加重要會議。不管駐紮在哪里，他們都不時對裝備更好的日軍開展游擊戰，集中兵力向那些為控制城市和交通幹線而分散駐紮的小股日軍發動攻擊。延安既是個足夠大的根據地，又離敵人相當遠，這使毛澤東既有時間研究黨的理論和全局性戰略，又有閒暇暢遊於歷史、哲學和詩詞當中。相比之下，住在太行山區一個較小根據地的鄧小平政委，更加接近日本人的前線，幾乎沒有時間研究理論，他得擔起實際責任，處理和當地居民有關的各種問題。實際上，鄧小平在八年抗戰時期成了山西太行山區的最高政治領導人。他要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為當地數萬居民和部隊提供足夠的口糧，同時還要生產足夠的經濟作物，並使當地簡陋的工業能夠生產出足夠的布匹和其他日用品。他還要為正規軍徵募兵員，評估軍事行動的政治意義，這是他在廣西時就已學會的本領。作為鼓勵地方經濟的舉措之一，他設計了一種鼓勵當地生產的稅收制度。他寫道：「向老百姓徵稅要根據當地最近幾年的平均收成，超出這一平均數的部分完全歸生產者所有。」^[1-21]為了使支持正規軍的當地民兵隨時作好對日作戰的準備，他還在這個地區秘密巡視。^[1-22]

1939 年鄧小平第二次回到延安，並在那裏與卓琳結婚。卓琳是延安聰明伶俐的革命三姐妹之一。她們的父親是以製作雲南火腿聞名的富商，死於後來的土改。在卓琳那個年齡的人中，能考入大學的人已經是百裏挑一，受過教育的女性更是鳳毛麟角，三姐妹卻都唸過大學，並在讀書期間參加了革命，卓琳更是被競爭激烈的北京大學錄取，在物理系就讀。她曾經說，鄧小平在大多數共產黨幹部中是個出類拔萃者。她認為他們大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

卓琳比鄧小平年輕 12 歲。他們的簡樸婚禮在毛澤東的窯洞前舉行，到場的有毛澤東、劉少奇、李富春和其他幾個人。鄧小平和毛澤東在西北時見過多少次面，並無可靠的紀錄，但在鄧小平結婚時他倆顯然已是至交。毛澤東後來曾以讚賞的語氣，談到鄧小平在江西時受過的罪（指鄧是「毛派分子」）。毛對鄧無疑抱有好感，這不僅由於鄧的能力和行動決心，還因為鄧對毛早期創建農村紅色根據地的成就深懷敬意——鄧本人也曾作過這方面的嘗試，但是沒有成功。

鄧小平和卓琳育有三女（鄧林、鄧楠、鄧榕）二子（鄧樸方和鄧質方）。除了鄧在危險環境中作戰時兩人不在一起外，直到五十八年後鄧小平去世以前，他們一直共同生活，是中共領導人中比較穩定的家庭之一。鄧小平並不親近自己的父親，可是他的妻子兒女卻是他面對繁重工作壓力時的避風港。與家人的親密關係並沒有延伸到政治事務上。鄧小平嚴守黨紀，從不把黨內高層的議論告訴家人。

內戰：1946–1949

抗戰之後，鄧小平成了中共在晉冀魯豫邊區事實上的最高長官，這是一片有著幾百萬人口、地跨數省——河北、山西、山東和河南——的邊區。在這片遠離國民黨軍隊駐守的城市的山區，為了不可避免的國共內戰，鄧小平整軍備戰。

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在年輕人中尋找和培養有前途的共產黨組織人才，其中有兩個人——趙紫陽和萬里——在 1978 年以後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戰結束不到一年，國共內戰爆發不久，劉伯承和鄧小平便奉命率軍進入華中平原一側的大別山。毛澤東這一調動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國民黨軍隊趕出西北地方，因為它正威脅著延安的中共總部；但不止如此，毛還希望在華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塊根據地，因為縱觀中國歷史，那裏一向是兵家決戰之地。向大別山進軍註定傷亡慘重，因為劉鄧大軍缺少禦寒衣被等各種給養，而該地區的敵軍又十分強大。

作為一個堅忍不拔、嚴守紀律的軍人，儘管鄧小平很清楚可能造成的嚴重損失，仍然義無反顧地進軍。劉鄧大軍中很多人要麼戰死，要麼死於饑寒交迫。倖存的士兵處境艱險，極易受到敵人攻擊，或因缺少給養而蒙受進一步損失。儘管困難重重，劉鄧餘部和新補充的部隊還是像毛澤東設想的那樣，建立了一個烏瞰華中平原的根據地。不同於抗戰時期的游擊戰，在內戰期間規模浩大的戰役中，雙方都投入了千軍萬馬。這個根據地將在未來的淮海戰役——國共內戰中的三大關鍵戰役之一——中發揮其作用。

淮海戰役從 1948 年 11 月初打到 1949 年 1 月，是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戰役之一。國民黨的參戰軍隊大約為 60 萬，由精明強幹的將軍指揮；中共投入的兵力大約為 50 萬，此外中共還動員了一百多萬農民為部隊運送糧草軍需，徵用了七十多萬頭牲口作為運輸工具。中共的戰略是引誘長江以北的國民黨軍隊打一場殲滅戰，以減少渡過寬闊的長江時可能遇到的抵抗。提出這個戰略的人是華東野戰軍（後來的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的副手、才華出眾的粟裕將軍。雖然鄧小平在淮海戰役期間與延安保持著密切聯繫，但毛澤東留給中共地方司令員自行決策的空間要遠遠大於蔣介石給其將領的空間。此時蔣介石已經對中共軍隊的高昂士氣深感憂慮——他們都是貧苦農民，盼著打了勝仗之後自己家裏就能分到田地。淮海戰役之前，蔣介石的軍隊在東北被中共的軍隊打敗，也使他對內戰的結局產生了悲觀情緒。^[1-23]

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在人數上多於劉鄧大軍，在淮海戰役初期的戰鬥中殲敵也比受到敵軍重兵圍困的劉鄧大軍更為成功。時稱「中原野戰軍」的劉鄧大軍（不久後改編為第二野戰軍），在投入戰鬥後傷亡慘重，需要粟裕的華東野戰軍及其炮兵前來增援。在淮海戰役的最後階段，毛澤東下令成立總前委，將 50 萬中共軍隊納入鄧小平總書記的統一領導。

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的領導作用並非沒有爭議。劉伯承擔心部隊的安全，試圖挖掘更多的戰壕以抵禦國民黨軍隊的優勢火力，鄧小平卻堅持進攻。後來有人批評鄧小平說，他在戰役初期把部隊置於更大的危險之中，造成了不必要的傷亡，也沒有讓部隊挖築更多的防禦工事。

但是，由總前委書記鄧小平統一領導的 50 萬中共大軍，在戰役的後期還是佔了上風。這一場大戰既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士氣的勝利，此後蔣介石的軍隊便退居守勢，共產黨的軍隊則繼續向南和向西推進。事實上，淮海戰役之後，國民黨已經難以集結大軍抵抗共產黨的進攻了。中共軍隊輕鬆擊潰抵抗，渡過寬闊的長江，迅速地西進、南進。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在 1984 年問鄧小平，他在一生中的什麼時候感到最幸福，鄧小平回答說，是他們克服兵力裝備都不如對手的雙重障礙，取得解放戰爭勝利的那三年。他特別提到了橫渡長江的壯舉。^[1-24]

隨著中共軍隊的節節勝利，一座又一座城市被攻取，部分軍隊需要留在城市建立軍管會，以便管理城市和開始政權過渡工作。中共軍隊攻佔上海後，鄧小平有幾周的時間親自負責接管上海市政府各個部門的軍管會工作。過去一直不暴露身分的上海中共黨員和支持中共的「進步」青年協助共產黨接管了城市。鄧小平會見當地各行各業的領袖，解釋黨的政策，選拔和任命下級部門的領導，以便在短暫的過渡期能夠獲得當地人民的支持。他還大力發展新黨員，以擴大上海地區的領導力量。上海市民對國民黨的腐敗和惡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普遍歡迎共產黨的到來。但是，中共還是用了數年時間，才克服了內戰造成的破壞和混亂。在領導了上海的政權過渡之後，鄧小平離開上海返回自己的部隊，開始向大西南進軍。

在西南地區建立中共政權：1949–1966

從 1947 年奪取東北到 1949 年年底控制全國，中共只用了兩年多時間。每佔領一個大區，中共就會成立一個「局」，領導該大區。1952 年以前，在北京逐漸建立起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期間，一直是由這六個大區的局承擔著統治中國的主要責任。為了給這些大區的中共統治打下基礎，毛澤東通常會挑選當地出身的人擔任大區領導。劉伯承和鄧小平都是四川人，而四川是西南地區最大的省份。戰時政委要服從司令員，和平時期則是司令員服從政委。因此鄧小平便成了西南

局——共產黨最後收復的六個大區的最後一個，有一億人口——的黨委第一書記。鄧小平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幹到 1952 年，直到各大區主要領導人奉調回京，其職責也被轉移到北京。

在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期間，鄧小平要平定全區，把國民黨的統治轉變為共產黨的領導；他要招募和訓練黨員，使之能夠領導政府與社會；他要克服戰時的混亂局面，領導整個大區的經濟發展。^[1-25]隨著共產黨在社會扎下根，他要承擔起公共生活各方面的責任——治安、經濟、工商業、交通運輸、文化教育和醫療衛生。

平定西南農村地區的工作比其他地方更為困難，因為自抗戰以來，這裏一直是國民黨的全國總部，國民黨在這裏擁有大量支持者；並且，對於逃到這裏或融入當地民眾的國民黨軍人來說，這個地區是他們的最後防線。他們中間有些人繼續或被動或主動地反抗中共統治。為了確保肅清這些麻煩製造者，平定該地區，賀龍將軍及其第一野戰軍也從西北來到這裏，以便加強劉伯承軍隊的力量。共產黨最後控制的省區是西藏。1951 年，鄧小平從西南和西北軍區抽調兵力控制了該地並建立了秩序。藏人缺少強大的軍隊，加之解放軍進軍西藏之前他們在川西的失敗，使得對西藏的軍事征服變得相對容易。鄧小平明白，從長遠看，西南地區的成敗取決於能否選拔和留住精明強幹的部下。因此他重用二野那些在維持部隊士氣、處理軍地關係方面富有經驗的政委，但也允許留用很多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只要他們願意跟共產黨合作。他還監督部下招募和培養有能力的年輕人，以充實地方黨政機關。

鄧小平對爭取當地人民的合作和擁護極為重視。在發表的講話和文章中，他向當地政府官員和民眾解釋共產黨的統治。他還組織招募和培訓幹部，讓他們開展消滅地主階級、把土地歸還農民的土改。華南局的葉劍英曾受到批評，說他對當地的地主手太軟；與葉劍英不同，鄧小平在土改中成績斐然，他鬥地主，處決了一些大地主，把田地分給農民，動員地方農民支持新的領導，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

鄧小平還大力推動成渝鐵路的建設。他認為這個連接該地區兩座最大城市重慶和成都的項目，對西南地區的發展至關重要，而且這也是他父輩就想做的事。鑒於當時施工設備十分原始，這是一項艱巨的工程，但是鄧小平和工人們百折不撓。1952 年，在離開西南局回京任職之前，鄧小平自豪地參加了這條鐵路的竣工儀式。

建設社會主義：1952—1959

1952 年，各大區的領導人奉調回到已經統治了全國的中央政府，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央政府副總理。不久毛澤東又下達書面命令，指示凡提交黨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經鄧小平過目。這反映了毛澤東對鄧小平及其回京後協調各項工作的關鍵角色深表信任。1956 年，鄧小平被任命為黨的秘書長——這是處理黨的日常工作的關鍵職位——和政治局常委之一。先前，他和毛澤東一起參加會議，研究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把個體農業和小工商業集體化、把大工業國有化的「社會主義改造」方案。

1953 年，財政部長薄一波丟掉了職務，因為毛澤東認為他在評估資本家的稅額時心太軟。毛任命鄧小平接替了他。鄧小平擔任財政部長的一年，也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他主導著與各省進行協商的政治過程，以確定各省要上繳多少糧食和稅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雖然最後拍板的不是他，但在國家依然很貧窮的時期，他必須作出有重大影響的判斷，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彙報各省完成糧食配額和上繳稅收的能力。^[1-26]當時，毛澤東經常和高級幹部開會，鄧小平每個月都要和他一起開好幾次會。1953 年底，鄧小平和陳雲（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向毛澤東密報了中共統治早期面臨的最嚴重人事問題：高崗有分裂黨的危險。毛澤東聽取了他們的警告。鄧小平和陳雲在處理這一事件上發揮了關鍵作用。^[1-27]

鄧小平在擔任處理黨內日常工作的主角時，得以親身觀察毛澤東如何判斷國家面對的重大問題以及如何作出影響全國的決策。毛雖然在晚年犯下災難性的錯誤，但他當時仍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傑出政治領袖。另外，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說周恩來總理是他遇到過的最偉大的政治領導人之一，在巴黎和上海時就與周恩來相識的鄧小平，也有機會觀察到這位大師如何處理外交事務，如何全面領導政府工作。通過和毛、周一起參加會議，鄧小平得以學習他那代人中這兩位最偉大的領導人如何評估國家大事。此外，作為建立新組織的參與者，鄧小平也有機會瞭解作出重大決定的理由，思考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大框架，這些經驗對於他後來在 1980 年代重建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都有莫大幫助。

1960 年毛澤東與蘇聯決裂，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封閉的國家。不過，他也花了很多時間思考如何對付列強。從 1952 年到 1955 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也要參與有關外交事務的討論。而在 1956 年到 1966 年擔任總書記期間，他還要處理與各國共產黨的關係（不含非共產黨國家），在這個時期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大多數國家都是共產黨國家。

例如，1956年2月他是赴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團團長，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譴責了史太林（Joseph Stalin）。與出席大會的其他共產黨國家的同志一樣，鄧小平也未被允許出席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的會議，但第二天他便獲准看了講話稿。他馬上敏銳地意識到，此事不但關係到蘇聯國內，而且會產生國際影響，他指派兩名翻譯連夜譯出講話，但在毛澤東決定如何作出反應之前他謹慎地避免談論這篇講話。回到北京後，他把講話的內容向毛澤東——毛也難免史太林受到的很多批評——做了彙報，由毛澤東決定如何應對。^[1-28]鄧小平很快就意識到，對史太林的全面批判將殃及那些和史太林一起工作的人，削弱蘇共的權威。

在實現了農業手工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之後，中共於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在1945年內戰前夕確定黨的任務的七大之後，這是第一次召開黨代會。大會作了全面而周密的準備，為這個負有統治一個大國責任的政黨提供了遠景規劃：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已經完成，五年計劃已在實施，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已不復存在，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人希望，黨今後能夠集中力量使工作步入正軌，推動經濟的有序發展。^[1-29]

鄧小平在八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提拔為總書記；作為政治局常委，他是黨的六名最高領導人之一（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之後）。他在1954年擔任的秘書長一職有黨內管家的性質，這使他能夠深入參與所有重大決策過程。但是1956年當上總書記——他擔任這一職務直到文革之前——以後，他成了負責黨的日常工作的領導。他既要抓北京中央領導機關的工作，還要同各省的領導打交道。在毛澤東的全面領導下，黨的第一副主席劉少奇為政治局常委提供工作指導，由政治局作出決定，然後交鄧小平執行。

當鄧小平在1957年11月陪同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鄧小平有理有據地嚴辭反駁了蘇共的大理論家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令毛澤東大為激賞，會議結束時他指著鄧小平說：「看見那個小個子嗎？他非常有見識，前程遠大。」^[1-30]據赫魯曉夫回憶，「毛澤東認為他是領導層中最有前途的成員」。^[1-31]

從1957年春開始，很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的鼓舞下暢所欲言，批評的嚴重程度令毛澤東感到意外。他怒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資本家雖然已被消滅，但他們還是脫不掉自己的階級本性。毛澤東在1957年夏發動「反右運動」，羞辱所有那些嚴厲批評中共的人。毛澤東帶頭整了大約55萬名知識分子，把他們劃為右派，並吩咐鄧小平具體操辦這場運動。鄧小平在「雙百」運動中曾對黨的地方幹部說，要聽得進批評意見，不要打擊報復。可是在反右運動中，有的知識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地批評那些任勞任怨的幹部讓他感到惱怒。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力挺毛澤東，維護黨的權威，打擊敢言的知識分子。這些打擊迫害以及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讓中國的知識精英耿耿於懷。

反右運動毀掉了中國大批最優秀的科技人才，也使很多人疏遠了中共。本來有可能阻止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批評者變得噤若寒蟬。毛頭腦發熱想出來的這種烏托邦式的大躍進，要以蠻幹的方式在短短幾年內徹底改造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大躍進開始後，特別是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不再像以前那樣不時徵求身邊幹部的意見，很多忠實於毛的人也變得沉默不語。

鄧小平作為執行者，要比毛澤東這個哲學家、詩人和夢想家更加務實；毛澤東看重鄧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為他們既能直率地向他說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開去講。像黨內許多忠誠的幹部一樣，鄧小平很清楚大躍進時的毛澤東不願聽取不同意見，因此他也沒有批評毛。此外，他和不少人都認為，毛澤東在內戰和統一全國的過程中作出的決策往往都被證明是正確的，所以他們寧願把懷疑放在一邊，一心執行毛的命令。鄧小平後來對女兒說，他很後悔自己沒有作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澤東犯下這些嚴重錯誤。

走入歧途的大躍進在全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饑荒很快就蔓延開來。農民被組織成公社後，公社使更多的農民參加草率上馬的建設項目，或在田間幹活；但是看到不幹活的人跟別人吃得一樣好，這讓他們失去了勞動熱情，結果導致嚴重減產，很多食堂也斷了炊。

另一個問題是對環境的破壞。由於鼓勵各地建「土高爐」，人們四處砍伐山林充當燃料，煉出不合格的金屬。大型新建工程用光了水泥，使計劃更周全的項目無水泥可用；各地黨委書記在壓力之下，罔顧現實作出糧食生產的承諾，來年只好動用庫存兌現承諾，而不顧當地百姓正在忍饑挨餓。雖然難以估算在最糟糕的三年——從1959年到1961年——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但按大陸官方統計，估計有1,600萬到1,700萬人死於非正常原因，外國分析家的估計則高達4,500萬。^[1-32]

1959年以前，鄧小平在貫徹毛的大躍進計劃時一直是個聽話的幹部。但是當烏托邦式試驗的災難性後果顯露出來時，他卻承擔着不令人羨慕的任務，他要掩蓋亂局，向黨的地方幹部發出指示，讓他們想方設法度過難關。在鄧小平

每天的日程上，晚上一般是和家人休閒的時間，然而在大躍進的混亂時期他卻無暇休息。大躍進進行了一年後的 1959 年夏天，鄧小平在玩桌球時不慎滑倒摔斷了腿，醫生的診斷是他幾個月內難以恢復工作；有些知情人認為，鄧小平這是有意避開會議，因為他知道自己會被要求支持毛澤東繼續搞大躍進，他要避免陷入這種處境。

病假開始時，鄧小平的觀點就已經發生了變化。^[1-33]幾個月後鄧小平重新工作，他繼續聽從毛的命令，表達對毛的忠心。但是大躍進的災難拉大了不可救藥的浪漫幻想家和務實的執行者之間的距離。鄧小平仍在貫徹毛的指示，但他擴大了自己的迴旋餘地，不再像以前那樣對毛澤東唯命是從了。從 1960 年到 1961 年，鄧小平積極參與了對工業、農業、教育和其他部門的務實的調整，以緩和大躍進的極端做法。當時毛澤東並沒有批評這些措施，但他後來發牢騷說，他講話時鄧小平坐在房間最後面，對他的話充耳不聞。他抱怨手下的幹部把他當成已經作古的人，雖然敬著他，卻把他的話當耳邊風。

雖然在國內問題上革命浪漫派和務實的執行者之間的裂痕在 1960 年代初日益加劇，但毛澤東仍全力支持鄧小平主持中蘇論戰。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分別於 1960 年 8 月和 10 月至 11 月兩次前往蘇聯，為中國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爭取更大的自由。他還主持了中共「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寫作。1963 年 7 月，毛澤東對鄧小平與蘇斯洛夫的交鋒——這次激烈交鋒削弱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為欣賞，乃至親自前往北京機場迎接鄧小平回國，給鄧小平以殊榮。確實，中蘇論戰中毛對鄧的信任使兩人的關係依然牢固，儘管他們在國內政策上存在分歧。^[1-34]

1964 年 10 月，赫魯曉夫在一次政變中被他的同事趕下台。毛澤東本來就對那些不對他言聽計從的部下感到不放心，這一事件後更多地談到接班人問題，也越發堅定地要求對他個人的徹底效忠。1965 年 2 月，毛澤東讓妻子江青引發批評，說黨的幹部沒有完全擁護毛的革命路線，並在 1966 年 5 月中旬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親自帶頭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毛澤東看來，「走資派」就是那些我行我素、沒有完全服從他領導的人。他動員紅衛兵和造反派批鬥當權派，在高級幹部中巧施離間計，同時依靠林彪控制軍隊，將一大批老幹部整下台，讓他們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

對大躍進的普遍不滿讓毛澤東怒氣衝天。例如，劉少奇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指責毛澤東要為大躍進的失敗負責，並且拒絕為自己當初的支持承擔全部責任。這使毛澤東十分氣憤，決心把他除掉。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之後繼續和劉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讓毛澤東感到不快。因此當 1966 年毛澤東整劉少奇時，也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說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1-35]

毛澤東的攻擊猛烈且具有報復性。從 1966 年底開始的批判日復一日地持續了數月，報紙廣播對劉鄧的批判鋪天蓋地。劉少奇是黨的副主席和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卻與家人天各一方，病中得不到任何必要的治療，在軟禁中死於開封；他的妻子也被關進了監獄。

1967 年，毛澤東把鄧小平夫妻軟禁在中南海（緊鄰天安門，是黨的高層領導生活和辦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被趕走以後，他們便同外界失去了聯繫，兩年間不知孩子們的下落。他們把時間用於讀報、看書和聽廣播，每天打掃門前的道路。他們的處境比很多挨整的幹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裏，他們得以免受紅衛兵的批鬥，並被允許保留自己的廚師和一名警衛，還能夠用節餘的工資購買必需品。毛澤東既要在鄧小平的個人效忠問題上給他點教訓，也為日後重新啟用他留有餘地。

鄧小平的子女卻沒有得到同樣的保護。他們受到紅衛兵的批鬥，被迫交代父親的罪行。大女兒鄧林在藝術學院受到批鬥，在北京大學唸物理的長子鄧樸方也在校內受到迫害。1967 年，兩個年齡較小的孩子鄧榕和鄧質方（和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一起）被趕到北京擁擠的工人宿舍，不許和父母見面。紅衛兵經常不事先通知就闖入家門，強迫他們低頭彎腰站著，搜羅有關其父罪行的材料，向他們大聲喝斥，在他們的牆上貼大字報，有時還摔東西。後來，三姐妹和鄧質方都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

1968 年，成立了一個調查鄧小平「罪行」的「專案組」。他們向認識鄧小平的人提問，調查他脫離紅七軍、與被毛澤東批判的彭德懷繼續保持良好關係等罪行。作為調查的一部分，鄧小平寫了一份自己八歲以後的履歷，一一羅列出他的全部個人交往。幸運的是，他早就養成了不留任何字跡的習慣，而他的工作也從未使他與國民黨官員有過密切接觸。在 1969 年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江青要求把鄧小平開除出黨，被毛澤東拒絕。毛繼續保護鄧小平，以防他受到激進派的攻擊。

1969 年 3 月第一次中蘇邊境衝突後，10 月毛澤東發出指示，要把一些高級幹部疏散到地方去，以便蘇聯一旦入侵時他們可以在當地組織抵抗。朱德和董必武被派往廣東，葉劍英去了湖南，聶榮臻和陳毅去了河南，陳雲、王震和

鄧小平分別去了江西的不同地方。事實上，他們下放農村後，並沒有在組織地方作抵抗準備中發揮任何作用。一些敏銳的北京觀察家認為，是林彪害怕潛在的對手，而以蘇聯進攻的危險為藉口說服了毛，把可能對其權力構成威脅的北京高幹流放到外地。確實，1971年林彪墜機身亡後，這些領導人紛紛獲准從地方返回北京。

鄧小平在去江西時已經深信，中國的問題不僅是由於毛澤東的錯誤，也是由於體制的深層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澤東，導致了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1949年中共掌權時，作為革命家的鄧小平成了建設者，致力於建設新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當他動身去江西時，他已經開始思考中國需要進行哪些改革。此時，他已經在最高層積累了有關黨政軍各方面工作的不同尋常的深厚經驗，熟知所有重大的內政外交問題，這構成了他反思中國如何進行改革的基礎。

[1-1]鄧小平出生時，牌坊村這個小村落叫「姚坪里」，屬於更大的行政村望溪鄉。後來它們分別改為「牌坊村」和「協興鎮」。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1904年8月22日，頁1。

[1-2]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毛毛）在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中，記述了她的家庭背景。這部分內容也利用了我對廣安縣的兩次訪問，其中一次去過鄧小平的家和當地的博物館；還有與當地歷史學家和鄧榕的交談，時間為2002年至2006年。

[1-3]《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15年，頁5。

[1-4]同上，1919年11月17–18日，頁7。

[1-5]Geneviève Barman and Nicole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çaises de Deng Xiaoping,”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o. 20 (October–December 1988): 19; 《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0年10月19日，頁10。鄧榕也講述過父親在法國的學習和工作經歷，見 *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pp. 58–79。

[1-6]《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1年1月12日，頁11。

[1-7]《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1年4月2日，頁12。

[1-8]《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3年2月17–19日，頁17。

[1-9]《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3年3月7日，頁17–18。

[1-10]《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3年6月11日，頁18；1924年2月1日，頁19。

[1-11]《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4年7月13–15日，16日，頁19。

[1-12]Marilyn Levine, *The Guomindang in Europe: A Sourcebook of Documents*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0), pp. 90–93; Barman and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çaises de Deng Xiaoping,” p. 30; interviews with Marilyn Levine, n.d.

[1-13]Barman and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çaises de Deng Xiaoping,” p. 34.

[1-14]關於中國學生在法國的生活和活動的記述，見 Marilyn A.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Genevieve Barman and Nicole Dulioust, “The Communists in the Work and Study Movement in France,” *Republican China* 13, no. 2 (April 1988): 24–39; 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1-15]Alexander V. Pantsov and Daria Alexandrovna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Lessons from Bolshevism,” trans. Steven I. Levine, 譯稿現存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antsov 和 Spuchnik 可以看到有關留蘇中國學生的全部蘇共檔案。另見對 Alexander Pantsov 的訪談，無日期。

[1-16]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1-17]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p. 12.

[1-18]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p. 11.

[1-19]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1-20]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1-21]Teng Hxiao Ping [Deng Xiaoping],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the Taihang Region," in Stuart Gelder,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46), p. 201.

[1-22]作者對太行山區黨史專家的採訪，無日期。

[1-23]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1-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鄧小平自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1。

[1-25]對這一過程的詳細描述見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6]《鄧小平年譜（1904–1974）》，頁1065。

[1-27]《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53年9月16日，頁1133。

[1-28]Vladislav M. Zubok, "Deng Xiaoping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6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0 (1997): 152–162; Jian Chen, "Deng Xiaoping and Mao's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the Path toward the Sino-Soviet Split: A Rejoind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0 (1997): 162–182.

[1-29]關於鄧小平在中共八大各項活動中發揮的作用，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55年8月17日，頁1249–1250；1955年10月14日，頁1261；1956年2月6日，頁1272；1956年8月10日–9月28日，頁1303–1318。大會文件見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pp. 1–390.

[1-30]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 253.

[1-31]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 281.

[1-32]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2010);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下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1-33]對鄧榕的訪談，2002–2006年。

[1-34]Zubok, "Deng Xiaoping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63," pp. 152–162; Chen, "Deng Xiaoping and Mao's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the Path toward the Sino-Soviet Split," pp. 162–182.

[1-35]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 2 章

從放逐到返京：1969—1974

1969 年 10 月 26 日，鄧小平與妻子卓琳、繼母夏伯根一起，離開了他們居住了十多年的中南海。一架專機把他們送到江西南昌，鄧小平要在那裏參加勞動，接受毛澤東思想再教育。他們獲准攜帶一些個人物品和幾箱書。鄧小平離京前請求見毛澤東一面，但未得到批准。不過，他被告知可以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寫信，他有理由相信汪東興會把信轉交毛澤東。鄧小平登上飛機時，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在江西呆多久。

在江西，鄧小平不能看機密文件，除了專門指派的當地幹部，也不准跟其他幹部有來往。但是他的黨籍被保留了，這使他對毛澤東有朝一日還會讓他回去工作抱有希望。1969 年 4 月，他在離京前不久寫了一份檢討，儘管毛澤東依然堅持鄧小平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此後他和家人便不再被當作階級敵人看待。鄧小平在離京前一晚與汪東興的談話也為他提供了一線希望：汪東興告訴他，他和妻子最終還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們不在時那所房子會一直空著。所有這一切肯定給他帶來了希望，因為他到達南昌後對自己專案組的當地代表說：「我還會出來工作，我還能為黨工作 10 年。」^[2-1]事實上，鄧小平回京後，又為黨工作了將近 20 年。

在鄧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來打電話給江西當地幹部，指示他們安排鄧小平的生活。為了確保安全，不使鄧小平一家人受到造反派的攻擊，他們被安排在一個軍事駐地，住所所在南昌市附近，以便必要時有方便的交通。附近有一家工廠，使鄧小平和卓琳能參加勞動。當地幹部選了此前由南昌步兵學校校長居住的一座二層小樓，鄧小平一家住二樓，保衛人員和其他幹部住一樓。以當時的標準而論，這房子給一個高幹住還算合適：雖然簡樸，但寬敞舒適。巧的是這所房子離著名的南昌起義的發生地只有幾英哩，那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誕生地——1927 年 8 月 1 日共產黨人（包括周恩來、朱德、陳毅、劉伯承、賀龍以及其他很多後來的領導人）就在那裏展開了對國民黨的第一次武裝反抗。

在江西安家之後，鄧小平和卓琳每天六點半起床。戰爭年代鄧小平每天做的頭一件事是往頭上澆一桶冷水，在江西時他用一塊浸了冷水的小毛巾洗臉洗頭，他認為這可以增強禦寒能力。然後他跟卓琳一起，在別人的監督下讀一個小時毛主席著作，這是他們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鄧小平不與當地幹部談政治，只有在聽他們上毛澤東思想教育課時除外。

吃過早飯後，鄧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縣拖拉機修造廠，在那裏幹一上午的活。分配給鄧小平的工作是對體力要求較輕的鉗工，很像 50 年前他在法國工廠幹的事情。修造廠離家只有一公里，當地人修了一條安全的專用路從他家通往工廠，使鄧小平夫婦每天步行上下班時不會遇到外人。^[2-2]工廠職工們都知道鄧小平的身分，但鄧小平告訴他們叫他「老鄧」就行，這是中國人對年長同事的常見稱呼。鄧小平幹活時，除了眼前的工作和他在當地的生活外，不跟工人談論任何別的事情。

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在家裏為他們做飯和料理家務。午飯後，鄧小平夫妻小睡片刻，然後閱讀他們帶來的書，有中國歷史典籍、《紅樓夢》和《水滸傳》之類的小說，還有翻譯的俄國和法國文學作品。當時還沒有電視，但是他們可以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他們晚十點上床，鄧小平還要讀一個小時的書，然後睡覺。孩子們的陸續到來，為他們帶來了一些外界的消息。鄧樸方在 1971 年夏天來後修好了一台收音機，使他們能夠聽到短波電台。

除了在工廠勞動，鄧小平和卓琳也在自己的菜園裏幹活。鄧小平也在家裏幫著擦地劈柴。^[2-3]他們夫妻兩人的工資比過去要少，因此日子過得很節儉。夏伯根養了一些雞，使他們仍然能夠吃上雞蛋和肉。鄧小平減少了吸煙的數量，幾天才抽一包煙。他上午在工廠裏不吸煙，只在下午和晚上抽幾枝。他也不再喝紅酒，只在午飯時喝一杯便宜的當地酒。^[2-4]長女鄧林和次女鄧楠仍能從工作單位領到一點工資，她們到來後便和沒有工作的兄弟姊妹一起分享這點錢。

文革對國家、對鄧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響讓他感到痛心。但是，據在江西最後兩年的大多數時間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鄧榕說：「他沒有意氣用事，沒有情緒消沉，沒有放棄哪怕是最後的一線希望。」^[2-5]在這一點上鄧不像他的一些老同事，譬如 1949 年至 1958 年任上海市長、1958 年至 1972 年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元帥。陳毅是鄧小平在法國時的老友、淮海戰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後變得意志消沉，情緒低落。^[2-6]

曾當過周恩來助手的李慎之，後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當幹部時是隨同鄧小平訪美的顧問之一，據他說，毛澤東沒有意識到鄧小平在江西期間發生了多大變化。^[2-7]鄧小平回京後，仍要做一些在毛澤東手下不得不做的事，但是他堅信中國需要更深層的變革，他對中國應當向何處去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反思的歲月

不論毛澤東對身在江西的鄧小平有何打算，對鄧小平來說這是一個機會，使他得以擺脫北京嚴酷的政治亂局——那裏，受到懷疑的人還在處心積慮地招架隨時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這些經歷過大權旁落和東山再起的國家領袖一樣，鄧小平發現，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歲月使他能夠對國家的重大和長遠目標形成清晰的認識。倘若鄧小平沒有對中國需要進行的改革的性質以及如何加以落實作過長期思考，很難想像他在 1977 年以後能夠採取那些熟練而有力的措施。毛澤東曾經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鎖隔絕的時間思考中共奪取政權後全國的整體戰略，鄧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時光，思考著他所要進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過，毛在延安時每天都與他的同志和助手討論，在他們的幫助下著書立說，鄧小平在江西時卻只能獨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下放江西使鄧小平能夠很快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雖然他不輕易流露感情，但據女兒鄧榕說，父親其實是個有感情的人。她說，父親在北京挨批的三年裏身體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後體重又開始增加，恢復了健康。他服用安眠藥已經多年，文革期間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 1970 年 1 月 1 日，即來到江西還不到兩個月，他睡覺時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藥了。^[2-8]鄧榕說，父親每天步行大約 5,000 步，圍著小樓轉 40 圈。用她的話說，鄧小平「一圈一圈地走著，走得很快，……一邊走著，一邊思索，……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2-9]他將在北京重新擔當重要角色的前景，使他的思考有了目標感。鄧小平從來不跟妻子兒女談論高層的事，但是妻子和女兒鄧榕整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又瞭解北京的政壇，所以能夠覺察到他的心情與關切。^[2-10]據鄧榕說，他們知道父親散步時在思考著自己的前途和中國的未來，以及回京之後要做些什麼。^[2-11]

鄧小平無法預見什麼時候能回北京、回京後毛澤東會讓他幹些什麼，也無法預見那時候國家將面對怎樣的具體形勢。他可以思考如何讓毛澤東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顧自己與同事經歷過的那些大起大落的生死鬥爭。但是，他還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黨如何對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澤東的歷史遺產？如何既讓毛的接班人改變路線，同時又能維持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基於他在中共領導層的廣泛個人交往，他可以評估不同領導人可能發揮的作用。他還可以思考如何實現由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為此他和自己最親密的同事已經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

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在災難性的文革之後恢復秩序。鄧樸方是鄧小平五個子女中最後一個獲准來江西的。1968 年，鄧樸方不堪紅衛兵無休止的迫害而跳樓自盡，結果摔斷了脊椎。由於父親正在受批判，醫院最初不敢給他治療，結果導致病情惡化。後來他獲准轉到北京第三人民醫院，醫生發現他脊骨斷裂，胸骨多處骨折，而且發著高燒。鄧樸方在醫院裏昏迷了三天。醫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沒有做手術來避免嚴重癱瘓，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覺，喪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他後來被轉到北京大學附屬醫院，但院方仍沒有給他動手術改善病情。鄧樸方的妹妹鄧榕和鄧楠搬到醫院附近輪流看護他。1969 年夏天鄧榕獲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時，把鄧樸方的遭遇告訴了他們。據鄧榕說，知道兒子鄧樸方已經終身癱瘓後，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鄧小平坐在一邊一言不發，一枝接一枝地抽煙。^[2-12]

鄧樸方是孩子中與父親最親近的一個。當他在 1971 年 6 月終於獲准來到江西父母身邊時，由於他自己不能走動，為了方便他進出，在小樓的一層給他安排了一個房間。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為了避免生褥瘡，每兩個小時要給他翻一次身。鄧小平在鄧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幫助下，負責白天為鄧樸方翻身。鄧小平還幫他洗澡按摩。後來有一位外國客人提到文革時，鄧小平情緒激動地稱之為一場災難。

毛澤東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領袖，都是個強勢人物：他功高蓋世，整起好同志來也毫不留情；他精於權謀，任何人在對他的評價上都很難做到不偏不倚。鄧小平的一生與毛澤東難分難解，就更難以做到這一點。他十分崇敬毛澤東取得的豐功偉業，忠心耿耿地為他工作了將近 40 年。然而毛的政策卻重創了這個國家。他不但發動紅衛兵把鄧小平打成第二號「走資派」，而且殃及他全家。說他沒有被出賣的感覺，那不合人之常情，而他恰是個不免常情的人。他一定會思考若有有機會回京，他該如何與毛澤東相處。對鄧小平來說，問題不僅是毛在世時如何與他共事——只要毛還活著，

就一直一直是老大；他還要思考如何盡量擴大毛澤東所能容忍的決策空間。鄧小平下放江西時毛澤東已經 75 歲，而且身體不好，他不可能萬壽無疆。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入思考如何對待毛的聲名，在他撒手人寰之後應當採取什麼路線。

當 1956 年鄧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魯曉夫譴責史太林時，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魯曉夫那種感情用事的抨擊給蘇共和曾為史太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創。雖然中國的報刊廣播對鄧小平的批判鋪天蓋地，把他說成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但是遠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決心，自己絕不做中國的赫魯曉夫。問題是如何對待毛澤東在群眾中培養出來的對他的敬畏，那些被他毀掉一生的人對他的仇恨，以及很多黨內幹部對他犯下錯誤的嚴重程度的認識。鄧小平如何才能維持人們對黨的信心，相信黨能夠提供正確領導，避免傷害那些曾經為毛澤東工作的人，即使他改變了毛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有充分證據表明，當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對處理這一問題的基本方式已經成竹在胸。中國領導人應當頌揚毛澤東，繼續尊敬他。但是在解釋毛澤東思想時，不應把它當作僵化的意識形態，而應看作對時代環境的成功適應，這樣理解毛的思想可以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提供適應新環境的迴旋餘地。

鄧小平去江西時，已能覺察到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將發生劇變的曙光。自南北韓戰爭以來，即使是在鄧小平主持「九評蘇共公開信」的 1960 年代前期，中國對西方都一直大門緊閉。然而，由於布列茲尼夫（Leonid Brezhnev）在 1968 年 9 月提出威脅性的理論，主張在共產黨國家的根本制度受到威脅時干涉其內政是正當的，加之第二年中國又跟蘇聯在烏蘇里江打了一仗，所以中國為對抗蘇聯的威脅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毛澤東在 1969 年曾讓四位老帥——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葉劍英——就如何對付蘇聯的危險出主意，他們對毛澤東想讓他們說什麼心知肚明，便回答說，中國應當主動與西方修好。

鄧小平在江西可以看報紙，鄧樸方到來後他還可以收聽到外國電台的廣播。當他在 1970 年獲悉中國和加拿大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時，立刻便意識到基辛格後來承認的當時美國官員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澤東邀請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席 1970 年的國慶典禮，是中國準備跟美國發展關係的信號。1971 年，仍在江西的鄧小平又獲悉：北京取代臺灣成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又有 11 個國家正式承認中國，基辛格訪問北京是為 1972 年尼克遜總統（Richard Nixon）的訪華作準備。第二年他又獲悉日本正式承認了中國。

鄧小平知道蘇聯在 1950 年代的援助對提升中國的經濟和技術有多大幫助，他自然會思考如何擴大對西方的開放，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但是他也要深入思考在對外開放時如何應付國內保守力量的反對，如何維持一種強大而具靈活性的政治結構。

日本是一個因與西方建立密切關係而受益的亞洲國家。鄧小平去江西時已經知道，日本人就要走完人均收入以兩位數增長的十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將被進一步拋在後面。西方願意轉讓新技術和設備是日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中國應如何跟美國發展關係，從而也能獲得類似的好處？

亞洲其他一些地區的經濟在 1969 年時也已開始起飛，當中不僅有南韓，還有同樣以華人為主的地區——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國人看到中國大大落後於歐洲，懷疑中國的傳統不利於現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華人地區能夠實現現代化，為何中國就不能有同樣快速的發展？

鄧小平在江西時更加堅信，中國已經大大落後，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經驗使他深知大躍進的失敗是多麼嚴重，由於其他領導人總是閱讀有關地方成就的浮誇報告，很難對此作出評價。例如，據鄧榕說，當鄧樸方 1971 年 6 月來到江西時，父親想給他找點兒事做，就問自己的工人同事有沒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機。一個工人回答說，工人的錢根本買不起收音機。鄧榕說，這讓父親很傷心，社會主義已經搞了 20 年，工人家庭仍然連個收音機也買不起。^[2-13]

鄧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來自於孩子們的經歷。除了癱瘓的鄧樸方，鄧小平的四個孩子都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再教育。鄧榕從陝西北部的農村完成勞動回到江西後告訴家人，農村地區仍然沒有廁所和豬圈。幾個孩子也都向父母談到農民不得溫飽的處境。他們描述了經濟的衰敗和由他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黨組織所受到的破壞。鄧小平顯然被這些事情所觸動，在聽孩子們講話時一言不發。^[2-14]

得到允許前來江西看望鄧家的第一批朋友是李井泉的三個孩子，他們在 1972 年春節獲准來江西住了五天。鄧小平任西南軍區政委時，李井泉在他手下當副政委，1952 年又接替鄧小平擔任了西南局書記一職。當時李井泉的三個孩子在江西老家工作。他們告訴鄧小平，父親受到批鬥，被罷了官，母親被逼自盡。總是希望瞭解真相的鄧小平很關心西南地區紅衛兵鬥爭的細節，對李家三個孩子之一下放的農村地區的有關描述也很感興趣。當時他本人幾乎什麼也沒有講，只說了一句話，農村需要更多的教育。^[2-15]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對中國問題的嚴重性和進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經不存在任何幻想。

家人相濡以沫

鄧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後的幾年，五個孩子也不斷受到紅衛兵的攻擊。鄧林和鄧楠在工作單位挨整，另外幾個孩子則在學校裏受迫害。他們只要敢走出家門，紅衛兵就有可能認出他們，把他們攔住進行辱罵。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和睦融洽，受迫害後孩子們更是同舟共濟有甚於以往，他們堅信父親的清白，從未有過動搖，堅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共度時艱。鄧小平深知孩子們因為受到自己的牽連而受苦。對於家庭以外的幹部，鄧小平是同志，黨的政策高於私人關係，但是他與妻子卓琳以及他們兒女的關係卻不以政策為轉移。他們之間忠心耿耿，相互關愛，總是以家庭為重。鄧小平從未置任何子女於不顧，他們也沒有一個人與鄧小平斷絕關係。對給他家做事的人——司機、廚師、勤務兵和他的秘書王瑞林，他也保持著親密的友情。王瑞林除了 1966 年至 1972 年與鄧小平分開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擔任鄧小平的秘書，從 1952 年他 20 歲起到 1997 年鄧小平去世。鄧小平視其為鄧家的一員而更甚於一名同志。

文革期間，孩子們的麻煩是從 1966 年 10 月 1 日一篇批判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社論開始的。這篇社論雖然沒有點名，但顯然是針對鄧小平的。他的三個女兒立刻斷定那些指責全是不實之辭，她們也從未向紅衛兵或其他人提供過可以用作批判父親的證據的新材料。^[2-16]卓琳後來表揚自己的孩子說，即使受到壓力，所有的孩子都沒有譴責過自己的父親。

鄧小平在江西寫的大多數信件都是為了請求允許孩子回家探親、安排他們在南昌附近工作、讓鄧樸方得到必要的治療。鄧榕說，他一生中除了為孩子以外，從來沒有寫過這麼多信。^[2-17]鄧小平估計這些信會轉給毛澤東，因此也是在向毛提醒自己還在江西、準備接受對他任何方式的安排，但信的內容都是跟孩子有關的事。北京的答覆有時拖延很久，但孩子們最終都被獲准前來江西探望父親，每次至少兩周，不過鄧榕得到允許住更長的時間。1969 年 12 月，先是鄧榕，然後是鄧質方，都獲准在冬季農閒時間住在家裏，但春耕開始之前兩人還要回到農村的生產隊。接著回家的是當時在國家科委工作的鄧楠及其丈夫，兩人於 1971 年春節獲准回家探親。鄧楠在江西生了一個女兒，這是鄧小平的第一個孫輩。長女鄧林也獲准在春節時回家探親。這些探親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毛澤東仍然覺得，與劉少奇和其他幹部相比，他同鄧小平的關係要更親密一些。

五個子女中鄧樸方最瞭解上層的政局變化。^[2-18]他在江西的出現使父親有機會聽到更多關於學生政治鬥爭的細節、感受到北京的政局。後來，一些瞭解鄧小平的人說，他在權衡如何懲罰人時，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會讓個人感情影響決定，然而他特別嚴厲地堅持要判聶元梓十年徒刑，因為正是聶在北京大學發動的政治批鬥導致了鄧樸方的癱瘓和大約 60 名教職工的死亡。

文革之後，甚至在 1997 年鄧小平去世後，他的五個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仍然同住一院。鄧樸方投身於殘疾人的工作，自己也經商。鄧楠從事科技管理工作，後被提拔為國家科委副主任。在江西時，根據鄧小平的請求，女兒鄧榕在離鄧小平住處不遠的南昌學醫，鄧質方在那裏學物理。鄧榕後在 1980 年到中國駐華盛頓使館任職了兩年，擔任促進文化交流的工作。由於這項工作，她成了撰寫家史的作者，還領導著一個促進中外領導人交流、幫助贊助西方音樂演出的基金會。鄧質方在美國留學八年，拿到了羅徹斯特大學的物理學博士學位。隨後他進入一家從事技術進出口的公司，後來又搞了一個從事房地產和通信裝備的分公司。1994 年以後鄧小平的頭腦已不太清楚，據說卓琳因鄧質方受到貪污指控大受刺激，試圖服藥自殺，但被及時搶救過來。鄧質方最後沒有受到懲罰。

1973 年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的聽力已開始下降。他平時不參與兒孫湊在一起的聊天，不過有孫兒繞膝，看看電視節目，也讓他十分開心。如果他參與孩子的聊天，他們會直接衝著他耳邊說話，告訴他自己的見聞，說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據鄧榕說，父親對自己的經驗和判斷力十分自信，很少受到他們意見的影響。^[2-19]

林彪墜機，鄧小平致信毛澤東

在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毛澤東把林彪元帥和鄧小平視為他的兩個最有前途的接班人。^[2-20]確實，周恩來在 1965 年秋天曾對他的至交王稼祥說，毛澤東正在考慮兩個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鄧小平。^[2-21]故也不難理解，他們兩人會因爭取毛澤東的青睞相加而相互視為對手。

據鄧榕說，父親跟十大元帥中的九人都有來往，唯獨林彪除外。毛澤東本人也注意到了兩人的對立，鄧小平曾說，毛澤東在 1966 年把他叫去，讓他跟林彪見一面，與林合作共事。鄧小平同意去見林彪，但交談並沒有解決兩人之間的問題，反而使他們各行其道。^[2-22]毛澤東在 1966 年選定了林彪作為自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以確保解放軍對他的擁護，因為林彪自 1959 年取代彭德懷之後一直領導部隊。但是儘管如此，毛澤東在 1967 年仍然私下說，如果林彪的身體不行了，他還是要讓鄧小平回來。^[2-23]

林彪在抗戰時脊椎神經受傷，從此變得性格內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澤東走得太近有危險，在毛澤東實際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絕接受。自從成了毛的「親密戰友」後，林彪對自己與老謀深算的毛澤東之間的關係憂心忡忡——他的擔心也確實有道理。到 1970 年，歷來疑心很重的毛澤東已經懷疑林彪有可能在他還活著時就計劃篡權，在 1971 年夏末開始準備把他除掉。他首先接見了林彪手下的主要軍隊領導人，以確保他們對自己的忠誠。1971 年 9 月初毛澤東乘火車從杭州回北京時，列車在上海停下。由於他對林彪深懷戒心，擔心個人的安全，因此沒有離開火車，而是讓上海的前造反派頭頭、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洪文和與林彪關係密切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登上他的火車。毛澤東在確信得到他們的支持後告訴他們，他一回到北京就會解決林彪的問題。當林彪之子林立果在 9 月 12 日得知毛澤東已經回京後，林家人立刻變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調來飛行機組和一架飛機，載著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幾個追隨者連夜逃往蘇聯。但是飛機並沒有抵達目的地，它墜毀於蒙古，機上無一人生還。^[2-24]

鄧小平最先是從用短波收音機聽新聞的兒子鄧樸方那兒得知了墜機事件。但是他等了將近兩個月，直到這條消息正式公佈之後，才採取了行動。11 月 6 日，當林彪墜機的文件傳達到縣一級時，鄧小平、卓琳和他們上班的工廠裏大約 80 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兩個小時去聽有關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鄧小平聽力不好，所以被允許坐在前排，而且可以帶一份文件回家閱讀。林彪死後有不少人認為，毛澤東很快就會讓鄧小平回來擔任要職。鄧小平本人肯定也這麼想。聽過關於林彪的正式文件兩天後，雖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給汪東興寫信，他還是鼓起勇氣給毛主席發出了一封信。^[2-25]

鄧小平很清楚什麼樣的信最能打動毛澤東，他在請求把自己的兩個兒女安排在江西他的身邊工作後，又寫道：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對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2-26]

話雖然說得謙卑，但是鄧小平心中有數，毛澤東對於像他一樣敢作敢為、善於應變的幹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

鄧小平數月沒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覆後，毛澤東顯然仍未決定是否以及何時讓他回來，更談不上讓他擔任什麼職務了。此時的毛澤東身心交瘁，況且他的精力也沒有用在林彪之後的領導班子上，而是忙於為 1972 年 2 月尼克遜訪華作準備。

毛澤東任用周恩來和黨的老幹部：1971 年 9 月—1973 年 5 月

假如毛澤東能按部就班地實施除掉林彪的設想，他或許能安排好接班問題。突如其來的墜機事件打亂了他使黨內高層接受他除掉林彪的計劃。被毛澤東當作接班人和「最親密的戰友」的人神秘死亡，轉眼間成了陰謀奪權的叛徒，即使普通人也會因此懷疑毛的判斷力。毛澤東為此身心交瘁，有兩個月的時間很少起床。^[2-27]後來他又逐漸下床，但在 1972 年 2 月 12 日輕微昏迷過一次，肺裏的毛病也影響到心臟，不時的咳嗽使他難以入睡，只好躺在沙發上睡覺。雖然他已行動不便，但至少在某些時候，在大事上，他的頭腦依然清楚。^[2-28]

在毛澤東手下受過罪的人，以及對他帶來的災難感到痛心的人，都知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多麼強大，假如直接批毛，將會使國家陷入更大的混亂。1958 年 12 月，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蠻幹所造成的錯誤已是昭然若揭，當時他在政策上作出讓步，允許其他領導人享有更大的決策空間，但他仍然想方設法繼續掌舵。林彪死後毛澤東故技重施，他在政策上作出讓步，給予別人更多的決策權，但自己仍是當家人。

毛澤東需要抓緊建立一個林彪之後的新領導班子。按規定黨要在 1974 年——即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五年之後——召開十大，但他想在兩年以內讓新領導班子到位，以便能在 1973 年 8 月召開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為此，他必須到自己的圈子以外物色人選，他雖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夥去批判別人，可是他們都缺少必要的經驗、良好的判斷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國家的能力。他的現實選擇只能是啟用富有經驗的老幹部，而他們大多數都是文革的受害

者。他們在文革之前能夠身居高位，至少部分原因是他們的領導能力。毛澤東需要他們老練的治國才能。^[2-29]周恩來向他彙報了很多老幹部的遭遇，毛澤東說，沒想到會有那麼多人受到如此嚴重的迫害。

此時此刻，其實只有一個人能管好黨和政府，而且由於多年磨煉，他也不會威脅到毛的權力，此人就是周恩來。在 1970 年 8 月組成政治局常委的五個人中，林彪已死，其同黨陳伯達也鋃鐺入獄，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澤東和周恩來了。毛澤東幾乎別無選擇，只能給周恩來更大的空間去恢復黨和政府的秩序，他不但讓周恩來主持政治局工作，而且讓他管著政府和黨的機關。

有觀察家認為，周恩來對林彪之死會幸災樂禍，其實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個人感情上的強自制力聞名，可是在林彪墜機後不久，當他向副總理紀登奎說明國家面臨的困難局面時，不禁潸然淚下，必須停頓片刻以控制個人的感情。他一邊說一邊哽咽。據說周恩來一生只哭過三次，一次是因為他遲遲才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為葉挺的犧牲，他們在 1920 年代就是革命戰友，還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周恩來對林彪之死的這種情緒反應，可能有若干原因。他知道，林彪雖然是個著名的激進派，但他務實、重秩序，周恩來很容易與他共事。此外，周恩來在毛澤東手下鞠躬盡瘁幾十年，如今國家在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破壞後，再次面臨大動盪，這讓他憂心忡忡。他深知每邁出一步都是艱巨的任務。^[2-30]有人認為周恩來也是在為自己落淚。到那時為止他尚能避免毛澤東對他的猜忌和懲處——兩個二號人物，劉少奇和林彪，都因此而喪命。他一直設法只當三號人物，現在自己卻也成了二號人物。他知道毛澤東會疑心。確實，毛在兩年之後便開始批他。

除了依靠周恩來以外，毛澤東也把葉劍英叫回來整頓軍隊。葉是一位老資格的軍事領導人，德高望重，沒有個人野心。毛還悄悄地開始允許另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回來工作。在林彪墜機後他休養的兩個月裏，毛不止一次承認，很多老幹部受了太多的苦。在對這個錯誤作出解釋時，他說那是因為他錯誤地聽信了林彪的讒言。^[2-31]

林彪墜機兩個月後的 1971 年 11 月 14 日，有更多跡象表明毛澤東的想法正在發生變化。這一天，他接見了一個座談會成員，其中包括當時已在著手重建軍隊領導班子的葉劍英元帥。毛擺出一副對文革中受迫害的高層給予鼓勵的姿態，指著葉劍英對座談會成員說：「你們不要再講他『二月逆流』了（指 1967 年 2 月一些老師和副總理試圖抵制文革）。」^[2-32]他又說，那次逆流是林彪操縱的，不要再用「二月逆流」這個說法了。^[2-33]毛澤東想以此盡量撇清他同批判 1967 年「二月逆流」的參與者的干係。他還作出為譚震林、陳再道等在 1967 年挨過整的老幹部平反的指示。

1972 年 1 月 10 日陳毅元帥的追悼會為毛澤東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使他能夠與文革期間挨過整的一批老幹部和解。離追悼會開始只有幾個小時，他才說他也要參加。這是自林彪四個月前墜機後他的第一次公開露面。陳毅是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的同事，中共掌權初期上海的第一任市長，後又擔任外交部長，是最受群眾愛戴的領導人之一。幾年後上海黃浦江畔為他豎起了一座塑像，便反映了民眾對他的崇敬。然而他在文革期間卻受到了殘酷批鬥。儘管他最終在軍隊醫院得到治療，但為時已晚，他由於缺少及時醫治而病故。此外，在他彌留之際，很多軍隊幹部前去看望他，他們很清楚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導致了他的死亡。

在追悼會上，毛澤東以三鞠躬表達他對陳毅的敬重。他說：「陳毅同志是個好人，是個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澤東用這些話把迫害陳毅的責任推給了他過去「最親密的戰友」林彪。毛澤東在數九寒天身穿睡衣，披著一件外套，顯而易見的帶病之軀拖著顫抖的雙腿。他虛弱的身體和言辭打動了參加追悼會的人。為了跟文革的受害者和解，他以這樣的狀態前來向一個受人愛戴的同志表達歉意和尊重，還有比這更好的方式嗎？

所有的高級幹部都心知肚明，如果毛澤東不點頭，陳毅也不可能受到批鬥。但是他們願意暫時接受林彪要對陳毅之死負責這種不實之辭。他們不指望毛澤東會承認自己的錯誤，毛對老同志的態度有了轉變，利用這種轉變對他們有好處。毛把政治看得高於經濟，但他從未放棄改善國民經濟的願望。再說，儘管他具有從感情上操控中國人民的非凡能力，但他仍然需要精明能幹的中共領導人。甚至在文革期間被毛澤東留用的幹部也承認，為了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需要那些文革前任職的幹部的強而有力的領導。毛澤東在 1972 年已經打算讓有經驗的老幹部回來工作，讓 1960 年代末林彪主政時被派到地方任職的軍隊幹部——他們大多數都無所作為——回到軍營。不久之後的 1972 年 3 月，周恩來交給中組部一份有 400 多名需要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名單，毛澤東很快就批准了，讓他們回來。^[2-34]在 1975 年和 1978 年，這些老幹部在幫助鄧小平恢復安定團結的工作中將發揮關鍵作用。

周恩來在 1972 年 5 月查出患了膀胱癌，但從這時直到 1973 年年初，他依然從事著繁重的工作。^[2-35]在林彪墜機後的混亂時期，周恩來利用他與另一些幹部之間獨一無二的密切關係，使國家避免陷入更嚴重的動亂。^[2-36]在罹患癌

症的早期，周恩來殫精竭慮，繼續想辦法讓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個人高超的協調手腕才能應對的形勢下，無人能夠取得周恩來那樣的成就。^[2-37]

在一些重大的任命和敏感問題上，周恩來繼續爭取毛澤東的同意，他盡量作出能夠得到毛澤東支持的決定。而毛澤東的讓步，以及他承認需要進行整頓，也使周恩來得以更有力地去解決更大範圍的問題。他致力於處理好老幹部之間的關係，恢復經濟秩序，阻止激進派在農村中的極端做法，擴大與西方的外交接觸。^[2-38]他甚至能夠讓著名物理學家、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提出推動理論研究的規劃。^[2-39]周恩來這些撥亂反正的努力預示了鄧小平在 1975 年推行的範圍更大的整頓。因此，毛澤東在 1973 年年底批周恩來預示了他在 1976 年初的批鄧也就不足為奇。

跟善於抓大放小的鄧小平不同，對細節有著驚人把握能力的周恩來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澤東一給他活動空間，他便運用自己過人的記憶力，對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達了特別的關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屬都萬分感激周恩來救了他們的命，減輕了他們的痛苦。周也對鄧小平及其家屬給予了相同的關照。1972 年 12 月，周恩來覺得會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便敦促汪東興加快給鄧小平安排工作的進程。

但是，周恩來對文革受害者的幫助是有限的，因為他擔心這會觸怒毛澤東，而他的擔心看來也很有道理。周恩來在 1956 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之後曾惹惱過毛澤東，他當時私下對毛說，自己從良心上不能贊成毛的冒進的經濟政策。自那次受到批評後，他在長達 15 年的時間裏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讓毛澤東找到理由懷疑他沒有全心全意貫徹毛的意圖。^[2-40]儘管如此，毛澤東在 1958 年 1 月還是對周恩來大發脾氣，他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五十步遠，這一斥責讓周恩來進一步退縮。

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使出渾身解數，痛苦地執行著毛的指示，同時也盡力保護他覺得自己能夠保護的人。^[2-41]在充滿感情糾葛的環境中，他是平衡這些相互衝突的利益的大師。大概無人能比周恩來更懂得揣摩毛澤東不明言的心思。有些人盛讚周恩來融政治技巧、對黨和國家的忠誠、一貫的沉著老練、翩翩風度以及為受迫害者提供誠懇幫助於一身。很多瞭解形勢的人認為，周恩來在緩和毛澤東的極端做法上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是並非人人都把周恩來視為英雄。例如陳毅的家人就對他沒有保護陳毅很氣憤，一些沒有得到周恩來幫助的受害者家屬也有同樣的心情。還有一些人則說他助紂為虐，對於文革的浩劫難辭其咎。有人問，倘若周恩來沒有阻止政權的垮台，那些罪惡難道不是能提前結束嗎？

無論人們對周恩來和文革有何看法，有一點是清楚的，在處理當時毛澤東議事日程上的一件大事——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上，沒有任何人具備周恩來那樣的高超技巧。1971 年 7 月 9 日，即林彪墜機兩個月以前，周恩來第一次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10 月 20 日至 26 日，墜機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為次年 2 月的尼克遜訪華作準備。基辛格後來寫道，他認為周恩來是他遇到過的兩三個最令人難忘的人之一。據基辛格的助手約翰·霍爾德里奇（John 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與周恩來見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著參加由兩個世界頂級大師進行的冠軍爭奪賽一樣。^[2-42]

毛澤東和周恩來，基辛格和尼克遜

中美之間有過兩百年的貿易交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了四年盟友，後來是二十年的冷戰對手，兩國在 1969 年開始考慮恢復邦交。1969 年發生珍寶島戰役後，毛澤東擔心受蘇聯入侵的危險，自南北韓戰爭以來第一次決定擴大與西方的交往，並指派周恩來進行談判。尼克遜正在設法解決越戰問題並尋找對抗蘇聯的長期合作對象，便指派基辛格與周恩來談判與中國修好。基辛格 1971 年從巴基斯坦飛往北京為尼克遜訪問打前站的戲劇性之旅，以及 1972 年 2 月尼克遜的訪華都是激動人心的事件，它們為鄧小平時代美中交往的迅速發展搭建了舞台。

1966 年至 1969 年的中蘇關係惡化，以及由此導致的 1969 年的中蘇邊境衝突，都與鄧小平無關。但是他在 1961 年至 1963 年曾率領一班人馬寫下反駁莫斯科的九封著名公開信；他還在 1963 年親赴莫斯科，發表了中方最後一次重要講話，使中蘇交惡達到頂點。中國重啟中美交往也與鄧小平無關，當時他還在江西，雖然他在 1973 年底陪同周恩來參加過談判。鄧小平的貢獻還有待於來日。

緩慢的復出：1972 年 1 月—1973 年 4 月

直到 1973 年 2 月，即林彪死亡 16 個月以後，毛澤東仍沒有讓鄧小平回京。他曾在 1966 年嚴厲批鄧，所以他不能指望別人會很快接受鄧小平，況且他尚未決定如何使用鄧小平。鄧小平曾因走「資本主義道路」受到猛批，毛澤東要向人們解釋為何請他回來，這並非易事。毛採取的伎倆是，他說鄧小平這位十分受人尊敬的總書記「受到了林彪的迫害」。在 1972 年 1 月的陳毅追悼會上，他就曾對陳毅的家人說，鄧小平跟劉少奇不同，他的問題不那麼嚴重。周恩來示意陳毅的家人把毛對鄧小平的評價讓更多的人知道。^[2-43]毛的話也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裏，這是說明毛澤東讀過他在 1971 年 9 月的信的第一個跡象。隨後又出現了更多的跡象。江西省革命委員會 1972 年 4 月初通知鄧小平，根據他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的請求，同意他的小兒子鄧質方進入江西工學院讀書，小女兒鄧榕則獲准去了江西醫學院。^[2-44]

受到這些積極信號的鼓舞，鄧小平在 1972 年 4 月 26 日又給汪東興寫信說，由於他的兩個孩子已去上學，能否讓他僱一個人幫他和卓琳一起照顧鄧樸方。他在信中最後說：「至於我自己，我仍然靜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幾年工作。」^[2-45]鄧小平沒有收到直接的答覆，但是一個月之內他和卓琳的工資便都恢復到了原來的水平。^[2-46]

鄧榕後來說，這些表明鄧小平的政治處境有所改善的信號讓一家人大為振奮。從鄧家人如此期盼積極的信號可知，儘管毛澤東疾病纏身，被林彪事件搞得心煩意亂，但他仍然左右著手下人的命運。實際上，陳雲已經在 1972 年 4 月 22 日獲准從江西回京，但是毛澤東讓鄧小平在江西又呆了將近一年。

1972 年 8 月 3 日，在數月沒有得到毛澤東或汪東興的答覆後，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試圖打消他估計毛仍然對他抱有的疑慮。他首先說，他已經聽過向他所在工廠的全體工人傳達的有關林彪和陳伯達罪行的文件。他表示，林彪雖然當將軍有一套，但在長征期間曾秘密夥同彭德懷反對毛主席。他還回顧往事說，林彪在抗美援朝時拒絕了毛主席讓他率軍作戰的要求。鄧小平承認，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的意圖，但他不同意林彪只講「老三篇」、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的做法；還有更多的毛主席著作應當得到運用。鄧小平又說，林彪和陳伯達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他感謝主席在文革期間保護了他。鄧小平毫無愧疚地講著他認為毛澤東愛聽的話。

鄧小平在信中強調說，他認可在 1968 年 6、7 月的自我檢討中所說的所有內容。他再次檢討了 1931 年自己在廣西離開紅七軍的錯誤，另外還承認自己在擔任黨的總書記期間工作也有缺點，有時候不徵求毛主席的意見。他在 1960 至 1961 年沒有消除自己的資本主義思想。他沒有有效貫徹毛主席關於抓好在內地建立關係到國防的「三線工業」的工作的決定。他也沒有在做報告前及時地向主席請示。鄧小平承認，文革揭露他的錯誤是完全應該的。他在信中還試圖打消毛澤東在一個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自己絕不會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2-47]

鄧小平信中所言顯然也正是毛澤東想聽到的話。1972 年 8 月 14 日，收到鄧小平的保證書沒過幾天，毛澤東就向周恩來總理作出書面指示，讓他安排鄧小平返京。毛澤東再次說，鄧小平的問題不同於劉少奇，他沒有歷史問題，沒有投降過敵人。此外，鄧小平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還為黨和國家做過其他一些好事。^[2-48]周恩來在收到毛批示的當天就把它轉發給了中央委員會。^[2-49]可是由於毛的妻子江青百般阻撓不讓鄧小平回來，事情一時沒了下文。^[2-50]

1972 年 9 月，鄧小平覺得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便請求走訪包括瑞金在內的江西蘇維埃老區，並且得到了批准。這是他三年來第一次走出家門。他花了五天時間外出訪問，得到省部級領導人規格的接待。鄧小平還被允許用兩天時間探望從 1952 年起就給自己擔任機要秘書的王瑞林，王當時在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後來鄧小平返京時，王瑞林也被允許回到了原來的崗位。1972 年 12 月 18 日，周恩來問汪東興和紀登奎，為何還不落實 8 月份毛澤東讓鄧小平回京的指示。他們在 12 月 27 日請示了毛之後答覆說，鄧小平可以回京。^[2-51]一個月後，即 1973 年 1 月，江西省委書記白棟材給鄧小平帶來了這個好消息。2 月 20 日工廠的工人來給鄧小平道別後，鄧小平與家人乘汽車前往鷹潭，在那兒登上了返京的列車。^[2-52]離開江西時，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幹 20 年。」^[2-53]確實，一直到 19 年又 8 個月以後，鄧小平才在黨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

鄧小平返京：1973

讓受過批判的人重新擔任要職，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愛護，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命。鄧小平在 1973 年 2 月 22 日從江西回京後並沒有立刻得到任命，儘管他在北京的露面已經暗示著他會重新扮演重要角色。鄧小平回京的消息傳開後，他看望了一些故交，但數周時間內既沒有出席任何正式會議，也不承擔任何工作，甚至沒有與毛澤東和周恩來見面。

毛澤東讓周恩來召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商量鄧小平將來的工作。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在接替周恩來的總理職務方面，他是鄧小平的潛在對手）及其支持者江青強烈反對讓鄧小平擔任要職，但毛澤東堅持讓鄧小平恢復工作，參加黨的組織生活。^[2-54] 協商的結果是，政治局提議把鄧小平安排到國務院的業務組，這是周恩來和副組長李先念手下的一個領導小組，在文革動亂期間維持著政府的日常職能；並且允許鄧小平參加黨的每週例會。^[2-55] 3月9日，周恩來把彙報這些決定的文件交給毛澤東並得到了他的批准。文件向鄧小平做了傳達，同時下發縣團級以上黨委。^[2-56]

鄧小平回京後與周恩來的第一次會面是在 1973 年 3 月 28 日晚上，在場的還有李先念（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和江青。見面結束後，周恩來立刻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精神很好，身體也很好，隨時準備重新工作。次日下午毛澤東便接見了鄧小平，這是六年來的第一次。他對鄧小平說：「努力工作，保護身體。」鄧小平回答說，他身體一直很好，這是因為他相信主席，他一直在等候主席的調遣。^[2-57] 當晚，周恩來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宣佈了要讓鄧小平擔任負責外交的副總理。鄧小平不是政治局正式成員，但討論重大問題時他可以列席政治局會議。周恩來給毛寫信彙報了政治局的討論，得到毛的批准後，鄧小平便正式上任了。^[2-58]

1968 年以後鄧小平第一次在官方場合露面，是在 1973 年 4 月 12 日為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Prince Norodom Sihanouk）舉行的宴會上，他以副總理的身分出席。鄧小平和其他人表現得若無其事，但有些人向他致意時還是很謹慎。這次露面之後，中共幹部和外國記者議論紛紛，都在猜測他將扮演什麼角色。^[2-59]

毛澤東顯然要對鄧小平委以重任。正如我們所知，鄧小平在 1973 年逐漸成為地位更加顯赫的領導人，先是獲准出席最高層的會議，接著成了周恩來的助手，然後在 1973 年 8 月 10 日的中共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他在證明了自己對毛的忠誠以後，12 月又成為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

作為周恩來的助手，鄧小平從 1973 年 4 月開始，陪同周恩來在機場送往迎來，會見了柬埔寨、墨西哥、日本、北韓、馬里、尼泊爾、剛果、菲律賓、法國、加拿大、澳洲和其他國家的客人。他還參加了一些會見外賓的活動，但尚未擔負起與他們會談的工作。^[2-60]

毛澤東培養王洪文：1973–1974

毛澤東像中國的其他年邁的領導人一樣，也很注重培養年輕幹部作為接班人。林彪死後他的健康每況愈下，接班人的問題也變得日益緊迫。毛澤東熟諳千百年來中國統治者如何處理繼位的問題，並利用了這些知識謀劃自己的戰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話說死，對自己的意圖給出暗示或信號，靜觀其變，既維持著自己的大權，又能隨時改變主意。從 1971 年到 1972 年 9 月，他把三個有前途的省級年輕幹部調到北京在黨中央工作：先是華國鋒，然後是王洪文和吳德。他在 1972 年底選中了王洪文作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個年輕力壯的造反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忠心耿耿。毛澤東喜歡他是工人出身，又參過軍，有大膽潑辣的領導作風（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毛澤東知道王洪文缺少領導政府的知識和背景，但他相信王洪文有可靠的左派立場和領導潛力，能夠成為中共最高領袖的第一人選。事實上，毛澤東開始萌生出這樣的想法：讓王洪文擔任黨的領導人，同時物色人選接替周恩來的政府首腦一職。

毛讓鄧小平協助周恩來

縱觀中國歷史，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濟之後，往往不再理會朝內袞袞諸臣，只跟內宮善於阿諛奉承的太監打交道。林彪死後，毛澤東也很少接見任何幹部，包括鄧小平在內。他與外界的溝通主要依靠三位女士，一個是隨時陪伴於他左右的生活秘書張玉鳳，還有所謂的「兩位小姐」：他的譯員唐聞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實是毛的表兄的孫女）。毛是在自己的專列上與張玉鳳相識的，當時她被安排做毛的服務員。張玉鳳長得頗具姿色，又有心機，政治上也很精明，雖然她沒有多少經驗，理解不了複雜多變的上層政治。「兩位小姐」本來是外交部派去的人，在毛澤東接見外賓時做他的助手。毛在接見外賓之前和之後常跟她們交談，兩人也開始逐漸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成了毛澤東與外界溝通的聯絡員。不管她們個人有什麼想法，她們在跟外界打交道時別無選擇，只能完全效忠於毛澤東，而外界也逐漸把她們視為毛澤東左傾思想的代言人。例如毛澤東批判周恩來時，便是由「兩位小姐」負責傳達毛的意見。當毛澤東對周恩來有意見時，這種情況給她們和周的關係造成了嚴重問題，因為她們實際上成了毛澤東對付周恩來的傳聲

筒，而且毛澤東也期望她們向自己彙報周恩來言行中所有可能的問題。毛在 1973 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稱「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直起頭來都困難，口齒也不清。1972 年 2 月他曾一度神智昏迷，但九天之後他仍會見了尼克遜。他沉溺於中國的文史典籍，但對於他所關心的問題，例如重大人事安排、自己的聲望以及各種關係的處理，他仍然像過去一樣成竹在胸，老謀深算。在這些事上他仍然大權在握，也很會算計如何利用他的聯絡員。

過去的皇帝上了年紀後，除了培養繼位者，也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身後事。毛澤東也一向很看重自己的歷史地位。1945 年他與蔣介石會談期間曾公佈先前在 1936 年寫下的〈沁園春·雪〉一詞，後來成為他最著名的詩篇之一。詩中寫道：「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接下來他又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以妄自尊大和權力欲而論，他在世界領袖中堪稱翹楚。在達到權力頂點時他參與各種領域的活動，但隨著健康狀況的下降和年歲增高，他開始更加關心自己的歷史地位以及能夠維護他的遺產的接班人。

在世界領袖中毛澤東同樣堪稱翹楚的另一件事是，他生性多疑，總覺得有人要陰謀篡權。但是，他對周恩來的疑慮也並非毫無道理，他害怕周恩來如果活得比他長，會拋棄他的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的事業，貶低他在這個時期黨的歷史上的光輝地位。^[2-61]周恩來在領導政府和外交工作方面能力非凡，記憶力過人，是當時幾乎不可缺少的人物，尤其是在恢復中國與美國和西方各國關係方面。高層人士都知道，毛澤東不喜歡周，但又離不開周。1930 年代周恩來在上海工作時，培養了一批為他工作的內部諜報人員，這些人的身分一直保密，而且仍然效忠於周恩來，毛澤東對於除掉這樣一個掌握著如此巨大的秘密支持者網絡的人是有所顧慮的。周恩來不同於劉少奇和林彪，他多年來一向謹小慎微，唯恐威脅到毛的權力。但是到了 1973 年，雖然沒有人公開說，毛澤東還是不難察覺很多高級幹部認為周恩來是個好領導——他竭力維持秩序，關心別人，盡量減輕壞領導的狂熱計劃帶來的後果。

毛與周的問題不是擔心周恩來有可能篡權，而是周的聲望超過自己的聲望，還有就是他同美國打交道時可能太軟弱。一旦周恩來活得比毛長，這些問題會變得尤其嚴重。因此，當唐聞生和王海容向毛澤東彙報國外媒體充斥著對「周恩來改善美中關係的外交政策」的讚揚時，毛面露不豫之色：^[2-62]那本是我毛澤東的外交政策，不是他周恩來的。此後，毛便想辦法削弱周的威望，他要確保當周恩來的癌症惡化時，接班的人忠實於他而不是周。^[2-63]

儘管毛澤東妄自尊大，偏聽偏信，犯下各種路線錯誤，但他的部下也承認，他不但是大戰略家，而且有發現人才的眼力。被毛澤東看上的另一個政治領導人證明了自己能夠嫺熟處理包括外交事務在內的大量複雜問題，此人便是鄧小平。^[2-64]半個世紀以前鄧小平在法國時，就和他的上級周恩來有密切的工作關係。但是 1930 年代初鄧小平在贛南蘇區又與毛結下不解之緣，他在後來的歲月得到提拔，也因為他是毛而不是周的人。^[2-65]周恩來在 1973 年處理著大量異常複雜的外交政策問題，使鄧小平在這年春天成為周恩來的助手後獲益匪淺。毛澤東在 1960 年代曾因鄧小平疏遠自己親近劉少奇而對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懷疑，假如對鄧小平委以重任，鄧會不會像文革前的幾年那樣，不再那麼聽他的話，而是跟著周恩來走？他會不會批判文革，撤掉毛澤東任命的關鍵人物，讓毛的錯誤任由歷史評說？^[2-66]整個 1973 年，毛澤東一直緊盯著鄧小平的表現。

中共十大：1973 年 8 月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召開了中共十大。雖然毛澤東主持了大會，卻是他自 1949 年以來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沒有親自講話的黨代表大會。毛在大會閉幕時無法起身，要等到代表們離開大會堂之後他才離去，以免讓人看出他的行動已是多麼不便。他仍保留著決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權力，但是由於他的病情，代表們不可能想不到接班問題。按照慣例在大會之後立刻召開的宣佈人事任免的一中全會，也因健康不濟，毛澤東宣佈缺席。從此後，毛不再參加任何中央全會。

時年 38 歲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雲，向國內外的政治領袖們表明了毛澤東已選定他作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腦的主要候選人。^[2-67]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兩個月前他被任命為選舉籌備委員會主任時業已凸顯，因為新的中央委員都要由這個機構提名。他還被委派準備新黨章，在大會上做有關新黨章的報告，這曾是鄧小平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上負責的工作，當時他也是準備接毛澤東黨的領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選人。^[2-68]在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又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排名僅在毛、周之後。其他領導人以及外國的外交官和媒體也開始把他視為毛澤東最可能的接班人。^[2-69]

鄧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無法與王洪文相比。他重新當選中央委員，但並沒有扮演領導角色。十大的目的是為了在林彪死後組成新的領導班子和清除林彪餘黨，因此與正常的黨代會相比開得十分匆忙。大會不像 1956 年的八大那

樣對所討論的問題作了全面總結，甚至也不如林彪扮演主角的九大。與為期 24 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會期只有 5 天，王洪文和周恩來在會上做了兩個重要報告，時間加在一起也不到 1 小時，大大短於中共黨代會上通常的報告。^[2-70]這次大會推出了新的領導成員，象徵著林彪時代的結束，但並沒有提出新的綱領。大會集中在三個議題上：批判林彪、林彪倒台後的清查運動和 1973 年的經濟計劃。^[2-71]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中有將近一半內容是批林的，經濟計劃沒有談到具體內容，因為當時的經濟仍處於一片混亂，領導層也無暇為當時的五年計劃中還剩下的兩年——1974 年和 1975 年——作出具體部署。

十大最重要的變化也許是很多老幹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員會，在鄧小平於 1973 年底掌握了更大權力時，他們將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們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導的九大上提拔進來的軍隊幹部。在新的中央委員會 191 名委員中，有 40 人是文革期間受過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幹部。^[2-72]經毛澤東同意回來工作的人中有副總理譚震林，他在淮海戰役期間是鄧小平領導下的總前委的司令員之一，曾在 1967 年 2 月毅然站出來批評文革；這些人中還有王震和鄧小平。鄧小平過去僅被允許陪同會見外賓，但從 7 月中旬他開始參與會談。^[2-73]

毛澤東決定提拔王洪文這個既年輕又無經驗的造反派頭頭，老幹部們很生氣。8 月 21 日十大前夕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老幹部們斗膽提出了反對任命王洪文的意見。許世友將軍表達了不太敢說話的老幹部們的心聲，他說，有周恩來一個副主席就夠了。受到壓力後他又改口說，可以再加上康生和葉帥。^[2-74]不過毛澤東最後還是堅持己見，任命了王洪文。文革期間曾在選擇要批鬥的老幹部方面起過陰險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過，另外兩個副主席，周恩來和葉劍英元帥，則是既富有經驗又立場溫和的領導人。

雖然讓周恩來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起草報告的卻是江青的兩個支持者張春橋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們起草的。因此，大會文件雖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權時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傾成果。事實上，十大之後的政治局成員仍然受到激進派的控制。十大後的 21 名新政治局委員中有 4 個激進派——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他們雖然不是一個一起工作的小團體，但有著相似的觀點，後來變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幫」。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員，包括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雖然算不上激進，卻傾向於左派。毛澤東想用「群眾代表」——農民和工人代表——平衡那些回到中央委員會的老幹部，儘管他承認「他們的思想水平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眾代表去支持主張繼續革命的激進派。

鄧小平有了新的職務，但並沒有為他指派具體工作。不過敏銳的政治觀察家看得清楚，毛澤東已開始考慮讓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們一起出去視察，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相互瞭解。^[2-75]

批判周恩來：1973 年 11 月–12 月

基辛格在 1973 年 2 月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發現，毛對美國以損害中國的利益為代價同蘇聯合作很不高興。同年 11 月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時，毛澤東不但對美蘇合作有意見，而且不滿於周恩來跟美國打交道時太軟弱。他在夏天時嚴厲批評美國「踩在中國的肩膀上」，想利用中國跟蘇聯達成協定。1973 年 6 月布列茲尼夫訪美並在加州聖克萊門特市與尼克遜會面，雙方共同出席簽署《防止核戰爭協定》的儀式之後，毛澤東的懷疑變得更加嚴重。中方在布列茲尼夫訪美後立刻向白宮發出正式照會，指責美國幫著蘇聯表演和平姿態，等於是幫著蘇聯掩蓋它的擴張主義。^[2-76]毛澤東懷疑，美蘇兩國達成的協定將使蘇聯騰出手來把武器瞄準中國，而美國對此不會作任何反應。

毛澤東指責周恩來和外交部太遷就美國，使美國得以利用中國去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他對美國在減少與臺灣的交往、跟中國恢復邦交上無所作為也很生氣。尼克遜曾經許下諾言要在 1976 年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但是不管作何解釋（對水門事件的調查削弱了尼克遜的實力，使他無法讓國會批准中美關係正常化），美國現在都是在利用中國去改善與蘇聯的關係。

基辛格於 1973 年 11 月抵達北京時發現周恩來的權力已被毛澤東大大削弱。周恩來對「現代大儒」（太溫和、不為中國的國家利益而戰）這樣的指責十分敏感，因此當基辛格說中國仍然受到孔子的影響時，周恩來勃然大怒。據基辛格的回憶，在他們長達幾十個小時的會談中，周恩來發脾氣這是僅有的一次。周恩來顯然承受著壓力，而「兩位小姐」會向毛澤東彙報他的言行。基辛格到北京時，美國剛任命了安克志（Leonard Unger）為新一屆駐臺大使，並同意向臺灣提供新的軍事技術。這令毛澤東十分惱火。

11 月，基辛格和周恩來會談了一天之後，周恩來和唐聞生一起去向毛澤東彙報情況。周把基辛格的建議告訴了毛澤東：如果中國表現出比中日建交模式更大的靈活性，允許華盛頓跟臺灣保持（比中日模式中）更近的關係，華盛頓也許就能得到國會的同意，進一步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這時唐聞生對毛說，這聽上去像是「兩個中國的政策」。^[2-77]（周恩來後來對基辛格承認：「我們跟主席在一起時，我不敢解釋這種說法，她卻敢作出解釋。」）毛澤東聽到周恩來居然認真看待基辛格的建議，讓美國同臺灣和大陸都保持較為密切的關係，對周恩來勃然大怒。

基辛格告訴周恩來：「中國核武力的增長是蘇聯無法接受的。」^[2-78]他還建議設一條熱線，以便美中兩國在蘇聯可能採取行動時能夠迅速交換情報。（「彌補你們軍隊的弱點，延長預警時間。」）周恩來對基辛格說，如果能就分享情報達成協議，「這對中國有很大幫助」。在基辛格訪華最後一天（11 月 14 日）的上午，他們交換了有關分享情報的文件草稿。^[2-79]

毛澤東聽完基辛格和周恩來會談的彙報後，認為這種建議與蘇聯在 1950 年代末要為中國提供聯合艦隊的建議如出一轍。正是蘇聯這種建議使毛澤東與蘇聯絕交，因為他擔心向蘇聯出讓權力有損中國的主權。現在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要向美國出讓搜集情報的權力，這將損害中國的獨立地位。

江青很會揣摩毛的心情，而且一直在伺機整周恩來。這時她覺得時機已到，便發動了對周的批判，說他喜歡對美國人低頭哈腰。她把周稱為「投降派」。^[2-80]毛澤東想讓中國外交的腰桿兒更硬，因此也樂意狠批一下周恩來。

基辛格訪華後不久，從 1973 年 11 月 25 日到 12 月 5 日，毛澤東組織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系列批周的會議。林彪死後，毛澤東對日常工作的細節已不感興趣，但他對批周一事卻作了具體部署，包括選哪些人參加，讓他們大體說些什麼，為會議定調子等等。在他看來，周恩來差不多已經成了右傾投降主義者。^[2-81]政治局全體成員都被要求對周進行公開批判。周恩來寫了一份詳細的檢討，但毛澤東認為不夠，要求他再寫一份更深入的檢查。在 1973 年 11 月這些會議之後，基辛格本來可以再次會見周恩來，但是周恩來表示得很清楚，自己已不被允許與他舉行談判。會見再也沒有進行。

毛讓鄧小平接手工作：1973 年 12 月

基辛格 11 月訪華後，毛澤東為了與美國打交道，轉而依靠鄧小平這個在對抗蘇聯時十分堅定的人。1973 年 12 月，鄧小平遵照指示參加了政治局批周的會議。無論在法國、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間還是 1950 年代初在北京一起工作時，周恩來就像鄧小平的兄長。但是毛澤東有理由希望鄧小平會和自己而不是周恩來站在一起。鄧小平在 1940 年代的整風運動中就站在毛澤東的一邊，周恩來卻沒有。自從 1931 年鄧小平被批為「毛派頭子」後，他就一直緊跟毛澤東，並在 1950 年代得到了毛的重用。1956 年以後鄧小平成了黨的總書記，他和周恩來的關係在黨內事務上有時變得很尷尬：周恩來在黨內排名上高於鄧小平，可是他要向負責黨內日常事務的鄧小平彙報工作和接受指示。^[2-82]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也沒有保護鄧小平。^[2-83]

鄧小平心裏很清楚，「兩位小姐」會把他在批周會議上的發言彙報給毛主席。會議臨近結束時，鄧小平對周恩來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2-84]這些話表面上並不惡毒，卻暗藏殺機。鄧小平實際上是在暗示，周恩來想架空毛澤東，篡奪毛的地位。「兩位小姐」把鄧小平的發言和態度彙報給毛澤東後，毛非常興奮，立刻把鄧小平叫去談話。

幾天以後，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要求讓鄧小平成為政治局正式委員和軍委委員。毛澤東不報請中央全會批准就要通過這樣的任命，這在歷史上還是頭一次。^[2-85]周恩來名義上仍是總理，但鄧小平開始參與他跟外國人的會談。雖然周恩來的身體條件在七個月後——即 1974 年 5 月——仍能允許他坐十幾小時的飛機代表中國出席聯大會議，但毛澤東卻讓鄧小平替他去了美國。周恩來為動手術在 1974 年 6 月 1 日住院後，鄧小平開始主持接待外賓。^[2-86]

加強軍隊建設：1971—1974

林彪墜機身亡後，毛澤東需要確保軍隊領導班子的團結和忠誠。他在林彪墜機之前已經預先採取措施加強了軍隊對他的支持以防範林彪。例如，1971 年 8 月他親自視察了華中和華南地區的部隊，公開談到他和林彪的分歧。他還撤

換了一些軍隊領導人，削弱了林彪的勢力。^[2-87]墜機事件後，政治局中的四名軍隊幹部，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被要求在十日內表態與林彪劃清界限。其實這些人在幾天之內便被抓了起來，直到 1980 年代末才得到釋放。

毛澤東撤掉彭德懷後，在 1959 年依靠林彪團結部隊；同樣，林彪死後，他也需要有人來加強中央對軍隊的領導。毛澤東先是依靠在軍隊中德高望重、從不樹敵的葉劍英元帥，他比林彪大十歲，沒有權力野心（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但是在 1973 年底，毛澤東開始依靠手腕更強硬的鄧小平去處理中美關係時，他也轉而利用鄧小平幫助他加強對軍隊的控制。

據說，在中共十大後不久，毛澤東為了考驗王洪文和鄧小平，曾經問過他們，自己死後會發生什麼情況。王洪文說，主席的革命路線將會繼續。鄧小平深知各大軍區司令員的權力，他說，可能「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年底各大軍區司令員就進行了大規模的對調。^[2-88]

毛澤東在中共十大後不久獲悉，剛當上黨的副主席的軍隊領導人李德生在林彪還在世時給他寫過效忠信。這件事讓毛澤東大為震驚，他擔心其他大軍區司令員也可能與林彪的關係過於密切，於是決定對他們進行調換；為了減少他們調換職位後網羅親信的風險，他們在調動時不能帶走自己的人馬。

當毛澤東又發現其他軍隊領導人寫給林彪的一些效忠信後，對曾為林彪工作的北京的領導班子愈發懷疑，於是決定把跟林彪沒有密切關係的軍區領導人調到北京。林彪大權在握時鄧小平一直在江西，所以毛澤東知道鄧小平不可能和林彪關係密切。他還知道，軍隊的兩個關鍵領導人——已被調往瀋陽軍區的李德生和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這一最敏感職務的陳錫聯——都在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任過職，所以他相信鄧小平能夠管住他們。

軍區司令員大換班後不久，毛澤東宣佈他請來了一個軍師——鄧小平。他要讓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用他本人的說法：「我想在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你不要這個頭銜，那就當總參謀長吧。」^[2-89]鄧小平一向重實權不重虛名，他客氣地謝絕了那些頭銜。毛澤東心裏清楚，任命鄧小平可以讓軍隊上層鬆一口氣，這不僅是因為鄧小平在軍隊的資歷，還因為他們確信鄧小平不會進行打擊報復。雖然鄧小平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嚴厲批評受林彪影響的幾位大軍區司令員。但這些人都是經驗豐富的老幹部，很清楚鄧小平這樣做出於無奈。任命鄧小平後，並沒有明確葉帥和鄧小平兩人誰排名在前。但兩人相互尊重，在與軍區司令員開展工作時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清除林彪對軍隊影響的同時，毛澤東還在社會上開展了一場批判林彪餘黨的政治運動。有人發現林彪在讀過的書的頁邊上寫有尊孔的話，於是這場批判林彪和另一個被指責有中庸傾向的人——周恩來——的運動，便被稱為「批林批孔」運動。運動以 1974 年的元旦社論作為起點，一直持續了半年。它最初的目標是軍隊中與林彪關係密切的李德生等人，但是到了 1 月底，江青開始利用這場運動批判周恩來。除了批林批孔以外，他們還把矛頭對準「周公」。周恩來雖然受到傷害，但他度過了風暴。他繼續擔任總理，甚至主持批判自己的會議，儘管不再讓他主持敏感的中美談判。

然而就在這場運動前後，毛澤東不時又從煽動者搖身一變成了胸懷大度的人。他指責「兩位小姐」在批周時就像小兵冒充大帥，還批評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做得太過火。他甚至對江青說，不要再整人了，她不代表他的觀點。毛還說，她宣稱周的問題十分嚴重、應當叫作黨內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一點是錯誤的；她說周恩來迫不及待想篡權，這一點也是錯誤的。^[2-90]

在 1974 年 7 月 17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警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幫」。這是他第一次用這個詞來稱呼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個激進派。這四個人並不是一個有嚴密組織和周密計劃的幫派，但他們確實扮演著批周的核心角色。

「四人幫」的名稱及其所表示的他們是危險分子的意思後來廣為人知。江青繼續批判周恩來和老幹部，同時她和另外三人也成了知識分子和老幹部的批判對象。但是當時還不可能觸及那個能讓「四人幫」整人的人——毛澤東。事實上，有些大膽的人只在與可靠的朋友的私下交談中會豎起四個指頭，然後晃動大拇指，意思是不光有「四人幫」，還有第五個人：毛澤東。

受到批判的周恩來癌症病情加重。為了做手術他於 1974 年 6 月 1 日住進 305 醫院，之後大多數時候都住在醫院一個舒適的套房裏，直到 1976 年 1 月去世。周恩來很能體諒人，他知道鄧小平在 1973 年底批他是因為有毛的壓力。1974 年初他已經開始和鄧小平密切合作處理外交問題。當時周恩來已住進醫院，但名義上仍保留著職務，在他的親自指導下，鄧小平成了事實上的代總理。^[2-91]鄧能回來工作是得益於毛澤東而不是周恩來，但是在 1974 年和 1975 年，他和周恩來再次緊密合作，就像之前在法國、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以及在文革之前的北京那樣。

鄧小平知道毛澤東也要求他與江青共事，他努力做到這一點。但是隨著周恩來的身體日漸虛弱，江青開始擔心毛澤東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給鄧小平，於是把批判的矛頭轉向了他。^[2-92]江青的感覺沒錯，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正在上升。毛澤東日益信任鄧小平的最突出的標誌，是他選定了鄧小平作為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的中國領導人。

鄧小平在聯大的歷史性發言

毛澤東在 1974 年春天派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使鄧小平在國際上名聲大振。中國大陸在 1971 年就取代臺灣取得了中國的席位，但是還沒有一位中國領導人在聯大會議上發過言。

聯大會議的一個多月以前，北京以為中國代表在聯大的第一次發言是以經濟問題為主，於是安排對外貿易部而不是外交部為中國領導人準備發言稿，由主管外貿政策的李強出席大會。但會前不久才發現聯大會議將集中關注中國的對外關係，於是準備發言稿的工作又從外貿部轉給了外交部。

毛澤東決定派鄧小平去紐約，是因為他考慮到周恩來太軟弱，不是一個能讓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則不夠老練，可能會碰到難題。毛澤東一定要讓一個老資格的領導人站在聯合國的講台上。

為落實這項計劃，毛澤東充當了幕後操控人，他讓王海容和唐聞生給外交部傳話，要讓鄧小平擔任赴聯大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很快就答應下來。江青不知道毛澤東已在背後決定讓鄧小平去聯合國，激烈反對這個人選。她很清楚，鄧小平的聯大之行將加強他在國內外的影響，早因其強硬而被稱作「鋼鐵公司」的鄧小平很可能對她的活動加以限制。^[2-93]1974 年 3 月 27 日，與江青分居的毛澤東寫信警告江青，不要再對鄧小平的出訪有意見，因為這是他本人的選擇。除了江青以外，政治局一致贊成由鄧小平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2-94]

毛澤東派鄧小平去聯合國的決定是在最後一刻才做出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只有一周的時間準備發言稿，幸虧他對毛的想法瞭解得很透徹，寫完講稿後就把它送給了毛澤東，毛批示說：「好。贊同。」^[2-95]喬冠華的這篇由鄧小平在聯大上宣讀的發言稿，基本上反映著毛的新世界觀，他認為國家關係的遠近不是以共產主義革命而是經濟的發展程度作為標準的：他稱之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從這個大背景出發，毛澤東通過喬冠華和鄧小平表明，儘管他希望美國和中國一起對抗蘇聯，但最近的不利事態——尤其是布列茲尼夫的訪美——讓他相信美蘇正在相互勾結。毛澤東現在希望聯合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共同對抗兩個超級大國。

喬冠華外長是個老謀深算、很有見識的外交官，他的家庭相當富裕，能夠供他在德國的大學讀哲學。他擔任了名義上的代表團團長，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明白人都知道掌握實權的是鄧小平。中國的領導層把這次聯大之行視為一次重大突破，是在世界各國聚會的場合嶄露頭角的一次機會。儘管病魔纏身，周恩來還是和大約 2,000 人一起到機場歡迎代表團，後來又在 4 月 6 日和一大群人去機場歡迎代表團的歸來。^[2-96]

鄧小平在聯大的發言博得了非同尋常的、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國以其幅員和潛在實力，被視為代表著發展中國家的力量。發展中國家特別高興地聽到鄧小平說，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也欺負和剝削他國，世界人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就應當給它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同中國人民一起打倒它。

在聯合國期間，鄧小平還與來自各國的領導人舉行了雙邊會談。他在回答問題和講話時都十分謹慎，因為他目睹過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嚴厲批評，況且他的訪問只有一周的準備時間。他把難題推給外交部長喬冠華去回答。鄧小平本人受到了一些外國領導人和媒體的友好對待。^[2-97]由於在他的發言中關於第三世界的基本思想全是來自毛澤東，也由於美國人並不喜歡有人把自己跟蘇聯聯繫在一起，所以這篇發言並沒有收進他後來出版的「文選」。^[2-98]

鄧小平發言兩三天以後，在紐約和基辛格第一次會晤。他們初次見面時，基辛格對鄧小平直來直去的風格有點兒摸不著頭腦。鄧小平雖然很客氣，卻帶著毛澤東的強硬指示。他知道周恩來因為向美國示弱而挨了批，他要確保自己不會受到同樣的指責。鄧小平轉達了毛澤東對美國的不快，毛認為美國想踩在中國的肩膀上與蘇聯達成導彈控制協定，以緩和美蘇關係。他還重複了毛的觀點，說蘇聯的戰略是「聲東擊西」，意思是美國應當重點防範蘇聯。鄧小平對基辛格說，蘇聯現在雖然反華，但它的真正目標是西方。^[2-99]鄧小平表示，他擔心美國不再把蘇俄視為主要對手，並可能鼓勵中國與蘇聯開戰以起到削弱兩個社會主義對手之效。^[2-100]基辛格後來比較過鄧小平的直率作風和周恩來巧妙優雅的風度。他說，鄧小平不太熟悉會談中提出的一些全球問題，他不時引用毛澤東的話，把一些問題交給喬冠華去回答，但是基辛格說，鄧小平似乎是處在「訓練期」。^[2-101]他在 1974 年謹小慎微的風格與 1978 年夏天之後會見外賓時所表現出

的自信形成了鮮明對比，那時他在會見外國領導人時已很有經驗，而且毛澤東已不在人世，無法再聽人向他彙報鄧小平的言論。

基辛格還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希望改善中美關係主要是基於安全考慮，鄧小平與他們不同，他更重視國內的發展，並且已經在考慮改善中美關係能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哪些好處。基辛格後來對鄧小平代表中國的能力給予了很高評價。

[2-102]

中國聯大代表團的任何成員都隻字不提周恩來。基辛格幾次善意地向鄧小平提到周，都沒有得到回答。鄧小平說，孔子是個保守派，為了使人們解放思想，必須消除孔子的影響。基辛格問，這是否實際上在暗指今天的某個人，鄧小平回答說，批判保守思想，當然要涉及代表這種思想的某些個人。^[2-103]話雖然說得隱晦，意思卻很清楚。鄧小平已經不再是周恩來的助手，而是就要取而代之了。^[2-104]

星期天，鄧小平在紐約的行程有一些空閒時間，手下人問他想做點兒什麼，鄧小平乾脆地說：「去華爾街看看。」在鄧小平看來，華爾街不但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徵，而且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象徵。他具有一種尋找實力的真正來源並理解這種來源的本能。華爾街在星期天都關門歇業，鄧小平還是讓下屬把他帶到了那裏，這樣他至少可以對此地有一個印象。^[2-105]鄧小平只領到了十來塊美元供旅途之用，他的秘書王瑞林在沃爾沃思連鎖店替他為孫子買了幾個 39 美分的玩具。唐明照（唐聞生的父親，曾是紐約一家左派中文報紙的主編）用自己的錢為鄧小平買了一個既會哭又會吃奶撒尿的玩具娃娃。他把這個玩具帶回家後，它一時成了家人的最愛。^[2-106]

鄧小平取道巴黎回國時，在那裏的中國大使館住了幾天。這是他從 1926 年離開後第一次訪問法國。他在那裏喝咖啡，吃牛角包，就像半個世紀前一樣。出於安全的原因，沒有讓他到市區轉一轉。他的隨行人員想找到他以前住過的地方，但一無所獲。回國之前，鄧小平買了兩百個牛角包和一些乳酪，回國後分送給周恩來、鄧穎超、李富春和聶榮臻等人，他們都是 1920 年代他在法國時的革命戰友。

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聯大之行非常成功，便繼續讓他在接待外賓上唱主角。毛在會見外賓時也讓王洪文陪同，但他並沒有積極參與會談。事實上，王洪文在 1973 年以前從來沒有會見過外國人。^[2-107]

6 月 1 日，即鄧小平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幾周後，周恩來再次住院動手術，此後他便不再會見外賓。這段時間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某個省的大廳裏會見大多數外賓，並安排他們在漂亮的釣魚台國賓館下榻。像周恩來一樣，他招待外賓的方式讓基辛格半開玩笑地說：「我來自一個在待客方面欠發達的國家。」

鄧小平在 1974 年秋天會見了各大洲很多不同國家的官員，包括日本、巴基斯坦、伊朗、也門、剛果、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越南、北韓、土耳其、德國、法國、加拿大和美國。他會見了政治領導人、工商界領袖、記者、科學家 and 運動員。他的談話中不斷重複某些主題。他尤其關心日本領導人如何領導經濟發展，日本如何使它的科學技術實現現代化。

他同一些外國領導人就國際事務——特別是在蘇美爭霸的背景下——進行廣泛的討論。他強烈贊成歐洲各國之間以及歐洲同美國加強合作的努力，視之為一股抗衡蘇聯的力量。他對軍備控制協定對蘇聯軍力增長的控制能力表示懷疑。他支持土耳其解決跟希臘的爭端，以免蘇美兩個大國從中取漁翁之利。他解釋說，中國當年跟蘇聯的關係出現了問題，是因為赫魯曉夫要加強對中國的控制。他還向美國的工商界明確表示，兩國外交關係正常化能夠使經濟交往迅速發展，而這又將取決於美國是否終止與臺灣的邦交。

他會見的美國人中包括時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喬治·布殊（George H. W. Bush）、參議員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和傑克遜（Henry Jackson）以及一個美國的大學校長代表團。^[2-108]他與心領神會的曼斯菲爾德和傑克遜交換意見，討論如何對抗蘇聯的擴張。他在接見大學校長時對他們說，還要繼續促進和擴大學術交流。^[2-109]

毛澤東要求安定團結

毛澤東是個大無畏的革命家，可以在短期內不顧現實。儘管如此，他也不能長期忽視嚴重的問題。他一度壓制對大躍進的抵制，但是在 1958 年底和 1960 年，他也同意針對已造成的破壞作一些調整。1974 年時文革已經造成了普遍的混亂，連他本人也認識到需要有所作為。經濟其實止步不前，到 1974 年夏天時已經有報告說，「批林批孔」運動造成了更大的混亂。鋼鐵產量下降，鐵路運輸也在滑坡。毛澤東顧及自己的身後評價，並不想讓人記住他是個讓經濟陷入災難的人。

1974 年 8 月，毛澤東把各大軍區的司令員和政治部主任叫到他在武漢東湖梅嶺的住所，這是他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他對他們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2-110]毛澤東雖然生性善變，但他在 1974 年底不斷提出需要安定團結。他在這一年的年底跟周恩來見面時，同意把「安定團結」這個提法作為次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召開的二中全會的口號。

執行者和看家狗的衝突

到 1974 年後期時已經很清楚，毛澤東要讓鄧小平在恢復安定團結上扮演主角。^[2-111]他在 1974 年 10 月 4 日宣佈要讓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這項任命表明他對鄧小平的表現很滿意，也是給黨內領導人的第一個明確信號：他有意讓鄧小平接替周恩來的總理一職。

毛澤東決定結束文革亂局，讓鄧小平恢復安定團結，這使江青及其激進派同夥坐立不安，卻讓務實的老幹部感到高興。毛澤東讓負責黨內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宣佈這項任命，王卻拖延時間，首先把消息透露給了江青，以便她有機會作出反應。另一些高層政治領導人知道，江青和王洪文想讓張春橋接總理的班。江青試圖勸說毛澤東改變任命鄧小平的主意，但未能得逞。兩天之後，不應該拖延如此之久的王洪文別無選擇，只能按毛的指示辦，宣佈了對鄧小平的任命。^[2-112]

毛澤東雖然讓江青和他分居，但是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認為江青忠實於他的繼續革命的事業，也是唯一堅定不移和其他黨內高幹——包括鄧小平這個他們中間最頑強的人——對著幹的人。但是，毛澤東對江青可能在自己死後奪權的跡象也很生氣。早在 1972 年，他對江青花一周時間跟打算寫一本江青傳記的美國學者洛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談話（就像當年毛澤東與埃德加·斯諾談話希望宣傳他本人的崛起一樣）就十分不快。^[2-113]

提拔鄧小平一事使兩人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江青後來在 1976 年 3 月批鄧時說，鄧小平 1973 年春天剛回京時，她和毛澤東之間的問題並不像後來那樣嚴重。這也許要歸因於毛澤東，他在 1974 年夏天要恢復安定團結，因此讓江青少鬧事，他還告誡王洪文，不要老是看江青的眼色行事。

江青挖空心思挑起毛對鄧的疑心。在宣佈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兩周後，她恰好看到報紙上有一篇讚揚中國製造的輪船「風慶輪」的文章。鄧小平這時想擴大外貿，因此支持交通部關於中國尚無能力建造大型貨輪、若想在短期內增加外貿就只能購買外輪的結論。江青讀到報上那篇文章後給報紙撰文說，中國已經造出了萬噸巨輪「風慶輪」，周恩來和鄧小平卻要浪費國家的錢去買外國船。她又說，鄧小平一直想買外國船，這說明他和交通部的幹部有買辦心理，崇洋媚外。她說，自己造的船同樣很好，「我們不是也造出了『風慶輪』這樣的萬噸巨輪嗎？」^[2-114]

第二次炮轟發生在 10 月 17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再次指責鄧小平支持購買外輪，說他是在搞洋奴哲學。她宣稱中國自己也能造大船。鄧小平通常能夠保持冷靜，但江青的不斷指責讓他失去了耐性。當時他對江青試圖提拔立場搖擺的楊成武擔任總參謀長也很生氣。他心想，50 年前他出國時，乘坐的是一艘西方製造的五萬噸輪船，這樣的大船在當時就已經不稀奇。總之，中國在船運方面已經大大落後，而江青對外面的事一無所知。鄧小平發火後，在李先念勸說下滿臉通紅地憤然離去。^[2-115]他後來對周恩來說，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批了他七八次，讓他忍無可忍。^[2-116]

10 月 17 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脾氣後的第二天，王洪文代表政治局飛到長沙。他奉江青之命前去告狀，讓毛澤東懷疑鄧小平的能力不足以擔當大任。可是見面的結果只是使毛澤東更加懷疑王洪文能否勝任自己的工作。^[2-117]兩天後的 10 月 20 日，毛澤東在長沙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時，鄧小平也被叫去參加了會見。

當時王海容和唐聞生已經向毛澤東彙報了江青和鄧小平在北京吵架的事。毛對江青很生氣，他叫她不要在政治上攻擊別人，她卻跟人鬥個沒完。^[2-118]他在 11 月批評江青，說她到處插手，批評政府文件（例如關於購買外國輪船的決定），以及不經商討就發文件，還想違背大多數人的意見自己組閣。毛澤東借用《西廂記》中的人物對江青說，要做厚道的崔老夫人，不要做搞小動作的紅娘。但毛澤東並沒有拋棄江青。她已經證明自己是個堅定的盟友，只要毛想整誰，她一定會整誰；況且他有可能還需要她整人的本領。但是至少在那時，由於毛澤東正在為即將到來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準備，他壓住了江青，他要讓鄧小平擔任更重要的角色。

[2-1]DXPCR, pp. 108, 117.

[2-2]DXPCR, pp. 106–115；另據作者 2008 年 11 月訪問這家工廠以及與工廠當地人交談的筆記。

[2-3]DXPCR, pp. 133–147.

[2-4]DXPCR, pp. 148–154.

[2-5]DXPCR, p. 185.

[2-6]為鄧小平和陳毅擔任過翻譯的冀朝鑄曾對鄧小平和陳毅作過比較。作者在 2002 年 4 月、2006 年 11 月和 2009 年 4 月對冀朝鑄的採訪。

[2-7]2001 年 3 月和 2002 年 1 月對李慎之的採訪。

[2-8]DXPCR, pp. 120–132; 巫猛、熊誠、李小川：〈鄧小平在江西新建縣的日子〉，《百年潮》，2003 年第 1 期，後收入楊天石編：《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55；另據作者 2002–2006 年對鄧榕的採訪。

[2-9]DXPCR, p. 179.

[2-10]2007 年 7 月作者對鄧林的採訪。

[2-11]作者 2002–2008 年對鄧榕的採訪。

[2-12]DXPCR, p. 103.

[2-13]DXPCR, p. 181.

[2-14]DXPCR, pp 140–145.

[2-15]DXPCR, pp. 191–194；2007 年 12 月作者對申再望的採訪，他是去看望鄧家的李井泉三個子女之一。

[2-16]2007 年 7 月作者對鄧林的採訪。

[2-17]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 223。

[2-18]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pp. 215, 267. 楊炳章（Benjamin Yang）是鄧朴方在北京大學的同學。

[2-19]2002–2006 年作者對鄧榕的採訪。

[2-20]DXPCR, p. 244.

[2-21]史雲、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8 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 197。

[2-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鄧小平自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 125。

[2-23]DXPCR, p. 192.

[2-24]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pp. 588–599.

[2-25]關於鄧小平被告知不要再寫信的事，見 DXPCR, p. 187。關於他所發的信件，見 DXPCR, pp. 182–184。對林彪墜機前後事件的記述，見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p. 275–306。另見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和孫萬國（Warren Sun）認為林彪本想疏遠政治，是毛澤東把他拖進了政治，林彪並沒有偏離毛的政策，林彪死前最後一年的緊張關係是毛澤東為削弱林的勢力而主動出擊造成的。

[2-26]DXPCR, p. 184.

[2-27]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說，毛「在林彪事件後身體突然垮了，他一整天躺在床上……在床上幾乎躺了兩個月」。見 Zhisui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 542–543。關於林彪墜機前一年毛對林彪的日益猜疑，見 Short, *Mao: A Life* (Henry Holt, 1999), pp. 588–599。

[2-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 1610、1616–1618。關於毛澤東的醫療條件，參見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2-2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Carle Place, N.Y.: 明鏡出版社，2003），頁 356–357。據毛澤東的醫生說：「只要毛澤東因逆境病倒在床，他總會想出一套新的政治戰略。」見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 543.

[2-30]作者 2002 年 4 月、2006 年 11 月和 2009 年 4 月對周恩來的翻譯冀朝鑄的採訪。

[2-31]DXPCR, pp. 191–192.

[2-32]DXPCR, pp. 191–192.

[2-3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63–364。

[2-34]DXPCR, p. 242.

[2-35]《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21。

[2-3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62。

[2-37]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56–357。

[2-3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59–368。

[2-39]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2007), p. 59.

[2-40]泰偉斯和孫萬國記述了周恩來要修改一張他與尼克遜合影的照片的事，周要把譯員冀朝鑄從照片上去掉，換上王海容的照片。王海容是得到毛澤東信賴的親戚，但事實上她並不是出色的翻譯。見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29–30.

[2-4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56–358。

[2-42]與 John Holdridge 的私人通信，無日期。

[2-43]DXPCR, pp. 192–19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64–368。

[2-44]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222。

[2-45]DXPCR, pp. 198–200.

[2-46]DXPCR, pp. 201–202.

[2-47]〈鄧小平同志的信：1972 年 8 月 3 日〉，未公開，現藏於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48]DXPCR, pp. 209–210.

[2-49]史雲、李丹慧：《國史·第 8 卷》，頁 202。

[2-50]《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50。

[2-51]史雲、李丹慧：《國史·第 8 卷》，頁 202。

[2-52]DXPCR, pp. 214–239.

[2-53]舒惠國：〈紅色大地偉人行〉，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 199。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幹二十年。」

[2-54]DXPCR, pp. 242–243. 江青後來說，她當初並不反對鄧小平回來，而且是支持他的（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180, 202），但黨史專家同意鄧榕的觀點，她認為江青反對讓他回來。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50。

[2-5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04–505; DXPCR, pp. 246–247.

[2-56]DXPCR, pp. 242–243.

[2-57]《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73 年 3 月 28、29 日，頁 1973。

[2-58]《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73 年 3 月 29 日，頁 1973。

[2-59]DXPCR, pp. 244–246. 西哈努克宴會的情況見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2-60]《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頁 71–81；《鄧小平年譜（1904–1974）》，頁 1974–1990。

[2-6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英譯縮寫本是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A Biograph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2-62]2006 年 10 月、12 月作者對章含之的採訪，她是毛澤東的英語教員和英語翻譯之一，她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在 1963 年。另見 Gao, Zhou Enlai, pp. 237–240。

[2-63]2006 年 10 月作者對章含之的訪談。

[2-64]這裏的敘述主要據《晚年周恩來》和該書英譯本。高文謙在中央文獻研究室擔任副主任長達 10 年，有評論者認為，高文謙的一些解釋有悖於史實，還可以作出更合理的解釋。例如，高文謙說毛澤東放鞭炮慶祝周恩來去世，但人們過春節時都會出來放鞭炮，這才是毛澤東放鞭炮的原因。

[2-6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2-66]DXPCR, p. 210.

[2-67]《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55。

[2-68]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anl, 1993), pp. 248–249.

[2-69]DXPCR, pp. 252–254; Richard Evans, Deng Xiao 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Viking, 1994), pp. 196–197.

[2-70]《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61。

[2-71]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97.

[2-7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54。對這次大會更完整的紀錄見同上，pp. 93–109。

[2-7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 1976–1977。

[2-74]《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61。

[2-75]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 197.

[2-76]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pp. 159–164. 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p. 124–128.

[2-77]Tyler, A Great Wall, pp. 168–169. 另見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 166–169. 基辛格與毛澤東的會談見該書頁 179–199。

[2-78]DNSA, CH00277,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November 11, 1973. 該檔案中的很多會議紀錄也見於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2-79]DNSA, CH00278, November 12, 1973; DNSA, CH00284, November 14, 1973.

[2-80]基辛格本人後來對這些訪問的記述見 Kissinger, Year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pp. 136–166. 很多帶有評註的文件後收入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2-8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461。

[2-8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02。

[2-83]很多在文革中挨過整的幹部對一直跟毛澤東做事的人——包括周恩來在內——心懷怨恨。鄧小平對基辛格說：「周恩來確實改善了很多人的命運，但他從未想過改變那些造成痛苦的政策。」見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0.

[2-8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472; Gao, Zhou Enlai, pp. 242–247.

[2-8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05–506; Gao, Zhou Enlai, pp. 247.

[2-86]《鄧小平年譜（1904–1974）》。

[2-87]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 296.

[2-88]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 197.

[2-8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473–474。

[2-90]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131–13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473–474、531–533。

- [2-91]Gao, Zhou Enlai, pp. 256–259, 262.
- [2-9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31–533。
- [2-9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06–507、527–528。
- [2-94]DXPCR, pp. 264–265.
- [2-95]2006 年 12 月作者對章含之的採訪。外交部長喬冠華的第一個妻子去世後，她於 1973 年嫁給了喬冠華。
- [2-96]DXPCR, pp. 264–265.
- [2-97]DXPCR, pp. 266–268.
- [2-98]2002 年 1 月作者在中央黨校對姜長斌的採訪。
- [2-99]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4.
- [2-100]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p. 869–886.
- [2-101]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868.
- [2-102]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4.
- [2-103]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p. 163–164.
- [2-104]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3.
- [2-105]2007 年 12 月作者針對這次訪問對鄧小平的隨行翻譯施燕華的訪談。
- [2-106]2006 年 10 月和 12 月作者對喬冠華妻子章含之的採訪，她也是代表團的翻譯。
- [2-107]DXPCP, pp. 268–270.
- [2-108]《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頁 88–117。
- [2-109]1974 年 11 月 4 日鄧小平與美國大學校長代表團的談話。我要在此感謝 Merle Goldman，她是代表團的一員，讓我分享了她的筆記。
- [2-11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 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1。
- [2-11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 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1–16。
- [2-112]DXPCP, p. 274.
- [2-113]Short, *Mao, A Life*, p. 618.
- [2-11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28–530。
- [2-11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另參見 DXPCP, pp. 276–277；史雲、李丹慧：《國史·第 8 卷》，頁 377–409。
- [2-116]DXPCP, p. 281.
- [2-117]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p. 202–203.
- [2-118]DXPCP, pp. 275–280.

第 3 章

在毛澤東手下整頓秩序：1974—1975

1974 年 12 月，周恩來離開病床飛往長沙去見毛澤東，兩人要商定北京關鍵領導崗位的人選，他們都知道自己已經來日無多，因此這項工作十分緊迫。周恩來在 6 月 1 日剛動過癌症大手術，身體十分虛弱，無法每天正常工作，他飛往長沙時乘坐的飛機就像個小型醫院，有醫生陪同。^[3-1]毛澤東則患有心臟病和葛雷克氏症，醫生告訴他剩下的日子不足兩年了。他的視力也嚴重衰退，說話含混不清。不過，兩位領導人雖然重病纏身，頭腦都還清楚。他們兩人雖有分歧，但也有一項共同的任務，就是為黨和國家選定繼承他們畢生事業的領導人。

當時負責黨內日常工作的是年僅 39 歲的王洪文，他也來到長沙加入了他們。雖然沒有正式的規定，如果他們選定的人表現不錯，就可以在毛周之後繼續主政。他們所決定的黨內職務的人選，將由定於 1975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召開的二中全會正式批准；政府職務的人選則要由隨後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周恩來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他每天開會時間過長，因此三個人的會議持續了五天，以便留出充足的休息時間。他們從 12 月 23 日到 27 日每天都開會，只有 26 日除外，這一天是毛澤東 81 歲生日，毛和周單獨會面。

為了給長沙的會面作準備，周恩來花了幾周時間徵求政府其他領導人的意見，篩選出一個他們認為最適合擔任高層職位的人員名單。他和手下人員對建議的人選名單三易其稿，同時擬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日程。在周恩來去長沙幾天以前定稿已送交毛澤東，作為他們商討的基礎。

毛澤東儘管年老體弱，仍然握有左右國家命運的大權。但是他在 1974 年 12 月擺在頭一位的工作是安定團結。他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對周恩來的嚴厲攻擊已經結束，兩位最高領導人現在又像過去一樣合作共事了。^[3-2]毛澤東與周恩來見面時，表示他仍要致力於繼續革命，但事實上他批准了周恩來及其在北京的部下提出的他們認為最有能力領導政府和管理經濟的人選。^[3-3]毛澤東支持能夠提供更穩定的政治環境、使經濟得到有序發展的高層幹部，這使周恩來大受鼓舞，他回到北京時已是精疲力竭，但也很寬慰。

毛周的接班計劃：1974 年 12 月

毛周二人在見面之前已經內定王洪文繼續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他們也同意把領導政府的主要工作正式交給鄧小平。6 月 1 日周恩來動手術後，鄧小平接手周恩來的工作幹得不錯，因此毛澤東宣佈支持讓鄧小平在 10 月份擔任第一副總理，將在全國人大得到正式任命。除了領導政府的主要工作外，鄧小平還將被提拔擔任黨和軍隊的要職。

王洪文和鄧小平將正式接過黨和政府最高領導人的工作，但事實上仍是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當下手，他們在去世之前會一直保留主席和總理的頭銜，王洪文和鄧小平要繼續接受這兩位老資格領導人的指示。毛澤東保留著他的權力，只要對他們的表現不滿意，他隨時能撤換他們。

因此，1975 年 1 月 5 日的中央 1 號文件仍把毛澤東列為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任命鄧小平擔任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在 1 月 8 日至 10 日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王洪文被確認為黨的副主席（排名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後），鄧小平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在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又正式擔任了第一副總理。

在毛澤東看來，王洪文和鄧小平是個很有前途的組合。王洪文原是造反派頭頭，對毛澤東感恩戴德，又沒有自己獨立的權力基礎，因此可以認為他將領導中共繼續沿著毛澤東的革命道路走下去，忠實於毛本人的路線。鄧小平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又有可靠的領導能力，能夠領導外交事務和複雜的政府工作。

凡是瞭解王洪文和鄧小平的人都知道，王洪文沒有多少擔任要職的經驗，他的權力事實上要比鄧小平小得多。鄧小平當過十年黨的總書記，一直負責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在運用權力上從不含糊。但是，通過把王洪文放在更高的位置，把宣傳工作交給以江青為首的激進派，無論鄧小平可能有何種偏離毛澤東路線的傾向（例如像他在 1960 年代初的

表現那樣）都會受到控制。毛澤東雖然批評江青好走極端，有野心，但他知道江青在支持他的宣傳路線上十分堅定，完全可以放心。^[3-4]此外，江青手下的激進派在姚文元的幫助下掌管著黨報《人民日報》和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另一個激進派張春橋掌握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3-5]

周恩來的謝幕：1975 年 1 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1975 年 1 月 13 日召開，這是自 1965 年 1 月以來第一次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時毛澤東仍在長沙。已是癌症晚期、面黃肌瘦的周恩來，在他最後一次重要的公開露面中，宣讀了政府工作報告。鄧小平在幕後主持起草了周恩來的報告。為了不使周恩來過度疲勞，他叮囑起草人講稿不要超過 5,000 字，篇幅要遠小於正常的政治報告。鄧小平深知毛澤東依然大權在握、一言九鼎，因此報告中充斥著毛的文革語言。周恩來在講話中讚揚了文革及其模範典型大寨和大慶。當他唸到「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深入、廣泛、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時，想必會讓代表們感到特別心酸，因為周恩來本人正是那場運動的主要批判目標之一。^[3-6]

周恩來做報告時，很多人大代表都為他痛苦的表情落下了眼淚；唸完報告後，他們全體起立，向他熱烈鼓掌達數分鐘之久。這種情感上的反應，是他們向這位臨終前的領導人表達的敬意，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黨和國家，工作出類拔萃；他在文革中保護了他們中間很多人，卻在毛的手下蒙受不白之冤。瞻望未來，很多人盼望文革浩劫早日結束，國家能夠最終致力於周恩來在 11 年前首次宣佈、在這次報告中又重新提出的任務——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3-7]

1975 年 2 月 1 日，在國務院各部委領導人的小型會議上，周恩來說，他以後不會再參加他們的會議了：「主席指定副總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稱讚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樣的會，我不可能常來參加，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其實，將近一年以前，從 1974 年 5 月鄧小平赴美參加聯大會議時起，他就主持接待外賓、替周恩來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直到 1975 年 2 月，權力才被穩固地移交給鄧小平，使他能夠全面負起責任，只要別惹毛澤東生氣即可。鄧小平很敬重周恩來，常去醫院看望他。他以恰當的謙虛態度解釋說，由於總理有病，他才協助總理工作。^[3-8]但事實上他已經成了負責人。

整頓黨的領導班子

鄧小平在 1975 年面對的難題是既要得到毛的支持，又要撥亂反正，使中國走上發展的正軌。為了不失去毛澤東的歡心，他十分留意毛的喜好。他不斷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唱讚歌，避免批評文革。1975 年初，他頗具創意地把毛的幾句話聯繫在一起，為自己的工作提供依據。在 1975 年 5 月 29 日的一次講話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毛澤東本人從未放在一起的「三項指示」：一，反修防修；二，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3-9]第一條「反修防修」的說法是再次向毛澤東公開保證他決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在文革中就是為此而受到批判的。然而，這也是使苦藥更容易下嚥的糖衣。他接著便強調毛澤東支持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使毛澤東也難以反對他採取那些頗為激烈的措施，他要通過這些措施使倦怠於文革的極端做法的中國恢復安定，重新煥發活力。

勇士鄧小平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作掩護，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著手帶領國家步入現代化的軌道。但他面對的問題是巨大的。就像其他國家內戰之後的領導人一樣，他必須把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團結在一起。同時，中國經濟停滯不前，計劃一團混亂，統計報告皆不可靠。農業生產不足以養活人口，更不用說種植棉麻等工業作物。運輸系統陷入崩潰，一地物資無法運往另一地的工廠。軍隊因為無休止的政治鬥爭和承擔管理全國地方工作單位的無限責任而超負荷運行，荒廢了訓練，軍事技術遠遠落後於潛在的敵人。簡而言之，中國對軍事衝突毫無準備。另外因為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殘酷打擊，整整十年基本上沒有培養任何技術專家。因此，鄧小平在領導四化工作時，缺少訓練有素的必要人才。

自 1941 年以來，毛澤東就用「整風」運動來實現黨的團結。「整風」是一個強大武器，用來打擊那些不夠服從毛澤東的個人領導和立場的人。在漫長的調查期間，要求受害者為自己的忠誠作出詳細的辯護，使同事相信自己的清白。受批判的人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結局也很悲慘：有些人被處死或被送去勞教，有些人因不堪重負而自殺。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初，通過整風形成的紀律對中共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統一全國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從 1957 年開始的歷次嚴酷的整風，也讓很多過去忠誠的知識分子和黨員疏遠了黨。

1975 年，鄧小平把他為加強團結而開展的工作稱為「整頓」，這在過去一直是中共軍隊裏的一種說法，周恩來在 1972 年也曾用過這個詞來表示與鄧小平相似的主張。軍隊的「整頓」是指一場戰鬥或戰役過後，對各單位剩餘的部隊進行整編，以便為下一場戰鬥作好準備。整編的關鍵工作是為各單位確定新的領導班子，以取代受傷或死亡的人員。在整頓中要對以往戰鬥中的錯誤提出批評，但重點是恢復補給和重建領導班子，使之能夠迎接下一場戰鬥。

在 1975 年進行整頓時，很難阻止下面的幹部重施故技，用他們在整風運動中學會的方式進行更惡劣的迫害，尤其當他們有機會向過去迫害過自己親友的人算賬時。鄧小平要結束過去 25 年來政治運動中的冤冤相報，他不斷表示，目的不是算舊賬，而是要通過整頓為迎接新的挑戰作好準備。

鄧小平認為，組織一個有效率的國家政府的關鍵不是改變法律法規，而是為各級行政單位配備一個領導班子，交給他們實權。為了在熟悉基層情況的基礎上提供有力的領導，各級幹部為下一級選出可靠能幹的領導人便至關重要。在鄧小平看來，從組織的可靠性上說，一個領導班子要優於一名領導人，不管後者多麼能幹。一名領導人說不定會出事，但如果是一個小班子，一旦出了問題，其他人可以隨時接過工作。理想的安排是：領導班子的成員不但能提供必要的全面領導，而且能掌握各自分管領域的專業知識，例如工業、文化和政法等等。大單位的領導班子可以有七八個成員，小單位也許只需要兩三個人。對於領導應當如何開展工作，要給予他們足夠的活動空間，只要他們能完成上級下達的目標即可。

1975 年鄧小平排在第一位的工作，就是為全國各級單位選出領導班子。他這項工作在 1975 年 10 月以前一直能夠得到毛的全力支持，包括不再重用過去的革命造反派，讓在文革初期挨過整的更有經驗的幹部取代他們。在 1974 年底和 1975 年，毛澤東支持為六百多名老資格的領導幹部平反。

鄧小平著眼於長遠，在 1975 年底也開始改善教育系統，以便將來有可能以知識和管理能力而不是人脈關係為標準選拔新幹部。這在當時必然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夢想。鄧小平在 1975 年接手的體制是一個爛攤子，很多最能幹的幹部沒有任何學習機會。他們經歷各異，標準統一的考試派不上用場。要到十年以後，大專院校才能提供足夠的畢業生，使學歷能夠作為選拔領導班子的標準，甚至應用於中層單位幹部的選拔。事實上，政府在很多年裏只能依靠個人評價去選拔幹部。

能否得到選拔對幹部來說是大有差別的。得到選拔不但意味著飯碗，還有特權和榮譽，他們的家人也有更好的就業、住房和教育前景。此外，由於文革給社會造成的分裂，選拔領導班子必然是一個明爭暗鬥的過程。為了使體制變得更加精英化，鄧小平只能先從最上層做起，讓可靠的老幹部去選拔領導班子，然後再層層選拔，直到最基層。鄧小平的整頓首先從軍隊抓起。^[3-10]

整頓軍隊

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後，便不失時機地採取了他認為對於整頓軍隊最為重要的一些措施：恢復紀律，裁減兵員，改善訓練，為每個單位建立新的領導班子。1975 年 1 月 25 日，他在毛澤東的全力支持下，召集總參謀部團級以上幹部開了一個會。前政委鄧小平直言不諱地列舉了軍隊的問題。解放軍在文革期間承擔起地方的許多職能後，變得臃腫不堪，很多幹部變得「腫、散、驕、奢、惰」。他說，最上層的紀律渙散導致了派系林立。部隊幹部在文革時期有權管治平民，這使他們變得傲慢自負，很多人利用這種權力住大房子，大吃大喝，耽於享樂，給朋友送高級禮品。上級幹部作風懶散，對下面的問題不聞不問，執行命令拖泥帶水，不願意承擔有危險的任務。^[3-11]結果是儘管軍隊規模龐大，保衛國家的能力卻十分低下。很多部隊單位成了一個個小獨立王國，就像抗戰時期各佔山頭的游擊隊一樣。^[3-12]

有「鋼鐵公司」之稱的鄧小平清楚地表明了他將如何對付那些不服從命令繼續搞派性的人。他說：「今後軍隊幹部的使用、提升，一條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能重用派性嚴重的人，不能重用堅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他明確說，這種警告也針對最高級別的人。他發下誓言：「無論牽扯到多少人，都要做到底。……我們是人民軍隊，我們的任務是打仗。」^[3-13]很多仍在搞派性的人過去參加過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活動，但是鄧小平沒有指責他們以往參加過這些組織。重要的是他們現在做什麼。無論過去打過什麼派仗，只要願意與新領導人一起工作，都會受到歡迎。

鄧小平和葉帥很幸運，他們為恢復軍隊紀律和樸素作風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中央軍委常委 11 名成員中大部分成員的堅定支持。中央軍委的常委會 1975 年 2 月 5 日才正式恢復，承擔著領導軍隊日常工作的職責。常委中的激進派（王洪文和張春橋）在數量上完全被鄧小平和葉帥的支持者所壓倒。

在常委的支持和毛的批准下，兩位領導人陸續使 25,000 名前軍隊幹部中的很多人重返工作崗位，鄧小平說，他們是在林彪時代受到了誣陷。他指示說，要讓受到誣陷的人回來工作，有病的要給看病。他說，清查工作要盡快進行，但不必公開。^[3-14]

在接手新的工作之前，鄧小平已經在明確思考軍隊現代化的問題。1975 年 1 月 14 日，即上任剛過一周，他就指示部下著手制定改進軍事裝備和軍需物資的五年規劃和十年規劃。^[3-15]規劃內容包括修理和改造舊裝備，以及生產缺失的零部件，這些都是在文革中被嚴重忽視的工作；還要研發導彈和其他現代裝備。^[3-16]

像毛澤東一樣，只要一提到美國撤出越南後蘇聯日益增長的威脅，鄧小平就會動怒。他擔心美國失去民意支持，不再願意堅定地對抗蘇聯。他也擔心 1974 年 8 月取代尼克遜的福特總統缺少尼克遜對戰略問題的深刻理解，不能像尼克遜那樣隨時準備對蘇聯的任何新威脅作出妥善的反應。因為美國如果不向蘇聯施壓，蘇聯在亞洲就可以隨意進行擴張，它已經在中蘇邊境部署了 100 萬軍隊。

鄧小平深知，美國是唯一能夠全面抑制蘇聯的大國，因此每一次會見美國官員時他都會敦促他們對蘇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毛澤東不必擔心鄧小平會像周恩來那樣在跟美國打交道時示弱。1974 年 4 月和 11 月鄧會見基辛格時，不但提醒基辛格注意蘇聯的侵略行動，還不斷諷刺他在對付蘇聯的攻勢時縮手縮腳。^[3-17]事實上，鄧小平指示他的外交部官員，特別是中國駐聯合國及其安理會代表黃華，每次見到美國人都要批評他們對蘇聯的立場不夠堅定。

在 1975 年，佔用鄧小平最多精力的軍隊問題是裁員。軍隊的臃腫造成預算緊張。現役軍人超過 600 萬，比 1966 年多了 20%。^[3-18]中國需要對文化水平不高的軍隊高層幹部進行裁減，培養瞭解現代技術的新一代領導人。裁軍是一支現代、穩定的軍隊能夠長期發展的最關鍵的第一步。但是鄧小平也知道，如果戰爭迫在眉睫，那就不可能大幅裁軍。毛澤東說過戰爭不可避免，鄧小平並沒有挑戰這個觀點，但是他確實說過，中國能在未來若干年裏減少戰爭的危險。

軍隊的任何問題都不像裁軍那樣引起了強烈的抵制，一個領導人假如沒有鄧小平在部隊裏的地位和強硬作風，就會知道這項工作幾乎不可能完成。每年都有大量復員軍人回到地方後找不到工作。當時還沒有新的市場機會，政府財力也有限。安置工作也一團糟，造成大批轉業老兵抗議他們沒有得到適當的安置。

鄧小平裁軍工作的要點是制訂新的編制表，然後把需要裁減的名額分配到全軍各個單位。早在 1975 年 1 月 14 日，鄧小平就在總參一次幹部座談會上宣佈，要制定出規定各單位人數的新編制表。^[3-19]新的編制表完成後，空軍和海軍不會減少員額，但是陸軍要裁員。此外，技術專業的崗位也不會減少。有些地方的軍隊人數要大幅減少，但是像新疆一類敏感地區，軍隊編制還要增加。^[3-20]新的編制表完成後，由各單位負責實施具體的裁軍工作，確定哪些人要保留，哪些人要裁撤。^[3-21]就像他一向處理有爭議的問題那樣，鄧小平不但下達指示，而且說明他的理由。他解釋說，國家財力有限，能讓錢用於現代武器系統的唯一辦法就是減少人員開支。即便是那些擔心自己被裁掉的人也很難反對鄧小平的這個理由。

為了減少對裁軍的抵制，鄧小平加大了為復員和轉業軍人找工作的努力。盡量安排退休的部隊高層幹部在地方黨政機關或國營企業工作。普通軍人主要安排到農村擔任公社幹部，還有一些人轉業去了工廠。^[3-22]要求政府幹部負責在當地為老兵安排工作。

鄧小平利用 1975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召開的軍委擴大會——這個大會因林彪事件而拖延了四年——為裁軍計劃尋求支持。一些軍官為避免削減自己單位的人員而提出特殊要求，但計劃並未發生多大改變。^[3-23]會議確定了三年內減少兵員 160 萬的目標，其中包括大約 60 萬名軍官。^[3-24]

新的編制表一完成，軍隊立刻開始選拔各級領導班子。鄧小平為新領導班子的面貌定出基調，他說：新當選的幹部要能夠運用新技術改進常規裝備和先進武器，能夠通過科學分析提高指揮和管理水平；要增加訓練和學習，以便提高幹部素質，幫助他們制定適應未來條件的戰略；需要有關心部隊、能夠改進軍民關係的政治幹部。^[3-25]中國的武器已經嚴重落伍，財力十分有限，因此鄧小平要求把錢花在刀刃上。軍委擴大會剛一結束，來自 400 多家國防工業大廠的領導幹部就在 7 月 20 日到 8 月 4 日召開會議，根據提高技術水平的新工作重點對他們的工作責任進行評估。^[3-26]

軍委擴大會召開幾周後，宣佈了中央軍委的新成員。毛依然允許激進派控制宣傳工作。「四人幫」中最老練的張春橋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但鄧小平仍然擔任總參謀長，葉劍英保留了對軍委的領導權。大多數中央軍委常委都是能與鄧小平和葉劍英合作共事的有經驗的軍隊幹部：聶榮臻、粟裕、陳錫聯和梁必業。

鄧小平及其盟友有效控制著激進派。在軍委擴大會上，級別最高的激進派王洪文和張春橋都沒有公開發言。「四人幫」試圖控制人事任命權，把他們以後可以用來打擊對手的人事檔案搞到手，但是沒有得逞。張春橋仍擔任總政治部

主任，因此控制著宣傳，但他完全不掌握人事任命權。鄧小平和葉帥在軍隊中得到的支持要大大高於張春橋，由他們決定工作日程，並且在下級的任命中起著主導作用。^[3-27]

鄧小平也恢復了部隊的培訓計劃。1966 年之前的 101 所軍事院校，在文革中大多數都被關閉。有些院校破敗不堪，無法重新開學。但是也有一些院校雖然不再教學，但教員仍住在校園裏。還能教學的有經驗的教員又被請了出來，讓他們修訂教材，重登講台。

與學校相比，大多數高級軍事技術研究所在文革中受到了保護（甚至一些民用研究所也被置於國防科委的保護之下）。但是，由於既沒有大學的支持和新畢業生的輸入，又缺少民用研究機構提供的相關支持和與國外的技術交流，中國的軍事技術已遠遠落後於它的潛在敵人。研究機構需要重整旗鼓，葉帥在 1975 年勸說已退休的張愛萍重新出馬幫助他工作，在組織軍事科研方面，張愛萍是最有經驗的高級軍官之一。

兩個研究和開發機構鬧派性十分嚴重，因此需要給予特別關注：一個是主要從事核武器開發的二機部，另一個是研究彈道導彈的七機部。在 1974 年，發射洲際彈道導彈的三次試驗均以失敗告終，這使得批評這兩個部的領導很容易得到政治上的擁護，但是對激進派的支持並沒有消失。^[3-28]「四人幫」的追隨者在其中一個部下面的一個工廠中仍很活躍，他們貼出了聲討張愛萍只抓生產的大字報。

5 月 19 日，鄧小平在訪法回國後的次日參加了負責軍工技術的領導幹部聶榮臻（他也是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同志之一）在七機部召開的會議。鄧小平的講話十分強硬，他說，政府不能再容忍派性，領導人必須在 6 月 30 日以前消除一切派性，7 月 1 日之後大家要合作共事，不然就對他們不客氣：堅決調開。

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同意後，鄧小平和葉帥監督著這兩個問題嚴重的部門進行整頓，仍然鬧派性的人被開除，建立了組織科研工作的新領導班子。^[3-29]從 1975 年第四季度到 1976 年，作為裁軍工作的一部分，編制表中正式取消了 46.4 萬個崗位。當然，有些人想方設法留在了自己的崗位上，但葉帥和鄧小平已經盡其所能落實了他們的裁軍計劃，新的領導班子也已選出，待時機到來便能在他們的部門和隊伍中應用現代科技。^[3-30]

總之，在 1975 年，鄧小平和葉帥在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大多數人的支持下，在恢復紀律、裁軍、為改進部隊的教育和技術水平鋪平道路方面，都取得了可觀的進步。

地方整頓的戰略：徐州鐵路局

為了在地方整頓上取得突破，鄧小平採取了抓典型的方式，這既能迅速增加生產，又能鼓勵其他單位。他在打游擊的年代就認為，打一些勝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隊準備打好大仗。1975 年，很多因為不能完成生產指標而受到批評的工廠都抱怨它們的物資供應不足。運輸是一個明顯的瓶頸。假如能在交通運輸領域初戰告捷，是不是既能增加生產，又能為其他領域樹立成功的先例？

中國在 1970 年代中期還沒有現代高速公路系統，貨運基本依靠鐵路。因此當鄧小平致力於改善運輸時，便將注意力集中在了江蘇北部的城市徐州，這裏是東西鐵路大動脈隴海線和南北鐵路大動脈津浦線的交匯點。在 1975 年 3 月之前，徐州鐵路局已經有 21 個月沒有完成裝貨和發車指標。自 1967 年 1 月起，那裏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幾乎從未間斷。

1975 年的形勢既糟糕又麻煩。擔任徐州鐵路分局局長的造反派頭頭顧炳華能搞到武器，頑固抵制外人對他的控制。自 1966 年以來，顧炳華和造反派就佔據著火車站附近的物資局大樓，將其作為他們個人的物資儲備和供應倉庫。當公安局前來抓捕一些工人時，顧炳華的同夥強行拘留了公安幹警。顧炳華的同夥甚至一度奪取了徐州市黨委的辦公樓，把市委幹部拘禁起來。^[3-31]

毛澤東堅定支持鄧小平整頓鐵路的工作，部分原因是他本人經歷過一次因混亂而造成的延誤。1975 年 2 月 3 日他要乘專列從長沙前往杭州，但保衛幹部無法保證專列的安全，使他直到 2 月 8 日才得以成行。^[3-32]前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現在也贊成打擊造反派。他支持壓制徐州，是因為他作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明白上海需要鐵路的供應。

毛澤東和王洪文的支持使鄧小平能夠對徐州採取迅速果斷的措施。此時萬里已經擔任了鐵道部部长（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作為他早先採取的步驟之一，鄧小平早在 1975 年 1 月上任之前便推薦了素以攻克難題聞名的萬里擔任鐵道部部长。萬里在早年負責領導包括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在內的天安門

廣場周邊建設項目時就曾受到毛澤東的表揚。^[3-33]「萬里」這個姓名的意思是「一萬里」，所以毛曾開玩笑說，這個人「真是日行萬里啊！」因此，當 1974 年 12 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長沙開會時，他們很快就同意了對萬里的任命。

1975 年 1 月萬里上任時，鄧小平對他說，要「盡快採取最有效的手段」改變鐵路現狀。^[3-34]他讓這位新鐵道部長抓緊準備一份有關徐州問題的報告，在他擔任副總理十天後，就聽取了萬里的彙報。萬里說，關鍵問題是派性，問題太複雜，解決起來需要半年時間。鄧小平說，形勢太嚴重，不能等那麼長時間。

幾周後的 2 月 6 日，鄧小平召集紀登奎和王震聽取了萬里有關盡快解決徐州問題的方案彙報。在這次會議上，粗魯莽撞、對鄧小平忠心耿耿的王震將軍提出派軍隊過去。萬里說，徐州很多幹部擔心口頭指示可能很快有變，因此他請求中央發一個書面文件，授權他鎮壓控制著徐州鐵路樞紐的革命造反派。鄧小平下令馬上起草這樣一份文件。

為了響應鄧小平發出的制定文件解決鐵路難題的號召，29 個省市自治區負責工業和交通運輸的書記從 2 月 25 日到 3 月 5 日在北京召開了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徐州的問題最嚴重，必須首先解決。他們希望當年第二季度就能讓鐵路貨運恢復通暢。^[3-35]會議結束後，立刻根據會議的討論出台了中央 9 號文件，標題是《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3-36]這份得到毛澤東批准的文件全面分析了當前的問題，概要說明了解決方案。最重要的是，這份文件表明，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北京領導層完全支持萬里在徐州的工作。

9 號文件把必要的政治和軍事權力集中到了萬里和鐵道部手中，從而打破了徐州鐵路樞紐管轄權重疊的死結。當時，位於江蘇西北角的徐州鐵路樞紐靠近山東、安徽和河南邊界，管理權涉及所有這四個省的幹部，他們分管著從治安到鐵路管理與維護的不同部門。

9 號文件還規定，必須消除派性，鐵道部的幹部要對發生的任何事故負責。反對這些措施的人（搞派性活動者、停工者和毀壞財物者）一經發現，要立刻予以懲處。鄧小平為了搶佔意識形態高地，宣佈說，對抗鐵道部領導的人——就算那些已經加入了激進團體的——也要被定性為違反組織紀律、搞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此外，破壞鐵路財物的人要一律定為「反革命」，迅速給予嚴懲。^[3-37]

鄧小平在省委書記^[3-38]會議結束時的講話簡短扼要、切中要害，既表明了他態度堅決，採用的方式又讓毛澤東很難反對，儘管他要限制一些革命造反派。他引用毛語錄說，必須「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一旦發生戰爭，交通運輸的地位十分重要，可是現在它運轉不良。有些領導人擔心，過於重視經濟，會像文革期間那樣繼續挨批。為了讓他們放心，鄧小平說：「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麼『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他明確表示，毛主席現在支持抓經濟，「怎樣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分析的結果，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3-39]

由於把鐵路作為地方整頓的典型，鄧小平親自講到全國鐵路問題的細節。他說，全國鐵路的日裝載能力估計為 55,000 個車皮，但現在只能裝 40,000 多個車皮。「現在鐵路事故驚人。去年一年發生行車重大事故和大事故 755 件。」（與此相比，1964 年只有 88 起。）紀律很差，規章制度得不到執行。例如，「火車司機隨便下車吃飯，經常誤點」，值班時間不能喝酒的規定也得不到嚴格遵守。「對這些人不及時處理（打擊投機倒把、升官發財的壞分子）……等到哪一年呀？……對鬧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對鬧派性的頭頭。」對於那些鬧過派性但已改正錯誤的人，鄧小平說：「教育過來，既往不咎，再不轉變，嚴肅處理。」同時，「要把鬧派性的人從原單位調開」。鬧派性的頭頭不服從調動怎麼辦？「不服從調動不發工資。」他又用更加積極的語氣說，「我想絕大多數人是擁護這個決定的」，「鐵路工人是中國工人階級最先進、最有組織的一部分……把這些問題講清楚，理所當然地會得到絕大多數鐵路職工的擁護。……解決鐵路問題的經驗，對其他工業部門會有幫助」。^[3-40]這充分顯示了鄧小平的特色：講清大局，說明為什麼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務上面，打好思想基礎，為撤換無所作為的幹部爭取公眾支持。

為了貫徹鄧小平的計劃，萬里在會議結束後的次日就召開了鐵道部全體駐京單位大會，向與會者傳達了 9 號文件和鄧小平的講話要點。第二天又召開了全國鐵路系統電話會議，向地方幹部說明 9 號文件和鄧小平講話的重要意義。王震在電話中說，他將從鐵道部向問題嚴重的地方派出工作組。幹部們都知道王震將軍的工作組中會有軍隊，他們在必要時會動用武力。^[3-41]自土改以來，由上級派工作組一直都是保證國家政策在地方得到落實的基本手段。

萬里整治鐵路運輸不暢的工作有全國的支持，又有中央文件撐腰，他於 3 月 9 日率領北京的工作組會見了江蘇省和徐州市的黨政領導。^[3-42]他到達的當天就宣佈，根據鄧小平親自批准的逮捕令，對四天前被鄧小平點名批評的徐州鐵路分局局長顧炳華予以逮捕。^[3-43]萬里知道，不把顧炳華抓起來，有些幹部還是不敢帶頭對他進行批判。他還明白，很多人就像鄧小平在講話中所說，仍然心有餘悸，擔心被打成右派。老練的革命領導人萬里知道，為了讓人們放心地批判

顧炳華，需要召開一次群眾大會，以此顯示行動得到了廣泛支持，並表明上面的大人物也在公開譴責顧炳華。**9** 號文件的發佈起著關鍵作用，表明他的鎮壓措施不只是一個不久就會下台的領導人的意見，而是得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全力支持。

萬里到達徐州的第二天，在徐州鐵路分局職工和家屬萬人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傳達了 **9** 號文件的內容，敦促他們在 **3** 月底前讓鐵路局成為促進交通運輸順利運行的模範。次日，萬里等人又在徐州體育館召開的徐州市黨員幹部大會上講話，傳達了鄧小平所強調的毛主席的三項指示，重申毛主席對「安定團結」的號召。在另一次群眾大會——這次是機務段的職工——上講話之後，他們的領導作出了讓貨運暢通的保證。^[3-44]

顧炳華被捕後，他的同夥繼續負隅頑抗，直到最後鋌鐐入獄。和其他派下去處理類似情況的工作組一樣，萬里和北京的工作組把那些帶頭搗亂、必須逮捕或至少撤職的人與通過「教育」仍能和新領導班子合作的幹部區分開來。他們對基層領導說，要解散派系，承認錯誤；很多人聽從後得到了留用。在隨後召開的小組會上，每個人都表態不再加入派別，保證貨運暢通。^[3-45]

為了加強對新的領導路線的支持，使當地的人們不計前嫌，也為了向當地群眾保證激進派的追隨者不會捲土重來，工作組宣佈為徐州地區在文革初期受到迫害的大約 6,000 人平反，釋放在押人員。同時對派系鬥爭中受害者的親屬做了道歉，對倖存的受害者進行了賠償，^[3-46]並為過去受到冤枉的很多人重新安排了工作。^[3-47]為了讓鐵路工人完成指標，萬里鼓勵當地領導班子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在接見新選出的領導班子之後，萬里和工作組一起離開了徐州，距他們到達時只過了 12 天。他們讓當地領導班子接手工作並向上級彙報。到 3 月底時，徐州平均每天辦理的車皮數從 3,800 個增加到 7,700 個，日均裝載量翻了一番，從 700 個車皮增加到 1,400 個。^[3-48]

中共領導人在全國推行新方案時，經常說「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在徐州實現了重大突破後，鄧小平決心把這個在點上取得的整頓經驗推向其他鐵路樞紐，然後再利用鐵路的經驗去整頓其他部門。**3** 月底，負責整頓的幹部從徐州轉道南京和江蘇等地方的鐵路樞紐。^[3-49]鄧小平首先集中精力抓問題嚴重的鐵路樞紐，如太原、昆明和南昌等等。他聽說太原有個黨委副書記阻撓當地鐵路運輸暢通，便指示迅速進行調查，如果情況屬實，在月底以前要把這個副書記調離，如果他在上面有後台，也要一併調離。^[3-50]

萬里繼續奔波於有問題的鐵路部門，隨後又視察了所有的貨車製造廠——洛陽、太原、成都和柳州——以保證鐵路設備的及時供應。**4** 月 **24** 日鄧小平陪同金日成訪問南京時，萬里趕到南京向他彙報了整頓鐵路取得的進展。^[3-51]對於鐵路的其他老大難單位，萬里採取和徐州相同的策略：召集小型會議聽取有關當地情況的彙報，宣傳 **9** 號文件，重申毛澤東對安定團結的重視，召開群眾大會爭取他們對改革的支持，在必要時還會搬出軍隊作為後盾。經過選拔，新的領導班子得到了任用。自然，被撤換的領導都是以前的革命造反派。

從 **6** 月 **30** 日到 **7** 月 **7** 日，萬里在北京主持召開工作會議，總結了 **9** 號文件下發後幾個月以來整頓鐵路的經驗。這幾個月的變化顯然是一項很大成就。據萬里的報告，全國二季度的貨運量比一季度提高了 **19.8%**，客車利用率提高了 **18.4%**。^[3-52]

鄧小平不可能像解決徐州鐵路局的問題那樣，對另一些問題付出同樣多的精力，但是這個案例鮮明地體現著鄧小平克服混亂、為其他地方樹立典型的方法：他盡量讓毛澤東站在自己這一邊；依靠有成功經驗的幹部；發文件，召開群眾大會，利用軍隊使群眾相信文革的政策不會輕易回潮；把阻礙進步的人抓起來，並督促建立新的領導班子。而且，他做起這一切來雷厲風行。

把徐州的典型推廣到煤礦和鋼鐵業

徐州的整頓大獲成功後，鄧小平又利用徐州的典型經驗推動其他地方的整頓。他在 **3** 月 **25** 日讓萬里彙報徐州的進展，但不是向鐵路幹部，而是向國務院的全體幹部大會。鄧小平在這種彙報會上一般不說話，但這一次他卻表現得很急切，數次打斷萬里作一些補充說明。

此後，鄧小平的部下從打擊徐州的派性轉向打擊徐州所屬的整個徐海地區的派性，然後又擴大到江蘇全省。江蘇省在 **1975** 年是全國最亂的省份之一，**1974** 年末全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有所增加，江蘇卻下降了 **3%**。萬里得到支持從鐵路轉向對江蘇全省進行整頓，就像在徐州一樣，他打擊派性，選拔能夠帶來穩定和發展的幹部。不到三個月，萬里就報告說，在整頓江蘇的新領導班子上取得了重大進展。**6** 月 **2** 日中央發佈 **12** 號文件，它實際上是在 **9** 號文件的基礎上

通報了在徐州、海州和江蘇其他地區取得的進展。鄧小平讚揚這個報告說，江蘇的經驗也可以用於指導其他地方的工作。^[3-53]於是改革又從江蘇推向浙江。儘管浙江的造反派仍在負隅頑抗，問題特別棘手，但是到 7 月 17 日就基本得到了解決。根據浙江的經驗出台的 16 號文件，使這一經驗又成了其他各省開展整頓的樣板。^[3-54]

鄧小平在 7 月 4 日概述了「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整頓任務，即從鐵路和地方政府擴大到其他部門，首先是煤炭和鋼鐵行業，然後是其他行業和其他運輸業，接下來是商業、財貿和農業，最後從經濟部門轉向文教部門、從國防科技轉向整個科技部門，從軍隊轉向地方政府。

中國的基本能源供應是煤炭，房屋取暖、發電廠和工廠都離不開煤。運輸是關鍵：煤炭運輸大約佔到鐵路總運量的 40%。但是在文革期間由於運輸拖後腿，大量煤炭只能被堆積在礦區附近，使煤炭生產失去了動力。

鐵路運輸的難題在 1975 年夏天已開始得到克服，這使北京可以把更多精力轉向煤炭生產。實際上，9 號文件出台後，鄧小平就給煤炭部長徐今強打氣，讓他利用運輸條件改善的前景增加煤炭生產。1975 年春天，徐今強把工作重點放在了鐵路運輸便利的產煤區：陝西、河北、河南、安徽和東北。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徐今強對派性發起打擊，首先針對問題特別嚴重的省份。這些省份的煤礦所供應的煤炭數量佔華東地區的 40%，對這些省份鋼鐵廠的煤炭供應至關重要。整頓工作使它們的生產大為改觀：1975 年第二季度的煤炭生產迅速增加，上半年結束時煤炭運輸量完成了全年計劃的 55.5%。^[3-55]

在這個時期，化肥、輕工產品和電力生產也有所改善，但是鋼鐵生產仍然停滯不前。鋼產量在 1973 年達到 2,530 萬噸的峰值後，由於批林批孔運動的干擾，1974 年降至 2,110 萬噸。1975 年初確定的當年生產指標是 2,600 萬噸。^[3-56]在 3 月 25 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的國務院會議上，萬里報告了如何把徐州經驗運用於其他領域之後，鄧小平說：「現在解決鋼鐵問題是頭等大事。」^[3-57]

在當月召開的鋼鐵工業座談會上，副總理余秋里直言不諱地說：「搞了 26 年，花了五六百億投資，職工 300 萬人，只搞 2,000 萬噸鋼。」他說，為了增加鋼產量，必須做到（1）保證煤炭的長期供應，要專列直達，定點供應，必要的重油和電力供應也要得到保障；（2）發動群眾，要讓懂技術的管理人員擔任負責人；（3）克服薄弱環節，特別是鞍鋼、武鋼、包鋼和太鋼四大鋼鐵廠。不幹工作的要免職，「不要佔著茅坑不拉屎」。^[3-58]

5 月初，李先念副總理把 12 家大型鋼鐵廠和當地政府的黨委書記召集到一起，召開了鋼鐵工業座談會。^[3-59]未完成指標的鋼鐵廠的領導要向一群嚴厲的與會者解釋為何沒有完成指標；他們說，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挨批的幹部害怕犯政治錯誤，他們擔心毛的政策會有反覆，如果不抓政治只抓經濟和生產，他們又會挨批。

5 月 21 日，鄧小平結束為期一周的訪法之行回國三天後，主持召開了由國務院牽頭的全國鋼鐵工作座談會。^[3-60]鄧小平不能公開談論讓很多幹部擔心的事——毛澤東有可能變卦，在「四人幫」的慫恿下再次打擊那些注重抓經濟的人。張春橋和姚文元就曾在 1975 年 3 月和 4 月分別發表文章，公開批判「經驗主義」，這是指只重視經濟生產，忽視意識形態的做法。鄧小平當時心中明白卻不宜公開說明的是，毛澤東曾在 4 月 18 日讓他放心，並就姚文元 4 月 23 日的文章寫下批示，進一步表明他現在反對批判經驗主義，支持鄧小平的整頓工作。

鄧小平在 5 月份的這次國務院座談會上說：「鐵路一通，就會暴露出冶金、電力、各行各業的問題。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樣工作，解決老大難。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決鋼的問題。」^[3-61]谷牧開始向與會者介紹鋼鐵問題的嚴重性，但鄧小平插話說：「這樣講還不夠。應該說，這樣繼續下去，對鋼鐵工業是破壞！」他又說：「谷牧說每年增加 250 萬噸鋼沒問題，我說每年增加 300 萬噸也不難。……不管是哪一級的領導，不能總是怕這怕那。現在，幹部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怕字當頭，不敢摸老虎屁股。我們一定支持你們。」^[3-62]

鄧小平說，有四五十年資歷的人也沒什麼大不了，「如果鬧派性，管你是老虎屁股，還是獅子屁股，都要摸……如果鬧派性嚴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堅決調開。一年調他三百六十次。7 月 1 號以後就不客氣了。……必要的話就把你調到烏魯木齊，妻子一鬧離婚，他就聽話了。」^[3-63]他說，「更重要的是，要嚴格，該批的批，該鬥的鬥，不能慢吞吞的，總是等待。鐵道部已採取了堅決的措施，但在這裏我看到很多人不喜歡。」他接著又說：「允許你們犯錯誤。要找那些敢於堅持黨的原則、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於負責、敢於鬥爭的人進領導班子。……我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一抓一大把。」他說，像鞍鋼這樣的大企業，那麼複雜，雜事很多，但是高層管理人員不能每天只抓技術性的小事。「公司必須單獨有一個班子，不是管油、鹽、醬、醋、柴，而是指揮生產的。」^[3-64]

在 5 月 29 日召開的關於鋼鐵工業的會議上，鄧小平強調企業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核心。他把重點放在鋼產量佔全國一半的八大鋼鐵廠上，並批評四家最大的鋼廠——鞍鋼、武鋼、太鋼和包鋼——都沒有完成指標。他說，鞍鋼的問題最大，關鍵是領導「軟、懶、散」。^[3-65]

1975 年 6 月 4 日，經毛澤東同意和政治局批准，向地方的鋼鐵主管部門下發了 13 號文件，內容與整頓鐵路的 9 號文件相似。文件重申了 1975 年 2,600 萬噸的目標產量。國家計委從各部委抽調人員成立了一個小組直接向國務院彙報，保證鋼鐵生產指標的完成。為了給鋼鐵廠所需物資提供保障，電力、煤炭、交通、石油等各有關部委都向這個小組派出了人員。要求各省市黨委履行對鋼鐵廠的領導責任，確保它們完成指標。^[3-66]

各大鋼鐵廠都召開了貫徹 13 號文件的職工大會，有些大會的參加者多達四萬人。^[3-67]直屬國務院的最高領導小組也每週開會，討論各項計劃，確保指標的完成。^[3-68]不過領導小組在 8 月 1 日開會評估鋼鐵生產時，與會者承認，要完成之前定的高額指標頗有難度。其中一個阻力是余秋里的突然病倒——春天他還在大膽領導著推動鋼鐵行業的工作，可是夏天生病以後，他無法再提供一貫的堅強領導後盾了。幹部們仍然擔心如果只抓生產，忽視極左政治，他們以後有可能遇上麻煩。確實，「四人幫」當時已經開始批評鄧小平正在犯這種錯誤了。

中國在 1975 年生產了 2,390 萬噸鋼，與 1974 年的 2,112 萬噸相比顯著增加，但並未達到 2,600 萬噸的目標。鄧小平接受了這一進步幅度，宣佈工作取得勝利。從 12 月 15 日到 23 日（此時鄧小平已在上層受到小範圍的批判），谷牧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與負責鋼鐵生產的省級幹部討論各種問題。雖然會上仍在唱高調，但高層幹部們已經知道，在 12 月新的政治氣氛中，鄧小平受到圍攻，地方幹部對繼續致力於抓增產已變得心有餘悸。果然，鄧小平在 1976 年第三次下台並被撤銷一切職務後，當年的鋼鐵產量下降到 2,046 萬噸。

1975 年中國鋼鐵生產的改善與當時日本的鋼產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鄧小平在三年後參觀一家現代化的日本鋼鐵廠時就會明白這一點，僅這一家工廠的鋼鐵產量就是 1975 年中國鋼鐵增產後總產量的數倍。鄧小平在 1975 年的努力，是他通過政治動員增加鋼鐵產量的最後一次嘗試。他在 1978 年 10 月參觀了日本的大型現代鋼鐵廠以後，在提高鋼產量的問題上採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頓，而是轉而依靠科技。這一戰略轉變帶來了巨大收穫。1980 年代中國從日本引進現代鋼鐵技術後，鋼鐵產量從 1982 年的 3,716 萬噸猛增到 1989 年的 6,159 萬噸，1996 年又進一步增加到 1.12 億噸，使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鋼鐵生產國。^[3-69]到 2010 年，擁有現代技術的鋼鐵廠在中國遍地開花，不用進行政治動員，中國就能達到 6 億噸的鋼鐵年產量，幾乎相當於 1975 年鋼鐵產量的 25 倍。

浙江問題和王洪文的失勢

1975 年毛澤東支持鄧小平選拔新的領導班子，讓過去鬥來鬥去的人能夠在一起工作。當時，分裂最為嚴重、最須下大力氣恢復團結的省份是浙江省。^[3-70]1974 年，隨著秩序得到部分恢復，除了江蘇和浙江以外，各省的經濟都有增長。浙江是一個人口多、比較發達的沿海省份，有很好的工業基礎。但是它的問題在 1975 年一季度仍很嚴重，工業生產比 1974 年一季度下降 20%，全省財政收入下降 28.5%。由於鄧小平和萬里等人的努力，1975 年全國前八個月的工業生產比上年平均增長 17%，浙江卻下降了 6%。^[3-71]

毛澤東 1975 年 2 月 8 日從長沙來到浙江杭州美麗的西湖，在回京接待北韓領導人金日成之前，在那裏一直住到 4 月中旬，對浙江產生了特殊的興趣。他在杭州時有很多機會與省裏的幹部談話，特別是黨的老幹部譚啟龍和軍隊老幹部鐵瑛，他們都在文革中受到過衝擊。毛澤東這時有恢復秩序的想法，因此覺得他們都是很能幹的人。相反，他在杭州時對翁森鶴印象不佳，翁過去是造反派頭頭，從 1973 年到 1974 年一直有王洪文為他撐腰。1974 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浙江的問題變得日趨嚴重，因為王洪文支持造反派，而譚啟龍又控制不了他們。毛澤東和王洪文之間在 1974 年也開始出現不和，1974 年 10 月 18 日王洪文飛到長沙時，毛已經對他過分緊跟江青感到不快。

1975 年春，毛澤東對王洪文的懷疑進一步增加。浙江問題的嚴重性引起了北京的注意，於是派王洪文分別在 1974 年 11 月和 1975 年 3 月與浙江領導人協商解決問題，但他一無所獲。從 4 月 27 日到 6 月 3 日的幾次政治局會議上，王洪文和江青一起受到批評，部分原因就是未能解決浙江的問題。王洪文為此作了檢討。^[3-72]

1976 年 10 月王洪文作為「四人幫」成員之一被捕後，有人說他是個無能的激進派，既魯莽又下流，沉溺於錦衣玉食的奢華生活。實際上，王洪文曾作過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擔起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職責；有些瞭解他的人覺得，他

並沒有參與「四人幫」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裏有眾多有經驗的優秀幹部，像王洪文這樣一個年輕的新貴，突然之間竄升到更有經驗、更能幹的幹部之上，很難贏得一個高層領導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1975 年 6 月下旬宣佈，王洪文暫時不再主持北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被先後派往上海和浙江。毛澤東支持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建議，讓王洪文作為紀登奎副總理領導的工作組的一員，去解決浙江的問題。實際上，王洪文是被派去接受教育和改造，他和紀登奎一起批評那些他過去支持過的造反派，這使他的處境頗為尷尬。但是他的到來也有助於解決浙江的問題，因為這能使他過去支持的造反派看到，即使地位顯赫的激進派王洪文也幫不了他們。^[3-73]

紀登奎在浙江的工作跟萬里在徐州的工作相似。他和工作組會見當地幹部，瞭解問題，召開群眾大會，選出以譚啟龍和鐵瑛為首的新領導班子，用正式文件支持他們的工作。雖然鄧小平是這項工作的主角，但是與徐州的問題相比，當時仍在浙江、與現有負責同志談過話的毛澤東對浙江問題的解決發揮著更積極的作用。祖籍浙江、對那裏很有感情的周恩來也提供了意見。

紀登奎在浙江的最後幾天，和其他幹部一起起草了 16 號文件，它對浙江的作用類似於 9 號文件對鐵路系統、13 號文件對鋼鐵工業的作用。1975 年 7 月 14 日，紀登奎、王洪文、譚啟龍和鐵瑛帶著文件草稿飛到北京，鄧小平第二天主持召開會議討論文件草稿，並作出了有關浙江省和杭州市領導班子的決定。鐵瑛坐在鄧小平的左邊，使右耳聽力嚴重下降的鄧小平能夠聽清他在會議上的發言。^[3-74]文件於次日送交毛澤東，毛批准了這個文件和人事決定，次日就下發了 16 號文件。

浙江的整頓工作因為毛澤東和中央領導的堅決支持，達到了在這個最混亂的省份恢復秩序、增強團結的目的。譚啟龍在講話中為自己過去一年的領導不力道了歉；並宣佈得益於北京最高層的大力支持，已牢牢控制住了造反派。浙江的幹部在 1975 年底宣佈，1975 年下半年的工業產量比上半年提高了 4%。^[3-75]

毛澤東並不想突然宣佈解除王洪文的正式職務，以免搞得黨內人心惶惶。王洪文去浙江後又保留了半年已有的頭銜，直到那時，社會上對他的失寵仍然一無所知，但是毛澤東再也沒有讓王洪文回到北京的領導崗位上。

重用鄧小平

毛澤東打算進一步重用鄧小平的第一個明確跡象出現在 1975 年 4 月 18 日，這一天他讓鄧小平陪同他一起會見金日成。他對金日成說：「我不談政治，由他來跟你談了。此人叫鄧小平。他會打仗，還會反修正主義。紅衛兵整過他，現在無事了。那個時候打倒了好幾年，現在又起來了，我們要他。」^[3-76]

在金日成訪華期間，毛澤東與鄧小平單獨做過簡短的談話。鄧小平提到了他對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大批經驗主義的擔心。鄧在恢復秩序和經濟發展上取得的成功，使他們害怕鄧對毛的影響力增加，於是開始批他只抓經濟不管基本原則——這種論調曾經很合毛的口味。然而 1975 年 4 月毛澤東安慰鄧小平說，這些批評太過分了。他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3-77]在知情者看來，毛的這些話意思很清楚：「有些人」是指「四人幫」，他們管得太寬了，現在更應該受到批評的是他們。

確實，政治局不久後便開會討論毛澤東在 4 月 25 日對「四人幫」寫文章批經驗主義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元帥批評江青和「四人幫」其他成員攻擊經驗主義。江青不得不作出檢討。想幫著江青阻止鄧小平擴大權力的王洪文在會後立刻寫信給毛澤東告狀說，周恩來對形勢一貫抱有悲觀情緒，現在有人替他說出來了。^[3-78]讀到這封信的人都清楚，所謂「有人」指的就是鄧小平。但此時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任沒有發生動搖。

5 月 3 日深夜，毛澤東在自己的住處召集政治局開會。毛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說明他有不同尋常的大事要商量，因為很久以來他都是讓別人主持這種高層會議。周恩來艱難地離開醫院的病床去參加會議，這是前一年 12 月以來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雖然此後周恩來又活了八個月，但這是兩位領導人的最後一次會面。以毛的身體狀況而論，他是能夠去醫院看望周恩來的，但他並沒有去過。

在 5 月 3 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人只批經驗主義，不批教條主義。毛從未與江青斷絕關係，但在這次會議上對她很嚴厲。他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又說：「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

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然後他指著鄧小平說：「你就是毛派的代表。」這也是毛澤東最後一次出席政治局會議。^[3-79]

在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和葉帥等人也附和毛的意見，進一步批評了「四人幫」。他們說，毛主席 5 月 3 日的指示很重要，教導他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們還批評江青誇大與周恩來的分歧，借批林批孔打擊葉帥。

在 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鄧小平第一次取代王洪文主持了政治局會議。江青和王洪文在 6 月 3 日的會上被迫作了檢查。^[3-80]幾天後，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接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時，把會議情況向毛做了彙報，毛對鄧在會議上的做法表示認可，因為他沒有對江青過於嚴厲。鄧小平向毛澤東證明了他能按毛的意願做事，會繼續和江青一起工作。

毛澤東從未完全放棄王洪文，王洪文後來還協助華國鋒籌備了毛澤東的追悼會，但是，自從去了浙江之後，王洪文在黨內的協商中事實上已經不起作用。王洪文被派往浙江時向毛澤東提議，請葉帥或鄧小平代他主持黨的會議。體力衰退的葉帥在 7 月 1 日寫信給毛澤東說，自己年紀太大了，還是讓鄧小平領導黨的日常工作吧，毛澤東立刻表示同意。葉帥在 7 月 2 日起草了一個正式文件，宣佈鄧小平除了作為事實上的總理領導政府工作、作為軍委副主席領導軍隊以外，還要主持黨的日常工作。最重要的是，大約就在這時，毛澤東還交給了鄧小平一項外交領域的新任務：鄧小平將成為第一位對西方國家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共官員。

與西方關係的突破：中法關係

鄧小平於 1975 年 5 月 12 日至 17 日對法國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出訪一個西方國家，這使他有機會著手為中國向西方學習作準備——就像 1950 年代學習蘇聯一樣。^[3-81]毛澤東選派鄧小平進行這次重要的出訪，使「四人幫」起了疑心，他們正確地看出這是鄧小平權力增加的又一個跡象。這次出訪對於作為領導人的鄧小平確實有重大影響。與他一年之前路過法國時不同，這次訪問提供了一次機會，使他能夠更具體地瞭解這個他在半個世紀以前所熟悉的國家發生了多大變化，思考中國為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做些什麼。

為何是法國呢？毛澤東在一年前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他把歐洲的發達國家看作第二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它們是中國應該與之聯合共同對抗蘇美兩大霸權的國家。在第二世界的所有國家中，法國又是最先主動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國家。它在 1962 年就與中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而當時沒有幾個西方國家願意這樣做。法國總統龐比杜（Georges Pompidou）在 1973 年 9 月正式訪問北京，並受到良好接待，成為第一個訪華的歐洲領導人。因此，當 1975 年法國向中國發出國事訪問的正式邀請時，中國很願意把這個機會作為對龐比杜訪華的回訪，並表明自己正在從文革的自我封閉中走出來。

在 1975 年訪法期間，鄧小平受到吉斯卡爾·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總統和希拉克（Jacques Chirac）總理的接待。希拉克後來回憶說，鄧小平直率而熱情，十分瞭解國際關係。^[3-82]在訪法期間，鄧小平表現了他個人對法國生活的讚賞，遊覽了里昂和巴黎等半個世紀以前他去過的一些地方。

鄧小平要向法國傳遞的主要外交政策信息是，請求西方繼續給予支持，共同對抗最具侵略性的超級大國蘇聯。他對同蘇聯搞緩和的價值表示懷疑，贊成西歐各國團結一致堅定對抗蘇聯。但是對於鄧小平來說，學習現代化的經驗至少和磋商外交政策問題同樣重要。他參觀了一些農業和工業場所，就如何擴大中法貿易舉行會談。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訪問一個現代西方國家，在這裏他看到了五十年前他離開之後法國發生的驚人變化，對中國已經變得多麼落後感到震驚。這些見聞體驗和成功的國事訪問帶來的連鎖反應有著深遠的影響。三年以後，谷牧率領的中國經濟官員將延續鄧小平的訪問，在喚醒中共領導人對國外經濟和外交機會的意識，為中國進一步向西方開放提供支持力量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3-1]參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 1975》（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25；張化：《鄧小平與 1975 年的中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3-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Carle Place, N. Y.: 明鏡出版社，2003）。

[3-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Carle Place, N. Y.: 明鏡出版社，2003）。

[3-4]對能看到毛澤東和江青之間通信的黨史專家的採訪。

[3-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78。

[3-6]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75 年 1 月 13 日。見 Documents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our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5)。

[3-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4–45；2002 年 4 月作者對唐聞生的訪談。

[3-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5 年 2 月 1 日，頁 14–16。

[3-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29 日，頁 50–51；另參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5–47。

[3-10]張化：《鄧小平與 1975 年的中國》，頁 70–74。

[3-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 月 25 日，頁 10–11；SWDXP-2, pp. 11–13。

[3-12] Jonathan D. Pollack, "Rebuilding China's Great Wall: Chinese Security in the 1980s," in Paul H. B.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3), pp. 3–20; Paul H. B. Godwin, "Mao Zedong Revised: Deterrence and Defense in the 1980s," in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pp. 21–40; June Teufel Dreyer, "Deng Xiaoping: The Soldi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5 (September 1993): 536–550.

[3-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 月 25 日，頁 10–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 3 卷，頁 4–6，1975 年 1 月 19 日。

[3-1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24–425。另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 月 12 日，頁 4–5。

[3-15]《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1–3。

[3-16]鄧小平：〈當前軍事工作的幾個問題〉，此文是 1975 年 1 月 14 日鄧小平聽取總參謀部工作人員的彙報後的批覆要點，見同上，頁 1–3；鄧小平：〈國防工業和軍隊裝備工作的幾點意見〉，此文是 1975 年 5 月 4 日對軍委常委會彙報的批覆，見同上，頁 20–25；鄧小平：〈要建立嚴格的科學管理和科研生產制度〉，此文是 1975 年 5 月 19 日聽取科學技術委員會和七機部（主管導彈研發和製造）的彙報後對軍委常委會的講話，《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26–27。

[3-17]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 308. 關於此次會談的背景和談話備忘錄，見 pp. 265–321.

[3-1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98。

[3-19]例如在總參謀部的一次座談會上，鄧小平明確宣佈，軍隊不必急著備戰。見《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9。

[3-20]例如在總參謀部的一次座談會上，鄧小平明確宣佈，軍隊不必急著備戰。見《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9–13。

[3-2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04–40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 月 19 日、25 日，頁 8–9、10–11；《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6–8；SWDXP-2, pp. 27–28。

[3-22]《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1–3。

[3-2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07–408。

[3-2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15–417。

[3-2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16。

[3-26]《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1975 年 5 月 19 日，頁 26–27。

- [3-2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08、412–415。
- [3-2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94。
- [3-2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07–10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19 日，頁 46–47。
- [3-30]2006 年對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張星星的採訪。
- [3-31]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334.
- [3-3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5–56。
- [3-33]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p. 333–334; Salisbury 1987 年 10 月 7 日對萬里的採訪。
- [3-34]王立新：《要吃米找萬里：安徽農村改革實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 22。
- [3-3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59。
- [3-3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4–56。
- [3-3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61。
- [3-38]中國各省省委書記（省一級黨的最高職務）的稱謂經常變動，各省也不盡相同。一般說來，1982 年之前各省都有數名省委書記，其中一名稱為「第一書記」。有時其他書記也有排序，有時則都稱為「副書記」，有時又稱為「書記處書記」。每一名書記分管一個「系統」，如政法、工業運輸、商業或文化教育。頭銜的變化往往並不反映工作責任的變化。即使中國的作者也不總是採用準確的稱謂。1982 年中共十二大重新強調集體領導以後，大多數省份都逐漸放棄了「第一書記」的稱謂，1985 年後不再使用，但仍有一名書記全面負責。我在本書中提到指職位最高的書記時，都用「第一書記」，不考慮時間因素，其他書記簡稱省委書記。
- [3-3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62。
- [3-40]SWDXP-2, pp. 14–17. 鄒讜在評論《鄧小平文選》時說，與原始文稿相比變動很小。見 Tang Tsou, "Review: The Historic Change in Direction and Continuity with the Pa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8 (April 1984): 320–347.
- [3-4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8、67–68。
- [3-4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64、68。
- [3-43]DXPCR, pp. 298–299.
- [3-4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68–69。
- [3-4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69–70。
- [3-4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70。
- [3-47]DXPCR, p. 299.
- [3-4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70–71。
- [3-4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71、77。
- [3-5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3 月 22 日，頁 28–29；《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73–74。
- [3-5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4 月 18 日–26 日，頁 36–37。
- [3-5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81–84。
- [3-5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29–445、465。
- [3-5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56。
- [3-5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76、82、126。
- [3-5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13–114。
- [3-5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25。

- [3-5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18–120。
- [3-5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26–133。
- [3-6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42–153。
- [3-6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25。
- [3-6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47–149。
- [3-6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50–152。
- [3-6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21 日，頁 47–48。
- [3-6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29 日，頁 50–51。
- [3-6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63–166。
- [3-6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66。
- [3-6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69。
- [3-6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69–170。
- [3-7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43–465；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245–251, 274–282;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2007 年 10 月對紀登奎之子紀虎民的採訪。
- [3-7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45。
- [3-7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45–446。
- [3-7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46。
- [3-74]據程中原的採訪，見《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54。
- [3-75]據程中原的採訪，見《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65。
- [3-7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4 月 18–26 日，頁 36–37。
- [3-7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4 月 18 日，頁 35。
- [3-7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4 月 27 日。頁 38–39。
- [3-7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3 日，頁 40–41。
- [3-8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27 日、6 月 3 日，頁 49–50。
- [3-8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12 日–18 日，頁 42–46；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1975 年 5 月 12–18 日。
- [3-82]《中國日報》對希拉克的採訪，2004 年 8 月 23 日。

第 4 章

在毛澤東手下規劃未來：1975

毛澤東在 1975 年指定鄧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黨的會議時，中共仍然處在文革的爭鬥所造成的混亂之中。鄧小平在黨內的新職務使他得以採取一些重要措施整頓全國的黨組織。在北京之外的第一步整頓工作是在省級層面進行的，三個月之後進一步推向縣和公社兩級。^[4-1]7 月 2 日葉帥寫信宣佈了由鄧小平主持黨內工作，兩天之後鄧小平便在很多省委領導參加的中央「讀書班」上做了講話，會議的重點是團結和整黨。

鄧小平知道毛對他盯得很緊，因此他在會上大講毛主席的教導，至少是「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這是他為了配合自己當時的工作目標，從毛的教導中挑選出來、組合在一起的。鄧小平的目的有二，首先是讓毛澤東放心他會反修防修，其次是強調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為了加強黨的團結，鄧小平採用了毛在 1945 年抗戰結束時召開的中共七大上的做法。在那個鄧小平第一次參加的黨代會上，毛澤東強調必須把抗戰期間佔領山頭跟日本人打游擊的各個單位統一起來。鄧小平結合前一段時期的情況說，各自為戰的打游擊時期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山頭」思想，同樣，在文革期間自然也出現了派性。他總結道，現在我們黨要響應毛主席在七大上發出的團結號召，再次克服派性。^[4-2]不管什麼人，只要「沒有犯過罪」，願意配合整頓、放棄派性，都要給予善待，包括過去的激進派。

鄧小平小心地避免觸動毛的敏感神經，同時大膽地、策略性地選拔善於治國而不是鬧革命的人。他沒有公然表示要清除黨內的左派或激進派，但他的確更強調對「宗派主義」（即拉幫結夥的左派）而不是搞「修正主義」（即右派）的人的批評。他說，要把領導權交給有十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幹部。雖然他沒有明確反對任命從紅衛兵中提拔上來的人，但這樣一來他就排除了 1965 年以後即文革期間發跡的人，當時這些人中間有部分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鄧小平還要求對那些未經適當資格審查就入黨的人重新進行審查。雖然未作具體說明，但他針對的也是 1966 年到 1975 年組織程序混亂時期新增的 1,600 萬黨員，而不是文革之前入黨的 1,800 萬黨員。^[4-3]因「不合格」而被清除出黨的基本上都是堅持派性不改的人。毛澤東沒有阻止鄧小平的做法，這意味著他承認當時國家需要更加穩定的領導班子。

整黨的一項中心任務是讓文革期間由林彪派往地方的軍隊幹部退出對地方政府的領導。鄧小平在 1975 年 8 月 8 日作出指示，除了少數例外，軍隊要退出所有地方職務。軍隊的很多人當時是「革命委員會」的成員，而革委會在一些地方已經成為正規的政府機構。1975 年底很多軍人又回到了軍營。

1975 年 5 月 5 日，毛澤東主持了他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後不久，鄧小平又去醫院看望了周恩來。鄧小平知道自己正觸及毛澤東十分關心的問題，他也知道，周恩來在跟情緒多變的毛澤東打交道方面要比他更有經驗。周恩來告誡鄧小平說，要謹慎行事，只抓具體問題，一步一步來，不要進行全面整頓。鄧小平雖然敬重周恩來，也知道毛澤東有可能不再給自己撐腰，但是他比周恩來更有魄力，他下決心進行全面整頓，攻克那些他認為搞四個現代化必須加以解決的老大難問題。^[4-4]

鄧小平當時還沒有談到改革，但是在構建後來能夠實施改革的中共體制的同時，他也開始思考未來改革的內容。為此他需要擴大自己的理論隊伍——能夠幫他思考一些大問題的官僚體制之外的作家、理論家和戰略家。毛澤東讓鄧小平接過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權後不久，他徵得毛澤東同意把自己的一批理論人馬擴大為政治研究室這樣一個正式機構。該機構設在國務院下面，其實是由鄧小平親自領導，由過去就是這個智囊團首領的胡喬木繼續負責它的日常工作。

政治研究室

在正式擔任了第一副總理後的第二天，1975 年 1 月 6 日，鄧小平把胡喬木叫來，提議由他和吳冷西、胡繩、李鑫等人成立一個研究理論問題的寫作小組。^[4-5]鄧小平和胡喬木都深知毛澤東對理論問題的敏感，因此挑選的都是受到毛器重的人，研究的題目也很合毛的心意，如「三個世界」理論、蘇聯的性質、資本主義危機、批判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等等。鄧小平從一開始就用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尋找那些毛澤東可以接受的理論觀點，以便自己能有更大的自由去實施他

認為有利於黨和國家的政策。1 月組成的小理論班子在 7 月擴充為政治研究室後，鄧小平開始研究一些他個人認為重要（毛澤東也不會反對）的問題，尤其是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

政研室比美國白宮的班子小得多，但除了不負責執行以外，它們的目的是相似的。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核心內閣，是直接向鄧小平負責的一批獨立的顧問，可以幫他規劃總體戰略，起草政府公告。鄧小平對它的控制權大於對黨的官僚機構的控制權，因為後者過於龐大、多樣，無法成為他本人的工具。

除了非正式的交流之外，政研室的成員每兩周開一次例會。他們將工作分成三大塊：理論（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國內問題和國際關係。最初這個機構只有六名老資格的成員（胡喬木、吳冷西、李鑫、熊復、胡繩和于光遠），很快又增加了第七名成員（鄧力群，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即使在鼎盛時期，把助手都算在內，政研室也只有 41 名成員。有些成員也曾經是鄧小平「釣魚台寫作班子」的成員，1962 年至 1963 年九評蘇共的著名公開信就是他們起草的。政研室的所有成員都是黨內公認的老資格知識分子、有創見的戰略家和寫文章的高手。吳冷西、李鑫、熊復、胡繩和胡喬木具有在毛澤東手下領導宣傳工作的豐富經歷，而胡喬木像鄧力群和于光遠一樣同時還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廣博的知識儲備。

在準備重要講話和文件時，鄧小平與政研室的人員密切合作。他提供政治指導，說明他們撰寫的草稿中應當包含的思想，但依靠他們的專長來確保講話稿和文件符合歷史紀錄，與毛主席過去的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保持一致。對於重要的講話和文件，鄧小平會親自看草稿，然後和作者一起修改加工。對於特別重大的問題，文件在下發之前要交毛澤東批示，得到毛的批示後鄧小平還會親自審閱，看看毛的觀點是否被準確寫進了稿子。^[4-6]雖然鄧小平與毛澤東有不同尋常的關係，但他和其他人一樣，也擔心善變的毛澤東會像在文革高潮時那樣，認為某份文件不可接受而大發雷霆。

雖然鄧小平掌握著全面負責黨內事務的權力，但毛澤東仍讓「四人幫」保留對宣傳工作的控制權，以防鄧小平偏離他的旨意。事實上，江青也有自己專門的寫作班子，他們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市委開會，總在伺機對鄧小平的政研室出台的文件進行批判。

江青的宣傳工作難免與鄧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發生重疊。對於鄧小平來說，文化領域的整頓需要改變大方向，這就需要重新贏得因文革而疏遠的知識分子的人心，把他們安置在能為中國的現代化作貢獻的位子上。因此，1975 年政研室在加強科研機構、特別是中國科學院的發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4-7]

江青和鄧小平爭奪最激烈的領域之一，是《毛澤東選集》最後一卷，即第五卷的編輯工作，它成了一個關於如何定義毛澤東思想的戰場。鄧小平把李鑫調到政研室，就是因為他作為康生過去的秘書，控制著毛澤東的很多文稿；李鑫來政研室工作，強化了《毛選》第五卷的編輯應由鄧小平主管的理由。然而，儘管胡喬木、李鑫、吳冷西以及政研室的其他一些人在為《毛選》第五卷準備材料，但他們在一個單獨的辦公室工作，受到另外一個組織的保護。

打算收進《毛選》第五卷的一份文件〈論十大關係〉成了爭執的焦點。這是完成企業集體化和國有化之後毛澤東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的一次講話，講話中的一些觀點鄧小平可以用來為自己在 1975 年推動的工作計劃提供依據。毛澤東說，中國在和平時期應當減少軍費和國防開支，把資源用於支持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國的領導人應當學習各國的長處。鄧小平請求毛澤東批准重新發表這篇講話。毛澤東看過打算重印的稿子後，建議作一些修改。鄧小平將修訂稿再次送呈毛澤東，並在附信中建議，鑒於這篇講話對當前國內和外交工作的意義，宜在《毛選》第五卷出版之前盡快發表。^[4-8]毛澤東再次退回稿子並作出批示說，應當把它送政治局討論。當然，「四人幫」反對重印這篇講話，毛澤東也從未同意將它公之於世。直到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後不久，這篇講話才在 1976 年 12 月 26 日重新發表。^[4-9]

鄧小平失去毛的支持後，政研室也於 1975 年 12 月停止工作。在它存在的不到 5 個月的時間裏，只開過 13 次全體工作人員會議。^[4-10]但是在這個短暫的時期內，它協助鄧小平為在 20 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進行的改革提前規劃了長期路線圖。它在恢復高等教育的準備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拓寬了文化活動的空間，促進了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科學研究。1976 年，它因為對以下三株「大毒草」的炮製發揮了作用而受到批判：（1）〈工業二十條〉；（2）〈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3）〈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政研室在制定前兩份文件上起著主要作用，第三份文件則由它和鄧力群全部承擔。

〈工業二十條〉

鄧小平承擔起新的職責後，召集所有主要經濟部門的幹部開了一個會。從 6 月 16 日到 8 月 1 日，他們出席了討論經濟工作長期目標的國務院計劃工作務虛會。^[4-11]會議籌辦方國家計委制定的討論議程，迴避了在對五年計劃的討論過程中難免會產生的爭議，比如詳細規定資源來源、分配給各部門和各個項目的資源規模等。在務虛會之前，十年經濟規劃、五年計劃（1976 年–1980 年）和 1976 年年度計劃的制訂工作已經在進行，但是有關這些計劃的最後決定要取決於這次務虛會確定的長遠目標。

這次國務院務虛會把工業作為討論的重心。在大躍進之後的恢復過程中，鄧小平曾在 1961 年牽頭起草了為工業系統的結構和目標提供整體框架的〈工業七十條〉。這次務虛會討論的也是類似的問題，前後各稿的條目數量不同，1975 年的最後一稿共包含 20 條。

由於統計系統和情況彙報在 1975 年仍處於混亂狀態，不同領域的與會者首先交流了有關經濟形勢的信息。務虛會的前兩周舉行的是全體會議，由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聽取各主要經濟部門的彙報。各部門的與會者從這些彙報中能夠瞭解到自身部門必須如何設置目標才能跟其他部門的能力和需要相配合。從 7 月 2 日開始，谷牧將務虛會分成八個工作組，分別研究理論、組織和幾個要害部門的工作。月底又恢復了全體會議，將與會者的全部結論匯總為〈工業二十條〉。

在 1975 年，幹部們對「四小龍」（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起飛已有所耳聞，它們實行的都是資本主義制度，取得了比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但在當時公開讚揚資本主義仍屬禁忌，因為這將使中國多年來付出的犧牲的價值乃至中共是否應該繼續執政受到質疑。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仍然是為高層決策提供正當性的信條。

但是，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的破壞之後，領導層想憑主觀意志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熱情基本上已經消失。大多數與會者認為，中國要想實現經濟增長，需要回到大躍進前的 1950 年代和大躍進後的 1960 年代初的恢復時期所採取的那種穩妥的計劃。與會者相信，由於人口龐大、土地短缺和資源限制，中國應當依靠計劃體制。人口少的國家也許能夠承受揮霍性消費帶來的益處，而不必在乎自由市場造成的浪費。黨的領導層認為中國則必須區分輕重緩急，控制對利潤的追求和浪費性的消費。此外，即使這種穩健的計劃也有可能受到毛的反對，因此與會者要以毛的名義為它正名。參加務虛會的通知上寫的會議目的是討論「毛主席關於加快現代化步伐的理論」。務虛會之後產生的十年經濟規劃也被貼上「毛主席的現代化計劃」的標籤。^[4-12]

鄧小平先於其他領導人意識到中國需要放寬眼界。他出訪過紐約和法國，經常會見外國官員，這使他對外國發生了哪些變化以及中國已經大大落後的狀況有著遠比其他幹部更清醒的認識。為了急起直追，中國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變。

毛澤東去世幾年後，鄧小平可以大膽地解釋說，中國應當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觀念，這不會威脅到中國的主權或共產黨的統治。但是他在文革中曾被批判搞資本主義，況且 1975 年時人們對開放市場和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尚未形成共識，所以他只能盡量打擦邊球。他推動擴大外國技術的進口；他表示同意另一些幹部認為不應向外國舉債的觀點，但國家可以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把外國的商品和資本引進中國。^[4-13]此外，他贊成對工人進行物質獎勵，通過「按勞」而不是「按需」的方式進行分配。但是，對舊體制的這些溫和的改變仍讓一些保守的幹部害怕，他們繼續強烈地主張要嚴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導。

鄧小平並沒有出席務虛會，但他看了總結報告，在 8 月 18 日〈工業二十條〉第一稿完成後，他對其中討論的主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認在發展工業之前必須增加農業生產，他認為工業要向公社提供農業機械，幫助提高農業產量。當時中國的工業尚不具備出口產品的能力。為了按計劃增加技術進口、改進中國的生產能力，他準備出售石油、煤炭和手工藝品。最初應當先引進一些採礦設備，這樣可以使中國增加石油和煤炭生產。從整體上說，鄧小平強調發展科技、改進企業管理和提高產品質量的重要性。他要求制定新的規章制度、更好地落實措施和組織紀律。他還支持向從事艱苦和危險行業的勞動者支付額外報酬。^[4-14]起草者於是進行了修改，把鄧小平的意見吸收到文件之中。

9 月 5 日，20 家大型國企的代表被請到會上，讓他們對〈工業二十條〉提意見。^[4-15]10 月 25 日完成了新一輪修訂，這恰好是毛遠新首次向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的同一天。雖然起草人小心地把它稱為「毛主席的計劃」，張春橋還是在 10 月 29 日指責說，「二十條」只引用了文革之前的毛主席語錄。胡喬木趕緊又搞出一稿，把文革期間的毛主席語錄補充在內。他後來自責說，自己未料到這會招致毛的批評，給了他藉口在年底將鄧小平撤職。「四人幫」成員沒有參加對經濟問題的討論，但是當 1976 年初鄧小平的問題成為政治問題時，他們立刻加入了批判，把「二十條」稱為三株「大毒草」之一，說它提倡物質獎勵，忽視發動群眾的重要性。

〈工業二十條〉形成的同時還制定了一個十年規劃，用來為 11 月召開的計劃工作會議作準備。10 月 5 日，鄧小平親自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國務院會議，討論成稿很快的十年規劃綱要草案。他批准了這個草案並在 10 月 27 日將其送交毛澤東。毛同意把它印發給中央和各省負責經濟工作的幹部。^[4-16]

經毛澤東批准，全國計劃會議在 11 月 1 日召開，專門討論第五個五年計劃（1976 年–1980 年）和 1976 年的年度計劃。來自全國各地的幹部對十年規劃提出修改意見，有些意見被納入了修訂稿。同時，對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的討論仍在繼續，12 月底草稿被送交毛主席。^[4-17]

新制定的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是謹慎的計劃派的明顯勝利，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努力克服計劃工作的混亂局面，現在終於如願以償。^[4-18]但是，在這些謹慎的計劃派和制定出更有野心的十年規劃的理論家之間也出現了分歧，這種分歧在 1980 年代將變得更加嚴重。

中國科學院

1975 年 6 月，鄧小平把精力轉向重整中國的科學事業。文革期間，在彙聚了大量高級科學家的中國科學院，每 250 個科學家中就有一人被迫害致死；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每 150 人中有 1 人死於非命。即使在社會上少數仍然維持運轉的研究機構中，科研工作也受到了極大的干擾。^[4-19]在文革前夕的 1965 年，中國科學院有 106 個下屬研究單位，科研人員 24,714 人。^[4-20]到 1975 年時只剩下 13 個研究所、2 個研究室和 2,000 多名人員，其中有 1,800 名幹部或科研人員，200 名後勤人員。在 1975 年，很多下放農村的科學家還沒有回來。鄧小平在 6 月 29 日對胡喬木說，政研室首先要對中國科學院進行整頓，包括選拔新領導、恢復科學著作的出版。因此，對科學界的整頓是從中國科學院開始，隨後擴大到其他研究機構的。

鄧小平親自決定由胡耀邦（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領導中國科學院的實際整頓工作。7 月中旬，華國鋒代表鄧小平和黨中央對胡耀邦說，黨希望中國科學院在四個現代化中發揮重要作用。胡耀邦首先要對中國科學院進行摸底調查，把情況彙報給中央，然後搞一個整頓計劃。^[4-21]中國科學院的整頓完成後，再整頓其他科研機構——隸屬於國防部、分管經濟的各部和地方政府的科研機構。之後要對學校和出版系統進行整頓。

胡耀邦率領一個三人小組，帶著整頓的命令於 7 月 18 日來到中國科學院。他宣佈，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科學院已經結束，工宣隊和軍宣隊都要離開。中科院過去被下放農村的人現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單位重新工作。要讓科研人員獲得必要的研究文獻，包括外文出版物。^[4-22]

幾周之後，胡耀邦召開了有中國科學院人員和各主要部委代表參加的一系列會議，探討中國在未來十年的科學技術需求。這些會議標誌著向制定十年科學規劃邁出的第一步。從 8 月 15 日到 22 日，胡耀邦又和相關的黨委幹部開會，討論中國科學院的重建和主要領導人的選拔。他宣佈，中國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包括科學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4-23]在整個 9 月份，胡耀邦與各研究所的領導開會，討論如何克服他們工作中的具體障礙。在去各研究所之前，他全面研究了有關各所的材料，並與熟悉所內工作情況的人員交談。

胡耀邦能夠設身處地為受過罪的人著想，因為他和他們都是被迫害的倖存者。他十幾歲便加入共產主義運動，不久後險些因某些有問題的社會關係而被判處死刑；文革期間，他在獲准回京重新工作之前也受過迫害。恢復工作的科學家覺得能與他親近，對他產生了信任感：這是一個理解他們苦難的人，因為他也受過苦。此外，經過認真研究，胡耀邦逐漸瞭解了各研究所存在的基本問題，他完全信任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團隊。

他還幫助解決中科院人員的個人生活問題，例如改善他們生活條件、把家屬從農村調到北京。事實上，他指示各所的幹部把全部下放農村勞動和「學習」的人員列出一份名單，繞開繁文縟節把他們調回來。他不怕替他們說話，為他們的事業出頭。每次他在某個研究所講話都會成為一件很轟動的事。他很快就成了中國科學家群體心目中的英雄。

9 月 26 日，胡耀邦向鄧小平彙報了中國科學院在撥亂反正、選拔新領導和恢復工作方面的進展，鄧小平充分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4-24]10 月 4 日胡耀邦被正式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他上任之後為各研究所任命了三套領導班子：一套管黨，一套管業務，一套管後勤。他尊重專家，明確表示業務上的事由他們說了算。^[4-25]該年年底鄧小平受到批判時，胡耀邦正在為各研究所任命新的行政領導，政治氣候一變，任命進程也隨即停了下來。

在制訂中國科學院的整頓計劃和為成立單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制訂計劃的同時，胡耀邦還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著手制訂了一個由中國科學院牽頭的十年科學規劃。由於倉促上馬，胡耀邦主要利用了 1956 年批准的現成的十二年規劃

（1956年–1967年）。新規劃的第一稿於8月11日完成，即胡耀邦召開一系列中科院研究所會議之前。它肯定了建國後前17年（1949年–1966年）取得的進步，在這個時期大約培養了15萬名科技專家，但後來他們都被「四人幫」打成「資產階級」科學家。文件的起草人為表明政治立場，引用了1962年毛澤東說過的中國要繼續搞階級鬥爭的話，但文件的重點是為促進「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提供穩定的工作條件。^[4-26]規劃說明了當前農業、工業和國防急需的技術，也談到了發展尖端技術的戰略，如計算機、鐳射、遙感、仿生學以及在核能、粒子物理和其他領域的基礎科學研究。^[4-27]

鄧小平在審閱文件時擔心毛澤東的反應，他指示胡耀邦和其他起草人把分散引用的毛主席語錄集中在一起，以清楚表明文件遵循了毛的總的觀點。他對撰稿人說，要肯定前17年的成績，同時要少談後來的問題。鄧小平還說，文件的篇幅也要壓縮。

鄧小平讓胡喬木負責修訂工作。胡喬木在8月26日給起草人寫了一份有關鄧小平的意見的說明，然後監督了修訂工作，他希望最後的文件能夠更符合毛的口味。9月2日完成的第四稿不再提前17年取得的科學進步，改為講建國後整個26年以來取得的科學進步，這樣就避免了批評文革。文件宣佈，要在2000年實現「毛主席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趕上甚至超過世界科技水平。文件還說，科學工作者要繼續自我改造，與工農相結合。行動部分具體說明了科學家要在基礎研究方面帶頭開創新的科研領域，這是他們支持四個現代化的使命的一部分。報告最後宣佈，為了實現毛主席的目標，需要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傑出科學專家。文件指出，雖然不能說什麼都是外國的好，但如果適合於中國，就要以開放的心態向外國人學習。^[4-28]

在9月26日討論該報告的國務院會議上，胡耀邦講話時，鄧小平不斷插話。胡耀邦講到追上世界科技水平時，鄧小平強調說，對中國目前的水平還是要謙虛一點，因為我國在科學技術上落後於其他國家太多。鄧小平一再插話，反映了他要振興中國科學的熱情——他一再說，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一步。鄧小平強調，要支持真正優秀的少數科學家，不要在意他們性情怪僻。解決他們的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問題很重要：他們的孩子要送進好的托兒所，還在農村的配偶都應當允許調到北京。鄧小平說，1950年代他在蘇聯時就瞭解到，蘇聯的原子彈的基礎工作就是由三位只有三、四十歲的年輕人完成的。鄧小平批評說，相比之下我們並沒有善待傑出的半導體專家黃昆，如果北京大學不用他，可以讓他來半導體所當所長，給他配黨委書記支持他的工作。

鄧小平接著說，雖然他的法語和俄語說得都不好，但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必須學習外語，以便能夠閱讀國外文獻。他們也要學習科學理論，如果不懂數理化，不管有什麼文憑都沒有能力搞科研。他還替那些在文革中挨批但仍堅持做研究的科學工作者辯護，說他們「比佔著茅房不拉尿的人，比鬧派性、拉後腿的人好得多」。^[4-29]

鄧小平批評說，有些人甚至不敢提「專」字。在他看來，國家應當愛護自己的專家。中國要在工廠引進自動化，要支持能夠從事這項工作的科技人員。他知道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批判仍在持續，因此強調說科技人員也是勞動者。他指示說，十年科學規劃經過修改後要送交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員。^[4-30]

鄧小平很少像在這次科學會議上那樣激動。他不但不時插話，而且大力主張科研必須在四化中起帶頭作用。但是他又認為，為了發揮這種帶頭作用，不必進行全面整頓。^[4-31]科技部門的45,000名幹部不需要像一些人建議的那樣全部調動，只動其中的5,000人就夠了。關鍵是各級領導班子。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熱心做事的人，為什麼還要保留他們的職位？為什麼不能提拔知識水平高的人當研究機構的領導？挑戰是艱巨的，關鍵要依靠四十出頭的科技人員和領導幹部，以及那些年齡更大、在文革前受過教育的人。他說，在中國的教育系統中一些大學只有西方中學的水平，它所面對的危機將阻礙整個現代化工作。^[4-32]

胡喬木在9月28日把鄧小平的講話吸收進了第五稿。報告必不可少地歌頌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也大膽宣佈政治理論不能代替科學。毛澤東第一次看到的就是這個第五稿。恰恰是在這時，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應毛澤東之邀來北京看望他。毛向侄子表示，他對鄧小平及其在清華大學的整頓工作有意見。毛澤東對科學規劃也很惱火。他的怒氣集中在一句話上：「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胡喬木在最後一稿加進去的。毛澤東堅信，他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4-33]

此時，鄧小平發展社會科學的規劃也有了成果。他本人很重視振興自然科學，但他也同意要為哲學和社會科學注入新的活力。儘管這個領域深具政治敏感性，鄧小平仍大膽提出，社會科學十分重要，需要成立一個單獨的社會科學院。1975年8月30日，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胡喬木發佈了成立中國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部的「國務院第142號令」。胡喬木在這個文件中提出成立一個獨立的科學院的計劃，此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鄧小平還宣佈，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要逐漸恢復出版專業刊物，為了給他們的工作打下理論基礎，首先要辦一個面向非專業讀者的綜合性刊物。為了減少

受「四人幫」和毛澤東批評的風險，鄧小平指示說，雜誌採用的稿件一律送政研室審查，以避免一切有可能激怒激進派的言論。胡喬木在創辦刊物的請示信中採取了預防措施，宣佈刊物將遵循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胡喬木在 10 月 4 日完成了有關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的請示報告，鄧小平在次日便把它送交毛澤東。毛在 10 月 6 日批准了文件，包括出版第一期新雜誌《思想戰線》。很快又召開了研究這個雜誌的座談會。但是 10 月 25 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受到批評後，出版雜誌的計劃戛然而止，那些文章從未面世。胡喬木想繼續落實這個計劃，但政研室受到毛的壓力，不得不在 1976 年 1 月 17 日宣佈它不再承擔指導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工作。^[4-34]恢復中國社會科學這項大事業還沒有真正起步就流產了。

文藝界的小「百花齊放」

鄧小平在促進文化領域的任何變化時都要特別小心，因為毛澤東在對文藝工作的控制上特別敏感善變。文革期間，毛澤東讓江青嚴密控制著一切文化活動：除了她的樣板戲之外不允許上演其他任何劇目。所有雜誌也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得以出版。書店裏只賣《毛選》、革命英雄故事、為數不多的教科書和少量初級技術教材，書店門可羅雀。很多知識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改造，在那裏參加勞動，學習毛澤東思想，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們沒有機會讀小說和故事。

但是，易變的毛澤東在 1975 年覺得小說戲劇的創作太少了，他對鄧小平抱怨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錯誤就挨批。百花齊放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4-35]得到毛的允許後，鄧小平立刻印發了毛的指示並在黨內傳達。知道自己不熟悉文藝工作，鄧小平當天——就是 7 月 9 日——便把政研室裏老資格的人召集起來開了個會，讓他們搜集文化、科學和教育領域的出版物，以搞清楚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實毛澤東的「雙百」方針。他們的判斷是文化生活死氣沉沉，這就為有限擴大可以允許的文化活動範圍鋪平了道路。^[4-36]

在向鄧小平抱怨文化缺乏活力的幾天以前，毛澤東讓秘書交給政治局一封信，宣佈要釋放周揚——他在文革以前相當於中國的文化沙皇。毛說：「久關不是辦法。」周揚的妻子於 7 月 12 日得到了丈夫獲釋的消息。很快，受到周揚牽連的很多著名人士也被釋放。幾天以後毛澤東對江青說，他希望看到文藝工作有更大的創作空間，對作家要寬宏大量一些。他表示，作家有思想問題，要本著「治病救人」的態度做工作。^[4-37]

但是，毛澤東仍然讓「四人幫」掌管著中宣部、文化部、解放軍總政治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這些文化機構。實際上，從 1975 年 7 月起，他讓「四人幫」和鄧小平來回拉鋸。「四人幫」對任何批評毛澤東的言論，無論是公開的還是隱晦的，一向十分警惕；鄧小平則在胡喬木的支持下推動了一場小規模的「百花齊放」。他和胡喬木對毛澤東允許放寬活動範圍的任何暗示都不放過，會隨即採取行動，同時小心翼翼地避免出軌，以防引起毛的注意。

因此難怪周揚的獲釋繼續成為雙方衝突的根源。毛澤東在 7 月 27 日宣佈，周揚的問題不是敵我矛盾，沒那麼嚴重。鄧小平在第二天就把毛的話四處傳達。可是「四人幫」仍然想方設法阻止完全恢復周揚的工資和職務。在這場拉鋸戰中，江青還阻撓周揚得到參加國慶慶典的特別邀請。毛澤東後來得知此事，氣憤地表達了不滿。^[4-38]

另外一些小衝突因電影而起。胡喬木碰巧看到一些文件，表明「四人幫」在壓制一部對工人和某些老幹部——特別是令江青討厭的余秋里——進行歌頌的電影。胡喬木於是授意電影劇本的作者給毛澤東寫信，請求批准電影的發行。他還為作者出謀劃策，讓他寫信時不要感情用事，要字字有據，不要偏激，以便讓人覺得這部電影確實應該得到公演。劇本作者接受了胡的建議，他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是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教導來創作這部電影的，電影表現了工人作出的貢獻，工人們為此感到自豪，他們很喜歡這部電影。^[4-39]

擴大文藝自由的一大突破就發生在 7 月 25 日毛澤東看了這部名為《創業》的電影之後。該電影歌頌了開發大慶油田的余秋里和一批工人，他們長久以來一直受到毛的讚揚。胡喬木估計，既如此，毛應該會對該片有好感，於是指示收集有關材料。7 月 25 日，剛做完眼部手術而視力大為改善的毛澤東看了電影，心情不錯。^[4-40]他因口齒不清，便寫了幾行潦草的大字，每頁有五到十二個字，一共寫了六頁。他寫道：「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

第二天鄧小平正在主持政研室開會時接到了毛的信。他中斷開會，把信大聲讀了一遍。毛在信中說，文化部太粗暴，連這樣的好影片也不許放映，還有什麼「百花齊放」？鄧小平很快就把這封信公之於眾，讓文藝界大受鼓舞。自文

革以來，這還是「四人幫」的文藝政策第一次受到公開批評。胡喬木關心的是繼續得到毛的支持，因此告誡劇本作者不要誇耀自己的成功；他還建議作者的妻子給毛澤東寫一封感謝信。^[4-41]

鄧小平不失時機地利用了這一突破。他批准了另一封致毛澤東的信，內容有關根據小說《海島女民兵》改編的電影《海霞》。後來，胡喬木和鄧力群、甚至鄧小平本人都幫助作者和作曲家給毛澤東寫信，讓他同意擴大文藝創作的自由，在一些事上他們也確實取得了成功。

魯迅被公認為 20 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毛澤東十分崇敬魯迅也是眾所周知的，然而江青在 1970 年代卻對出版魯迅的書信之事橫加阻撓。在 1975 年秋天，魯迅之子周海嬰根據胡喬木的建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准許出版父親的著作。胡喬木把信交給鄧小平，由他轉交毛澤東。毛回信說：「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到 1981 年時，包括註釋在內的 16 卷《魯迅全集》得以全部出版。^[4-42]

在 1975 年 7 月之後的幾個月裏，毛澤東對文化生活的支持使「四人幫」退居守勢。王洪文正在上海和浙江安撫造反派。姚文元被派到上海後發牢騷說自己與普通市民無異，「擠公交車上班」。^[4-43]江青仍在北京，但她被管得很嚴，無法阻止人們接二連三地請求毛澤東增加文化作品的供給。

雜誌恢復出版的速度要比小說慢一些。已於 1966 年停刊的《人民文學》雜誌在 1975 年夏天宣佈即將復刊。不難預料，「四人幫」試圖阻止《人民文學》復刊，未能得逞後他們又試圖對雜誌的內容盡量施加影響。鄧小平領導著《人民文學》與「四人幫」的鬥爭，但他在 10 月上旬開始受到批評後，保守的文化部又佔了上風。1976 年 1 月《人民文學》第一期出版時，鄧小平已經控制不了它的內容了。^[4-44]

周榮鑫恢復高等教育的努力

1975 年夏天，鄧小平和他的教育部長周榮鑫等人果敢地開始著手恢復中國的高等教育。文革期間仍在開課的大學寥寥無幾，而它們也不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機構。毛澤東在 1968 年 7 月 21 日就作出指示，大學的學制要縮短，要從工人農民中招收學生，學成後還要回到生產第一線。1970 年 6 月又宣佈，要讓工農兵而不是學術人員管理大學。大學都要建校辦工廠，讓學生能夠用一部分時間在工廠勞動。1971 年 8 月 13 日又發佈正式規定，上大學要通過推薦而不是考試。^[4-45]這些改變對中國高等教育造成了嚴重破壞。美國科學家在 1973 年 5 月訪問過中國一流大學北京大學後的結論是，該校的科學教育大體相當於美國初等技術學院的水平。^[4-46]

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和其他激進派很難反對開辦軍事院校，部分是基於這一點，他開始恢復高等教育。在文革期間，中國最好的軍事科技大學——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很多人被調往長沙加入長沙工學院，以提高該校水平。^[4-47]甚至在普通院校恢復正常工作之前，少數有學術前途的知識分子就已經被允許進入這所學校和其他一些軍事院校，理由是他們的研究與軍事有關。

其他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處境卻很嚴峻。1972 年尼克遜訪華後不久，北京大學的行政領導周培源應邀向周恩來彙報中國的科學現狀。周培源鼓起勇氣說，中國在所有 32 個科學領域都已經大大落後。^[4-48]此外，隨著毛澤東在 1974 年元旦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學者們恢復正常工作的一線希望也化為泡影。^[4-49]科學的進步仍然有待來日。

周恩來在 1974 年 12 月與毛澤東談話回京後，又燃起了恢復高等教育的希望。在這次會面時，他答應讓「四人幫」的人負責文化體育部門，但竭力爭取讓他推薦的人選周榮鑫主管教育，並且得到了毛的批准。周榮鑫過去與周恩來沒有什麼關係，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黨務工作，但是他上過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1961 年短期擔任過教育部副部長。他在任教育部副部長時開始擬定真正的大學教育計劃，但並未得到毛的批准，第二年他的計劃便無果而終。

1975 年 1 月擔任了教育部長後，周榮鑫在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支持下，再次計劃恢復高等教育。^[4-50]為了減少毛澤東提出反對的風險，他謹慎地重申政治學習的重要性，包括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有關教育的教導。但是他也試圖進行真正的改革。從 5 月到 9 月，教育部根據周榮鑫的指示，主持召開了多次討論教育工作的座談會。教育部還出版了一個刊物《教育革命通訊》，周榮鑫借此向在高等教育方面真正有經驗的人表達自己的看法。^[4-51]他大膽指出，工農兵學員在大學裏上一年學，不可能學到過去的學生在三年裏學到的東西。他還大膽地說，工農兵學員上完大學後再回到原來的工廠或農村，無法滿足國家對受過培訓的幹部和科技專家的需要。^[4-52]

鄧小平完全支持周榮鑫。他在 9 月 26 日的講話中說，所有的現代化國家，不管是什麼社會制度，都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但中國的大學卻下降到只有其他國家的中學的水平。一年以前，美國大學校長代表團小心翼翼地對

鄧小平說，在他們看來中國的高等教育存在嚴重問題。令他們大感意外的是，鄧小平回答說，他完全同意他們的看法，他希望他們把這種觀點也講給黨的其他幹部聽一聽。^[4-53]

在 9 月 27 日至 10 月 4 日的農村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再次談到要改進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他說，為了響應毛主席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號召，國家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幹部。他還說，大學的主要任務是教學，為了讓教師好好教書，必須改善教師的地位。^[4-54]這些話在幾年之後聽起來也許像是常識，但是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鄧小平是很有勇氣的，他冒著讓毛澤東發怒的風險。

鄧小平在 1975 年甚至建議，學生不必中斷學業參加兩年勞動就可以直接從高中升入大學。實際上，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籍華人李政道在 1972 年 10 月會見周恩來時就提出過這種建議；1974 年 5 月 30 日李政道向毛澤東提出這個建議時，毛澤東甚至也表示同意。然而，1975 年 11 月，這個當時被稱為「周總理指示」的想法卻成了批判鄧小平想重新使用「走資派」、「刮右傾翻案風」的理由之一。^[4-55]只要毛澤東還在人世，鄧小平是無法實現讓大學恢復正常教育這一目標的。

同時，周榮鑫在鄧小平的鼓勵下開始起草一份指導教育政策的文件。11 月 12 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時批鄧已經開始，但草稿的基本要點並沒有變：對於從 1949 年到 1966 年上學的人，他們所受教育的價值應當給予肯定（不應把他們劃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當恢復專業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學教育的時間應當延長；要提高教育的整體水平。兩天以後的 11 月 14 日，周榮鑫被叫到政治局會議上，他的建議受到了猛烈批判。^[4-56]

對周榮鑫的批判甚至比對鄧小平的批判還要嚴厲。他在 1975 年 12 月不斷挨批，直到病倒被送進醫院。儘管如此，他仍被從醫院揪出來參加了五十多場批鬥會。最後，周榮鑫在 1976 年 4 月 12 日上午的批鬥會上昏倒並於次日黎明前去世，年僅 59 歲。^[4-57]中國的教育改革也一時歸於沉寂。

將鄧小平撤職的前奏：1975 年秋

晚年的毛澤東很少把時間用在治國的具體事務上，而是花大量時間沉溺於他所喜愛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的內容對當前政局的意義。1975 年 7 月 23 日動眼部手術之前，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從 1975 年 5 月 29 日起，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女教師蘆荻來給他讀古典小說，並且與他一起討論。蘆荻在 8 月 14 日記下了毛澤東對古典俠義小說《水滸傳》的評論，其中包括毛的這樣一種觀點：他認為梁山義軍的故事對當代也有意義。^[4-58]毛的這個看法傳到了姚文元那裏，他便抓住機會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來和鄧小平，說他們跟宋江一樣是喪失了革命熱情的投降派。^[4-59]

鄧小平雖然察覺到了麻煩，但在 8 月 21 日的政治研究室會議上，他試圖使事態得到控制。他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4-60]然而毛澤東卻另有打算，他要讓辯論在群眾中大張旗鼓地進行。毛已經在擔心鄧小平會像周恩來一樣熱衷於解放對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幹部。顯然，人們很難阻止毛澤東的疑心日重。^[4-61]由於直接談論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可能會如何對待毛的歷史遺產在當時還過於敏感，「四人幫」便採取間接手段，討論赫魯曉夫如何抹黑史太林。批鄧的人警告說，他最終可能變成中國的赫魯曉夫。既然鄧小平以「打擊派性」做幌子將造反派撤職，讓老幹部捲土重來，難道他們不會抹殺毛主席的威望，對毛主席和打擊過他們的造反派進行報復？

江青一直在尋找既能討好毛澤東又能批鄧的機會，她抓住了毛澤東評《水滸傳》所提供的機會。從 8 月 23 日到 9 月 5 日，《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等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告誡讀者《水滸傳》中的義軍領袖宋江是一個反面教材。江青也開始更囂張地指責鄧小平等人從事的整頓工作。9 月 15 日，她利用一次大型會議（「全國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進行了一個小時的惡毒攻擊。她借《水滸傳》指桑罵槐，指責一些高級幹部想架空毛主席。

然而，毛澤東在 1974 年秋天以後想實現安定團結，一直對江青加以限制。他覺得江青在大寨會議上胡鬧，話說得太過火。唐聞生把江青的講話稿交給毛澤東過目時，他說這個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沒有允許它發表。他還讓江青以後少說話。^[4-62]很多高級幹部猜測毛對不斷批判以前的造反派、繼續為老幹部平反已經有所不滿，但評《水滸傳》的運動當時還是平息了下來。

在這期間，周恩來也感到了評《水滸傳》運動的壓力，1975 年 9 月 20 日他進手術室之前把自己關在醫院一個小房間裏，仔細閱讀了有關 1931 年他從事地下工作時一樁案子（「伍豪事件」）的錄音記錄稿，該案稱他涉嫌向國民黨送情報。^[4-63]他在進手術室之前對妻子鄧穎超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鄧穎超把他的話告訴了汪東興，請他轉告毛澤東。^[4-64]看來周恩來就像毛澤東一樣，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也很擔心自己在黨內的名聲。

關於清華大學的衝突：1975 年秋

1975 年 7 月 23 日動過眼部手術後，毛澤東開始閱讀以前無法閱讀的文件。他越看越覺得鄧小平走得太快，已經超出了恢復安定團結的範圍。^[4-65]10 月份毛澤東開始關注清華大學，他早在 1969 年就把「六廠兩校」——兩校是指清華和北大——樹為全國的樣板，因此心裏一直想著該校。文革早期曾經得到毛澤東支持的人在 1975 年一批接一批受到鄧小平的批評，毛一直忍著沒有發作。但是鄧小平在清華大學的事情上走得太遠了。^[4-66]

鄧小平這一代政治領袖中沒有人上過大學，但是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和他那個時代另一些聰明的共產黨人，如周恩來、葉劍英、胡耀邦和趙紫陽，本能地願意與知識分子相處，深信他們的幫助對現代化事業至關重要。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很敏感，但是他在其他領域的成功整頓使他對維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便在 1975 年末開始嘗試虎口拔牙：把整頓工作推向清華大學，儘管他知道毛澤東對那裏有著特殊的關心。

1975 年清華大學的負責人包括黨委書記遲群和副書記謝靜宜，都是文革初期作為「工人宣傳隊」成員來到清華的造反派。遲群原是軍人，當過負責保衛中南海的 8341 部隊（「中央警衛團」）的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在 1968 年被汪東興派到清華大學。這個鐵桿的造反派後來當上了大學黨委書記。他在清華的戰友謝靜宜從 1958 年到 1968 年擔任毛主席的機要秘書，毛一直用通常稱呼晚輩的方式叫她「小謝」。「小謝」後來被提拔為北京市委副書記兼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遲群和謝靜宜雖然有激進派的支持，但清華大學的知識分子都把他們視為難以忍受的意識形態狂。

鄧小平在 1975 年 8 月擴大整頓範圍時，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看到了希望。他過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團中的部下，在校內一些知識分子的鼓動之下，他於 8 月份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揭發遲群過著墮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毒化校園氣氛。劉冰在信中說，遲群既不看文件，也不接見外人，工作不負責任；他經常酗酒，發脾氣，辱罵別人，有時還大發雷霆，往桌子上摔杯子，男女關係上也很不檢點。劉冰向胡耀邦請教有什麼適當的渠道可以把信送給毛澤東，胡耀邦建議他先把信交給鄧小平。鄧小平馬上就大膽地把信轉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既沒有答覆劉冰，也沒對鄧小平說什麼。可是遲群知道了這封信。他立刻召開黨委會，批判「清華的黨委內部支持修正主義路線的人」，即劉冰及其支持者。不久後劉冰又寫了一封信，把矛頭也指向謝靜宜。他說，身為黨委書記的遲群在謝靜宜的支持下，阻止在校內傳達鄧小平的講話和教育部長周榮鑫的指示（周榮鑫宣佈學生不必再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從事勞動，要減少低學歷的工農學生的數量，把重點放在培養科技專家上）。李鑫等人勸鄧小平不要轉交劉冰的第二封信，因為毛澤東對兩間樣板學校十分敏感，然而鄧小平不為所動，還是把信轉給了毛澤東。^[4-67]

10 月 19 日，毛澤東把李先念和汪東興等人叫去開會，卻沒有叫鄧小平。主席對他們說，劉冰「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小謝在 1968 年是帶三萬工人進清華大學的」。毛澤東問，劉冰為何不把信直接交給他，還要讓鄧小平轉交？他讓他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劉冰的當」。^[4-68]根據毛的指示，鄧小平在 10 月 23 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了毛的指示。北京市委的高官又把毛的指示傳達給了清華大學黨委。

也就是在這時，毛澤東注意到了〈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十年規劃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這個提綱引用毛的話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毛看過之後說，他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他說，這樣說等於把科學技術看得和階級鬥爭一樣重要，他不能接受這種觀點。在毛看來「階級鬥爭是綱」。鄧小平被毛澤東叫去訓了一頓後，讓負責起草文件的胡喬木去查找出處。胡喬木經核對後發現毛澤東是對的——他從未說過那樣的話。胡喬木僅僅是從毛的著作中偶爾看到了一個類似的觀點，他作為編輯稍稍改動了一下措辭。^[4-69]毛澤東允許鄧小平糾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壞，但他仍抱著遮羞布不放，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現在鄧小平卻向這塊遮羞布動手了。假如毛澤東仍在世時鄧小平就敢篡改他的指示，打擊他在清華大學的寵兒，那麼毛去世之後，說不定他還能幹出什麼事來。

毛澤東的新聯絡員毛遠新：1975 年 10 月–1976 年 4 月

毛澤東對鄧小平不尊重其意見的疑心日益增長，同時他對自己的聯絡員「兩位小姐」（唐聞生和他的遠親王海容）的懷疑也有增無減。她們正在變得過於親近鄧小平。^[4-70]毛說，她們就像「沉船上的耗子」。^[4-71]毛澤東已屆風燭殘年，鄧小平正冉冉上升，不能再指望她們忠實於他這艘正在下沉的船了。確實，即使在失寵於毛澤東之後，鄧小平仍然不時與她們見面。^[4-72]

由於 1972 年尼克遜訪華時唐聞生發揮過關鍵作用，因此當朱麗·尼克遜（Julie Nixon）和大衛·艾森豪威爾（David Eisenhower）在 1976 年元月 1 日至 2 日訪華時，毛澤東仍讓唐聞生擔任翻譯。^[4-73]但這也是她最後一次給毛澤東做翻譯。幾周之前毛澤東已經開始依靠另一個聯絡員——他的侄子毛遠新（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毛遠新成為毛澤東的聯絡員時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富有經驗的幹部，熱衷於執行毛的指示。他在前往新疆（他父親成為烈士的地方）參加 1975 年 9 月 30 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 20 周年慶典的途中，於 9 月 27 日在毛澤東的北京住所暫住。像往常一樣，他向伯父詳細彙報了東北的情況。他說那裏有兩派意見，一些人認為文革是七分成績，也有人認為文革是七分失敗。他說，否定文革的聲音甚至比 1972 年林彪死後周總理批極左的調門更高。

參加了新疆的慶典後，毛遠新回東北花一周時間處理自己的事情，然後便到北京當上了伯父的專職聯絡員。毛遠新對伯父心存敬畏，與之有相同的激進觀點。作為一名有經驗的幹部和毛澤東的侄子，他的聯絡員角色要比「兩位小姐」權威得多。在毛澤東部署幾乎每天開展的批鄧運動時，他也比她們發揮了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

一些擁護鄧小平的人後來說，是毛遠新使毛澤東對鄧小平起了疑心。例如，他讓毛澤東注意到鄧小平在毛已經批准的文件下發前對其所作的一些改動。其實毛澤東在毛遠新到來之前就已經對鄧小平起了疑心。^[4-74]還有一些幹部確信，毛遠新在傳達毛的指示時塞進了他自己的一些觀點。

不論是否如鄧的擁護者所說，是毛遠新將毛鄧之間的問題升級，毛遠新確實抱持激進觀點。1974 年底他在遼寧時就與遲群有過一段合作，兩人一起推廣「朝陽經驗」，目的是向學校提供適合培養農村幹部需要的教材，以此進行思想政治教育。^[4-75]因此，毛遠新本人也同意遲群認為思想教育在清華大學很重要的觀點；他像遲群一樣，反對劉冰、鄧小平和周榮鑫重視學術質量的新做法。

毛澤東發動批鄧：1975 年 11 月

鄧小平意識到了毛澤東對他的工作日益不滿，於是在 10 月 31 日請求與毛澤東見一面。毛第二天便接見了他，批評他支持劉冰。^[4-76]但是毛澤東也給了他一些安慰。鄧小平請求毛澤東對過去幾個月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作一個評價，毛說「對」。這等於承認了整頓的成績。^[4-77]毛澤東在過去兩三個月與江青的幾次見面中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鄧小平，因此鄧小平雖然明知有一定風險，仍對毛的繼續支持抱有希望。然而事與願違，他高估了自己在未來幾周內能從毛那裏得到的支持。

毛遠新第二天見到毛澤東時，向他的伯父彙報說，鄧小平很少談文革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也幾乎不曾稱讚以周恩來作為主要對象的批林批孔運動。毛遠新說，鄧小平幾乎不提階級鬥爭，只抓生產。最後，也是最令毛澤東擔心的，他對伯父說，鄧小平有恢復文革前的體制的危險。^[4-78]毛澤東與侄子這次見面後，鄧小平和毛澤東之間的緊張迅速加劇。

鄧小平數次試圖單獨面見毛澤東「向他請示」，但是在 11 月 1 日見面之後，毛澤東總是拒絕見他。如果鄧小平只在私下裏對他說擁護文革，那麼在毛去世之後鄧小平可以否認自己說過的話。看過相關文件的黨史專家相信，毛澤東想讓鄧小平擁護文革的話被別人聽到，或是寫成白紙黑字，這樣鄧就無法公開否定文革了。例如，當毛澤東在 11 月 2 日與毛遠新見面時，他讓毛遠新當天去見鄧小平，在另外兩個幹部在場的情況下把他的意見轉告給鄧小平。

雖然鄧榕沒有記下日期，但她講述了父親在家裏與毛遠新的一次會面，此事很可能就是發生在那個晚上。^[4-79]她寫道，一天晚上，毛遠新奉毛澤東之命來到她家與鄧小平談話。她不清楚他們關起門來單獨說了些什麼，但她敢說毛遠新是「來者不善」，父親則是「絕對不會動搖」。據她判斷，「父親和毛遠新這次談話並不愉快。毛遠新走的時候，父親沒有送客」。^[4-80]據說，毛遠新剛擔任聯絡員時，對鄧小平等黨內老幹部多少有些缺乏自信。但是當他講話時有毛澤東在背後全力為他撐腰，他便底氣很足。不難想像，鄧小平為自己取得的很多個人成就而自豪，他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不願意肯定文革，對於這個年齡小他一半的人對自己說三道四自然不會有好感。

毛澤東指定了另外兩個人——汪東興和陳錫聯——在第二天跟毛遠新和鄧小平一起開會，他們對文革都持有和毛一樣的觀點。鄧小平知道毛遠新會向主席彙報，但他並沒有動搖。他直截了當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按你（毛遠新）的描述，是中央整個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而且是所有領域都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這個話不好說。……我主持中央工作

三個多月是什麼路線，……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是老是壞實踐可以證明。」鄧小平知道自己會觸犯毛澤東，於是又加了一句，說他願意再作檢討。^[4-81]

這次見面之後，毛遠新當天就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沒有順從地接受批評。毛澤東對侄子說，馬上再開一個八人會議，原來的四個人（鄧小平、毛遠新、汪東興和陳錫聯），再加上張春橋（「四人幫」成員之一）和三名副總理——李先念、紀登奎和華國鋒，他們都是文革期間維持著經濟和政府工作的人。毛說：「不怕吵，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此前毛澤東曾說過文革是九分成績，但他在準備這次會議時作一點讓步：鄧小平和其他幹部必須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績，「（政治局會議）一次開不好，兩次，三次，不要急」。^[4-82]

第二天，即 11 月 4 日，這個八人小組便召開會議，毛遠新當晚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議的結果。毛遠新要求鄧小平同意文革是成績為主，擁護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鄧小平卻不願向毛的侄子直接作出回答。毛澤東顯然對這種反應感到失望，不過他對侄子說，讓他們批評鄧小平不是為了撤他的職，而是要幫他糾正錯誤。毛還告訴侄子，要提醒「四人幫」成員之一的張春橋，這些談話的內容一個字也不要向江青透露，^[4-83]因為她總是在伺機公開批鄧。毛遠新給伯父彙報完以後，毛澤東指示八個人繼續開會，他們也遵旨照辦。毛遠新在 11 月 7 日又向伯父彙報說，讓鄧小平作出讓步的事毫無進展。

毛澤東接下來採取的策略是逐漸增加開會的人數，使壓力層層加碼，直到鄧小平明確表示擁護文革。因而，他指示毛遠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內的全部 17 名成員開會。政治局成員要點名批評文化和科技部門那些支持鄧小平的人：胡喬木、胡耀邦、李昌和周榮鑫。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說，打擊這些得到鄧小平支持的人是向鄧小平施加大壓力的手段，因為他知道自己拒不讓步會給他的同道帶來麻煩。如前所說，教育部長周榮鑫曾任浙江大學校長，長期擔任周恩來和陳雲的助手，他一直大膽直言要通過提高教育水平促進現代化，甚至提出要減少思想教育的作用。^[4-84]因此，在 11 月 8 日進一步批鄧時，分管教育的張春橋對周榮鑫說，他必須就鼓勵學生只管學習、忽視政治鬥爭的行為作出檢討。

在政治局開會批評鄧小平及其同道的時候，鄧小平的擁護者因其所持的精英教育觀點也受到了公開譴責。當時鄧小平還沒有被公開點名，但是在 11 月 13 日，由於毛澤東對鄧小平在前幾次會上不作回答很不滿意，於是給政治局下達書面指示，要他們對鄧小平進行「幫助」。

兩天以後，鄧小平敏銳地覺察到毛澤東的批評的嚴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對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給毛澤東寫信，建議讓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替他領導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澤東當晚就作出了答覆，他說，還是要由鄧小平繼續主持會議。他沒有再讓王洪文恢復以前的工作，兩個月以後他任命華國鋒擔任了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工作。

11 月 16 日和 17 日，政治局再次開會批評鄧小平及其在教育 and 科技領域的主要擁護者。像周恩來一樣，鄧小平無奈地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開了批判自己的會議。毛遠新作關鍵發言，他批評鄧小平不執行毛主席關於肯定「文化大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指示，沒有遵循毛澤東的教育方針。當時也被允許到會的江青及其激進派盟友加入了批鄧的合唱。鄧小平除了作為會議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兩語以外，幾乎一言不發。他讓批他的人說完後，把同樣受到批評的人——胡耀邦、胡喬木、周榮鑫、李昌和劉冰——也叫到會上來，讓他們說明自己的立場。^[4-85]但是，當會議結束要進行總結發言時，鄧小平卻推辭了，他說自己聽力不好。

批鄧的進程在 11 月的上半月迅速升級，於 11 月 20 日達到了頂點，這時的討論已經轉向對文革的全面評價。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鄧小平再次主持會議。鄧小平很少徵求別人的意見，但是在召開這次會議前的幾天，面對不斷的壓力，他去徵求了周恩來、葉劍英和陳雲的意見。他要力爭以毛澤東最不會反對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紀登奎的建議說自己在文革期間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4-86]毛澤東本人在幾周前提到過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這句隱喻。然而鄧小平這種自作聰明的迴避術並不能讓毛澤東滿意，他要的是對文革的明確肯定。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走進了僵局。

四十多年來，鄧小平對毛澤東一直是有令必行，毛喜歡聽什麼他就說什麼。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對象，自己的長子跳樓致殘，他對文革無疑抱有強烈的反感，但是長久以來他一直把個人感情與國家大事分開，無怨無悔地聽從毛的命令。那麼，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圖，為何現在非要拒不服從呢？鄧小平知道，毛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已經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操控大局於股掌，事實上他已經來日無多。但是，答案還要從鄧小平對中國未來需要的評估中找。薄一波後來說，如果鄧小平肯定文革，他就無法進行整頓，無法做到「實事求是」，也無法實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們的思想。^[4-87]他會留下擁護過去錯誤政策的紀錄，使他無法去做他認為推動國家前進必須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職的造反派也會捲土重

來，使他的工作變得更加艱難，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領域。假如他能在毛澤東死後獲得一定的統治權，他需要與階級鬥爭劃清界線，繼續他的整頓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過迫害、視文革為一場災難的人與他充分合作。

如果鄧小平聽從周恩來或陳雲的勸告，他就要屈服於毛的壓力，這也許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鄧小平沒有屈服。據鄧榕回憶，當父親在年初開始大力進行整頓時，他已經估計到有可能挨批和丟官，他已經作好了精神準備。^[4-88]儘管鄧小平在當時處境艱難，前途未卜，但到 1977 年重新上台時，他在 1975 年與毛澤東劃清界線、拒不讓步的做法卻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動空間。

毛鄧兩人都劃出了自己的底線，但是在準備 11 月 24 日政治局的「打招呼會」時，他們的行動仍然有所節制。毛澤東很清楚在鄧小平領導下 1975 年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他本人也贊成鄧小平做的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恢復安定的能力上，沒有人能比得上鄧小平，況且他也沒有替換鄧小平的更好人選。此外，福特總統（Gerald Ford）就要在 12 月 1 日至 5 日訪華，周恩來重病在身，鄧小平上個月還與基辛格一起為福特的訪華作準備，毛澤東不知道還有哪個熟悉外交的領導人能夠在美國支持臺灣、拖延承認中國、與蘇聯搞緩和這些敏感問題上巧妙而強而有力地表達中方的觀點。

在 12 月初與福特的第一次會談中，鄧小平借用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比喻美國對蘇聯讓步太多的危險。他說，魏王曹操打了勝仗之後，大將軍呂布願意為他效勞，可是曹操疑心呂布不忠，說他「譬如養鷹，餓則為用，飽則揚去」。^[4-89]換言之，滿足蘇聯的要求從長遠看是沒有用的，因為它的需要一旦得到滿足，它還是會追求自己的利益。

毛澤東在會見福特時說，中國論武器裝備打不過蘇聯，只能放放空炮，「如果說到罵人，這種本事我們倒是有一點」。^[4-90]為了向鄧小平施壓，毛讓江青及其激進派盟友充分施展了「這種本事」。鄧小平知道毛澤東仍然掌握著決定他命運的大權，他必須與那些仍然敬仰毛澤東的幹部共事，儘管文革造成了許多錯誤。由毛澤東準備講稿、仍由鄧小平主持的定於 11 月 24 日召開的會議，是要提醒老幹部牢記黨的正確路線。鄧小平在會議召開的三天前給毛澤東寫信，就如何主持這次會提出了具體建議。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議。毛還指示說，也要請一些中青年幹部，他們也要對路線方針有正確的理解。但是毛鄧兩人都知道，大多數「中青年幹部」都是過去的造反派，他們在會上會對鄧小平施展「罵人的本事」。但是毛澤東隨後又改了主意，他在第二天指示說，不必急著給中青年幹部打招呼，這可以等到以後的會議再做。^[4-91]此時毛澤東仍然不想開足馬力批鄧。

11 月 24 日的「打招呼會」有 130 多名高級幹部參加，聽取毛澤東關於如何「避免犯新的錯誤」的指示，也就是說，如何終止對鄧小平的施政路線的追隨。根據毛澤東對會議的指示，鄧小平大聲宣讀了毛的信。毛在信中批評劉冰想搞掉遲群和謝靜宜，他說，劉冰的信其實是沖著支持遲群和謝靜宜的我來的。他沒有點鄧小平的名，但是劉冰的信是由鄧小平轉給毛澤東的，因此開會的人顯然知道這是在批鄧小平。會議要求鄧小平對毛的信作出答覆，鄧小平想找一條脫身之計，既不肯定文革，又服從毛的指示。他說：主席希望幹部對文革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主席說，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黨的基本路線。^[4-92]事實上他只承認了毛主席說的話就是黨的政策，但並沒有說自己同意這些話。〈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經毛澤東批准後，於 11 月 26 日下發給了全國高層黨政軍幹部。文件雖然沒有點鄧小平的名，但是看文件的人都清楚，他遇上了大麻煩。^[4-93]

擴大批鄧：1975 年 12 月–1976 年 1 月 8 日

11 月 26 日下發了 24 日會議的講話要點之後，政治局又在兩個月內召開了一系列會議，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這是指他允許太多的老幹部恢復工作的做法。毛澤東繼續讓鄧小平主持以他作為主要批判對象的會議。鄧小平在會上除了宣佈「開會」、「散會」外，就靜靜地坐在那裏聽憑江青及其激進派大肆攻擊他和他的政策。《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等媒體隨即也展開了批判。在這場批判中，堅定擁護鄧小平的「四大金剛」（胡耀邦、萬里、周榮鑫和張愛萍）都因為支持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受到批評。國務院政研室以及在那裏工作的老幹部，包括胡喬木、鄧力群和于光遠，也因他們支持鄧小平這一錯誤在批判會上挨了批。^[4-94]

12 月 18 日，毛遠新把批評鄧小平、周恩來和葉劍英的材料交給他的伯父，這是 10 月份以來他在遼寧省委、上海市委和清華、北大的幫助下搜集整理的，激進派在這些地方有著雄厚的基礎。毛遠新還附上一份說明，請求允許下發這些材料，毛澤東立刻同意了這一請求。^[4-95]兩天以後，這些材料下發給了黨內和軍隊的高層幹部。^[4-96]鄧小平在同一天簡短地作了一個沒有書面紀錄的「口頭檢討」。^[4-97]他說，他在 1975 年初恢復工作時，一些工業部門的生產停滯不前，

派性嚴重。為了解決派性問題，他首先抓了鐵路，使問題很快得到解決。然後又以同樣方式抓了鋼鐵工業，使生產有了增長。他說，自己的失誤不是因為文革期間有八年沒做工作，而是由於他對文革的態度。他的檢討，正如他女兒所說，其實是在為自己的政策作辯護，他仍然認為這些政策是正確的。^[4-98]

鄧小平希望緩和與毛澤東的關係，在 12 月 21 日給他寫了一封信，並且附上自己口頭檢討的紀錄，他說，這只是個初步的檢討，希望能夠得到主席的教誨。不出意料，毛澤東認為他的「檢討」太敷衍。他沒有作出答覆，而是擴大了批鄧運動。^[4-99]1976 年元旦一過，汪東興就讓鄧小平看由毛澤東批准的元旦社論。這篇社論說，抓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在等待什麼，他立刻動筆又寫下一份書面檢討，於 1976 年 1 月 3 日交了上去。他在書面檢討中重複了 12 月 20 日的話，僅僅補充說，自己有時不徵得主席的同意就宣佈政策。在後來受到江青等激進派批判的會議上，鄧小平堅持自己的立場，他寧肯受罰也不說中國要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周恩來在鄧小平交出檢討五天後去世，鄧小平很快就被華國鋒所取代。

會見基辛格和福特總統的插曲

在這期間，鄧小平曾被批准暫時從受批判當中脫身，因為他要跟基辛格、後來又跟福特總統談判。為了給福特總統訪華作準備，10 月 20 日至 22 日，鄧小平與基辛格舉行了三天漫長的會談，就國際局勢交換意見。鄧小平幾乎沒有讓基辛格說開場白，就逼著他在關鍵問題上表態：你們賣多少糧食給蘇聯？你們給了蘇聯多少美國現代設備和技術？你們如何評價赫爾辛基會議（美國在這次會議上力促西歐與共產黨陣營搞緩和）？鄧小平然後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和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對希特拉（Adolf Hitler）採取綏靖政策的經驗教訓：由於英法兩國向希特拉最初的侵略示弱，導致了希特拉進攻西方。他奉勸說，為了阻止威脅，必須作出強硬反應，而現在美國卻在示弱。他說，蘇聯現要比美國和西歐加在一起更強大。蘇聯有兩個弱點：它缺少糧食和技術，而美國在這兩方面施以援手，幫它克服自己的弱點，這只會增加蘇聯攻擊的危險。^[4-100]周恩來曾被指責為投降派，而當這次會談彙報給毛澤東時，他很難找到以同樣的眼光看待鄧小平的證據。

在與基辛格就全球問題舉行的漫長會談中，鄧小平不斷重提美國從越南撤軍後蘇聯形成的威脅。他在整個會談中一再向基辛格施壓，讓美國對蘇聯的威脅作出更強硬的反應，基辛格則試圖解釋美國在對付蘇聯的威脅上已經做了不少事。鄧小平儘管咄咄逼人，但並沒有超出外交禮節的範圍。

基辛格會見毛澤東時有鄧小平作陪。毛澤東像鄧小平一樣，也很重視美國不對蘇聯的挑戰作出適當回應的問題。基辛格在與鄧小平和毛澤東會談後寫給福特總統的報告中說，在訪華期間的會談中，暗含著一些可能讓美中關係降溫的麻煩，這跟中方感到美國面對蘇聯攻勢的退縮態度有關。基辛格認為，中方對美國的反應感到失望，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對抗蘇聯。^[4-101]

即使在漫長的會談中也能始終對會談內容保持高度專注，這正是鄧小平面對壓力時堅毅剛強的性格的一種體現。無論基辛格還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沒有覺察到鄧小平當時正承受著來自毛澤東的沉重政治壓力。事實上，基辛格從會談的情況斷定，由於毛澤東病得不輕，無法過問具體的或持續性的工作，現在「鄧小平是關鍵人物」。^[4-102]

11 月 4 日，即鄧小平第一次在八人會議上挨批的當天，外交部長喬冠華召見美國駐京辦事處主任喬治·布殊，建議美方把福特總統的訪華行程推遲到 12 月份，但是美國要求訪問如期進行。中國在 11 月 13 日同意了原定的訪華日程。鄧小平是福特總統的主要東道主，在 130 多名高官參與的會議上受到批評一周後，他去機場迎接了福特的到來。鄧小平舉行了一次歡迎宴會、一次告別午宴，舉行了三次漫長的會談，並且陪同毛澤東會見了福特。

中方官員對福特的來訪並沒有太多期待。他們認為，面對蘇聯的壓力，尼克遜是個足智多謀的可靠領導人，而福特則軟弱得多，且剛上任，還沒完全從水門事件中恢復過來。尼克遜曾承諾在 1976 年與中國恢復正常邦交，他們在訪問前就知道福特不會把關係正常化的計劃提前。福特在外交事務上不像尼克遜那樣老練。鄧小平在第一輪漫長的會談中確實又向美國施壓，要求其對蘇聯採取更強硬的行動，他當時對福特說：「我不想冒犯閣下，不過在跟蘇聯打交道方面，我們也許比你們的經驗更多一些。」^[4-103]就像六周之前他跟基辛格會談時一樣，他把他對蘇聯的看法又強調了一遍。他說，中國已經作好了單獨對抗蘇聯的準備，儘管中國很窮，缺少技術，但中國準備「挖地道」，「用小米」養活它的軍隊。鄧小平雖然不滿於美國向蘇聯示弱，但他並沒有表示中國要增加自己的軍費。

不過毛澤東和鄧小平對福特總統的態度要比六周以前他們接待基辛格時客氣得多。鄧小平對福特說：「我們相信只要保持交往……我們的看法有分歧，有時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麼。」除了在蘇聯問題上向美國施壓外，鄧小平還以其迷人且好辯的個性，敦促美國重視中美兩國的國家關係、貿易、文化交流和美國的對台政策。^[4-104]鄧小平還發現，福特總統對國際事務的瞭解比他以為的要多得多，其反蘇態度也比他預料的要強硬得多。一周以後他對喬治·布殊說，他與福特會談的成果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4-105]

福特回國後，批鄧的會議也隨即恢復，但是美方一直無人覺察鄧小平受到了批判。福特訪華一周後，當鄧小平為已經結束美國駐京聯絡處主任的任期、就要返回美國的喬治·布殊舉行告別午宴時，布殊把這次午宴描述為「氣氛輕鬆愉快」。^[4-106]

毛澤東於 1975 年 12 月 2 日會見了福特總統，這是鄧小平最後一次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毛。鄧小平被允許在 1 月 1 日會見尼克遜的女兒朱麗·尼克遜及其丈夫大衛·艾森豪威爾（David Eisenhower），次日又接見了由瑪嘉烈·赫克勒（Margaret Heckler）率領的美國國會代表團。^[4-107]這也是鄧小平在 1977 年復出之前最後一次會見外賓。幾天後周恩來去世。

再次打入冷宮

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在 10 月 25 日向政治局傳達了毛對鄧小平的批評後，黨建、科技和文教領域的前進步伐立刻停頓下來。下級單位沒有立刻獲悉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但是幾周之後他們都感到，他們想讓上面同意作出一些改變的努力受到了阻礙。鄧小平在 1976 年 1 月便無力再為他們提供支持了。

從 1975 年 5 月到 10 月，鄧小平著眼於未來為黨建、經濟、科技和文化領域的長期進步打基礎的工作雖然被凍結，但並沒有死亡。1975 年在他領導下制定的經濟計劃，仍然是 1976 年年度計劃和 1976 年至 1980 年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基礎。「四人幫」印發了「三株大毒草」並發動批判運動，讀過的人雖然不能公開讚揚，但它們在 1977 年卻變為三朵「香花」，成了未來幾年政治綱領的基礎。例如，成立獨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計劃在 1975 年被終止，但在 1977 年得到了落實。政研室在 1975 年底變得死氣沉沉，可是它的很多研究人員在為 1978 年的三中全會和後來的改革撰寫文件中發揮了作用。

批鄧運動在軍隊中從未形成氣候。除了解放軍總政治部外，「四人幫」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在軍隊，最明顯的影響是批鄧放緩了讓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回來工作的進程，軍事院校恢復教學的工作也被推遲。但是 1977 年老幹部又開始返回軍隊，軍事院校也重新開課。^[4-108]

鄧小平的下台在短期內對高等教育造成了顯著影響。提高教育水平和減少政治思想教育的計劃被中止，重建中國科學院的工作也失去了動力。得到允許的文藝活動的範圍大為縮小。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又被潑了一頭冷水。

在政治領域，為黨的高級幹部平反的工作也放慢下來。鄧小平一些最親近的擁護者受到批判並被撤職，特別是胡耀邦和胡喬木。他們手下的幹部也丟了官職。

1975 年毛澤東是有意願轉向安定團結和經濟發展的，但鄧小平的動作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限度。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手中仍握有大權，他能收緊韁繩，能撤掉鄧小平或讓他受批判。然而，毛已經沒有精力或勢力去控制他手下幹部的思想了。從短期看，鄧小平是出局了。然而，他在 1975 年底對自己所支持的事拒不認錯，使他在 1977 年復出時擁有了一個十分牢固的起點。那時候，他將解凍他在 1975 年建立並推進的人事安排和工作計劃。

[4-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 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202–203；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5。

[4-2]SWDXP-2, pp. 24–26.

[4-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37–540。

[4-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08。

[4-5]有關政研室的這一節的材料來自作者與政研室資深成員于光遠、政研室理論組黨組書記朱佳木的交談。另參見于光遠：《我憶鄧小平》。胡喬木的生平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4-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13。

[4-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04–208。

[4-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12–213。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5 年 7 月 13、18 日，8 月 8 日，頁 69 腳註；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13–215。

[4-10]這些會議分別召開於 1975 年 6 月 29 日，7 月 23 日，8 月 26 日，9 月 13、19、25、26 日，10 月 10、14、24 日，11 月 10、15 日和 1976 年 1 月 17 日。

[4-1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33–272；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324–339.

[4-1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41–243。

[4-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9 月 20 日，頁 102。

[4-14]SWDXP-2, pp. 41–44.

[4-15]關於兩份草稿的差別，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65–266。

[4-16]關於兩份草稿的差別，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52–256。

[4-17]關於兩份草稿的差別，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2 月 25 日，頁 138。

[4-1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42–243。對收入較高的地方作了一些讓步，允許它們有更多的支出。見頁 239–241。

[4-1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53–357。

[4-2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53。

[4-2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53–357。

[4-2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22–224。

[4-2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67。

[4-2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64–365。

[4-2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66–367。

[4-2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74–380；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頁 68–70。

[4-2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71–374。

[4-2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81–386。

[4-2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90。

[4-3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90。

[4-3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89–392。

[4-3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90–392。

[4-3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92–394；吳德：《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 166–173；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頁 94–97。

[4-3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26–232。

[4-3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75。

[4-3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82–286。

[4-3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74–282、341。與江青的談話錄音，後經毛澤東作了一些修訂，收錄在 1975 年 11 月 15 日發表的談話中，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第 13 冊，頁 447–449。

[4-3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43–346。

[4-3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91–298。這封信的原文附於頁 295–296。

[4-40]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講述過毛做眼科手術的背景，見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 604–605.

[4-4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96–298。

[4-4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29–339。

[4-4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73。

[4-4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39–341。

[4-4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71–473。

[4-46]這是美國國家科學院代表團的科學家得出的結論，作者是代表團成員之一。

[4-47]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省委、湖南電視台製作的大型電視片《鄧小平十章》（湖南電視台，2004），第 3 集，《破冰》。

[4-4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73–474。

[4-4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77–478、495。

[4-5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78–480。

[4-5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80–482、488–490。

[4-5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90–496。

[4-53]中國問題專家 Merle Goldman 與該代表團一起參加會見，她友好地讓我看了會談紀錄。

[4-5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98；SWDXP-2, pp. 45–47.

[4-5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81–582。

[4-5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99–502。

[4-5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99–502、506。

[4-58]對《水滸》事件更具體的描述見 Merle Goldma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4-5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07–512；史雲、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8 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 577–580。按後一著作，是蘆荻而非毛澤東挑起了這一討論並記下了毛的觀點，是姚文元和江青而不是毛澤東發動了公開的辯論。但至少毛澤東允許了公開辯論的發生，並且知道它的政治含義。

[4-6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12–517。

[4-6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65。

[4-62]關於評《水滸》運動的各種記載，見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363–374; Merle Goldman, "The Media Campaign as a Weapon in Political Struggle: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Water Margin Campaign," in Godwin C. Chu and Francis L. K. Hsu, eds., *Moving a Mountain: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p. 191–202. 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g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pp. 283–285.

[4-63]Wenqian Gao,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p. 166.

[4-6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12–517。

[4-65]2006 年 1 月作者從一位瞭解毛遠新觀點的幹部那裏得知這是毛遠新的看法。

[4-66]對這場鬥爭的不同講述，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 1753–1755；DXPCR, pp. 350–351；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388–399；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p. 471–473；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04–407;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60–563。

[4-67]史雲、李丹慧：《國史·第 8 卷》，頁 406。

[4-68]《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4。

[4-69]《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4。

[4-70]這一節內容依據的是 2006 年 1 月作者對一位瞭解毛遠新立場的幹部的採訪，以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2–1758; DXPCR, pp. 350–355;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374–381, 399–410;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60–579; 史雲、李丹慧：《國史·第 8 卷》，頁 592–598;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1 月 1–28 日，頁 125–134。

[4-71]2006 年 1 月對一名知情官員的採訪；另參見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17.

[4-72]DXPCR, p. 361.

[4-7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1、2 日，頁 139–140;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16.

[4-74]1980 年評價歷史問題時，陳雲、葉劍英等人擔心，如果結論是毛遠新只是簡單轉達毛的意見，會有損於毛的威望。最終毛遠新同意承擔影響毛澤東的責任，因此也得到了比較好的待遇。2008 年 12 月對熟悉黨內文件的歷史學家的採訪。

[4-75]對「朝陽樣板」的討論，見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340.

[4-76]這一節內容取材自作者 2006 年 1 月對一位看過很多有關檔案的黨史學者的採訪。

[4-77]DXPCR, p. 351.

[4-78]2006 年 1 月對一位瞭解毛遠新狀況的幹部的採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4–1755; DXPCR, pp. 352–353.

[4-79]DXPCR, p. 362; 《鄧小平年譜（1975–1997）》，僅提到這次來訪發生在 11 月初。

[4-80]DXPCR, p. 352.

[4-8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1 月 1、2 日，頁 1;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5。

[4-8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5–1756。

[4-83]《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6。

[4-84]David S. 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March 1978): 140–159.

[4-8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1 月 16、17 日，頁 31。

[4-8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1 月 20 日，第 131–132 頁; DXPCR, p. 361.

[4-8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下冊，頁 1249。

[4-88]DXPCR, p. 366.

[4-89]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p. 226.

[4-90]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pp. 890–891.

[4-9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4。

[4-92]DXPCR, pp. 364–365;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5–576;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1 月 24 日，頁 132–134; 2002 年 4 月對唐聞生的採訪。

[4-9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6–577; DXPCR, p. 365.

[4-9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83–586。

[4-9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第 579–580 頁；另參見吳德：《吳德口述》，頁 194–199。

[4-9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9–582。

[4-97]鄧小平的講話錄音仍保存在中央檔案館，這裏的講述是根據程中原的概括，而程中原的概括則是根據這一錄音的整理稿：《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2 月 20 日。（經查年譜中無紀錄。—中文版編者註）

[4-98]DXPCR, pp. 367–368.

[4-9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1–579。

[4-100]鄧小平和基辛格的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66, CH00367, CH00369, and CH00373, October 20–22, 1975.

[4-101]基辛格國務卿與毛澤東會談的分析和要點，DNSA, CH00368, October 22, 1975；基辛格和毛澤東的會談紀要，DNSA, CH00372, October 17, 1975；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

[4-102]基辛格國務卿與毛澤東會談的分析和要點，DNSA, CH00368, October 22, 1975；基辛格和毛澤東的會談紀要，DNSA, CH00372, October 17, 1975；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

[4-103]吉拉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

[4-104]毛澤東與福特的會談，DNSA, CH00395, December 2, 1975；吉拉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96, December 3, 1975；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吉拉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99, December 4, 197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2 月 1 日–5 日，頁 134–135；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p. 886–894；Tyler, *Great Wall*, pp. 215–219.

[4-105]喬治·布殊的報告，DNSA, CH00402, December 9, 1975.

[4-106]DNSA, CH00402, December 9, 1975.

[4-10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1、2 日，頁 139–140。

[4-10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20–422。

第 5 章

在毛時代終結時靠邊站：1976

從 1975 年 12 月到 1976 年 9 月短短一年內，中國有四位高層領導人離開了人世。先是康生，秘密警察頭子，專替毛澤東做見不得人的事，在他佈置下有數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幹部遇害；他於 1975 年 12 月去世。接著是總理周恩來，他死於 1976 年 1 月 8 日凌晨。然後是朱德，紅軍締造者，早期軍隊領袖；他死於 1976 年 7 月。1976 年 9 月，高居萬民之上的毛主席撒手人寰。隨著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幫」在 1976 年 10 月的被捕，一個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隻手就能撼動整個國家的時代結束了。

周恩來去世

周恩來走在毛澤東之前，這使毛澤東得以左右周恩來追悼會的安排：他試圖借機抑制群眾對周的懷念，對周一生的成就只給予了以黨的標準而論盡可能低的評價。可是毛這些手段的效果適得其反。很多中國人非但不服氣，反而為深得他們敬仰與愛戴的周恩來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而憤憤不平。

周恩來去世的當天下午，政治局開會籌備追悼會事宜，當時仍名義上擔任副總理的鄧小平於下午 6 點 30 分把政治局撰寫的訃告草稿送毛澤東批示。第二天一早毛就批准了訃告，對以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和朱德為首的 107 人治喪委員會的人選也沒有提出意見。^[5-1]毛甚至同意由鄧小平致悼詞，將周恩來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但是毛澤東沒有出席追悼會。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三天前，毛不以為然地對他的警衛團團長汪東興說：「為什麼要我參加總理的追悼會？」^[5-2]他讓機要秘書張玉鳳簡單解釋說，他行動不便，無法出席（雖然短短幾個星期後，他還有體力會見尼克遜總統，會晤時間長達 1 小時 40 分）。他確實給周恩來送了一個花圈，但除此之外沒有參加任何追悼活動。

在周恩來去世前的最後幾個月裏，毛澤東也同樣與他保持著距離。到 1975 年 9 月，周恩來的體重已從過去穩定的 130 斤減少到僅 80 斤。^[5-3]鄧小平、葉劍英等親密同事常去醫院病房看望他，儘管他已經無法說話。1 月 5 日他做最後一次手術時，鄧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守候在一旁。^[5-4]儘管毛澤東的體力要比周恩來好得多，卻一次也沒去醫院看望過周。毛還試圖弱化外國人對周的悼念。周恩來去世的當天下午 4 點，鄧小平向毛彙報說，很多外國代表請求前來表達敬意。當天下午晚些時候鄧小平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大使時宣佈，根據毛的指示，外國駐京大使可以參加弔唁活動，各國領導人可以前往中國駐該國使館憑弔，但不必派代表團來京。^[5-5]

儘管毛澤東態度冷漠，但當電台和廣播喇叭裏傳出周恩來逝世的噩耗後，舉國上下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眾的眼中，周恩來自 1973 年以來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民眾自發流露的哀痛，堪與 1945 年羅斯福去世或 1963 年甘迺迪遇刺在美國引起的反應相比。中國人民還記得一年前周恩來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時虛弱憔悴的樣子，故而對他的去世並不感到意外。但讓他們擔心的是，再也沒有誰能夠保護國家、使之免於毛澤東和「四人幫」的瘋狂行徑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領導人，對周恩來如此心甘情願地與毛澤東合作深感不滿；但是在群眾眼裏，是周恩來使他們躲過了毛澤東的極端做法。^[5-6]很多人擔心，周恩來現在已經不能再保護他們，接下來不知會發生什麼。

1 月 11 日，北京居民僅僅從小道消息得知為周恩來送葬的車隊將在當天出現，就已紛紛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表達他們的哀思。這天下午，運送周恩來遺體的靈車在 100 輛黑色轎車跟隨下，經天安門廣場駛往西山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周的遺體將在那裏被火化。儘管是數九寒天，估計有一兩百萬人佇立於街道兩側。^[5-7]悼念的群眾聽到讓他們擔憂的謠言說，政治局不顧周恩來的遺願，下令將他的遺體火化，他們憤怒地堵住了車隊，直到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向他們保證說，遺體火化是周恩來本人的要求。^[5-8]

1 月 12 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覆蓋著黨旗的周恩來遺體的照片，這意味著悼念活動已得到允許。^[5-9]於是成千上萬的人前往紫禁城旁的太廟瞻仰周恩來的骨灰盒。雖然禁止佩戴黑紗，製作黑紗的黑布和紮小白花的白紙還是在北京脫銷。^[5-10]到 1 月 12 日，大約已有 200 萬人曾前往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花圈和祭文。^[5-11]

在 1 月 12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提議由葉劍英元帥在 1 月 15 日宣讀政治局為追悼會準備的悼詞。葉帥在一個月前剛讀過康生的悼詞，儘管鄧小平當時正受到猛烈批判，他還是想給鄧小平一個宣讀悼詞的機會。其他政治局成員接受了葉劍英的建議。^[5-12]毛澤東雖然有權阻止，但否定政治局的決定也會令自己難堪，因此也同意了由鄧小平宣讀根據政治局指示正式擬定的悼詞。

在追悼會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向精心挑選的 5,000 名與會者宣讀了悼詞。據經常給周恩來和鄧小平當翻譯的冀朝鑄回憶，很少感情外露的鄧小平「剛開口讀到『我們的總理』時就聲音哽咽，停頓了一下。每個人也都在落淚」。^[5-13]半個世紀以來，鄧小平的生活與周恩來難分難解，兩人都在毛手下兢兢業業幹了幾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過罪。這是鄧小平在 1977 年春天復出之前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鄧小平宣讀的悼詞頌揚了周恩來。但悼詞內容是按政治局的指示寫就的，所以毛澤東和「四人幫」也很難不同意。悼詞中說：周恩來為黨、為戰無不勝的人民解放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為工人、農民和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作出了貢獻。他為無產階級專政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外交事務上他貫徹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周恩來同志一生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他總是顧全大局，遵守黨紀，善於團結絕大多數幹部。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為其他領導人樹立了生活艱苦樸素的榜樣。鄧小平又總結道，他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疾病作了頑強的鬥爭。^[5-14]

追悼會一過，立即宣佈正式的悼念活動結束。儘管報紙上刊登了追悼會的簡訊和鄧小平致的悼詞，但與革命領袖去世時通常的做法相反，版面上幾乎沒有刊登任何介紹周恩來生平的文章，也沒有關於天安門廣場上和運送靈柩時參與悼念群眾人數的官方估計。對於這種淡化周恩來去世的做法，很多人感到憤憤不平，不僅是因為沒有為受到他們崇敬的人舉行適當的悼念會，還因為這暗示著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對手在政治上佔了上風，他們將實行與周恩來背道而馳的政策。^[5-15]

追悼會過後，按周恩來遺孀鄧穎超的請求，由她陪伴周恩來的骨灰前往機場。在那裏，工人將骨灰送上一架飛機，從空中撒向他奉獻了一生的中國大地。^[5-16]

鄧小平下台和華國鋒當選：1976 年 1 月

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僅僅讓政治局的批鄧會議中止了幾天。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兩次檢討很不滿意，在周恩來追悼會的前一天就作出指示說，要把這些檢討印發政治局，作進一步的討論。^[5-17]在鄧小平看來毛的意圖不言自明。在 1 月 20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當鄧小平第三次作檢討時，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機會見到毛主席。江青問鄧小平為何要見主席，鄧小平說，他要親自向主席說明自己錯誤的嚴重性，親自聆聽主席的批評和指示，還要對自己工作中的一些問題作出說明。^[5-18]但是毛澤東一向拒絕跟他的批判對象見面，這次也不例外。他不想單獨聽鄧小平說什麼，因為鄧小平很容易事後不認賬。^[5-19]

鄧小平知道自己無法單獨見到毛澤東後，立刻提筆給他寫了一封信，實際上是宣佈自己準備辭職。他把信交給了毛遠新，請其轉交毛澤東。他寫道：「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懇請予以批准。^[5-20]現在，已過去兩個多月，批判還將繼續下去，再不提出會妨礙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過失。至於我自己，一切聽從主席和中央的決定。」^[5-21]

毛在收到鄧小平的信後，第二天又與侄子見面，聽他彙報鄧小平在昨天會上的表現。在毛遠新看來，鄧小平的檢討仍然不充分。毛遠新還向毛澤東彙報說，三位副總理——華國鋒、紀登奎和陳錫聯（這三位年輕的省級幹部分別在 1973 和 1969 年調入政治局，日後成為更高職務的主要候選人）——都請求有人牽頭處理國務院工作。毛立刻回答說，可以讓華國鋒帶個頭，並隨即主持黨的日常工作。^[5-22]

華國鋒不僅對外國人來說是個新面孔，甚至對中國民眾也是如此，但毛澤東認識華國鋒已有 20 年。毛第一次見到華是在 1955 年，當時華在毛的家鄉湖南湘潭任地委書記，大力擁護毛澤東激進的農業集體化政策，給毛留下了良好印象。在過去的 20 年裏毛澤東一直很瞭解華國鋒，華國鋒在每一場政治運動中都堅決擁護毛澤東，而每一次運動之後

也都得到了提拔。在毛 1959 年批判彭德懷和後來林彪墜機後批判林彪時，華國鋒都證明了自己是毛的可靠擁護者。其他北京領導人是在 1973 年華國鋒升進政治局後，才有機會對他有所瞭解（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王洪文性情固執、難與他人共事，華國鋒則是與觀點不同的幹部也能做到關係融洽。華在文革前就是高幹，因此那些剛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容易接受他。「四人幫」也接受他，因為他們樂觀地以為此人性格溫順，易於操縱。

毛澤東告訴毛遠新讓華國鋒牽頭的同一天（1 月 21 日），張春橋和江青安排召開了清華、北大的黨委會議，會上第一次點名批判了鄧小平。曾經受到鄧小平支持者批評的清華幹部遲群，帶頭組織了更多公開批鄧的會議。^[5-23]

毛澤東先公開批鄧，再讓他退出政壇，他作這樣的時間安排自有其考慮。在 1975 年，群眾都把鄧小平看作領導人，認同他的工作表現。為使華國鋒這個新領導人被人們接受，不因鄧小平的存在而受到影響，最好是讓鄧小平退出公眾視野，降低他在群眾中的威望。

中國民眾和外國媒體是從 1 月 26 日的《人民日報》上預感到了華國鋒的高升。雖然這則新聞沒有用通欄大標題，而是放在第三版一條不起眼的報道中，只說華國鋒接待了一個羅馬尼亞貿易代表團。^[5-24]1 月 28 日，毛澤東正式讓華國鋒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5-25]2 月 2 日，鄧小平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向全國高層幹部宣佈：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華為代總理。^[5-26]鄧小平這時已經退出人們的視線。他提出辭職後，直到 1977 年夏天才回來工作。^[5-27]

毛澤東知道，華國鋒不像鄧小平、周恩來那樣出類拔萃，但他實在找不到其他年齡和經驗都合適、又能符合其要求的幹部。至少就當時而言，毛澤東雖然放棄了鄧小平，但他並沒有放棄抓安定團結，而華國鋒（與王洪文不同）既不樹敵，也不搞派系。其實，華國鋒屬於那種鄧小平考慮提拔下級幹部時也會尋找的人：他是一步一步被提拔起來、能夠解決問題的實幹家。雖然他缺少馬列主義理論素養和外交經驗，但毛澤東希望他能逐漸熟悉這些領域。

也許對於毛澤東來說，最重要的是華國鋒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確信他不會否定文革。與鄧小平不同，華國鋒沒有自己的勢力基礎，他能掌握領導權全憑毛澤東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會維護毛的威望和遺志。^[5-28]

但是，在高層缺少經驗的華國鋒只是被任命為代總理：毛澤東在最終任命他之前，仍然要觀察他。1975 年 1 月，毛對鄧小平表現出的領導能力十分放心，才把黨政軍全部頭銜正式交给了他。相反，華國鋒在 1976 年 1 月既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也沒有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甚至沒讓他擔任任何軍隊要職。但是毛澤東確實把主持政治局會議、領導黨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全部責任交給了華國鋒。華最初的任務之一是領導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即批判鄧小平為許多老幹部恢復工作的做法。

批鄧運動的失敗

即使在撤了鄧小平的職，準備對他進行公開批判之後，毛澤東對批鄧仍是有節制的。他在 2 月 21 日選定華國鋒後的講話中說，與鄧小平的分歧還不是那麼嚴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對鄧小平的工作以後還要再商量；現在可以減少他的工作，但還是要讓他繼續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毛澤東沒有完全拋棄鄧小平，但他決定開展一場公開的批鄧運動。他還盡量減少鄧小平對軍隊的控制，使他難以聯合軍隊反對自己。

1 月 18 日，即鄧小平把辭職信交給毛澤東的兩天以前，大約有七八千名國防科技幹部在先農壇體育館召開了批判「右傾翻案風」的大會。曾與鄧小平在國防科技領域密切合作過的張愛萍將軍此前已受到嚴厲批評，江青甚至說他是國民黨特務。張捎話說自己身體不適不能到會，並稱自己作出的決定由他本人承擔責任，與部下無關。^[5-29]

當政治氣候迅速轉為不利於鄧小平及其同事時，張愛萍將軍並不是唯一感到不適的人。除了張愛萍以外，另外三個「金剛」及其親密同事——胡耀邦和他推動科技工作的同事，萬里和他主管鐵路的同事，以及周榮鑫和他教育界的同事——也都受到了批判。兩個月後周榮鑫去世。中央在 2 月 2 日宣佈，由於葉劍英元帥生病，由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陳錫聯在遼寧時與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過從甚密，因此毛遠新可以做陳錫聯和毛澤東的聯絡員，確保軍隊維護毛的利益。2 月 16 日中央批准了中央軍委的報告，宣佈鄧小平和葉帥去年夏天在軍委擴大會上的講話有嚴重錯誤，停止傳達他們的講話文件。此報告一公佈，鄧小平和葉帥在軍委的工作也隨之結束。^[5-30]毛澤東不想冒任何風險，讓受到批判的鄧小平和葉帥有可能與軍隊領導人聯手跟他作對。

由毛遠新牽頭，中共中央組織召開了由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批鄧會議。這次會議從 2 月底開到 3 月初，很多地方領導人都是在這次會上第一次聽說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而材料又是毛遠新搜集整理的。毛對毛遠新說，鄧小平把毛的「三項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放在一起的行為，既沒有得到政治局

的批准，也沒有向毛彙報。毛還批評鄧小平所講的「白貓黑貓」論（即「不管是黑貓、白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認為這個說法並沒有將帝國主義和馬列主義區別開來，反映出鄧小平的資產階級思想。張春橋插嘴說，鄧小平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

這之前在會上批鄧是不點名的，但是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點了鄧小平的名，批他搞「修正主義」路線。不過華國鋒和毛澤東一樣，對批鄧運動作了一些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3月3日，毛澤東和華國鋒批鄧的文件傳達到了全黨。^[5-31]

江青像通常一樣，沒有那麼節制。她在3月2日召開了一個12省負責人的會議，試圖將鄧小平錯誤的嚴重性升級，把他稱為「反革命」和「法西斯」。在毛澤東看來這太過分了。他批評江青不跟自己商量就開會，並禁止發表她的講話錄音。3月21日，《人民日報》號召「深入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但北京的幹部明白，毛澤東仍希望鄧小平回心轉意，這是在給他機會。^[5-32]然而鄧小平沒有任何軟化立場的表示。到4月5日時事情已經很清楚，批鄧運動在群眾中是不得人心的。

示威支持周恩來和鄧小平——天安門廣場：1976年4月5日

中國的清明節（每年的掃墓日）是每年祭奠亡靈的日子。離1976年清明節4月5日還有好幾周的時候，「四人幫」就預感到有人會利用這個時機上街遊行悼念周恩來。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僅幹部和學生，很多一般群眾也對1月份沒有為周恩來舉辦適當的悼念活動感到氣憤，他們的確打算在清明節表達對周恩來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幫」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批判鄧小平及其「後台」，稱還有另一個「走資派」。人人都明白這是指周恩來。在這件事上，「四人幫」理解民情的能力極差，因為這篇試圖抹黑周恩來的文章引起了反彈。當年當過紅衛兵的人憤怒了，把他們過去在批判江青的對手時學到的本領反過來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圍了報社，要求作出解釋。

在距上海三小時火車車程的南京大學，很快就出現了抨擊《文匯報》文章的大字報，示威也從大學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們抬著花圈從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進發，將花圈擺放在陵園內；這裏是為紀念被國民黨殺害的十萬共產黨人而建立的墓地。後來「四人幫」讓自己的人取走花圈，並阻止了進一步的示威。他們不讓官方媒體報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卻無法阻擋消息從非官方的渠道傳播到其他城市。^[5-33]

3月26日，南京爆發示威活動的次日，鄧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批判為名聲掃地的黨內資產階級的頭子，並被譴責要搶班奪權、另立中央、最終復辟資本主義。^[5-34]實際上鄧小平還受到警告說，4月5日如果發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對其負責。

僅僅四天之後，3月30日，悼念周恩來的第一批花圈開始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人們張貼悼念周恩來的詩文，歌頌周恩來、抨擊「四人幫」的演說開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報表示支持鄧小平，還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為漢語中的「小瓶」與「小平」諧音。

北京的中共領導層試圖阻止民情的進一步宣洩，宣佈各單位可以在自己單位內開展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但要維護天安門廣場的秩序。他們派出巡邏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動。北京市的官員估計，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約有100萬人去過廣場，當天廣場上的人數最多時達到10萬，並一直維持在數萬人以上。^[5-35]北京市的領導發出緊急通知說：「不要去天安門送花圈……送花圈是舊習俗。」^[5-36]但是消息不脛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估計超過了200萬人）。人們向周恩來表達敬意，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

為避免讓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擊自己，鄧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的詩文、大字報、小白花、花圈越來越多。^[5-37]人們聚集在演講者周圍，聽他們冒著被捕的危險表達對周恩來的愛戴；演講者們表示，不惜犧牲生命也要反對陰謀篡權的「四人幫」。廣場上的人來自各行各業，有幹部、學生、工人和農民。^[5-38]幾個最大膽的演說者遭到逮捕。親自觀察過現場的英國大使館官員羅傑·加塞德（Roger Garside）說：

這次人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比我見過的任何國家葬禮都要感人。這種政治示威與我在中國見過的任何事情大相逕庭。一大批人群的行動是發自於信念——表達著多年來暗流湧動的思想感情。這是一對周恩來去世後所受待遇的憤怒，是反抗毛澤東的精神，是對中國未來的憂慮，是對那些肯定會懲罰示威者的人的蔑視。——人民收回了給毛的授權。^[5-39]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研究如何應對廣場的事態。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員葉帥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鄧小平也沒有到會。華國鋒主持了會議，並且有毛遠新到場。北京市委書記兼革委會（它全面負責北京的治

安)主任吳德在會上說,廣場上的 2,073 個花圈分別來自 1,400 多個單位。一個地方的花圈堆了六米多寬。吳德還報告說,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劃這些活動,而且受到鄧小平的影響。江青想要讓示威停下來,她宣佈,清明節已經結束,要在黎明前把花圈清理出廣場,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華國鋒指示吳德想辦法落實江青的要求。^[5-40]

4 月 5 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約 200 輛卡車來到天安門廣場,工人們把花圈扔到車上拉走了。天亮之後人群又湧入廣場,人數超過 10 萬。當他們明白了發生的事情後,群情激奮,開始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無畏的人群衝擊人民大會堂,點燃汽車,砸毀自行車,追打一位外國攝影記者,還攻擊了一座駐有民兵的小樓。

當天下午政治局再次開會。已多日不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鄧小平被叫到會上接受批判。張春橋首先攻擊鄧小平說,他和納吉(Imre Nagy, 1956 年匈牙利暴動的主使者)一樣。^[5-41]毛遠新接著傳達了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書面和口頭指示,鄧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了毛澤東要調動 10 萬民兵鎮壓示威群眾的命令。但是負責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說,頂多可以調動 3 萬民兵,吳德也補充說,這麼多民兵對付不了廣場上的大批抗議群眾。

接下來,張春橋說,吳德應當向示威人群發表廣播講話。於是吳德寫了一個簡短的廣播稿,把它交給華國鋒等政治局成員過目,他們同意了講話的內容。廣播稿不提抗議的原因,而是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讓他們警惕廣場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這些人在把悼念活動轉變成一場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政治運動。它還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他們不是團結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周圍,而是大刮「右傾翻案風」。廣播員說,由於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這一事件,革命群眾應當立刻離開廣場。

4 月 5 日下午 6 點 30 分,政治局的錄音講話在廣場上播出。在《人民日報》次日刊登的這篇講話中,加上了沒有出現在廣播中的鄧小平的名字,特別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5-42]

根據政治局批准的計劃,民兵要在晚上 8 點出動,但當時在場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認為,廣場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對一直與他保持電話聯繫的華國鋒和陳錫聯解釋說,民兵此時清場為時尚早。晚 10 點半廣場上打開了探照燈,再次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要求抗議者離開廣場。最後,夜裏 11 點吳忠打電話報告吳德,還留在廣場上的示威者大約只有 1,000 人了,吳德下令出動民兵。當時逮捕了 38 人(按後來追查,又陸續拘捕了 260 餘人,先後共拘押 388 人)。雖然警察沒有使用槍械,但他們確實使用了棍棒,有數十人受傷,清場之後街上留下一些血跡。^[5-43]但沒有關於死亡的報道。

幾小時以後,4 月 6 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員開會評估這一事件。他們斷定示威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因此已經構成一場反政府的陰謀。當天下午,毛遠新與毛澤東會面,一起討論了事件的性質,毛主席同意宣佈這是一場陰謀。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本人認為鄧小平是組織示威的幕後黑手(如公開宣佈的那樣),但他確實認為,假如鄧小平繼續掌權,將會把黨帶上一條錯誤的道路。^[5-44]當天晚上,江青也與毛澤東見面,再次要求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但毛澤東仍然沒有同意。^[5-45]

當時在中央檔案館工作的高文謙說,對毛澤東來說,4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情是「十分令人沮喪的。……以往他總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民眾的山呼『萬歲』,而如今竟成為人們聲討的對象,……(他)身後恐怕也難逃歷史的清算。……毛澤東內心的沮喪和恐懼的心情可想而知」。^[5-46]中國當時並不採用投票選舉方式,甚至連村級選舉也沒有,但是天安門事件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民眾政治覺悟最高的北京,毛澤東已經失去民心,周恩來才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鄧小平也有足夠的民意支持成為主要領導人。

撤掉鄧小平和提拔華國鋒：1976 年 4 月

4 月 7 日上午,當毛遠新再次向毛澤東報告最新事態時,毛給了他一份書面批示,對如何進行稍後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作出了指示。在政治局開會時,毛遠新出示了毛澤東寫的紙條,上面寫著:「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簡言之,運動變成了反革命運動,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更加嚴重,成了黨與企圖推翻黨的敵人之間的矛盾。毛遠新還向政治局傳達了毛主席的兩條建議:第一,代總理華國鋒正式擔任總理和黨的第一副主席;第二,當時仍未被正式撤銷黨政軍職務的鄧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職務。然而,即便在這時,毛澤東對待鄧小平仍是有節制的,還指示說,對鄧小平要「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毛的指示傳達後,政治局會議上一片沉寂,隨後便批准了毛的建議。只要毛澤東一張口,結果從來不會有任何意外。

毛澤東把鄧小平徹底趕下了台。但是當汪東興最先向毛澤東透露江青有可能動員群眾批鄧時，毛指示汪東興把鄧小平轉移到一個離他的子女不太遠的安全地方，住處要向「四人幫」保密。^[5-47]

毛澤東把權力全部交給華國鋒，免去了鄧小平的一切正式職務，這就為華國鋒領導國家掃清了道路。在毛澤東看來，華國鋒擔任代總理的幾個月裏沒有犯過大錯，況且他也沒有更好的人選能既忠實於他的威望、又能與激進派和老幹部搞好關係。華國鋒在鎮壓「四五」示威時也行動有力。

一些瞭解內情的北京幹部相信，直到 4 月 5 日之前，毛澤東一直保留著讓鄧小平和華國鋒共同承擔領導責任的可能。但是 4 月 5 日群眾表現出的對鄧小平的擁護程度，使這件事變得根本不可能了：華國鋒將被鄧小平壓倒。毛澤東允許鄧小平保留黨籍，給他留下了重新報效國家的可能，只是現在還為時尚早。這一晚 8 點，發佈了華國鋒被任命為黨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總理的公告。^[5-48]

全國各大城市黨的上層負責人紛紛召開表態大會，向華國鋒表示效忠。各個單位和大學也召開了同樣的表態大會。例如北京大學的全體學生就接到通知收聽 4 月 7 日晚上 8 點的重要廣播；到了指定時間，校內的廣播喇叭宣讀了慶賀新上任的第一副主席和總理華國鋒的公告，然後宣佈召開由各系代表參加的全校大會。代表們在會上聲討鄧小平，支持華國鋒。不過，有些人注意到，發言者一本正經地唸稿子，卻幾乎沒有表現出 4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者那樣的熱情。^[5-49]

雖然華國鋒很少能見到毛澤東，但是在 4 月 30 日新西蘭總理馬爾登（Robert Muldoon）訪華期間他與毛澤東見面時，毛拿出一張紙，在上面潦草地塗了幾句話交給華國鋒：「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5-50]華國鋒當時沒有把毛澤東這條最後的指示公之於眾，但紙條的真實性和毛澤東的意圖無人質疑。^[5-51]毛選定了華國鋒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斷是，華國鋒會一直忠實於他和他的路線，他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但是他希望華國鋒能夠團結激進派和老幹部的想法卻未能如願。毛去世之後沒過幾天，華國鋒就斷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進派同夥共事。毛澤東還希望華國鋒在葉帥和李先念等老幹部的支持下，能夠形成一個長期穩定的領導班子，這個願望也未能變成現實。

1976 年 4 月 7 日以後的鄧小平

1976 年 4 月 8 日，鄧小平被撤銷一切職務的次日，鄧請汪東興把他的一封信轉交毛澤東。鄧小平在信中明確表示自己仍會遵守黨紀。他寫道：「我完全支持黨中央讓華國鋒同志擔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的決定。」他知道江青想把他開除出黨，又說：「我對於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激。」^[5-52]

但是，鄧小平不被允許參加黨內討論或公開會議，也不能參加紅軍司令朱德（7 月 6 日去世）和毛澤東（9 月 9 日去世）的追悼會。^[5-53]在毛澤東逝世當晚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再次試圖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但不僅遭到葉帥的反對，也被恪守毛澤東命令的華國鋒拒絕。^[5-54]

被批判和孤立的壓力即使對鄧小平這麼剛強的人來說也是一種重負，何況很多人沒他那麼飽受折騰。4 月 5 日之後，批判周榮鑫的會議愈演愈烈，連負責清理天安門廣場的吳德也承認，是「四人幫」和遲群「把他鬥死了」。^[5-55]

毛澤東不僅保護鄧小平，允許他留在黨內，還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關照。例如，鄧小平在 6 月 10 日讓汪東興把他的一封信轉交華國鋒和毛澤東，他說自己的妻子為了治療眼疾住進醫院，最好能有一位家人在醫院看護她。毛澤東批准了他的請求。鄧小平在 6 月 30 日也接到通知，他可以從東交民巷的臨時住處搬回寬街的老住所。即使在彌留之際，毛澤東也沒有完全放棄鄧小平。

鄧小平一家人搬回原來的家九天以後，北京一百多公里外的唐山發生大地震，官方統計有 24.2 萬人死亡。北京也有強烈震感，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建築結構受損。如同帝制時代一樣，有人認為這場災難是上天對統治者不滿的徵兆。鄧小平一家人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在院子裏搭了一個帳篷，一直住到他們不再擔心房子倒塌為止。鄧小平一家人搬回原來的家之後，從 1976 年 4 月 5 日直到 1977 年初恢復工作，他在寬街的生活就像在江西的三年一樣，又變成了以家人為中心，並只能從報紙和電台上瞭解新聞。

1976 年 4 月 7 日後的政治制衡

華國鋒被選為總理和第一副主席意味著他在政治上的排名第一次超過了「四人幫」。華國鋒想跟「四人幫」搞好關係，可是他們卻要唱自己的戲。大體而言，他們是激進派的宣傳家，華國鋒則是解決問題的實幹家。此外，華國鋒的晉升也使「四人幫」有理由把他視為勁敵。

華國鋒從一個謙遜的中層幹部到突然身負大任，在把握緊張的政治氣氛上格外小心。很多老幹部支持他，是因為至少在短期內他們找不到另外一個能維護國家團結的人，還因為華走的是溫和路線，更因為華主動和他們合作。

直到 4 月 7 日以前，毛澤東仍然大權在握，仍有精力操縱上層政治，但是他也知道，人們都覺得他最多活不過一年。他已經看到耗子們正在棄沉船他去。2 月 23 日他會見尼克遜總統時，提到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六廠兩校」，他說：「我也只能管得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5-56]高層幹部因為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仍然尊重他，但是他們也在考慮還要在多大程度上服從他。他已經不再能把自己的威名變為實權，像 1958 年或 1966 年至 1967 年那樣動員全國了。

毛澤東選定了華國鋒，並在 4 月 7 日進一步明確地把統治權交給他，但無論在這之前還是之後，兩人之間都很少直接來往。在這之前，即使臥病在床，毛仍然積極部署批鄧運動，挑選未來的領導核心。而 4 月 7 日之後，尤其是 5 月 11 日第一次心臟病發作之後，他就既無心也無力積極指導華國鋒了。與此相反，江青依然精力充沛，猛批鄧小平和其他老幹部。她盡力鞏固自己的關係網，重點首先放在黨和軍隊的宣傳部門上，並且恫嚇那些畏懼在毛死後由她掌權、不敢得罪她的人。

1976 年 5 月，葉帥的至交之一王震將軍去西山軍區大院葉劍英的住處看望葉。王震提出了如何對待「四人幫」的問題。當時還很少有人敢於說出很多人的心裏話：其實「四人幫」本是一個以毛主席為首的「五人幫」。的確，據說當王震小心翼翼地問葉帥對「四人幫」的看法時，葉帥擔心可能有人竊聽，便展開右手四個指頭，並把拇指彎向掌心，他的意思是，等毛澤東撒手人寰之後再說吧。哪怕這個故事是捏造的，北京也有很多人相信它，它也符合葉帥的風格。

身為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在部署批鄧和提拔華國鋒上扮演著核心角色，但是 4 月 5 日之後，隨著毛澤東不再積極問政，毛遠新的角色也變得不再那麼重要了。

儘管華國鋒在 4 月 7 日擔任了更高的職務，他並沒有獲得對軍隊的控制權，這使他不能像鄧小平那樣行使權力。華國鋒指導行動的治國方針並沒有遠離鄧小平的做法：即以務實的方式推動四個現代化。上面的決策仍然懸而未決，下面的官僚系統則每日每天繼續運行著，儘管缺少大方向；同時不安地等待著毛澤東之後新的權力格局的出現。

毛澤東去世：1976 年 9 月 9 日

1976 年 5 月 11 日，天安門示威剛過去一個月，毛澤東犯了心臟病（心肌梗塞）。他仍然有意識，但身體已變得十分虛弱。此前毛澤東還一直能審閱政治局的文件，在政治局的決定向下傳達和落實之前給予最後的批准。但是在 5 月 11 日之後，他就不再能看文件了。6 月 26 日他的心臟病第二次發作，9 月 2 日又發作了一次，並於 9 月 9 日零時 10 分去世。自動成為黨的代主席的華國鋒當天清早馬上召集政治局開會，批准了宣佈毛澤東逝世的訃告。訃告將於當天下午 4 時公佈。

毛澤東的去世讓舉國陷入受政府引導的悲痛之中。這是一個領導了中共 40 年、領導了國家 27 年的傳奇人物；政治上一無所知的普通群眾一向接受著熱愛毛主席的教育，為他們頂禮膜拜的領袖的去世而落淚，表達著他們的崇敬之情。即便是那些參加「四五」遊行的人也在擔憂毛的去世將對國家的未來、甚至對自己生活產生何種影響。中國是否會回到 1966 年至 1969 年的混亂狀態？政府是否會崩潰，使得國家陷入內戰？

不管高層幹部有多少類似的擔憂，眼下他們得做非做不可的事——準備追悼會、處理遺體、寫公告、接待國內外各種團體、維護首都的治安。以華國鋒為首的 377 人的治喪委員會立刻宣佈成立，名單序列說明了官員的地位高低及其對黨和國家的貢獻多少。

北京和各省都在精心籌備追悼會，人人都在表達對毛的崇敬，政治角力也被暫時放在一邊。各級負責人各就各位，再次明確了他們在官場上的位置。華國鋒牢牢控制著追悼活動，他全面領導悼念活動的工作後來得到了很高評價。從 9 月 11 日到 17 日，人民大會堂每天都在舉行悼念活動。

9 月 18 日，按照常規仍由王洪文——他不再負責日常工作，但仍保留著正式職務——主持追悼會，但最高榮譽給了華國鋒，他在天安門廣場上宣讀悼詞，讚美毛澤東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估計有 100 萬人出席了追悼大會。同日，全國的工廠和列車鳴笛三分鐘致哀。華國鋒還宣佈，毛澤東的遺體在解剖之後，將被保留並供人瞻仰。

後來天安門廣場上建起一座紀念堂，參觀者在外面排隊進去瞻仰毛的遺容。鄧小平和 1975 年與他密切共事的幹部——胡喬木、張愛萍、萬里和胡耀邦——被排除在參加悼念活動的黨政領導人之外，這對於他們是一個打擊。不過鄧小平在家裏設了一個靈位，與家人一起私下祭奠毛澤東。^[5-57]

追悼活動一過，高層政治領導人又恢復了各種政治運作，以樹立和維護他們的公共形象，為必將來臨的權力鬥爭作準備。

抓捕「四人幫」

江青曾對她的西方傳記作者洛葛仙妮·維特克說：「性愛在最初幾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長久使人著迷的是權力。」^[5-58]毛澤東去世後，她曾驕傲地宣佈自己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一條狗。也許她還應當在「狗」前面加上「會咬人的」，這更能說明她的特長：她在肆無忌憚地毀滅毛認定的打擊目標這一點上無人能比。清楚她來歷的有教養的人，私下嘲笑她是一個專門和上層人物打交道的蕩婦和不正当發跡的二流戲子。她缺少那種自然而然獲得權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風度，表現出急於登上高位者的傲慢。即使為她工作的人也認為，她蠻橫無理，從來不體貼別人。她對 1940 年代以來一直躲著她的那些黨內老幹部恨之入骨。通過為毛澤東辦事，她得到了反擊的權力。作為毛澤東最壞的一面的化身，她很容易在中國為千夫所指。毛澤東從 1974 年開始要恢復安定團結，因此把她視為需要加點約束的炮筒子。但毛澤東仍然喜歡她的忠誠，關心她的生活，對她加以保護，以備自己的不時之需。

沒有跡象表明毛澤東曾經想讓江青掌握大權。而每當她暴露出這種野心，毛就會管束她。毛正式任命華國鋒擔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之後，她登上權力頂峰或在領導層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事實上已不復存在，雖然她的野心並未隨之消失。

江青從未培養出政治眼光、組織才能或與其他掌權者積極合作的能力，而這都是真正的權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質。她幹了太多過河拆橋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層幹部，疏遠太多同僚。她缺乏作為忠誠反對派的自制力。她缺少遠比她有組織能力的黨內老幹部的擁護。在軍隊中，除了總政治部以外，她實際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在毛澤東在世的最後一年，江青力求鞏固自己的地盤。她借助於黨的宣傳機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繼續開展毛澤東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她與上海民兵中能搞到武器的激進派保持著聯繫。將軍們並不擔心她有可能在任何關鍵性的軍事較量中取勝，他們擔心的是一些軍隊幹部會出於恐懼同她合作，擔心她煽動激進派鬧事，造成長期的爭鬥與混亂，這只會放緩中國前進的步伐。

江青知道，最能幫上她的就是找到、甚至是修改一些毛的文件，以使她確保更多的權力，並由她來闡釋毛的遺志。毛澤東一死，她便天天去找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要求她把毛的全部文件轉交給自己。她確實得到了一些文件，把它們留在自己手中數日，但當華國鋒堅持全部文件要由汪東興保管時，她的情願地把文件交了回去。其後她又對紀登奎施壓，想查看原來由林彪收集和保管、當時還封存於林彪在毛家灣住所的材料。^[5-59]

華國鋒致悼詞後的次日，江青要求立刻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處理毛的文件，常委會中要有她的盟友王洪文和張春橋，但不許葉帥到會。^[5-60]華國鋒感到別無選擇，只好在當天下午召開會議。江青把姚文元和毛遠新也帶到會上，她要求由毛澤東去世前十個月裏一直負責管理主席文件的毛遠新繼續掌管他伯父的材料，並準備一份相關報告。由於其他人對此表示反對，會議無果而終，結果材料仍然留在黨中央。^[5-61]

江青還試圖加強對宣傳部門的控制，她在文革早期個人權勢達到巔峰時就控制著那裏。此外她還動員年輕人繼續搞階級鬥爭，批判官僚主義。10 月 1 日在清華大學的一次講話中，江青鼓勵年輕人立下戰鬥到底的誓言。

當華國鋒聽說「四人幫」在一些會議上告訴他們的盟友 10 月 7 日、8 日或 9 日會有好消息時，他斷定必須立刻採取行動。雖然沒有江青正在策劃政變的證據，卻有另外一些不祥的徵兆。10 月 4 日遲群向江青發誓效忠，而 10 月 4 日《光明日報》重點推出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北大和清華一些激進派的筆名）——〈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聲稱「任何修正主義頭子（影射華國鋒），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出於對這些事態的擔憂，葉帥當天便去找汪東興和華國鋒商量，他們已經在擔心「四人幫」會很快採取某種行動。^[5-62]

沒有人懷疑江青屬於「你死我活」的政治傳統的一部分，她會一拼到底。任何逮捕「四人幫」的決定，都需要華國鋒代主席的果敢領導，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帥及時任中央警衛團（負責保衛黨中央）負責人汪東興的配合。一切都要面對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動迅速。毛澤東一死，當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葉帥就向華國鋒保證，他將全

全意支持華國鋒向後毛澤東時代順利過渡。毛去世幾天後，華國鋒就曾派李先念去葉帥那裏探聽如何對付「四人幫」的口風，李、葉二人都認為有必要抓緊採取行動。汪東興後來講述如何為逮捕「四人幫」作準備時說，華國鋒和葉劍英都是戰略家，他本人僅僅是執行了他們的命令。^[5-63]

葉帥力求避免在採取抓捕行動時軍隊之間發生衝突，造成進一步的混亂。「四人幫」在釣魚台的住所都有自己的警衛，因此應該避免在那裏交手。但是時機的選擇也至關重要。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這三位策劃者一致認為，必須搶在「四人幫」之前動手。在看過 10 月 4 日的社論，又聽說「四人幫」告訴其同黨到 10 月 9 日就會有好消息之後，華國鋒、葉帥和汪東興三人準備迅速採取果斷行動。同時，汪東興從他可以信賴的警衛團中逐個挑選了一小批可靠的人。

10 月 5 日下午葉帥分別與華國鋒和汪東興商量，他們決定由華國鋒發出通知，在第二天 10 月 6 日晚 8 時在中南海懷仁堂臨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這也有常例可循）；宣佈的會議內容包括三個重要問題：出版《毛選》第五卷，籌建毛主席紀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過去的住所的用途。通常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的只有華國鋒、葉劍英、王洪文和張春橋。這些議題都是王洪文和張春橋不肯錯過的。姚文元雖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一直是《毛選》第五卷出版工作的關鍵人物，請他到會參加討論也順理成章。

10 月 6 日晚，汪東興的一小批警衛人員已埋伏在室內，但是樓外一切如常。將近 8 點時王洪文從東門邁步走進房間，立刻就被警衛扭住。他怒斥道：「我是來開會的，你們這是幹什麼！」警衛把他摀倒在地拖進了大廳。華國鋒起身說道：「王洪文，你犯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中央要對你進行隔離審查。」王洪文被押出大廳後，張春橋也提著公事包準時到達。他正要從東門進入大廳，也被警衛抓住銬了起來。華國鋒向他宣佈要對他的罪行進行審查，他也乖乖就範。姚文元一到，在樓外就被逮捕了。

與此同時，一小隊警衛前往中南海中央委員會辦公樓江青的住所，向她宣佈要對她進行特殊審查。江青說她要去一下衛生間，於是一名女警衛陪同她前往。回來後她便被押上一輛轎車帶走。35 分鐘之內，沒放一槍一彈，沒流一滴血，「四人幫」的威脅就被消除了。^[5-64]

大約在同時，華國鋒和葉劍英還派出一隊特別人馬前往廣播電台、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新聞單位，以確保「四人幫」餘黨無法向社會傳播消息，不公佈任何新聞，直到把「四人幫」骨幹分子全部抓起來為止。「四人幫」被捕後的第二天，北京市委的謝靜宜和清華大學的遲群也被隔離審查。^[5-65]

接下來要抓緊解決的問題是，「四人幫」作為政治局委員一直抵制華國鋒成為正式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因為江青也在覬覦這個位置。為此，葉劍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開了一次沒有「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從晚 10 點一直開到凌晨 4 點，會上一致推舉華國鋒擔任黨的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他們還討論了需要採取哪些措施，以防「四人幫」餘黨製造麻煩。^[5-66]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後還立刻宣佈，將在華國鋒的領導下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鄧小平曾與「四人幫」極力爭奪此事的控制權；它為華國鋒提供了闡釋毛澤東遺志的重要機會。^[5-67]

「四人幫」餘黨製造動亂的最大危險來自於上海的武裝民兵。^[5-68]事實上，葉劍英和華國鋒等人對「四人幫」被捕一事嚴加保密，直到他們確定已經控制了上海的問題。據說曾長期擔任南京軍區（上海地區亦歸其管轄）司令員的許世友飛到北京向幾位領導人保證說，部隊對上海可能爆發的戰事已作好充分準備。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四人幫」被捕兩天後，上海的餘黨因為與他們聯繫不上懷疑出了麻煩，開始為武力反抗作準備。

北京為了對付這種威脅，電召江青在上海的同黨馬天水等人去北京開會，這些人一到北京，就稀裏糊塗屈服了。到 10 月 14 日，仍打算在上海策劃抵抗的人感到黨的高層幹部和群眾普遍反對武裝反抗，他們自知處境無望，沒打一仗就放棄了掙扎。中央隨即派遣蘇振華將軍為首的一批老幹部去上海穩定局勢。^[5-69]

同時，安全部門的幹部也在甄別「四人幫」過去的部下中哪些人是最危險的。抓捕「四人幫」後的第二天，北京大約抓了 30 名「四人幫」的鐵桿親信。公安幹部繼續監視那些可能構成安全威脅的人。^[5-70]毛遠新也被逮捕。

「四人幫」被捕的消息突然公佈，讓已經厭倦了無休止鬥爭的民眾欣喜若狂，也消除了他們對那些人會捲土重來的顧慮。10 月 18 日消息公佈時，全國各地爆發了自發的慶祝活動。據觀察到這些事件的外國記者報道，所有大城市都有異常興奮的群眾湧上街頭慶賀。^[5-71]

華主席尋求黨內支持

但是，對於是否應當逮捕「四人幫」，甚至對於毛澤東是否真心選擇華國鋒做接班人，黨內是有懷疑的。毛澤東事實上從未公開批評過江青，人們先前也從未聽說過「四人幫」一詞。高層幹部認為，毛澤東從未想過要逮捕「四人幫」，即便不喜歡「四人幫」的人也覺得應當服從毛澤東的遺願。

為了鞏固對華國鋒統治的支持，葉帥和李先念在各省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在北京召開的會議上力挺華國鋒。他們歷數「四人幫」的罪行，解釋抓捕他們的必要性。大多數高層幹部都同意有必要逮捕「四人幫」，並且承認華國鋒、葉帥和汪東興在行動中表現得機智而果敢。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第一次出示了毛澤東在 4 月 30 日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訪華期間給他潦草寫就的紙條：「你辦事，我放心」。^[5-72]此舉有助於使各軍區黨委書記相信毛澤東確實選擇了華國鋒。與會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當選的態度。華國鋒與「四人幫」的鬥爭後來被一再說成善惡之間的偉大鬥爭，是追求正確路線的黨與「四人幫」反黨集團的鬥爭。就像中國歷史文獻中記錄的很多故事一樣，這其實屬於成王敗寇的老生常談。不過，這一次就像 1949 年一樣，獲勝者確實得到了真誠而普遍的擁護。

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華國鋒決定繼續批鄧，拖延恢復鄧小平的工作。他在 10 月 26 日宣佈，當前要批「四人幫」，可以附帶批鄧。^[5-73]黨內對鄧小平的批判雖然沒有像當初「四人幫」那樣極端，但仍持續了數月。華國鋒還沒準備好讓鄧小平回來。鄧太有經驗、太自信，也隨時能夠掌控大局。葉帥也認為，華國鋒需要時間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還是讓鄧小平晚一點回來為好。臨近 1976 年年底時，葉劍英元帥和李先念等老幹部才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

[5-74]

鄧小平一向願意接受權力的現實，他是最早表示擁護華國鋒的領導人之一。10 月 7 日，鄧榕的丈夫賀平從葉帥的家人那裏聽到「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後，立刻騎自行車飛奔回家，向鄧小平一家報告了這個喜訊，因此他們是先於公眾知道此事的。^[5-75]鄧小平在 10 月 10 日寫了一封信，請汪東興轉交華國鋒。他在信中祝賀黨在華國鋒同志領導下採取果斷行動，取得了對陰謀篡權者的偉大勝利。他說：「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接班人。」^[5-76]

12 月 10 日，即抓捕「四人幫」兩個月後，鄧小平因前列腺疾病住進了解放軍 301 醫院。12 月 14 日黨中央通過決議，允許鄧小平閱讀中央文件。住院期間他拿到的第一份文件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這也是為了使他擁護華國鋒逮捕「四人幫」而預備的一系列文件中的第一份。鄧小平看過第一份文件後說，大量證據已經說明採取行動是正確的，他不需要再看更多的材料了。^[5-77]儘管如此，華國鋒與葉劍英還是親自請鄧來玉泉山，向他通報了粉碎「四人幫」的經過。^[5-78]

這時，另一些領導人已經開始推斷鄧小平將在某個時點回來工作。有些領導人認為，可能會給他安排類似於毛澤東在 1974 年設想的，讓鄧小平取代周恩來領導政府、同時配合王洪文的工作。或許鄧小平可以利用他的豐富經驗和能力，在黨的首腦華國鋒的領導下負責政府工作。其他人認為，可以讓鄧小平擔任更有限的角色，只抓外交。還有一些人則認為，可以在某個時候讓鄧小平完全接過黨的工作，就像 1975 年夏天那樣。為鄧小平恢復工作的決定於 1977 年 1 月 6 日作出。而實際情況是，華國鋒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讓鄧小平恢復工作。

毛澤東激進路線的終結

學者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inson）談到儒家思想在帝制末年的命運時說：當儒家思想喪失活力時，它雖然仍被供奉於廟堂之上受到人們祭拜，但是它已經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聯繫。同樣，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之後，毛仍被供奉在神壇上，到天安門廣場中心的毛主席紀念堂參觀的人仍然絡繹不絕，但是他的激進思想、他的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已經不再是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內容了。

其實，毛澤東激進思想與人們日常生活的分離過程，早在 1974 年毛澤東宣佈支持安定團結時就已經開始了。1975 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以及 1976 年初華國鋒掌權時期，這個過程一直在繼續。「四人幫」被捕後，激進的毛主義終於失去了最後的有力擁護者。宣佈「四人幫」被捕之後自發的歡慶，以及先前「四五」運動時的民意宣洩，都是強大而明顯的象徵，表明群眾憎恨給國家帶來嚴重混亂和破壞的毛澤東的激進思想。

後來的審判「四人幫」成了一次全民觀賞的廟堂祭典，這次審判中對毛澤東激進思想的譴責沒有針對毛，而是被轉嫁給了「四人幫」。其實，包括一些慶賀「四人幫」被捕收審的幹部在內，很多人過去都曾信奉毛的激進理想，甚至

參與過實現這種理想的努力。儘管如此，「四人幫」的覆滅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一種想通過不斷革命和階級鬥爭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滅。中國人在這種局勢的轉折中表現出的興奮和釋然，後來將會變成支持改革開放務實政策的深厚基礎。

[5-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6年1月8日，頁141。

[5-2]毛澤東對汪東興的評價，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7–8、602–604。

[5-3]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96), p. 482.

[5-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5日，頁140–141。

[5-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9日，頁141–142。

[5-6]關於周恩來晚年與毛澤東的關係，參見《晚年周恩來》。

[5-7]吳德：《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203–204。

[5-8]加塞德（Roger Garside）是1976年至1979年的英國駐華外交官；David Zweig是加拿大交流學生，兩人都會講漢語，那幾天的大多數時間他們都在天安門廣場。參看 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5-9]吳德：《吳德口述》，頁203。

[5-10]關於不允許佩戴黑紗的禁令，吳德：《吳德口述》，頁204。

[5-11]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0–13.

[5-1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12日，頁142–143。

[5-13]Chaozhu 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 285; 2002年4月對冀朝鑄的採訪。

[5-1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15日，頁143–144; 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p. 285.

[5-15]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13.

[5-1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14日，頁143。

[5-17]DXPCR, p. 372.

[5-1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20日。

[5-19]對黨史學者的採訪，無日期。

[5-20]DXPCR, pp. 372, 380–388;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414–415.

[5-2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20日，頁145。

[5-2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21日，頁145–146。

[5-2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21日，1月–4月，頁146。

[5-24]《人民日報》，1976年月1月26日。

[5-2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21日，頁146。

[5-2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2月2日，頁147。

[5-27]DXPCR, pp. 380–388;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15、21日，2月2日，頁143–147。

[5-28]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443–447.

[5-2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 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584。

[5-3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2 月 2 日，頁 147。

[5-3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2 月 25 日–3 月初，頁 147–148。

[5-3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8–24.

[5-33]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10–115. David S. 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March 1978): 154.

[5-3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3 月 26 日，頁 148。

[5-35]吳德：《吳德口述》，頁 204–206。

[5-36]Garside, *Coming Alive*, p. 115.

[5-37]關於鄧小平告訴家人不要去天安門廣場，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3 月下旬–4 月初，頁 148–149。

[5-38]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p. 154–158;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8.

[5-39]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6.

[5-40]吳德：《吳德口述》，頁 207–211。

[5-4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4 月 5 日，頁 149。

[5-42]吳德：《吳德口述》，頁 210–214。據 Garside 說，廣播是從下午 6 點半開始，9 點 35 分時打了探照燈，在紫禁城裏集結待命的民兵向廣場進發。見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8–135。「四人幫」被捕後，吳德多次為污蔑鄧小平作過檢討，但他也替自己辯解說，4 月 5 日那天他別無選擇，只能服從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決定。儘管有人說 4 月 5 日那天有大量流血，但對這一事件的 3 份調查報告，包括在醫院和火葬場及其他幾處的調查，都沒有找到有任何人死於鎮壓的證據。吳德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編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中一些記述的混亂，是由於中央政治局在 4 月 4 日和 5 日兩次會議被混在一起，讓人以為這兩次會議都是在 4 月 4 日召開的，還因為一些「四人幫」作出的批評沒有被記錄在案。見吳德：《吳德口述》，頁 218–221。

[5-43]2006 年 10 月 21 日對章含之的採訪。

[5-44]2006 年 1 月對一位熟悉毛遠新觀點的幹部的採訪。

[5-4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4 月 6 日，頁 149。

[5-4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08。

[5-47]即使是高層幹部也不知道鄧小平的去向，因此在外國人中間謠言四起，說鄧小平避走廣州，被他的老友和支持者、1974 年 1 月至 1980 年 2 月擔任廣東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將軍保護起來。不僅香港的報紙，連一些西方分析家也報道過這些傳言。見 Garside, *The Coming Alive*, p. 140;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367. 鄧小平的女兒後來糾正了這些誤解。

[5-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4 月 7 日，頁 150；吳德：《吳德口述》，頁 216–218。

[5-49]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 158.

[5-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 1778。

[5-51]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說毛澤東是在 4 月 30 日給華國鋒寫下這些話的。見 Zhisui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 5.

[5-5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4 月 7 日、8 日，頁 150。

[5-5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7 月 6 日，9 月 9 日，頁 151。

[5-5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9月9日，頁151。

[5-55]吳德：《吳德口述》，頁197。

[5-5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390.

[5-5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9月9日，頁151。

[5-58]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 449. 關於「四人幫」被捕的背景和過程的簡要記敘，見史雲、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8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第647–716頁；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策劃實施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11期，後收入李海文：《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1949–1980）》（上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下冊，頁248–281；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吳德：《吳德口述》。英文文獻見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p. 519–528;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and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0–45.

[5-59]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363–364。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p. 3–30, 615–625; 2007年10月對紀登奎之子紀虎民的採訪。

[5-60]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367。

[5-61]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369–370。

[5-62]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 524; 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4–5;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51–594.

[5-63]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368。是華國鋒還是葉劍英首先提議採取行動，以及兩人中誰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國學者中有不同看法。華國鋒掌權時，中國媒體強調他起的作用更大，他下台之後同一批媒體又強調葉劍英的作用。兩人顯然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對這個問題討論可參見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5-64]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377–380。

[5-65]Garside, *Coming Alive*, p. 154 與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 274 都提到未經證實的報道，稱毛遠新本想逃跑，在試圖登上一架去東北的飛機時被捕。但是看過很多黨內文件的范碩沒有提到這些傳言，香港《明報》和《爭鳴》雜誌曾經將這條傳聞和關於捉捕江青的戲劇化報道一同刊出，相關的概要介紹見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2–167。黨史專家也沒有證實這些傳言。另參見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0.

[5-6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2.

[5-67]Roderich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2.

[5-68]關於這些工人民兵的背景，見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5-69]程中原、李正華、王玉祥：《1976–1981年的中國》，頁11–14;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2–590.

[5-70]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4–167.

[5-7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0月21日，頁152;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65–166.

[5-72]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6–587.

[5-7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0月26日，頁152–153。

[5-74]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頁153。

[5-75] DXPCR, pp. 440–441.

[5-76]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0月7、10日，頁152。轉引自 Baum, *Burying Mao*, p. 43.

[5-77]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2月7、12、13、14、24日，頁153–154。

[5-78] 《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54。